东欧当代文学丛书

保加利亚
短篇小说选



新华出版社

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

余志和　樊　石
金丕良　张春荣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

余志和　樊　石
金丕良　张春荣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63,000字
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统一书号：10203·141　定价：1.65元

出 版 说 明

东欧各国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文学先驱者鲁迅、茅盾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致力于向我国读者介绍东欧各国的优秀作家和作品。解放后，东欧各国著名作家的杰作更多地被介绍到我国，受到读者的欢迎。

本丛书介绍东欧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优秀作品，分册陆续出版。举凡这些国家当代文学的名篇佳作，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均在编选之列。选材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也兼顾作品题材的广泛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本丛书是我国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东欧各国文学。我们期待这套丛书的出版，会使我国广大读者了解东欧各国当代文学发展概况和人民的生活及思想风貌，并从中得到艺术欣赏和借鉴，同时也进一步增进我们与东欧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目　录

尼·海托夫

山 羊 角

〔作者简介〕 尼古拉·海托夫(1919—)生于普罗夫迪夫州亚沃罗沃村，中学毕业后当过饭店服务员、石匠、面包师等。1943年肄业于索非亚大学林业系。曾编辑《人民文化报》和《我们的祖国》画报。担任过作协秘书长和《罗多彼》杂志主编等职。海托夫熟悉保加利亚农村的生活、语言和习俗，并据此创作了许多颂扬普通劳动者高贵品质的作品，如《粗俗的故事》、《海杜特》、《恰夫达尔统领》、《炉火》等。短篇小说集《粗俗的故事》新颖别致、独具一格，曾获得季米特洛夫奖金。

这个血淋淋的故事发端于一次强奸。有个名叫德利·穆斯塔法的家伙——埃尔克奇的看守，闯入扎戈雷村的卡拉伊万家，奸污了相貌超群的卡拉伊瓦尼查。她男人当时放羊去

了，赤手空拳的女人由于惊恐和折磨，昏了过去，男人回家时，发现她已不省人事。卡拉伊万牵来一匹骡子，把她驮到库克伦"圣医"修道院，用那里的泉水医治。不幸的女人没过多久就死了，她被葬在原地——库克伦修道院的旁边。

满腔怨恨而又走投无路的卡拉伊万在为妻子送葬后，放了一把火，烧了他在村里的房屋，带着十岁的女儿玛利娅住进了深山老林中的一间草房。父女俩在这间草房里孤孤单单地住了十年。玛利娅和他不幸的父亲历尽了无数的苦难。卡拉伊万从不回村，唯恐往事触痛他心上尚未痊愈的创伤。他不愿同人交往，大家也纷纷传说他疯了。谁都不敢从他草房边经过。通往草房的小道杂草丛生，那地方成了一片荒野。只有偶尔听见尖利的叫喊声和山羊的角斗声，人们才又记起，在山上某处，在悬崖峭壁之上，在狗熊出没、山鹰栖息的地方，卡拉伊万依然活着。

久而久之，大家都把卡拉伊万忘了。即便在发现德利·穆斯塔法那胸口有窟窿的尸体时，也没有谁提到他。那个窟窿既不是用匕首刺的，也不是用曲剑穿的，而是用山羊角扎的。人们在找到这个看守时，山羊角还插在他胸上，他死于一只狠毒的手。

土耳其人被激怒了。他们到处捉拿杀害穆斯塔法的凶手，但未能觅得踪迹。只知穆斯塔法在礼拜天丧命之前，曾跟几个同他一样淫逸放荡的汉子在树林里抢走了一个土耳其女人；他抓住斯塔尼马什科卖醋的罗克萨尼，用烧红的三棱刀刺进他的脑袋，掏了他的腰包。他还偷走了一个包工头的马，这个

包工头当时正在监视农民割麦。他恶贯满盈，活该被人扎死。

德利·穆斯塔法坟上的新土未干，正在凉台上喝咖啡的黑眼斯帕希亚[①]卡拉·麦米什先生又遭枪杀。当他家开凿的两眼"幸福泉"水声潺潺，旁边榆树林里的夜莺婉转啼鸣的时候，一颗子弹突然从林中飞来。卡拉·麦米什家的弟子、卫兵和长工东奔西跑，搜遍树林，也没找到凶手的痕迹。在斯帕希亚卡拉·麦米什的内室里，有九名保加利亚姑娘被抢去做他的妻妾。许多母亲因此哭得死去活来。他还把许多男子打得遍体鳞伤。在受他虐待的三百来个农民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把他杀死。

圣母日那天，又发生了新的流血事件。这是一桩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流血事件。在去乌宗卓沃的路上，在一个名为"奥尔曼鲍亚兹"的地方，哈斯科沃的官吏休斯尼和跟着他的两个心毒手辣的阿尔巴尼亚人被杀死了。阿尔巴尼亚人吃了子弹，而休斯尼挨了山羊角。死者旁边，一匹驮着两口袋白银的骡子在悠闲自在地啃草，无人过问。前来追捕强盗的侦探大惑莫解，惊恐万状。虽然确实没有找到线索，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接二连三杀死这些有神灵保佑的汉子的那个人，并非为了钱财，而是为了报仇。

"奥尔曼鲍亚兹"一带被细细搜查了一遍，追捕者一直搜到卡拉伊万的草房旁边，但见疯子端着筛子在播种黍子。他满脸络腮胡子，眼睛通红。疯子瞥见土耳其人，哈哈大笑，

---

① 斯帕希亚，土耳其封建主。

于是土耳其人急急忙忙离开了这个不祥之地。

严冬过去。土耳其财主们对德利·穆斯塔法、卡拉·麦米什和休斯尼的遭际已淡漠下来。可是，突然又有两个科扎诺夫的猎人——阿利舍和麦科，轮奸了一个正在翻地的妇女。科扎诺夫的“好汉们”在完成了这一“辉煌业绩”后，不出三天，阿利舍的房子就在一个晚上着了火。惊惶失措的阿利舍砸开窗子跳了出来，但门被卡紧，房檐塌下，吐着火焰的木板和木柱把他堆得严严实实。邻居们赶来救起他，他还在抽气，但被烧脱了一层皮。他被抬到一间茅舍里，可过了两天，茅舍也起火了。阿利舍的守卫逃之夭夭，强奸犯被活活烧死。那个看守这回看见了纵火者：一个身披兽皮、手持羊角的怪物。整整三天，看守吓得浑身筛糠，牙齿打战。

阿利舍的遭遇使麦科毛骨悚然，他躲在四堵石墙里面，不敢出门。他放出几只恶狗，还在院子四角各派了一名子弹上膛的卫兵。大约有一个月，谁也没有从这座显眼的房子进出。麦科盘腿坐在屋里，腿上放着枪，一味喝酒，以避开那些可怕的谣传。他甚至害怕睡着。一打盹，他马上又惊醒过来，朝耗子打架的天花板开枪。整个村子惶恐不安，居民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狗吠声撕人心碎。一天夜里，又有枪鸣，可谁也没有起床看看。第二天早晨，卫兵们发现他们的主子仰面朝天躺在地上，枪口对着嘴，脑袋开了花。据说他是吓得魂不附体，自己扣动扳机的。

谣言四起，说是魔鬼已同天堂串通一气。猎人不再狩猎。男子汉不轻易出门。土耳其人惶惶不可终日。在土耳其

人开设的咖啡馆里，人们讲述着种种怪诞不经的传闻、阴森可怕的踪影、灾祸临头的迹象。土耳其人再也不敢摸黑下地，也不敢闯到基督教徒的家里①。穷人们稍稍喘了口气，先前惧怕斯帕希亚的农民暗自高兴；他们感到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保护者的力量，这个保护者不肯露面，但总是见义勇为。只要哪个土耳其人想找碴儿，斜眼看人，大家就叫他规矩点，当心撞上山羊角。一个克尔贾利的斯帕希亚不听劝告，抢了农民的粮食，果然又被山羊角扎死。从此，"山羊角"——人们心目中的复仇者，便使那些坏家伙心惊肉跳，闻风丧胆。

扎戈雷一带的村庄又响起了风笛声。姑娘们走出家门，跳起了霍罗舞②，媳妇们戴上项链，腰间的银带扣闪闪发亮。卡拉伊万的那个村子格外活跃，因为那里有最佳的长笛吹奏者。斯塔尼马什科的年轻人纷至沓来，在长笛和风笛的伴奏下去教堂举行结婚仪式。还有些人到这里来尽兴玩耍，因为在那些艰难的年头，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寻欢作乐的。于是，在有一次过节跳霍罗舞时，一个双眸明亮、舞姿轻盈的姑娘露面了。她跳得如此起劲，如此灵活，以致耳环坠落地上。姑娘俯身去拾，一个山羊角从她怀里滑出来，"哐当"一声掉在卵石路上。姑娘脸一红，抓起山羊角，塞进怀里，迅即钻进穿着节日盛装的人群。

① 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土耳其人曾强迫保加利亚人信奉伊斯兰教。

② 霍罗舞，保加利亚民间舞蹈。

“山羊角，山羊角！”人们谈虎色变。风笛声猝然中止。长笛吹奏者直着脖子盯着这个奇怪的姑娘，光棍们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不幸的是，乡亲们认出了她就是美女玛利娅，卡拉伊万的女儿。这是一则耸人听闻的特大新闻，要保密是不可能的。一个吉卜赛木匠把它告诉了地方官，地方官带着一队兵痞包围了卡拉伊万居住的山坡。玛利娅一手放枪，一手挥刀，竭力抵抗。当她发现无法脱险时，为了不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她便奔到崖边，纵身跳进了深谷。“疯子”卡拉伊万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打散了蜂拥上来绑架他的警察，然后夺路逃走，钻进了密林。他的裤衩被子弹穿了许多窟窿。

土耳其人在卡拉伊万的草房里找到了一袋磨尖的山羊角，还在土豆窖里发现了各式各样的服装：跳面具舞的服装、乞丐的服装和吉卜赛人的服装。无所畏惧的反抗者和她的父亲正是穿着这些服装夜游的。

在这些流血事件发生后不久，一个衣衫褴褛的割草人来到库克伦“圣医”修道院，要求留在那儿当差。到底修道士中是否有人认出了他就是卡拉伊万，这不清楚，只知割草人夏天害了一场疟疾。临死之前，他要求忏悔，并且向牧师吐露了他的真名和来历。这次忏悔后来传到其他修道士耳里，广为扩散，才使我们知道，卡拉伊万在他妻子死后，一心只想报仇，并为这种可怕的报仇作了长期准备。他甚至装疯卖傻，以使人们不再留意他，忘记他。大家从他的忏悔中还知道，德利·穆斯塔法是在果园里酣睡时，被玛利娅套走的。整整一个星期，她在他脖子上拴上绳子，就象给马系上笼头

一样，牵着他在树林里转悠，最后才赏给他山羊角，把他扔到河里。为了击毙卡拉·麦米什，浑身是胆的玛利娅攀上庄园对面的一片榆树林，饥肠辘辘地熬了三天，直等到这个色鬼淫狂在凉台上出现为止。追捕者在她眼皮底下搜查时，她就坐在树林里。

阿利舍的房子，玛利娅和她父亲是用焦油球点着的。他们装扮成卖醋人，混进了这个土耳其村庄。骚乱之中，谁也没有留意他们。当受惊的土耳其人东奔西跑，在黑暗中胡乱打枪时，卡拉伊万和玛利娅却正混在人群中提水灭火。

这些故事听起来确实可怕，但最使牧师动心的，却是卡拉伊万承认，他为了替妻子报仇，竟然离经叛道，想把一个温柔的少女变成一个复仇的男人。他自己有一只手残废了，枪法不好，只能寄重望于玛利娅。

九年中，他压住怒火，强咽苦水，等待幼女长大成人。在此期间，他把女儿当成男孩训练，给她穿男装，束腰带，剃光头，教她打枪和舞弄大曲剑。机智灵活的"男孩"玛利娅整天赶着父亲的羊群翻山越岭，独自抵御饿狼的偷袭，比起有经验的老羊倌来毫不逊色，并且练就了惊人的枪法：她用她父亲的枪，能在三百步内，打中一颗猪牙。九年中，卡拉伊万求助于狂风暴雨，恶狼顽熊，运用他的全部经验和智慧，要撕碎一个女孩温柔的心，除去她身上任何女性的东西。

有一次，卡拉伊万发觉女儿瞅着一个镀锡的小盘发愣，便把草房内所有的盘子砸个精光，还把碎片埋到地下。他不仅剃光了她的头发，而且有一回还用火燎，使之不再生长。

纺车、剪刀、针线——所有女人用的东西，都被他扔掉了，毁坏了，为的是使姑娘不再意识到自己是个女性。他严密监视她，不许她同单身汉、任何男人晤面，实实在在把她变成了一个凶狠的人，一个可以毫不留情地把指甲刺进每个仇敌脖子的人。

平时，玛利娅总是走在头里，而她父亲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忽而装成瞎子，忽而装成樵夫，忽而装成卖醋人。她诡计多端，遇墙就跳墙，遇猎物就打枪，一再把山羊角刺进仇敌的胸膛而脸不变色。她听命于卡拉伊万，无所不为。然而，一件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 件事使老头 怕得要命。当父女俩想偷偷烧掉麦科的房子时，他们在一个羊倌的茅棚里呆了一个礼拜天，在那里吃饭、睡觉。就是在这一天，所有那些卡拉伊万花了九年心血残忍地要夺走的东西，都在姑娘的心里复苏了：玛利娅爱上了漂亮的羊倌，而羊倌也毫不怀疑，在这个年轻造反者的红色上衣下面，一颗女人的心正在剧烈跳动。经验丰富的父亲从她眼睛里放出的光芒，从她苍白的脸上浮起的红云，意识到姑娘情窦已开。这个坚毅而可怕的男人心里卷起了醋意的狂澜，在他们干掉麦科和离开茅棚后，他借口忘了扳机，再次回到茅棚，杀死了羊倌。

卡拉伊万并不知道，玛利娅已答应羊倌，礼拜天跳霍罗舞时同他见面，而她也根本没有怀疑，她父亲竟会亲手杀死自己女儿热恋着的人。玛利娅跳完霍罗舞后是否知道她爱上的羊倌已成了僵尸，是否知道这是她父亲干的？——这可不清楚。也许卡拉伊万的忏悔就在这里煞住，也许牧师记性欠

佳，把它忘了。

这个血淋淋的故事是我小时候从阿维尔基神甫——库克伦“圣医”修道院的一个老态龙钟的修道士那儿听来的。他不住在修道院里，而是住在修道院旁边一个他亲手搭起的茅棚内。据说，他是被修道院院长赶出来的，因为他议论过院长偷盗之事。老修道士不知道这个院长受到大主教的赏识和支持，因而在风烛残年突然被扫地出门。阿维尔基靠野果和别人的施舍为生。我曾看见他把干玉米芯捣碎，掺着玉米面烤饼吃。他烟瘾很大，可又买不起烟。我们这些放牛娃每次从他茅棚旁边走过，他都要问我们带烟没有。有时候，我们在烟地里捡些老叶子给他，作为报偿，他就给我们讲些人世间的苦难。其中一个故事就是讲的卡拉伊万和她的女儿——造反者玛利娅。这个故事又叫山羊角。阿维尔基出家时投靠的修道士，就是赐给卡拉伊万最后圣餐的那个神甫。

直到现在，阿维尔基神甫仿佛还在我眼前晃动——他蜷缩在褪色的道袍里，两脚裹着小块羊皮，白胡子被烟熏得焦黄。每每讲到玛利娅，他就两眼噙满泪水，激动地吐口唾沫，用这句老话收场：

“不平事太多啦，一个玛利娅算得了啥！所以，这个世界还没有治好！”

（余志和译）

迪·塔列夫

金钥匙

〔**作者简介**〕 迪米特尔·塔列夫(1898—1966)生于马其顿普里莱普，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斯拉夫语系。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铁灯》、《普雷斯帕的钟》、《伊林节》，中篇小说《基普罗维茨起义》，短篇小说集《金钥匙》、《旧房子》等。曾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锡拉克①·斯托伊科一屁股坐上马鞍，勒勒缰绳，沿着教堂那条街走去，马蹄在圆石路面上均匀地发出嗒嗒嗒的声音。正当他穿过一条斜街时，鲍格达娜·措尼娜冷不防从教堂大门那边的一个拐角蹦了出来。黑马哆嗦了一下。锡拉克·斯托伊科一勒缰绳，牲口立时收住脚步。姑娘被这突如其来的晤面惊呆了，慌忙往后一退，那长曳及地的鲜红的连衣裙

① 锡拉克一名意为孤儿。

的下摆飘了起来，露出了她花鞋上方雪白的腿肚。

"哎呀，吓死人啦！"鲍格达娜喃喃地自言自语，然后抬起眼睛瞅着骑马人，莞尔一笑。她那张猛地吓得煞白的脸泛起红晕，眼眶湿润了，似乎又想哭又想笑。

锡拉克·斯托伊科骑在马上，怒目而视，但他没有破口大骂，只是粗声粗气地问道：

"你是哪家姑娘？"

"我叫措尼娜，鲍格达娜·措尼娜。我爸爸早就死了。"姑娘心平气和地回答，又同样心平气和地瞅着骑马人眉头紧蹙的面孔。

锡拉克·斯托伊科又直视着姑娘的脸停了片刻，好象要记住她的名字，然后骑着马迅速远去了。

锡拉克·斯托伊科这个人与众不同。他不记得自己的爸爸、自己的妈妈——他的双亲死得早，撇下他孤苦伶仃一人，既无住房，又无亲友。刚刚长大，也就是刚会东奔西跑，他就象丧家狗一样只身流落街头。他衣衫褴褛，挨冻受饿，蓬头垢面，就连求得一点施舍也并不轻松；为了挣一口面包，他得替别人挑几百奥卡① 水，劈一院子木柴。后来他就夜间翻墙爬进别人的院子，潜入别人房内，但他并不能窃得什么，只是一味毁坏碍眼的东西。院里的蔬菜、树上的果子、笼里的母鸡，都被他糟踏个精光。他活象一个吸血鬼，竟然勒死了草棚里的两头奶牛。没有一个孩子敢在他眼前晃动，而当

① 奥卡，容量单位，一奥卡约等于一点三升。

他长到十六七岁时，就连大人也躲着他，免得同他狭路相逢。他骨瘦如柴，面孔黝黑，长着一双冷冰冰的凶狠的眼睛，煞是吓人，说不定还会杀人。

单身汉的生活使这孩子有了一副黑心肠。任何一句粗话，任何一个投向他的石子，都会激起他的愤恨，使他暴跳如雷。他形影相吊，而别人都抱成一团，离他远远的。他的苦命使大家感到害怕，他也仇恨所有的人。他恨他囊空如洗，似乎也恨他自身。有一回，他右手的一个指甲缝糜烂了。锡拉克·斯托伊科在疼痛难忍时，没有去找草药医治，而是干脆用牙齿拔掉了讨厌的指甲。

有一段时间，他不知躲到哪儿去了。过了十年，他回归故里。他在这些年中长高了，发胖了，紧闭的嘴唇两边挂着两撇细细的胡子，一张呆滞的脸表明他傲慢不逊，目空一切。在这十年中，锡拉克·斯托伊科也尝到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滋味。

他买下了衰微破败的老财主扎雷的房子，马上把昨天的房主赶出了大门，再把房子拆掉。看来，财主的这座房子勾起了他对不幸的孤独生活的痛苦回忆。他在原地建造了一幢有四十眼窗户的两层楼房，楼房的围墙高得挡住了邻居的菜地和院子的阳光。除了他自己和一个为他做饭洗衣的老太婆外，没有一个活人敢进楼去。高墙里面听不到说话的声音，大院里找不到一朵鲜花，包着铁皮的沉重的大门整天紧闭。

锡拉克·斯托伊科去城里转悠时总要骑马。他不会打招呼，不会讲一句人话。当他开始放高利贷时，城里的人全都

目瞪口呆。可是，谁要向他借钱，也就把命交给了他。他不断聚敛财富——购买房子、耕地、葡萄园，——一双瘦骨嶙峋的手无比贪婪地把一切攫为已有。锡拉克·斯托伊科想让全城的人都跪倒在他脚下。

他在见到鲍格达娜·措尼娜的第三天，第一次在城里步行，朝寡妇的房子走去。母女俩胆战心惊地迎接了他，可他连坐也不坐。他点了点头，示意姑娘出去。当屋里只剩下他和姑娘的母亲时，他开口道：

“我想要你的女儿。”

他似乎觉得这话重了点，又补充说：

“我想娶她。”

贫穷的老寡妇又吃惊又害怕，不知如何作答。她那张不听使唤的嘴勉强漏出了几个字：

“你问她吧。”

鲍格达娜在外面听到了一切，又回到屋里。她紧紧盯着锡拉克·斯托伊科的那双眼睛，想在他的眼睛里寻找恰如其分的答案。接着是一阵沉默，长时间的、令人心悸的沉默。鲍格达娜蓦地破颜一笑，大胆而清楚地说道：

“那好吧。”

唯有她看到了锡拉克·斯托伊科的脸轻轻地、迅速地颤抖了一下。

“现在就结婚，就在这个星期天。”他瞅着一旁说。

“怎么？可得准备准备。”姑娘的母亲说。

“我只要老婆，别的什么都不要。”锡拉克·斯托伊科说

着，抬腿就走。

尽管全城的人都在等着看热闹，但婚礼静悄悄地举行了。

鲍格达娜长得并不漂亮。可她笑得很美，那笑纹整天挂在她厚厚的嘴唇上，使她年轻的脸庞闪射着淡淡的、使人倾倒的光泽。还在俩人结婚的头几天，她就把自己的丈夫称作老爷，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比她年长许多岁。这种放肆使那只狼嗥叫起来，但她装着什么也没有听见。她在这么称呼他时，仿佛是在用她温柔的手指抚摸他，因此，锡拉克·斯托伊科的嗥叫声越来越小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看见周围的一切正在变样，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快活。仿佛乌云已被驱散，红瓦上和院子里又撒满了欢乐的阳光。鲍格达娜轻盈的步子、清脆的声音、朗朗的笑声赶走了令人沉闷的寂静，使锡拉克·斯托伊科的楼房里又有了生气。一个个房间窗明几净，使人觉得亲切、温暖、舒适。

“再给点钱，老爷，”鲍格达娜老在丈夫耳边说，“我要买四块窗帘，还要买一块白布来罩住客房里的坐榻。”

斯托伊科被周围的一切迷住了，于是给了钱。

院子里一垅垅鲜花怒放，漂亮的楼房里有了更多的欢声笑语——沉重的铁门现在成天敞着。

鲍格达娜似乎把自己的丈夫抱进了柔软和暖和的摇篮。她用忍耐和爱情感化他，用她勤快的手一刻不停地拂去他眼前的阴霾。她不怕他，总是用轻声细语来回答他的粗暴举止。

她小心谨慎地深入了他的心灵，看见了他自己并未觉察到的变化。虽然锡拉克·斯托伊科仍然板着一张脸，但年轻的妻子不把这放在眼里，仍然爱他，耐心地等待他。

她也关心他的马——按时上料和牵它去饮水，按时打扫马厩。一天午饭后，锡拉克·斯托伊科备好了马，准备出门。他把马留在院子里，上楼穿外衣去了。正在这时，从园子里出来的鲍格达娜看见背着鞍子的黑马，就走过去，抚摸它光亮的额头。她突然心血来潮，想登上马鞍坐坐，便把马牵到一块大石旁，骑了上去。黑马发现有人骑它，即刻朝大门走去。

"斯托伊科，斯托伊科！"鲍格达娜失声叫道，用颤抖的手死死抓住马鬃。

锡拉克·斯托伊科急忙跑了出来。他的脸由于为鲍格达娜担惊受怕而刷地变白。这样一种感情，他还从来没有体验过。年轻的妻子由于他的到来而有了勇气，她看见他煞白的脸，就嚷道：

"快点，老爷，这马要驮着你老婆赶集去啦！"

她刚才还急出了眼泪，现在却笑了起来，仍旧死死地抓住马鬃。

锡拉克·斯托伊科的胸膛里猛地爆发出一阵遏止不住的、动情的、亲切的笑声。他第一次这样捧腹大笑。过去积压在心底的愁苦随着笑声吐了出来。他向年轻的妻子走去，把她抱下马鞍，又哭又笑地报之以一阵狂吻。

一种前所未有的甜蜜的倦意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把妻

子轻轻放在地上。然后，他以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腔调说：

“你用金钥匙打开了我的心房，鲍格达娜……”

黑马把它聪慧的脑袋转向他们，亲昵地嘶叫了一声。

（余志和译）

多·若特夫

三位大娘

〔**作者简介**〕 多布里·若特夫(1921—)生于佩尔尼克州拉杜伊村，中学毕业后因从事反法西斯活动坐过15年牢，解放后编过《人民青年报》和《黄蜂报》，写过十余本诗集、小说和戏剧，其中以短篇小说集《过去的故事》，诗集《渴望》、《暴风》等较为有名。

我不明白，我是怎么离队的。

我和大家正执行一道命令——利用沟壑作掩护，从那儿越过顶峰，躲开迎面扑来的政府军。

沟里大雾弥漫——我迷路了。我看不见自己的同志，只能听见他们的脚步声。脚步声倒能听见，可越来越小了。真见鬼！

直到走出迷雾，我才看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走的这条沟，同支队走的那条沟是平行的，两条沟相距一百来米。

这以后，我就往几乎相反的方向走去了。

我来到了毫无遮掩的地方。政府军已经逼近。他们当然发现了我。要是我掉转方向追自己的同志，那就可能把他们的队伍和他们所走的路统统暴露。

我朝四周张望——头上是顶峰，前后左右是稀朗的山毛榉，脚下是三十来座简陋的小房。

这种西部小村虽然缺少面包，但却以好客遐迩驰名。只要你打村子路过，你碰见的第一人尽管跟你素不相识，但总会向你问这问那，请你去作客。他家里没吃没喝的——但会为你找到食品。

我决意下山去——反正我是本地人，是从平原上回家的。我一面瞅着政府军的动静，一面小心翼翼地下了山。

政府军走一阵，停一阵。他们爽然若失，看来不知如何是好。随后，他们又上了路。

我放了心——这个花招耍得好。我钻进谷地，不让他们看见，心想："我就从村边过去，然后改变方向，在山那边同支队会合。这就躲过了政府军，如此而已！但愿谁也碰不到我——斯拉夫人的殷勤好客这回将使我感到头疼！"我把手枪和几个手榴弹藏在衣服下，加快了脚步。

但是，还没有走过村边的第一座小房，一个干草棚里就钻出一位大娘，挡住了我的去路。她身穿一件长至脚踝的连衣裙，包着一条黑头巾。她满脸堆笑地开口道：

"你好，孩子！"

"你好！"

我担心的事情到底发生了——她不光打了招呼，而且还习惯地脱口问道：

“孩子，你叫啥名字？”

“莫姆奇尔。”我随便编了个名字。

“莫姆奇尔吗？”她越发高兴起来，“我那小子也叫莫姆奇尔。他当兵去啦，岁数跟你一样大，孩子。

“天哪，你们还小，可当妈妈的见不到你们的影子，听不到你们的声音。从小就盼你们长大，生怕有人欺负你们。你这是上哪儿去，孩子？”

我说了一个村子的名字。大娘惊叹道：

“哟，远着哩！你打哪儿来呀？”

我又说了一个村子的名字。她一拍手：

“我娘家在那儿，说不定知道你家。你是哪家的？”

谎言到此为止。我不能瞎说我是哪家的。我生硬地说：

“别再问我啦，多保重！我不想告诉你我是哪家的，打哪儿来，上哪儿去！”

“看你说的！……打搅你啦，孩子，咱们这儿的人就喜欢问这问那，晓得哪些该问，哪些不该问！”

我求她别再问，抬脚就走。她站着，站着，突然赶上来，抓住我的手。

“到屋里说去！”

我把手一缩，可大娘紧紧拉住我不放。没到过这一带的人压根儿就不知道，推脱不去是很不象话的。

我答应进去吃点面包再走。可是，这根本由不得我。大娘把我拉进屋，不是匆忙塞给我点面包，而是摆上了饭桌。她又是切黑土般的面包，又是拿黄奶酪、腌菜和泡菜。

她上下打量着我——说我长得象她家小子，声音象她家小子，也跟她家小子一样惹人爱，就象是她家小子回来度假一样。

我想起那支政府军，暗示说：

“我刚才躲过了一些当兵的，说不定你儿子就在里头？”

大娘顿了顿，两手搭在围裙上：

“我的莫姆奇尔在老远的地方。在舒门当兵。”

听她的口气，好象政府军和游击队是一回事。她脸上挂着微笑，会心的微笑。这微笑似乎在说：“你们追来追去，耍儿戏！”

外面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

“伦基娅大婶，该不是莫姆奇尔从部队回来啦？”

伦基娅把切面包的刀子放下，愣了一会。她不能不应酬，于是凑到窗前：

“莫姆奇尔，可不是我那个莫姆奇尔，兰卡。我老家一个小伙子来啦。”

“小伙子？”兰卡高兴起来，“我瞧瞧，象不象我家小子尼克伦。”

兰卡进了屋，在连衣裙上擦擦手，抱住我就亲。

我听说，她也有一个小子当了兵——名叫尼克伦。我长得也象他，特别是眉毛。兰卡大娘瞅着我，心醉神迷，然后

脚步生风地回家去端刚挤的鲜奶。

她一出门，第三个大娘——卡拉维利娅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进来。她说我又同她当兵的小子——格尔根长得差不多。

当兰卡大娘捧着一陶罐鲜奶进来时，卡拉维利娅大娘也不甘落后，急急忙忙回家拿梨去。她送来了满满一围裙梨。

但是，我甚至没工夫瞅梨一眼——几个政府军的士兵已出现在山梁上。他们是离开队伍来追捕我的。

我蹦了起来。三位大娘面如土色。我走到窗前指了指政府军，然后朝门口冲去。必须快跑。伦基娅大娘把我拦住：

“别跑，孩子！你出去，准会被他们看见！”

她说得对。不过，呆在屋里，他们也会找到我。

“你想让他们烧了你家房子吗？”

“说不定不来这儿！”

“会来的！”

伦基娅大娘双手抱着头：

“天哪，要是放你出去，准被抓住！……就坐这儿，孩子，要是他们来，你就是我儿子，当兵的，放假回家！”

“当兵的，”我停下脚步，“没穿军装！他们一眼就看得出来！”

兰卡大妈马上接上话头：

“你真说到了点子上！没啥，我这就把我男人的军装给你拿来。他退役啦，还藏着一套衣服。”

几个士兵下了山梁，直奔伦基娅大娘的小房而来。我猛

然想到请三位大娘把我藏到草棚里去，可马上又意识到，他们站在高处一览无余，我一出去就会被发现。

除了穿上兰卡大娘拿来的军装，我再无别的出路。看来她男人是大个子，我没脱一件衣服，直接把军装套在身上。

三位大娘各就各位，就象是迎回了一个军人。卡拉维利娅大娘还哼起一支歌：

老妈妈心疼自己的儿子，
老妈妈可怜自己的儿子……

几个士兵由一名上士领着，径直闯了进来。卡拉维利娅大娘放开了歌喉。他们的眼前是饭桌、食品、三位大娘和我。

伦基娅大娘递给他们一瓶白酒，说：

“各位来得正巧，我家小子莫姆奇尔回来歇假。请喝杯酒吧！”

上士犹豫不决地接过酒瓶。卡拉维利娅大娘搬凳子请他们坐，还问我有没有见到过他家当兵的——格尔根。

我鼓足勇气，从容作答。

当官的喝了口酒，问我在哪儿服役。我照伦基娅大娘刚才的说法，回答说我在舒门服役。酒瓶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

伦基娅大娘不住地劝酒：

“喝吧，孩子们，喝吧！”

“谢谢啦，这白酒真过瘾！”他们回答说。

当官的训斥道：

“放下！咱们是来值勤，还是作客？”

小兵还了酒瓶。屋子里死一般地沉静。上士还想问我什么，可卡拉维利娅大娘把话岔开了：

“既然来啦，可不会让我们扫兴吧？请坐请坐，使劲喝。”

接着，她唱了起来：

亚尼纳山起大火，
烧着了几只小鹰。
鹰妈妈在天上盘旋，
对着小鹰呻吟……

这歌声梗在我喉咙上。我仿佛看见了正在盘旋的鹰妈妈，看见了大火熊熊的亚尼纳山，也看见了“小”鹰。霎时间，我忘了自己所处的险境。

但是，上士打断了歌声，又想同我拉话。他瞟了我一眼，问道：

“刚才下山的是你吗？”

“是我。”

“你，可那儿没有路！”

“我抄近道，”我解释说，同时又布下疑阵，“不知道你们看见的是我还是别人？”

“啊，别人！……是谁？”

“我不认识他……”

当官的睁圆眼睛扫了几个小兵一眼，小兵们无动于衷地耸耸肩膀。

这时，卡拉维利娅大娘无缘无故地说，她要拿她家白酒来——上好的白酒。她转身出了门。

上士把眉头一皱，字斟句酌地说：

“对不起，这是公事！为了避免误会，请让我看看你的证件！”

“完了。”我想，慢慢站起身来。猛地，我心里有了办法，含含糊糊地说：

“请等等，这就去拿！”

就在这时，卡拉维利娅大娘喘着粗气冲了进来，只见她头发蓬乱，连衣裙松松垮垮。她拚命喊道：

“那遭天打五雷轰的！你们坐在这儿盘问伦基娅的孩子，可你们要抓的那个家伙偷了我的小马！”

当官的睁圆眼睛盯着她：

“什么小马？”

“小马就是小马。在下边草场上——我放它在那儿吃草。我去牵马，可那家伙把我推倒啦，他骑上马就跑得不见人影！”

“他带武器了吗？”

“带啦——背着枪，腰上别着手榴弹！那该死的！天哪，我就只有这匹马。”卡拉维利娅号啕大哭起来。

“别哭啦，”上士厉声说道，“你说，他往哪儿去了！”

她走到门口，指了指方向。当官的领着几个小兵追去了。他们在追赶莫须有的游击队员。三位大娘捅捅我，说：

“孩子，快跑！”

“趁他们还蒙在鼓里，跑吧！”

“孩子，就这么着，快跑！”

兰卡大娘哭了起来：

“你是咱们的孩子，咱们疼你！……我的尼克伦也让当官的领着满山跑，追赶自己的兄弟吗？”

“是这样。”我回答说，脱下了军装。

“全乱套啦，孩子，”伦基娅大娘说，“你们就这么你整我，我整你？”

我感到为难了。这种母爱是发自肺腑的。她站得很高，使我难于令人信服地启齿回答。

我在躲进附近的一条深沟前，回过头来望了一望。

三位大娘包着黑头巾，她们长至脚踝的连衣裙和系在腰间的围裙随风飘荡。她们一个挨一个地站在那里，目送着我，身影映在蓝天上——这就是伦基娅大娘、兰卡大娘和卡拉维利娅大娘。

（余志和译）

埃·斯塔内夫

傍晚静悄悄

〔**作者简介**〕 埃米梁·斯塔内夫(1907——1979)生于保加利亚中部历史文化名城特尔诺沃，曾受过高等财经和绘画教育，肄业后当过小职员。早在三十年代，斯塔内夫即以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跻身文坛，后又创作了中短篇小说《傍晚静悄悄》、《偷桃子的人》，长篇小说《伊凡·康达雷夫》、《反基督者》等名篇，以及大量以动物为题材的富有哲理性的小说。曾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一

他躺着，毫无倦意，脑海里浮现出明天就要发生的事情：他把水桶朝警士扔去，然后沿着被太阳晒烫的旷野，拼命跑向能够救命的青纱帐。这片青纱帐离打水台有四五百米。当

这一情景在他脑海里清晰可见时，他浑身的肌肉绷紧了，胸口也堵得慌，仿佛他已奔跑在弹雨之中，感觉到死亡的临近。

他仰卧在贮藏室般狭窄的牢房的木板床上，出神地望着罩着一层蛛网的灯泡映在天花板上的柔和的光圈，这么想着，大概已经有十次了。他断定，越是想得活灵活现，他就越容易对付行将发生的事情，越有勇气一举成功。剩下的主要问题是时间——需要充分利用每一秒钟，精确计算两腿的速度。

他相信他能顺顺当当地逃走，因而屏住气息，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过于自信。他必须具有这种信心，不曾想过会被打死，似乎这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也不曾想过有可能受伤被擒，因为这是最糟糕的——如果被擒，他的身份就要暴露，一个不大的但又宝贵的武器库就要落到敌人手里。

抓住他的不过是个庸碌的暗探，他为此不能宽恕自己。这件事说来有些蹊跷。暗探出现在他眼前时，他正站在炸油饼的小摊旁边，心不在焉地瞅着周围的农民。暗探要他跟他走，他断定不能脱身，二话没说就去了。不过，他如此容易就范，主要是因为自己觉得，他只是受到嫌疑，身上又证件齐备。

他脸上掠过一丝苦笑，规规矩矩地跟着暗探朝乡公所走去，嘴里还嚼着刚买来的油饼。但他仍然有些发懵，满腹狐疑。他带着曾多次帮他脱身的假证件，还有一张通行证，上面写着他叫安东·阿赫塔罗夫，是个大学生，索非亚人，现被疏散到普列文州某村，到这个小镇上来是有一桩要紧的家务事情。

但他小看了地方警察的能耐，以为凭着他的知识分子模样和整洁的衣衫就能轻而易举地瞒过他们。警察局长秉性多疑，他一声不吭地听了他的解释，看了他的证件，然后用两个指头捏了捏大得出奇的歪鼻子，半信半疑地打量了安东足足一分钟。最后，由于一只苍蝇飞来捣乱，这番审视才告结束。警察局长有些犯难，恶狠狠地盯他一眼，在他的抗议声中下了拘捕令。

从那时起，他心里布满疑团，觉得事情已经败露，接头的人可能已经被捕。他咬紧嘴唇，心里直恨自己，怪自己掉以轻心，也怪自己傻乎乎地束手就擒。他从来不曾料到，他会不加反抗，不拼个你死我活就窝窝囊囊地落到警察手里。他当时那样做，是因为他懂得自己重任在身，同时也怕自己忍受不了严刑拷打。于是，这一切就如此简单，如此突然，如此倒霉地发生了！谢天谢地，他外衣领子上还缝了一小包毒药，供他绝望时服用。他摸摸外衣领子，不觉一阵心寒。他过去常常想过死，可从来不曾为此多愁善感，认为说到底无非就是疼痛，死的恐惧来源于对疼痛的恐惧。难道疼痛会永远存在吗？人一失去知觉，疼痛就随之消失。

他早就估量过自己的生活。他的生命是属于党的。如果党能在斗争中取胜，他死不了，那就继续活下去。要是党遭到失败，他则会全力以赴地进行斗争，直到在这场斗争中或早或迟地献出生命。尽管他才二十八岁，风华正茂，但他还不曾尝过生活的任何一点快乐。他从不感情用事。他选择了书籍，舍弃了爱情，选择了斗争，舍弃了娱乐，选择了事业，

舍弃了其余一切。他是一个钢铁工人的儿子，历尽沧桑才自学成才，并为艰苦危险的历程做好了准备。世界对他充满了敌意，他在世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朋友——他的同志。他很少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同他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加入支队以前，他担过任重要职务，曾受命完成过许多艰巨的任务。

他除了怨恨自己外，心里还一直犯疑——明天会不会再派他到打水台去给大桶灌水？如果不让他去，他就找不到逃跑的机会，一切就都完了。

他知道，在查明他的身份之前，他将一直受到拘留。大概眼下正在搜集他的材料，要不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要给他照相。警察局找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匈牙利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在一架老式照相机后面弯着腰，把头伸进一个黑布套。他自己站在墙边，警察局长和那个暗探瞅了瞅他，又瞅了瞅各自手里的照片。随后他发现，他们的脸上露出了不悦，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断定他们手里的照片不是他的。暗探把他带进了牢房。当他再次提出抗议，甚至指出警方随便抓人的后果时，警察尴尬地说："也许你说得在理，但我们要查查你是什么人，是到镇上来干什么的。"警察还给了他一床被子，显然对他很客气。这是昨天上午的事。到了下午，当他要求透点新鲜空气时，他就被派去打水了。

他被领到后院，那里有一匹套好的小黑马，还有一个被捕的男孩。小孩一头鬈发，面孔黝黑，瘸着腿吃力地跟在马拉的大桶旁边。看见这个小孩，他心里一惊。这小孩不就是那

个小交通吗？正是这个小交通要把六支卡宾枪和一批子弹转交给他。

他着魔似地盯着小孩，惊讶于在这里看到他，而且还是那么精神、健壮，没有被枪弹打死。如果这个小孩确实就是小交通，大概是刚被抓住？可能是故意领来吓唬人的？……

他瞅了警士一眼，想从警士的脸上发现一点能证实他的怀疑的东西。接着，他又环顾左右，看看是否有人在监视他。但又高又黑的警士只顾盯着马，院里并无他人。安东十分窘迫地走过去，两眼仍旧盯着小孩。他的脸渐渐恢复了平静，还显得有点生气。他得装出一副受了侮辱的知识分子的样子——在无辜被捕后现在又被派去打水。

时值八月，午后的骄阳把院子照得通亮。刷成粉色的旧楼把长长的影子投在屋檐下，遮住了一辆溅满稀泥的马车。院子朝阳的一边晒着几张床，床上放着软垫，软垫的影子伏在草地上。离这儿不远有一个已经干涸的打水台，上面的水管只安了一个铜质龙头。石砌的围墙把旧楼的后面堵死了，而旧楼临街的一面有几畦残败的花卉。

安东走在黑马旁边，黑马不安地咬着笼头。出了两扇大门，前面是又陡又窄的街道，街道两旁有一堵堵围墙，围墙里面栽着李子，一座座小房掩映其间。

他提着水桶和用来往大桶里灌水的漏斗。街上满是石子，大桶哐啷作响，黑马在下坡时直往前冲，小个子男孩一瘸一拐地好不容易才把它拉住。安东走过去抓住笼头。

"把桶提好！"还没等小孩接过水桶，他就贴着小孩的耳

朵说了一句悄悄话。

小孩睁大褐色的眼睛，惊讶得半张着嘴，露出两排白牙。

“真巧，”他说，叹了口气，“同志……”

“小心，”安东说，“提好水桶，别站住！”随后又轻声补充一句：“走我左边。”

他们并排走着，警士跟在后面。当警士在一个很窄的拐弯处掉到后面时，安东不动声色地问道：

“你是昨晚被抓来的？”

“是的。”小孩愁眉苦脸地说。

“在磨房吗？”

“不，在家里，当我准备走的时候……”

“为什么抓你？”

“搜查时翻出了书。”

“枪呢？”

“还在老地方。”

“哪儿？”安东急不可耐地问。

“就在磨房里，埋在地下。”

安东长嘘了一口气：

“挨打了吗？”

“不要紧，给他们擦了擦靴子。我不信他们会用重刑。”

“什么都别说。”

“知道。”

警士走上来了，他们默不作声。三人出了小镇，路好走

了，大桶也不响了。

过不一会，他们来到打水台。石头砌成的打水台又旧，又高，又牢，水槽很长，散发出一股水藻味。天旱使水流变小了，灌满大桶要很长时间。

打水台前面是毫无遮挡的平坦的牧场，牧场那边是收割过的庄稼地，再过去便是青纱帐……

二

如果十秒钟跑一百米，全程就要三十五秒或四十秒，至多一分钟。

他一骨碌翻身下床，走到门边，棱着耳朵听听外面有无动静。过道里传来警士们的鼾声。有一只耗子咯吱咯吱啃着木板。隔壁关的就是男孩。安东刚才还敲了敲墙壁，想试试能不能同他通话，可小鞋匠对"发报"一窍不通。

安东断定门外无人，就直立在牢房里，两手下垂，然后猛抬左腿，往后一闪，双手往胸前一合，似乎在防备向他投来的东西。他左手挡开想象之物，右手往腰部一摸，直到他用脚点了两个拍子——拔出了"手枪"，他才把右手平举起来，做出射击的姿势。

他沉思了片刻。那蓄着络腮胡子、长着尖鼻子的轮廓分明的脸庞流露出不满和忧虑。在做这一连串动作时，他的右脚只打了五个拍子。这就是说，警士从挡开他扔过去的水桶，发现他在逃跑直到开枪射击，只需要五秒钟。

他不由得皱起眉头，晃了晃脑袋。如果砸警士的脑瓜，使用裹着铜皮的漏斗倒比水桶强得多。不过，如果警士站在打水台上方，从下往上就不好砸。这得随机应变。或许要另换一个警士吧？或许他不站到打水台上方去吧？

他又躺上木板床，试图入睡。明天要把全身放松，保持旺盛的精力。他裹着被子，可又闻到了枪上的机油和汗臭味。于是，他又兴奋地想起昨晚离开宿营地时的情景。在一堆已经不吐火苗的篝火旁边，支队队长盖特曼、政委和他正在冥思苦想：如何才能完成取回枪支弹药的任务。这些枪支是预备给一支新的游击队使用的，但一次出乎意料的挫折使小镇上的十来名青年团员落到了警察手里。卡宾枪未被搜走，只有瘸腿小鞋匠才知道它们藏在哪儿。

他摸黑走在收割了的庄稼地里，四周漆黑一团，只有禾秸依稀可见。接着是覆盖了一层软绵绵的尘土的道路、一棵大树、一块坡地，最后终于发现了废弃不用的老磨房黑魆魆的影子。磨房周围只有蚊子嗡嗡乱飞，青蛙鼓腮鸣叫。他走过去，支起带托的毛瑟枪，趴在地上，盯着磨房的黑影呆了很久。磨房里无声无息。他说了句暗号，便顺着杂草丛生的小沟爬过去，发现磨房里确实无人……

他见门上顶着一根杠子，心里踏实了。这根杠子表明，接头的地点是在镇上。他仔细查看了四周，就在磨房旁边躺了下来。一群群蚊子在他头上嗡鸣，叮得厉害，他只好用手帕缠住脖子，把裤脚放下来。他一觉睡到朝阳染红了禾秸和树梢，便把手枪埋在磨房旁边，在小河里洗了脸。他相信自

已的证件顶用，一向不带武器进村或进城接头，并大大方方地用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警察，然后住进旅店蒙头睡觉，等着店员把他的身份证送到警察局去让警官过目。

……他上了路，进了镇子。卵石路面的街道坑坑洼洼，铺满阳光，长得没个尽头。街旁尽是两层的旧房，屋檐很宽，墙壁很长，其间开了许多小铺。每座房子的后面都有院子，房门很宽，门前有一块石板。

初来乍到，他的头桩事情是熟悉环境。他看得清楚，街后那条河就是他洗过脸的河；镇子很长，凋零冷落。几棵杨树长在河畔，树冠已枯，高入蓝天。小广场上停着两辆卡车，卡车的轮子已卸了下来，因而用大石头支着。他想去理发。一夜没睡好觉，路上又累，他脸色难看。他进了一家刚打扫过的理发店，理了发，眯着眼睛把自己那张脸瞧了半天。殷勤而好奇的理发员问他话，他差点愣住了。

随后，他到了市场，挨家找着修鞋店，想找到那个“纳恰洛”招牌，以便故意问问他送去的那双登山鞋修好了没有。

广场上正在炸油饼，他饥肠辘辘，想先吃点东西再找。就在这时，暗探来了……

也许今夜将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夜。这要看情况如何。他对个人的命运是毫不介意的，既要斗争，就会遇到千变万化的情况……

头十秒钟要跑离警士一百米。端着手枪瞄准百米之外的人影，谈何容易。枪身短，晃来晃去，子弹难中目标。何况他要曲里拐弯地跑。另外，警士慌慌张张，持枪的手准会发

抖……

“击中我，不过是一种侥幸。”他最后这样断定，心里也不再害怕。他是善于控制自己的，此刻又把自己的思路收拢到逃跑的关键问题上，一面默念着警士的一连串动作，一面用他的脚在被窝里算着时间。裹着铜皮的沉重的漏斗仿佛已攥在他的手里，在他眼前晃动。

他用被子蒙住头，两腿一曲，但猛地又坐起来，穿他的鞋。他过惯了游击队员的生活，喜欢和衣入睡。然后，他脱下外衣，叠成一个枕头。重新躺下时，他觉得两眼发胀。

“该睡了。”他想。

然而，他仍很兴奋，无法入睡。翻腾的思潮、昨夜的步行、突然的被捕、逃跑的准备、不断的疑团，使得他神经紧张。此刻，他的思路又转到囚禁他的这座旧楼上。

旧楼共两层，下面一层是乡公所，上面一层是区公所和警察局。在这种情况下，白天是不便拷打犯人的，也就是说，审讯只在晚上进行。是不是还有一个地下室呢？说不定十来个青年团员就在那里遭殃……

为着镇静下来，他开始采用一个行之有效的老办法。平常，大雨过后，当他和同志们躺在树林里湿漉漉的枯枝上时，他就经常采用这个办法：想些愉快的事情，比方说战争就要结束啦，红军取得了胜利啦，等等。苏军已到了比萨拉比亚，再有两三个星期就会开进我国国土。假如人们知道他是谁，知道他为什么而来，那他就有救，就能看到红军……

他越想越兴奋，心里美滋滋的。但他接着又控制住自己，

知道想入非非会挫损他的意志。他翻了个身，决心什么也不再想。

周围死一般地沉寂，仿佛旧楼内没有一个生灵。镇上也悄然无声。不过，他仍然听见一辆卡车轰轰隆隆地开了过去，震动了这座旧楼。

卡车运送的莫非是宪兵？奇怪的是，镇上竟没有宪兵。听说宪兵驻扎在附近一个大村里，离这儿约莫二十公里。

……有一回，他到山区一个小村取盐——当时食盐极其贵重。他见到了交通员，他们把盐放在村外，由他带走。交通员对他说，乡里关了一名游击队员，一个教员。他白天躲在草地的小棚里，天一黑就把盐装进口袋，扛回山去。他穿过田野，抄近路朝树林走去。走近山岗上的一个小教堂，他听见有人说话，就停下脚步。接着是十字镐和铁锹的声音。他又等了几分钟，想听个究竟。静静的黑夜里传来吓人的嚎叫声和沉闷的打骂声……

过些日子，他听说他碰到的正是那个教员被打死的情景。那天晚上宪兵进了村……

不行，这么东想西想，哪能入睡！

他于是又回到他的童年，想起了他的母亲。他母亲又高又瘦，长着一副男人的脸，前额很高。但她已在九泉之下。母亲的神态使他感到欣慰，他觉得自己的神经松弛下来。他象在幻梦中一样看见了洛增内茨① 的那座小房，房前有个小

---

① 洛增内茨位于索非亚南郊。

院，院里开着野花，墙边的西葫芦攀附在玉米杆上。就这样，他又想起了过去——起先想到老家，继而想到召开秘密会议的维托沙山和他的同志们居住的各个街区。在这样的环境中，他长大成人，投入了阶级斗争和党的事业。至于他个人，他是满怀信心，愿意作出自我牺牲的。在这场斗争中，活着的人很少，牺牲的人很多，也许他明天就要加入这些死者的行列……

合眼之前，他又对那只怀表感到可惜。这只表眼下放在警察局长的抽屉里。丢了这只表，丢了证件，他心里非常难过。那些证件是靠一位在乡公所办事的同志弄到手的，失去它们是个很大的损失。

他入睡时，镇上的旧式土耳其报时钟敲响了一点。

三

姑且就把这间临时关押犯人 的 黑 洞 洞的斗室称作牢房吧。牢房只朝着后院开了一眼小窗，窗玻璃多年未擦，象蒙上了一层塑料布，就连固定在外墙上的铁栅也看不分明。白天的光线勉强透进牢房，如果不开灯，简直难于找到自己的衣服。

醒来时，安东闹不清时间，只能凭区公所里的动静估计一个大概。过道上传来警士们的靴子声、说话声和结皮带的声音。他们正在洗脸，在院子里跑动。看来时间还早。

当院子里稍静下来，镇上的报时钟响了七下时，安东等

得不耐烦了，动手敲门。几分钟后，有个粗嗓子问他干吗敲个没完。随后，他被领到院子里洗脸。警士们阴沉着脸好奇地瞅着他。陪他的那个警士——一个农民模样的褐发青年，洗脸时还帮他浇水。这一星半点的关照使他感到高兴，也给他壮了胆。他请求警士替他买包烟，并留在过道上等候。看着院子里的警士，他心里捉摸："今天要向我开枪的是哪一位呢？"他很想多看几眼那个黑大个子，但不见他的影子。而那些已经回到屋里穿衣服的警士，一个个懒洋洋地打不起精神。他们被迫在这里当差，对农事和家庭的操心自然超过了对现政权的安全的兴趣。

他铁青着脸，瞅着一边，拘谨地站着，继续装出一副不得不忍受他们的上司欺凌的知识分子的样子。有的警士问他为何被捕，他没好气地回答："问你们当官的吧，他知道！"

快七点半了，机关已开始办公，他又被关进牢房。

"我要吃早饭，"他说，"请帮我买点东西。"

警士答应了，拿走了钞票，几分钟后给他送来了奶渣饼。他狼吞虎咽地吃了饼，坐在木板床上抽烟。他没有烟瘾，平时抽得很少，但也不怕尼古丁。在这些难熬的时辰，抽烟使人解闷。

他想弄清除他和小孩之外，楼里是不是还关着别人。他不敢向任何人打听，可他断定，这里只关着两人，不然的话，他不会不发现他们，也不会单独一人呆在牢房。这使他放了心——没有人会代替他去打水。不过，他仍然不知道会不会再派他去，什么时候去。

今天必须跑掉。这是燃眉之急。天一黑，支队的两位同志就要在离这儿七公里的临时交接站旁边等他。他必须赶到那里，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一同去磨房取枪。游击队中还有人赤手空拳，而新的战斗日益临近。

他很想见见那个暗探，再向他提出抗议，并旁敲侧击地打听一些消息，譬如说是不是还派他去打水，警察局长想拿他怎么办，等等。他竖起耳朵想听出暗探的声音，但在一片开门和关门、说话和上楼的嘈杂声中，很难分辨出一个不太熟悉的嗓门。小孩屋里也毫无动静。会不会是昨晚他睡觉时把小孩带走了呢？

他走到墙边敲了几下，小孩也敲了敲，这才使他踏实下来。说不定小孩也躺在那里，一门心思地期待着有人把他领出去。

他懊恼而气愤地想道："干吗要把进步书籍放在家里？"

铁锁当啷一响，牢门打开，暗探出现。他一头浓密的褐发湿漉漉的，看来刚刚梳过；小胡子一撅一翘，许是刚上街吃过油饼。粗糙的脸露出严肃的表情，浅灰色的眼睛透出高傲和严厉的神色。

"去见局长！"暗探把头一歪，示意他出去。

他先到楼道，然后走进一个小厅。小厅的地板脏得一塌糊涂，一大堆农民正在里面等发通行证。暗探在一扇门上敲敲，把他推了进去。

局长办公室的中央铺着一长条积满尘土的蓝色旧地毯，地毯的尽头摆着一张旧式办公桌。在桌后的保加利亚君主像

和希特勒像下面，他看到了一对冷冰冰地射出凶光的眼睛、一个大得可笑的鼻子和鼻子下面的小胡子。警察局长两手握着被他扭成弧形的铁尺，一双眼睛贼溜溜地在安东高大的身躯上扫来扫去：先是瞅他黝黑的脸膛，然后瞅他略微泛红的头发、他的衣服，最后又恶狠狠地把目光转回到他的脸上。

还没等警察局长开口，安东就愤愤不平地说：

“你们把鄙人当成盗贼，要关到何时才肯罢休？”

警察局长把身子往前一倾：好大的口气。竟不问一声好，不叫一声局长先生？他的眼睛里射出两道凶光：

“我还没说话，哪容你多嘴！”他用铁尺敲着桌子。

“我要去告状！”安东口气很硬。

警察局长打量了他半晌。

“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然后再看看该谁告状！”他鄙夷地把眼一眯，红眉毛吓人地耷拉下来。

安东气愤地回敬了他一眼，想惹他生气，让他漏点底。他知道自己应该充当什么角色。对于这样的角色，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几乎每次执行任务之前都要动番脑筋。现在的问题是要把戏演活。

他堂堂正正地说：

“我父亲是后备役上校，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有十足的理由提出抗议。”

警察局长又抬起一只眼睛，瞟了他一下，似乎想从他的外表上看看他是否言之有据。

“我对此兴趣不大……不管您如何标榜自己，”他改变了

口气，这次还用了“您”，“您是谁，马上就会查清。使我感兴趣的是您坐什么车来的。”

安东胸有成竹，随口说道：

“坐大车。”

“什么时候到的？”

“昨天早晨。”

“车把式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佩特科的大叔。”

“全名呢？”警察局长伏在桌上记着安东的答话。

“不清楚，是个老农。”

“‘不清楚’可不妙，要被关起来的。”

“那我就胡乱编造。”安东斩钉截铁地回答。

“哼……哪找的大车？”

“上奥里亚霍维查车站。”

“您雇的吗？”

“没雇，只是求人捎个脚。”

“车把式是哪村的？”

“据他说是一家小店的，记不起小店的名字了。”

“哼，记不起了。是不知道呢还是记不起？”

警察局长放下铅笔，趴在桌上，逼视着安东。

“好好想想吧。”他酸溜溜地说。

“大概能想起来，不过得等一会。好象叫米科瓦小店。”安东心里明白，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小店。

“有把握吗？”警察局长又拿起铅笔。

“不太把握……诸如此类的名字。”

警察局长把他的回答记了下来。

“您说，”他口气很硬，“在什么地方下车的？”

“镇子边上。”

“干吗在那地方下，不在镇上下？”

安东也酸溜溜地一笑。

“想下就下呗。”

“哈，想下就……这么说来，您是在镇子边上下车的？”

“如果您是我的话，也会这样干的。”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一个人坐了三十公里的大车，到了镇边，准会憋不住的。试想想，要是您颠簸了一夜，不会这样吗？”

“干吗不等公共汽车？”

“我等过车，可后来发现旅馆房间太脏，我宁可步行离开车站也不愿睡在里面。要不是碰见那个农民，我会一直走到镇子上来。我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过夜。”

接着是一阵沉默。警察局长若有所思地望着屋角，用铁尺刮着脸。随后，他连眼睛也不抬，气大声粗地说：

“来镇上干什么？”

“有点事。”安东漫不经心地回答。

“什么事？”

“这不便向您透露。”

“要想放您，非说不可。”

“通行证上写得清清楚楚。”

“通行证已经过期……逾期一月……不管用。您说，您是来干什么的？”

安东摸出烟盒，象在家里一样悠闲自在地抽起烟来。点火前，他还把卷烟在烟盒上抖了两抖。警察局长瞅着他，皱起眉头，闷声不响。

“快说，到这儿来干什么？”他脸带愠怒，开始失去耐性。

“我不会说的。这是我的私生活。”

“那我就继续关您，直到您说出来为止！”警察局长气势汹汹地嚷道。

“您无权继续关我，哪怕再关一小时。”

警察局长直挺挺地站起来。

“您是什么东西？”他冲着安东大声叫着，“要是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把您送到地下室去！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是在咖啡馆里吗？”

安东不吱声。

“再给您一分钟时间，然后说说您来镇上干什么！”警察局长转过身去，踱到窗前。

窗外传来小镇上低沉而单调的喧嚣声。一辆大车嘎吱嘎吱地从街上过去，行人边走边说话。什么地方有人在箍木桶，这声音撞在墙上又折了回去。透过窗户，披着朝阳的蓝中泛绿的山脉隐约可见，天空明朗。

“你们是强人所难。”安东终于屈服，装出不得不吐露真情的样子。他侧过脸去瞟了暗探一眼，然后悄悄说道：“我来找一个女人……”

警察局长转过身来好奇地望着他。暗探憋不住扑哧一笑，用手梳着油光可鉴的头发。办公室里一片沉寂。安东低着头，又愁闷，又恼怒。警察局长朝他走去。

“哪个女人？”他问。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警察局长弯腰抓起听筒。听筒里的声音很急。警察局长满脸惊色。

“什么地方发现的？”他在电话里问，对方回答了一句。“什么时候？走了？真是的……盯住他……不要打草惊蛇……等一等……”

他捂住话筒，没看安东一眼就对暗探说：

“带他下去！让准尉查查他的身份。给波尔迪姆去个电话。把他换到警士室里！”他随便摆了一下手，似乎是表示“再见”，又似乎是表示“滚开”，然后继续对着话筒发话。

暗探把安东领到小厅里。

“请让我呆在老地方。”安东说。

“为什么？警士室要好些。”

“我不愿意警察们问这问那，也不愿意办事的老百姓把我当猴看。”

暗探想了想，无动于衷地说：

“既然如此……”——于是又把他带回牢房。

四

从现在起，安东计算着时间——听着镇上报时钟慢悠悠

的打点声。每分钟都使人牵肠挂肚——似乎他那颗受到压抑的心在拚命推动着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他等着给他送来午饭(这是暗探答应过的)，然后再派他去打水。他还等着再把他叫到警察局长那儿去。他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听着过道里的动静。也许那个准尉已经同发放通行证的波尔迪姆派出所通了电话，而派出所所长答复说，他们那里没有疏散来这么个人，通行证是假的。

他心如潮涌，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又爬起来，在狭窄的牢房里走来走去。他的思想象脱缰的野马。他想起了晚上要等他的那两位同志，他们现在可能正在赶往交接点。他又想起过去，那时他怕死，可后来胆子大了。他还想到那个磨房，磨房的地下埋着六支枪。喧嚣的小镇上的和平生活浮上他的脑海，这种生活同他身处的那个世界大相径庭。他不止一次地企图设想他逃跑时的情景，由于逃跑的某些细节现在还不能确定，他在脑子里设想了几十种情况。他想镇定下来，但又办不到。

十二点整，暗探推开了没有上锁的牢门。安东等着他的头一句话。

“给您送午饭来了。”暗探说话时，一个警士钻进牢房，笨手笨脚地端着一盘东西。

“电话没接上。现在要带一个受伤的赤匪来。”

安东嘘了一口气，但后一句话又使他凉了半截。暗探以为他这一嘘气是在表示不满或者愤慨。

“您运气不好，”他安慰安东说，“电话老是占线。宪兵昨

夜发现了一批赤匪，交了火，现在还在追捕。”

警士搬来一个凳子，把一盘菜、一片面包和一把叉子放在上面。安东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坐在床边吃起来。他两腿打颤，但他控制住自己，若无其事地问道：

“在哪儿发现赤匪的？”

“镇子东边。”

“这不可能，”安东想，“我们在西边活动，想必是别的支队。”于是，他又装着对上述新闻毫无兴趣的样子说：

“请让我去打水吧，透透新鲜空气。”

“放您到院里走走。”暗探说。

“最好去打水，免得象个放风的犯人。我想跟在马后面蹓跶蹓跶。”

“好吧，”暗探回答说，“马一牵来就派您去。大概在三点……”

安东吃得很快，根本没嚼出什么滋味。要吃，吃饱才有劲。

几分钟后，隔壁房门开了。男孩被带走了。是不是要审问他？安东不安地凝神听着。男孩真的会象他自己想象的那样受到宽大吗？如果把他交给宪兵，他就完了。安东偷偷在牢房里跨了几步，走到门边，把耳朵贴在门上。几间屋子里除了通常的响动外，没有别的声音。一辆大车突然进了院子，接着是靴子撞击楼梯的声音。他握住生锈的门把，轻轻把门推开。过道里不见人影。

他的心咚咚直跳。干吗现在不趁机逃走？溜下楼梯就上

了大街。如果被谁拦住，就说在牢房里呆腻了。牢房没锁就表示相信他。警察局长本人不也下令把他换到警士室里吗？

他在昏暗的过道上蹑手蹑脚地走了几步，到了警士室的门口。门敞着，屋内透出的光线晃人眼睛。他走过去，只见一个警士把蓝上衣搭在凳子上，脸朝门坐着，正在缝扣子。

安东往后一闪，脚下的楼板嘎吱一响。警士走了过来。

两人面面相觑，目光很冷。警士是个宽肩膀的矮个子农民，长着一张机警的大脸和闪闪发亮的猫眼。安东笑了笑。

“到哪去？”警士问他，“谁批准的？”

“上你这儿来。”安东回答。

“上我这儿？……门是怎么开的？”

警士惴惴不安。

“没给我上锁，”安东解释说，“我在那间黑屋里呆腻了。”

“回去！”农民用怀疑的眼光瞪他一眼。

“警察局长准我呆在警士室里……”

“走吧！少废话，快回去！”

安东只好服从。警士送他进屋，咔嚓一声锁了门。当班的警士想踏踏实实地缝他的扣子。

安东骤然对这帮警士充满了愤恨，尤其是把这个胖子恨之入骨。他觉得他是个危险分子，仿佛现在还看见他那琥珀色眼睛射出的凶光。

安东咬着牙，坐在床边。怎么没逃走！那木板多可恶！过道上传来不均匀的脚步声。小孩被送回来了。这是把他弄到哪儿去了？是去受审吗？审讯如此短暂，令人不能置信。

安东听见门锁当啷一响，接着是暗探的声音："在我把你交给迪切夫斯基上尉以前，你还可以好好想想，是不是认识他。上尉可不好对付，你得把娘奶都倒出来的。"小孩说了句什么，暗探便自言自语地快步走过安东的牢房，仿佛在说："走着瞧吧！"

镇上的报时钟敲了两下。楼道上又传来警士们杂乱的靴子声。职员们也回来了，打字机响起来。一个女人问了句什么。

"他死了，"有人回答，"刚死的，大概死在路上。"

安东猜得出来，他们等来的是一名受伤的游击队员，但这个不幸的人已经牺牲了。安东如芒在背，两腿发软。

一辆卡车从街上沉闷地开过去，震撼了古老的建筑物，一小块墙皮从天花板上脱落下来。安东象被螫了一下，打了个哆嗦。他神经紧张，两手发抖。再过一小时，他就会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忽而想到牺牲的同志，忽而想到晃动在他眼前的打水台，忽而又想到警士。

时间难熬。沸腾的血液涌进耳腔，嗡嗡作响。镇静，还有一会，还有一会。他们现在忙于应付那具死尸，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哪有工夫管我。

他时不时长吐一口闷气，然后出声地来个深呼吸。报时钟终于响了三下。他坐在床边等着。时间一分分地过去，可谁也没有来。他紧张得心脏快要撕裂。他随时预备着牢门打开，来个警士把他带到警察局长那里。如果他们查出波尔迪姆没有疏散去那么一个人，也没有给这个人发过通行证，而

且查出车站旅馆没有住过安东·阿赫塔罗夫，他将作何回答呢？……那就会把他交给迪切夫斯基上尉，他就只好服毒自杀。

他躺在床上，思考着如何回答这一连串问题，又该作出怎样一种姿态。想着想着，心也不象刚才那样跳得厉害了。快四点了，仍然没有人来。正当他感到无望的时候，门锁一响，开头上锁的那个值班警士出现在门口。

“喂，出来！”他叫道。

“上哪去？”安东问。

“院里。”

他猛一冲动，眼睛一花，歪倒在地上。然后站起来，穿上外衣，结好皮带，走在警士前面。两人下了楼梯，到了院子里。马已套好，但小鞋匠不在它旁边。一个警察抓住缰绳，向屋檐下的职员和警士们嚷着什么。一小堆人背朝院子拥在屋檐下，大概正在瞧那个游击队员的尸体。

“干吗不把小鞋匠带来？”牵马的警察气乎乎地问。

“没有命令。”安东背后的警察回答。

“那谁牵马？”

“这人来牵。”

“要两个人才行。喂，帕什特拉帕诺夫，去开门把小鞋匠叫来，让他去打水。”

有个人从人堆中钻了出来，安东认出了他就是暗探。

“什么事？”他问。

“只带一人去打水，那不成，谁牵这牲口？”警察生气地

说，一巴掌打在马上，那马喷了他一手泡沫。

“那就你去。”暗探说。

“我有事……局长吩咐谁也不要离开，大概要去增援宪兵队！”

“喂，克利门特，给你钥匙，去把小东西带来！”暗探对胖子说，把钥匙给了他。

警士走去了，安东瞅着他离去的背影，只见此人腰粗背圆，一条皮带胀得象桶箍。他脑袋很大，后脑勺又丑又长，上面盖着一顶又好笑又难看的制帽。

“那些人干吗挤在那儿？”安东问。

“赤匪送来了，谁也认不得他。不是本地人。”暗探露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

“帕什特拉帕诺夫，我不能老牵着马。”警察威胁道，但暗探没有理他，而是领着安东向檐下走去。

“当时没有马上把他绑起来，真是大错特错，”暗探嘀咕道，“现在从死人嘴里能掏出什么？迪切夫斯基上尉饶不了他们。”

安东贴他走着，脸色刷白，两腿打颤。他紧张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根本就没有听清暗探说些什么。

两人走到檐下，众人为他们让出一条道。

这个游击队员身高体大，长着一头褐发，约莫三十五岁。粗壮的脚上没有穿鞋，两只手很有力气。他穿一身咖啡

色衣服，衣服上血迹斑斑。仰面躺着，两腿岔开，脑袋歪在肩膀上。那张久未修刮的脸没有表情，象是在思考什么问题。他褐色的胡子和那对还未合上的、仍然有光的蓝眼睛似乎还会转动，还有生气。

安东想赶快走开。他不认识这个游击队员。也许是舒门州那个支队的？正当他要逃走的时候，他不想多看一眼。天晓得，半小时后，他会不会热乎乎、软绵绵地仰面躺在死者旁边，两腿岔开，脑袋歪在肩膀上！

他两肩发麻，骤然觉得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在把他推到死者的行列里去。他的整个身子仿佛莫名其妙地同死者贴在一起，因而充满忧伤。

“认识他吗？”暗探问道，对他脸上的愁容感到奇怪。

“从何谈起？”

“也许在什么地方见过……偶然一晤。你脸色蜡黄。”暗探盯着他又说一句。

“我第一次看见死人。”安东说。

“神经脆弱。我就什么都敢看……就跟大夫一样。走吧，叫您了。”

小鞋匠手执马缰，胖警士忧郁而恼怒地向安东一挥手，指了指水桶和漏斗。男孩的一对褐色眼睛阴阴沉沉，毫无生气。

“喂，莫卡，”从小马旁边走过的一个警士对男孩说，“你看到屋檐下那个岔开腿的家伙吗？你也该躺在那儿。不干好事，看禁书！”

警士揪住小孩的头发晃了晃，小孩踉踉跄跄地窜了几步。

“快点！还愣着干什么？”胖警士说。

安东抓过缰绳，马车轮子转动起来。小孩提着水桶和漏斗。

他们走在狭窄而弯曲的街上，空桶骨碌碌震天价响。小马一股劲往前奔，安东使劲勒住缰绳，使得它不断尥蹶子。他觉得全身的肌肉都绷得很紧，但他仍拚命挺着。死者的脸在他眼前晃动，他满腔愤恨。

他低着头，疾步如飞，一往直前，周围的景物什么也没有看见，耳朵里灌满了大桶和车轮的响声。

出了小街，他放开缰绳，小马加快了脚步。他扭头看了警士一眼，发现警士的手枪皮套没有解开，左手捏着一根木棍。

“掏出手枪至少要三秒钟。如果子弹没上膛，还得一秒钟。”安东寻思着，仿佛这胖家伙就是死神。

他一抬头，望见深绿色的远山微微冒着暑气，宛若一道长墙，又如绷直的衣衫。躲进深山的强烈愿望使他心跳剧烈，毛发倒竖。他的同志们就栖身在那深绿色的海洋里，他向他们默默问好。他还能看见他们吗？他们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么吗？啊，他们现在是多么可爱，他和他们贴得多紧！

安东转过头来，搜索着男孩的眼睛。这个瘸腿小同志由于粗心大意而使他遭到逮捕，现在又将眼睁睁看见他呜呼哀哉——如果他不能逃脱的话。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这眼色

使人永生难忘。

打水台到了。小马低头站在石板地上，警士吩咐松套。安东两手发抖，鼻子搐动，眼睛闪光。他偷偷瞟着警士，看他站到哪里去。警士在身后五六步远的地方迈着步子，要是扑过去，他未必能掏出手枪。

安东踏上石板地，把水桶放在打水台的石槽上，然后紧紧抓住漏斗。小鞋匠惊慌地盯着安东，安东生怕这目光暴露了他的企图。就在他等警士靠近，准备向警士攻击的那一瞬间，警士却站到打水台上方去了。他紧盯着警士的两脚。警士似乎注意到了他的目光，稍稍往后一退，用棍子敲了一下皮靴。安东低下头，用水桶接水，然后把漏斗插进大桶的窟窿，背朝警士站着，眼光飞向玉米地。三个人谁也不吭声。小马喷着鼻子，用尾巴赶着苍蝇，打得空桶砰砰作响。泉水哗啦哗啦流进水桶。小马每蹬一下后腿，踢踢石板地边缘黑糊糊的水藻，马车就前后摇摆一下。

第一桶装满了，安东把水倒进漏斗。小孩牵着马。

泉水又哗哗流进水桶。安东直起身子，瞥见警士坐了下来，前面挡着一个石板。隔这么远攻击他，无论如何不会成功。要攻击，就得爬到上面或绕道上去，而警士满可以利用这一时间作好准备。剩下的只有第二种办法。安东觉得，要给这个或许拖家带口的农民留一条活命，第二种办法是唯一可取的。

当水桶再次装满时，安东低下头，又瞅了小孩一眼。小鞋匠圆睁着眼睛，欲言又止。装得满满的水桶沿着一条弧线

向警士飞去。警士还没有摸着头脑，水就淋了他一身，漏斗又重重地打在他胸口上……

安东低着头，缩着脖子，两脚生风地奔跑在毫无遮挡的牧场上。风在耳边呼啸，这声音他还从来没有听见过。他身子前倾，两脚拚命拉动才使沉重的身体保持了平衡。飞快扇动的两手，就象一只飞鸟的双翼。他笔直地往前冲，忘了跑个曲里拐弯，避开子弹。他极度紧张地等着警士开枪射击。

最初几秒钟，他觉得时间凝固了。奇怪的是，除了听到警士的喊叫，他竟没有听见枪声。他跑到牧场中间，才发现左侧冒起一团白烟，听见九毫米口径手枪的射击声。第二团白烟是在他两腿之间冒出来的。接着，他觉得他跳过了一颗子弹。第四枪，子弹在空中嗖地掠过；第五枪、第六枪……他默数着，此时的思想犹如闪电，不可言喻。枪声停了下来。是不是警士的子弹打光了？是不是手枪卡壳了？

他心中一阵狂喜，减慢了速度，抬头望了一眼玉米地。要跑到玉米地，还有一大段距离。于是，他又重新在毫无遮挡的牧场上拚命跑起来。快要跑到收割了的庄稼地时，背后有一种力量将他猛地一推，使他打了一个趔趄。他觉得眼前一黑，大地左右颠簸。但他仍旧保持着平衡，照样飞快地向前奔跑，过了一会才惊慌地领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他再次听到枪响，看见子弹在收割了的庄稼地里溅起一团白烟。

他等着疼痛或死亡的到来，但身上并无疼痛，只是右背发木。那地方热乎乎的，他断定只是受了伤。他跑着，急促地喘着大气，干燥的泥土在腿下发出沉闷的响声。他感到大

难临头。

地里的金黄色玉米秸迅速闪到身后，青纱帐就在眼前。他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一股股粗气涌出干燥的嘴唇。他蓦地收住脚步，往后一看，看见警士站在打水台旁边挥着打光了子弹的手枪，没来追他——大概是担心小孩也趁机跑掉。他还清楚地看见拖着大桶的黑马远远望去就象一只大昆虫，而在打水台上方的斜坡上，一幢幢白房轮廓分明。他突然想到追缉队很快就会出现，于是又向玉米地跑去。现在，他感到伤口处沉重，便用一只手捂住右胸的肋骨。热血浸透衬衫，粘了他一手。他明白，子弹穿透了他的身体。他先是感到害怕，接着又感到恐惧，就象一个惊慌失措的孩子一样抽噎起来。但他很快就恢复了理智。对同志们的思念使他决心不顾性命。不管是活是死，他都要奔向那两位同志。他只能朝他们跑去，别无出路。想到自己受了伤，他意识到要节省力气。他抬起捂着伤口的右手一看，鲜血淋淋，不禁感到一阵恶心。他头晕脑涨，一闭眼睛，差点倒了下来。还差几步才能跑到青纱帐。但是，到了青纱帐，他钻进去一看，前面却是波浪起伏的光秃秃的田野，其间杂有一块块收了庄稼的土地、田埂和稀疏的灌木。原来，这片玉米地又长又窄，不足三步宽……

他站在玉米地里，犹如落入陷阱。他知道，现在只能再往前跑。不管是躲避起来还是向两边拐弯，都只会缩短他和追缉队之间的距离。但他还是决定避开毫无遮掩的田野，否则易被发现，遭到枪击。他一转身，顺着玉米地跑了起来。

玉米地尽头的坡地上有个洞子，这洞子表明那里有一条小沟。他想钻进沟去。跑近小沟仔细一看，原来这条小沟是通向树木蓊郁的谷地的。

进入谷地，他继续朝前跑。河水越来越浅，四处横溢；谷地越来越宽，草木丛生。他蹦过当间一条小溪，想躲进树丛，但突然发现了一条山路——黑黑的、潮湿的山路，路上的白色鹅卵石斑斑点点。

他停下来，解开衬衫纽扣，看了一下胸口。伤口象张发紫的嘴，一股鲜血从“嘴”里直往外冒。他哆嗦一下，感到腹部和腰部也沾满了鲜血，于是再次陷入恐怖和绝望。

他继续盯着胸口，胸口艰难地一起一伏。他想：“我要完蛋了。”但这种冷静倒使他又振作起精神，自言自语地说：

“拿出力量，赶到交接站……别无他法。”他说出声来，似乎是想证实自己还活着。他觉得这声音是体内的另一个人发出来的——是要死的那个人，而不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他再次想到要节省力气，要“理智”。他大步走着，忽又觉得口渴。他回到溪边，喝了几口水。当他把身子直起来往后一看时，看见一个骑兵站在那条小沟上面的山梁上。有人追来了。脱险的唯一办法是象兔子一样躲起来，屏住气息。

小溪流到一块菜地后面就不见了。这块菜地周围栽着黑糊糊的棘篱。他沿着一条小路向菜地走去，看见前面横着个木梯，挡住了去路。这木梯是主人用来拦牲口的。他见地里没人，就跨过木梯，但突然在高高的菜豆架之间看到了一个妇女。这妇女当时正在棘篱边猫腰干活，见他跨过木梯便直

起身子，轻轻惊叫了一声。安东看见了面前的一双惊恐的眼睛，还发现这个少妇长着圆圆的、黑黑的、温和的脸膛。

安东喘着气，喃喃地说：

“别怕，大嫂……没什么……我是偶然……不会使坏的。”

少妇惊讶地瞅着他，半张着嘴，预备喊叫，但随即看见两行泪水顺着他丰腴的面颊流了下来。安东紧盯着她，似乎在用一颗心说服她不要叫喊，也别害怕。

少妇莫名其妙，他便吃力地说：

“有人追我……”

“谁？”她问。

“警察……”

她眼睛阴沉下来。安东急忙又说一句：

“我是大学生。”

“呵，天哪。”她说，“要我怎么办呢？”

“别暴露！”

少妇仍然不解地瞅着他。

“我就躲在这儿，”他恳求说，“假如被发现，就说是我自己钻进来的，你没看见。”

少妇往谷地上方望了望，一声不响地走到菜地的另一边。

他走近棘篱，躺在菜豆中，嘴里流血，身子发软。他又卧着，感到腹部的血热乎乎的。

道上传来马蹄的哒哒声。少妇在离他二十来步的地方摘菜豆——她蹲在地上，把摘下的菜豆装进围裙。小溪低声絮

语，潮湿的土地发出腐味，鹌鸟在近处叽叽叫着。

马蹄声更近了，他听见马鞍咯吱一声，马打了一个响鼻。骑马的警察从谷地的另一头来到少妇跟前，马停下脚步。她直起身子。

警察喘着气问：

"有没有人路过这儿？"

安东屏住呼吸，等着妇女的回答。他觉得，她足有一分钟没有开腔。

"什么人？"

"年轻人，穿便服的。"

她又迟迟没有作答。安东惊呆了。

"谁也没打这儿路过。"她说。

"你敢保险？"

"真的谁也没有看见。"

"你几时来的？"

"早就来了，已经两个钟头。"

接着是一阵沉默。警察寻思着，然后又说：

"如果看见那个人……高个子，穿便服，长头发，没戴帽，你就喊叫！"

他用马刺锥了一下马，马鞍咯吱一响，沉闷的马蹄声在山谷里回荡。

安东瞅了少妇一眼。她仍然蹲在那里摘菜豆。菜豆藤发出不安的沙沙声。她晒黑的双手摘着豆荚，高高的豆架不断摇晃。她没看他，就象把他忘了一样。必须呆在这里，等追

缉队过去，或者熬到天黑。但是，他怕体力不支，又急着要走。每分钟都在流血。他捂着伤口，觉得胸部越来越沉重。少妇两次仰望谷地上方的山坡，看见数名警察正在那边搜索。随后，他听见远处一声枪响，认定追缉队冲到山里去了。

他慢慢站起来，只觉得天昏地转，不得不先跪着抓住棘篱，把两腿伸直。菜地在他眼前打旋，就象一根根长竿绕着他飞转，绿中泛蓝的甘蓝变成了蓝色的迷雾。他身子一歪，靠在棘篱上，压得棘篱嘎嘎作响。他已没有力气。要看到自己的同志，必须赶到交接点，哪怕有被活捉或打死的风险。他走了几步，看见少妇投来同情的目光。

“谢谢你，大嫂。”他吃力地说。

少妇神情自若地环顾一下四周，朝他走去。她温柔的目光中充满怜悯。她突然默默地解下自己的白头巾，递给他。

“扎住伤口。”她双肩打着哆嗦。

安东接过头巾，用它把伤口捂住。

“再见！”他说道。

“上帝保佑。”少妇回答。

他跨过木梯，顺着山谷朝上走去。他需要绕一个小圈子，回到警察去过的地方。得救的希望和会见自己的同志的热望使他只有一个念头——跑。这个念头推着他前进，给了他力量。他头也不回，目不斜视。他弯着腰，用头巾捂着伤口，走得很快。山谷象一道长弧，正把他引到一块光秃秃的平地，可他并未察觉。如果警察看见，准会向他开枪，他就只能一步一颠地任由子弹最后把他推倒在地。他的上下牙齿时不时地

打架，背部和胸部越来越疼，这疼痛来自肺腑，那受伤的内脏一呼吸就全被拉动。他尽量不作深呼吸，觉得自己的肺只有一半管用。他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自己身上，仿佛整个身子、所有感官都对周围世界越来越迟顿、麻木。

他绕过河湾，向山上走去。出现在眼前的是他曾经躲藏过的玉米地，玉米地后面是小片小片的树林，其间有几株高大的橡树和耕地。山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看见了高矗的山脊，看见了象一条条巨型履带一样伸展到平原上的矮岗，感觉到了森林里刮来的凉风。他两眼搜索着圆锥形的山岗，因为他的同志就将在那里等他。他看见这座山岗在稍稍偏右的地方。他知道自己偏了点方向，就停了片刻，捉摸着上山的道路。但当他进入茂密的树林时，他迷了路，只凭着感觉朝前走。

树林使他松了口气，并模模糊糊地感到了希望。但是，攀登陡坡时，他呼吸困难，不得不放慢脚步，再一次担心自己没有力气。无论如何要歇一歇。他在一个长满苔藓和地衣的树墩上坐了下来。

周围的山毛榉有着银白色的光滑树干，一棵棵耸入云天，犹如屹立不动的巨人。树叶沙沙作响，就象有无数生灵在喁喁低语，向他述说着死神即将来临。他闻到了腐烂的树叶和潮湿的泥土的气味。这气味使人麻醉，他因而更觉得悲哀和孤独。不远处，溪水淙淙，他又觉得口渴难耐。但他没有往回走，而是仍旧坐在原地，犹豫不决。最后，他站起来，开始攀登山岗。落叶在他脚下刷刷地响。如果附近有个警察，

这声音准会使他暴露。但他全然不顾这些，扶着树干继续前进，呼吸越来越困难。他以极大的耐性登上一面斜坡，就在一小块披着落日余晖的平地上停了下来。伤口疼痛愈烈，腹重难以忍受，嘴里冒出腥味——他自己的血使他想要呕吐。他两腿发抖，大颗大颗的冷汗从额头上渗出来。他呻吟一声，扶着一棵大树，慢慢瘫在山毛榉树墩旁边软绵绵的金黄色苔藓上。他的心脏似乎移到了眼睛里，跳得又快又有力。他鲜血淋淋的双手颤抖着，胸部在剧烈扇动。他跪在地上，一股殷红的血从嘴里流了出来。他看见自己的血流在苔藓上，冒着热气，但他不再感到害怕，因为胸口的疼痛和沉重感已随之缓解，呼吸也轻松了。但是，当他试图再站起来时，他骤然感到周身无力，头晕目眩。必须咬紧牙关站起来。他看了一眼离这不远的山岗。幸好这里有一条现成的山路。他象醉汉一样上了道。他想到需要抱着拐棍走，就找了一根树枝。但这树枝对他来说太沉了，何况他一只手要捂伤口，另一只手哪能支持住沉重的身体。

就这样约莫走了百步，他正好来到山顶下的一条褶皱处。那条又陡又湿的小沟就是从这里发源的。他冷得浑身发抖，冰凉的汗珠沁出额头。他停下来，望了望山顶上挂着夕阳的树梢。山顶似乎升高了，树林晃晃悠悠，犹如一次骇人的地震摇撼了山岳，把他抛了起来。他脚下的天空眩目耀眼，无边无际……

等他苏醒过来，他才知道自己仰面朝天倒在地上。他躺在路上，舒展着四肢。他觉得轻松，近乎愉快。傍晚的天空

金光灿灿，他好象漂浮在温暖、平静和充满柔情的海面上。儿时的情景似乎又展现在他眼前，他当时躺在陈设简陋的小屋里养病，屋子的墙上每天早晨就映着这金灿灿的光线，那光线使他倍添精神。他曾试图用他的小手抓住粗糙的墙壁上的光线。他现在也是一个正在受苦的孩子，但这不是由于生病，而是由于斗争所需要的磨难。他多想休息，多想闭上眼睛，永远沉浸在这热烘烘、金灿灿的光线里啊！

他想起了同志们，仿佛看见他们躺在离他很远很远的森林里，一个个面庞消瘦，不安地倾听着寂静的森林中的任何一点声响。他耳中灌满了窃窃私语，似乎听见晚风在树梢上移动。他聆听着许许多多种声音，每种声音都断断续续，使人陶醉；他虽然不能清楚地说出他听到的每个单字，但却理解这些单字的意思。在这些声音中，有一种声音述说着他相信会在地球上发生的种种事情。渐渐地，这种声音听起来象是钟鸣，在满天的阳光下时而令人不安，时而使人高兴；继之是千百万种声音混在一起……

他闭上眼睛，昏昏沉沉，因失血过多而苍白的脸上泛起一抹微笑……

路上的落叶窸窣作响，两个身穿咖啡色外衣、头戴军帽的人影怯生生地出现在路口，接着又踌躇地向他走来。他们走得很慢，小心翼翼，拿短短的自动步枪对着他。他们突然一咬耳朵，顺着山路向他跑来。

其中一人脱去了他的外衣，撩起他的衬衫。有什么东西从他胸部拔去，热乎乎的。他想睁眼，但是无力，只是一笑。

一只粗糙的手温柔地捏着他的手……

他的眼前仍旧是金光灿灿，他的心仍旧游弋在光海之中。随后，他觉得有两只手把他轻轻托了起来。他很温驯，就象小时候被母亲抱起来一样。他听见两人在担心地轻声说话，这声音使他感到踏实。

他们抬起他。在山路的路口，残阳照着他白得象死人一样的脸，被汗水湿透的黑发散落下来，在他的同志的肩上来回摆动。就在这时，他想起了那个少妇。她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黝黑的皮肤、温柔的举止、圆圆的脸膛、善良的眼睛。她解下白头巾，递在他手里……

下面的平原、山岗已灰蒙蒙一片。高高的山毛榉轻声耳语，仿佛因过去了一天而松了口气。最后一抹阳光从一个山头移到另一个山头，而在遥远的地方，在一大片深绿色的森林那边，在有居民、城镇的地方，天空撒下万道金光，宛如一股火的巨流，使千万颗心燃烧起来。

（余志和译）

迪·哈吉利耶夫

审讯室

〔**作者简介**〕 迪米特尔·哈吉利耶夫（1895—1960）生于教师家庭，毕业于维也纳商学院。担任过“劳动战斗作家联盟”秘书长、“现实主义剧院”经理，并在多种刊物任过编辑。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顽石开言》、《难于置信，但是事实》、《英勇的日子》、剧本《亡兄之歌》、《斗争公开化》等。

他被单独关在一间囚室。侦破工作进行得很慢，许多被捕者的口供对不起来，都没有提到他，仿佛谁也不认识他似的。只有一个事实：找到了从兵营里拿出来的武器；这次秘密行动只有一个证据确凿的参加者：炼钢工人赫里西莫夫，从他家里搜出了武器。所以，警察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以彻底查清这次秘密行动错综复杂的线索。但这是不容易的：炼钢工人早在第二天就从五层楼梯口跳下去，脑袋在

水泥地板上摔得粉碎，从他嘴里未吐出任何口供。这样一来，侦查线索从一开始就断了。

单凭怀疑就逮捕了米尔奇诺夫。他们知道他是危险的秘密分子，当兵时就在兵营里机警地组织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所以他们最怀疑他。

当把他带到审讯室时，他已经知道哪些人被捕了，甚至得知他们表现得很坚强和勇敢。在过去的七天中，他们度过了最可怕的时刻，一切都坚持住了，没有动摇。尽管审讯时侦查组长声称所有被捕的人都承认他参加了，并供出他是这次秘密行动的主要组织者，米尔奇诺夫并不害怕，因为他了解这些手腕，他们不是头一次用这种方法对付他。

“可能他们承认了，”他平静地说，“也可能他们参加了，不过我并不认识他们。你们千方百计说我参与了这件事，那是白搭，我根本不知道。”

开始时，他们没有用老一套办法对付米尔奇诺夫。作为侦破大而复杂案件的能手而受过嘉奖的组长，不允许使用任何暴力。这一次，他也想采用试过的心理战术。白天，对他审讯了六次，大多数情况是：一个问题也不提，就将他带回牢房。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不让他睡觉，派了好几名侦探轮流站在他门前，每隔一刻钟叫醒他，使他的神经由于睡不成觉而保持紧张状态。接着再审讯他。第四天让他安静睡觉，他刚刚睡熟，门嘭的一声开了，他被惊醒，站了起来。他前面站着一个男子，那人衣衫褴褛，脸上血迹斑斑，目光呆板得可怕，嘴巴歪扭，流着淡红色口水。这是个疯子。走进这

个昏暗的房间时，疯子退了几步，痴呆地微笑着。然后，突然间他伸开双手，凶恶地张开五指，扑向米尔奇诺夫，打算把他掐死。米尔奇诺夫握紧拳头，在他腰部猛击一拳，那疯子便摇晃了几下，倒下去了，象只受伤的野兽哀嚎着。

透过门缝进行监视的侦探非常吃惊，赶忙跑去报告上司，说疯子处在危险之中。

“没有关系，”上司回答说，“今天晚上把他留在那里，让他们斗到天亮吧，看他明天交待不交待。”

这天晚上真难熬。疯子好几次想抓住米尔奇诺夫，多亏有力的拳头，使他顺利得救了。疯子好象是个哑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傻笑和野兽般地哀嚎。而米尔奇诺夫已被不眠之夜弄得疲惫不堪，差点儿痛苦得哭起来。现在该如何制服这个不幸的人，让他平静下来呢？……疯子蜷缩在窗前，米尔奇诺夫不停地望着他。午夜过后，他睡着了，象只受了重伤的野兽打起鼾来了。米尔奇诺夫走向前去，瞧了瞧他，便放了心，至少不会对他进行报复。

第二天清早，侦查组长走了进来。看见疯子在这里，他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对陪他来的警察说：

“你们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一个疯子弄到米尔奇诺夫先生这里来？混蛋！”他装着怒不可遏的样子，补充说：“你们会把一个好人也搞疯的……”然后 他转向米尔奇诺夫：“请原谅，朋友 …… 这是个大错误，我会叫他们将您挪到别的房间去的。”

不一会儿，他们真的将米尔奇诺夫带到了另一间囚室

——更狭小，更阴暗，空气中充满难闻的潮气和臭味。他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便蜷缩在一个角落，刚刚闭上眼睛，就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喊叫声和嚎啕声，有人在受刑。他用手堵住耳朵，但还是不能压低从墙那边传来的尖锐刺耳的喊叫声。他觉察出自己身上汗如雨下，模模糊糊的眼睛里布满血丝。

“听见了吗，朋友，就该轮到你了。”有人透过门缝朝他喊。

米尔奇诺夫握紧拳头，趴在门口。外面的人为了让他听见，故意大声说话：“我们剥他的皮，看他承认不承认！”

快到中午时，又对他进行审讯，那位组长跟他谈话时不再客气了。米尔奇诺夫的坚强态度使他很恼火，所以他眼睛里充满愤怒。当他提问时，他的嘴唇不停地颤抖。由于米尔奇诺夫什么也不说，他气得时而站起来，时而拍桌子，想用大嗓门吓唬他，但米尔奇诺夫什么也没有供认。组长按了按电铃，马上进来一个大汉，他长着老鼠眼，低额头，溜肩膀。组长朝他点了点头：

“带去继续审讯！”

他被带到头一间牢房，疯子已不在那里。“现在轮到我受刑了。”米尔奇诺夫想。“与其在这种令人恐惧的等待中消耗精力，不如早点受刑为好。”

他知道什么在等待着他——他已好几次落到了这里。

“但不知其他人表现怎么样？”他自问自答。“既然侦查组长那样怒不可遏，他们肯定都表现得不错，否则一切都不会象现在这样了。要是万卡坚持不住，把一些事情说出来的话，

那我否定也是白搭，无济于事。佩蒂娅把宿舍里的材料转走了就好，否则将会损失惨重，会牵连到十来个人。不过，赫里西莫夫已经死了，他跟我们之间的线已经断了。”

他一面忧虑地寻思，一面在牢房里踱着步，在等待中他愈来愈焦急。他站在窗前，望着明净而广阔的天空，外面的生活仿佛变了样。他把目光转向街道，而思想则飞到了更远的地方，把他带到波杜扬内居民区，然后又把他带到远方的村庄，现在他年迈的母亲、妻子和两周岁的小女儿正在那里等待着他。她们知道他被捕了，他曾写信叫她们寄衣服和被子来，但还没有回音。现在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无比地爱她们，尤其是小孩……想起孩子，他眼睛里情不自禁地冒出了泪水。就在这时，他突然害怕起来，担心自己……“假使我如此软弱……那我就完了。”他对自己说，试图把思想转到别的方面去。

突然间，门当的一声开了，走进三个人来。其中一个人走近他，朝他脑门猛击一拳。米尔奇诺夫失去了平衡，几乎站不稳了，便靠着墙。其他两个人扑上来，使劲抓住他的双手。米尔奇诺夫鼓足了劲，毛发竖立，准备自卫，但第二拳打在他眼睛上，他摔倒在地上了。他感到那样突然，连摔疼了什么部位也没有感觉，只听见刽子手们在破口大骂，并觉察出有人踩他伸开的手掌。他脸朝下摔的，皮鞭抽遍了他全身。开始是手上肌肉感到痛，接着是腿关节，最后背部和臀部都疼起来。他痛极了，但紧咬着牙，以免喊出声来。后来他支持不住了，失去了知觉。

米尔奇诺夫趴着躺了两天——既不能站，又不能坐，也不能仰卧。他遍体鳞伤，关节象断了似的。刽子手们估计米尔奇诺夫已经服输了，所以现在组长单独走进他的牢房，继续审讯。他凶狠、严厉、冷酷地向他提出已经问过的那些问题，米尔奇诺夫还是态度坚决地一言不发。他估计自己不大可能从这里活着出去，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沉默。他觉得自己身上反抗的力量已大大增强，任何酷刑也不能把他摧垮。他这种坚强态度简直把侦查组长气疯了，于是侦查组长又把那个长着老鼠眼和溜肩膀的人叫来，大声对他说：

"继续审讯！"

从这天起，用各种刑具，采用各种方法对他施刑，想用武力迫使他供认。米尔奇诺夫的沉默不仅使侦查组长，而且也使刽子手们感到恼火，所以他们特别残忍地折磨他，不放过任何一种刑具：电椅，把他四肢钉在架上，用鞭子抽打他全身，折断他的关节……米尔奇诺夫完全失去了知觉。当发现自己尿血时，他想："我完了，这倒更好，现在可恶的生命再也不能欺骗我了，有些人不就是为了活命而不能坚持到底，最后断送了自己吗？"当他想到自己已经活不了多久，不会有背叛的危险时，便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刽子手们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点，他们让他平静地度过了四天，让他养伤。为了使以后的审讯有结果，必须让他重新恢复对生活的渴望。

第五天，侦查组长走进他的牢房。

"我们逮捕了你的妻子和孩子，你有什么要说的？"他阴险

地说。"难道也要她们为你的顽固态度而送命吗？什么在等待着她们，你好好想一想吧，无论什么也不能阻挡我们。"

米尔奇诺夫愣住了。"这些恶棍连这也干出来了！"他对自己说，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侦查组长死死盯着他的脸，发现他脸部抽搐，不停地眨眼，嘴唇颤动着，于是便高兴起来，以为很快就会成功呢。

"你们这伙暴徒！……"米尔奇诺夫冲着他的脸喊道。"你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侦查组长再一次看了看他的脸，就离开了牢房。米尔奇诺夫一下子倒在地上。就在这时，他听见了小孩的哭声，开始声音很远，接着愈来愈近。他跳了起来，把耳朵紧贴在门上。这时，小窗开了。

"这就是她们！"传来了侦查组长的声音。"你瞧，她们就在走廊里。"米尔奇诺夫瞧了瞧：走廊的另一头，妻子背朝这边站着，手里抱着用被子裹着的孩子。他熟悉这条被子，是她们。

"想不想让我放她们？"又传来了侦查组长的声音。"你为她们感到痛苦，对吗？……只要你放聪明点，这个我们会办到的。"

"让我去看看她们！放我出去！……"米尔奇诺夫喊叫起来。

小孩哭个不停。侦查组长挥了挥手，于是她们被带到一扇门前，门窗关闭着。米尔奇诺夫紧贴着门，侧耳细听孩子的哭声——什么也听不见。接着，他心慌意乱地在牢房里走

来走去，最后走到窗前，抓住铁栅栏，用突然间充满他全身的力量使劲拽，他感觉到铁栅栏被他拽得松动了。什么也不能使他得到安慰，周围只有四面墙和紧锁着的门，无法出去。他感到憋闷，全身无力，象是一双有力的手卡住了他的喉咙，不让他叫喊，使他四肢无力，大脑昏迷，撕碎了他的心似的。“我可爱的孩子！我可爱的孩子！”他脑子里重复着这句话，感到一阵头晕，便倒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走廊里又传来了小孩的哭声，声音愈来愈近。她们从牢房旁边走过去了。米尔奇诺夫扑向牢门，用拳头使劲敲着，喊道：

“开门！……放我出去，恶棍……杀人犯！”

小孩的哭声渐渐远了，消失在走廊的尽头。米尔奇诺夫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开门……告诉他们我将供认……你们那里听见了吗？”

但谁也没有来开门。“他们肯定在外面偷听，残忍地拿我的痛苦取乐。”米尔奇诺夫想，同时拚命推门。“现在会把她们怎么样呢？我可爱的孩子……她那样瘦弱和娇嫩……用不着多久就会被折磨坏的……”这些愈来愈沉重、愈来愈充满恐惧的念头占据着他的脑海。就在这时，门又开了，侦查组长又出现在门口。米尔奇诺夫站在他前面：

“带我去写供词。”

组长从旁边瞧了瞧他，仿佛想以此对他表示深深的蔑视。然后他露出微笑，嘴唇勉强地动了动。

“就是说，你最后同意承认喽。”他以蔑视的口吻说。“好，

我会叫你的。"他补充了一句，就走出门外。门又关上了，把米尔奇诺夫跟那个正在周密策划如何使他上钩，如何从他嘴里掏出最重要的情报的外部世界分隔开了。

"混蛋，恶棍！"米尔奇诺夫心里骂道。"他们以为用这种极端残忍的手段会捞到什么。"

"一会儿就来叫你。"侦查组长又透过门窗重复了一遍。"好好想一想应该回答什么问题，否则你妻子和孩子就要被关进地牢里。"

米尔奇诺夫觉察出自己身上重又开始恢复刚才失去了的那种反抗力。"这是我没有毅力的表现……这是弱点。"他对自己说，接着离开了门旁。他透过窗子往外瞧；但他无法平静地看城市一眼。孩子的哭声和侦查组长所谓什么也阻挡不住他们的威胁话，仿佛仍在他耳边回响。他觉得这种威胁实在卑鄙和令人作呕，但同时又感到痛苦——非常痛苦，这揪着他的心，使他的四肢软了下来，仿佛自受刑以来还没有感到这么痛苦过。他们曾象疯狗一样扑向他，打他和用脚踩他。要是继续把他折磨死就好了，要是在他们手里断了气就好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一切也早就完结了……这一个又一个的想法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时而坚强和不可动摇，时而脆弱和不坚定。一个极端是坚持到底、毫不动摇的英雄主义，另一个极端是对亲人依恋的人之常情。但是无论这一方面，还是那一方面——这种深厚的爱都是高尚的。一方面是要通过斗争使所有的人都同样得到自由和幸福，另一方面是两个无力自卫的弱者——他的妻子和孩子——现在被带到这里，这

是敌人的诡计。无论这一方还是那一方，都不能象不需要的东西而被抛弃掉，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地为对方牺牲自己。

米尔奇诺夫焦急地在牢房里踱来踱去。他在门旁停住脚步，竭力控制住自己不用脚踢门，不把积在胸中的怒火喊出来。他气得上气不接下气，连威胁带骂地说："这一次你们也不会成功的，恶棍！这一次你们也无法摧垮我的意志，你们这一伙杀人不眨眼的暴徒！在斗争中我的妻子和孩子并不是最先的牺牲者，我们定会成功地把你们象蛆虫一样踩得粉碎……"

这样度过的那几分钟，简直长得象几小时——极其痛苦的几小时，象过了很久很久，而且是在这潮湿的牢房里。接着门又开了。

"侦查组长叫你去！"一个说话尖刻的人说，他象个强盗似的窜进牢房里。

米尔奇诺夫走出牢房，他发现一只手枪对准着他。

侦查组长在办公室等他，将头靠在手上，香烟在烟灰缸里着完了。当他们进去时，他平静地抬起头来，对那个人轻轻地晃了晃脑袋，示意他出去。然后，他装出一副客气的样子，指着椅子说：

"请坐！"

米尔奇诺夫仍然站着。侦查组长正面瞧了瞧他。

"请坐，请坐……现在我们可以进行朋友式的交谈了。"

米尔奇诺夫无法伸开手，他的拳头攥得紧紧的。

侦查组长继续假心假意地向米尔奇诺夫献殷勤。

“请坐，抽支烟吧，米尔奇诺夫先生。请放心，我们也是人。”于是，他把银烟灰缸递了过来，米尔奇诺夫摇了摇头。“您不抽烟？您真是个有意思的人！怎么能放弃这种享受呢？”

“我觉得你们把我关在这里，并不是让我来享受的。”米尔奇诺夫说，他仿佛想用这句话检查自己的声音是否可靠。他的声音确实非常平静。

“哎，您说说看，当我对您说想在兵营里暴动是很不明智的，我说得对吗？您瞧，这件事已经暴露了。我感到奇怪的是，您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也上了钩，去帮助一些乳臭小儿呢？”

米尔奇诺夫没有上当，这是由远而近地来诱他上钩。

“我同意您说的，”他回答说，“但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硬说我参与了我根本不知道的事情。你们单凭怀疑就逮捕我，而现在又要我承认我连听也没有听说的事。”

“不知道？没有听说过？”侦查组长抓住这些反驳说。“可是，要是我出示您的同伴们的供词呢？他们都说您是这次秘密行动的中心人物，假如一切是这样的话，那您将怎么说呢？”

“不可能是这样……”

“不可能，”侦查组长打断他，“可是，当我们把逮捕您妻子和孩子的消息告诉您时，为什么您那么慌张？”

“因为这是我的亲骨肉，更何况我是人，不是野兽……”他本来想说“不是你们这样的野兽”，但他没有这么说。“请告

诉我，为什么连她们也不放过？她们犯了什么罪？难道想用这种办法逼我承认根本没有的事情吗？既然仅仅是为了救妻子和孩子而捏造一些不存在的事实，这对你们又有什么用呢？要是你们想杀我，那就杀吧……这对你们来说是不难的。”

侦查组长暴跳如雷。

“别耍滑头了，先生！……有不少象你这样的人曾经落到我手里……我不允许你在我面前耍滑头！”他按了一下电铃，随即进来一个露出一排假牙的人。“把他带走！”

米尔奇诺夫松了一口气。“但愿一切已经结束！”到了走廊里时，他这样对自己说。

同一天，局长办公室里出现了极其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当侦查组长向局长报告，说从米尔奇诺夫嘴里还是什么也没有挖出来时，他便象个狂人一样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这是胡闹！”局长气得嘴都歪了。“让一个坏蛋捉弄了我们整整一个月！”

侦查组长吓得胆战心惊，低声地对他说明了侦查的全过程：心理刺激，用各种手段施刑，最后逮捕他妻子和孩子等等。

“当他表示愿意承认时，你是不是过了好长时间才提审他？”响起了局长愤怒的声音。

“是的，我想用这种办法进一步折磨他的神经，打算等他内心极其痛苦时去软化他，使他最后失去坚定性。”侦查组长战战兢兢地说，嗓音发颤。

局长猛地一拳打在桌上，大声说：

“错了！……注定错了！……你怎么会想出这种原始办法来？应该当时就……在他听到小孩哭声后几分钟……不该给他考虑的时间！……哎，多么愚蠢！……我怎么对军方交待？……我亲自要求他们将一部分侦查任务交给我们，可现在……一切都弄糟了。”

“再加刑吧？”侦查组长恶狠狠地说。

“胡说！胡说！……既然他坚持到现在，也会坚持到底的。我们不需要他死，而要他供认，懂吗？……”

就这样停止了对米尔奇诺夫的审讯。接下去两周，他们也没有对被捕的人再进行审讯，因为这些人要养伤。后来，把他们提交法庭时，警察局的侦查材料虽然不充分，还是包含一些可以判刑的事实，但所有被告都矢口否认警察局逼出来的供词。与此同时，由于从兵营往外运武器的主要参加者武器库保管员和站岗的哨兵都已逃之夭夭，所以军事当局的侦查也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法院仍然宣告米尔奇诺夫有罪，把他作为可能会经常成为最复杂的秘密活动的中心人物、死硬分子和危险的共产党员而判了刑。

（樊　石译）

迪·恰夫达罗夫-切尔卡什

伊凡和他的战友们

〔**作者简介**〕 迪米特尔·恰夫达罗夫—切尔卡什(1912—1972)生于贫农家庭，毕业于索非亚自由大学财经系。他是以“赫·斯米尔宁斯基”命名的革命文学团体的组织者之一。担任过《黄蜂报》主编和多种刊物的编辑，做过外交官。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幸福的时刻》、《伊凡和他的战友们》、《柳树荫》、《七月的早晨》、《鸟语》，喜剧《机器中的沙子》、《这些钱》等。曾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一

伊凡站在战壕里机枪阵地旁，心想匈牙利平原上的黑暗多么迷惑人。你随时都觉得天快亮了，可实际上才刚过半夜，周围老是那样雾气沉沉，你仿佛腾云驾雾一般，大概是由于

这里大雪覆盖着单调和一望无际的平原，并且伸展得很远很远的缘故吧。伊凡从来就不觉得平原上好。他爱故乡的青山，它那起伏的山峦将夜晚分割开，每当月亮高悬在天际时，夜景多么迷人啊！伊凡深深吸了一口气，开始用靴后跟蹬冻结了的地面，想暖和一下腿。但他觉察出自己的眼皮快要合上了，为了不致被这蒙蒙的灰雾完全遮住眼睛，他便扣了一下枪上冷冰冰的扳机。射出去的子弹的火光划破了夜空，对面阵地上的德国岗哨马上回敬了几枪，看来他也没有睡觉。他们几乎同时停止了射击。伊凡想摸摸敌人的情况，他只模模糊糊地看见对方凶恶的眼睛和冻得发紫的肥鼻子——其他一切都被淡绿色的头巾和钢盔罩住了。有意思的是这些凶残得象野兽一样的德国鬼子却爱象老太太那样包着头，尽管夜晚并不太冷。大概他们这种习惯是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那致命的冬天留下来的吧。

接着，伊凡开始想到自己在前线不怎么顺利。早在占领这个阵地的第十天，有一位班长牺牲了，于是上级委任伊凡接替他的职务。为什么恰恰选中伊凡呢？是不是因为他自愿执行夜间侦察任务？不过看来上级对他的估计并不怎么对，伊凡至今从未指挥过别人。假如说外貌会使人建立起威信的话，那么他的外貌一点也不引人注目。他脸部表情缺乏坚定性，眼睛不善于指挥，按照前线士兵的样式留起来的金黄色胡子，使他不象很有战斗性。他身材低于中等，所以他的大衣几乎拖到踝骨边，他的手包括指尖在内都消失在袖筒里。但最糟糕的是要他指挥一个人员极其复杂的班，仿佛这个班

的人是故意挑选的，好让他失败，让他成为全排的笑柄似的。

伊凡又叹了一口气，他想依次回忆一下对自己下属人员的印象。最难弄的看来将会是那个不服管束的战士斯托约·明科夫，他在农村长大，从小失去父母，牧童和雇农的遭遇使他对人充满愤恨和不信任。他的眼神里从未流露过一丝一毫的快活，而从他被烟熏得焦黄的牙齿间冒出来的只是谩骂和指责。对他来说任何上级都不好，他骂所有的人，只在副班长面前稍微收敛一点。他老是感到饿，认为大家是一起说好了对付他，都偷他的面包、腌猪油和香烟。他还爱吵架，动不动就伸出骨骼粗壮的长手打别人的耳光。

伊斯兰教徒萨利·伊勃里亚莫夫从来就不爱说话，总是把黑得发亮、炯炯有神的眼睛隐藏起来，回答问题时极其简单，要不就呼哧呼哧地说得叫人听不清。但他是个优秀战士，即使不该他站岗，他也总是不声不响地帮忙。萨利爱惜武器，拆开武器零件和擦机枪时，是多么熟练啊！眼力又是多么准确啊！他的枪从来没有生过一点锈，总是擦得锃亮。可是，在他那黑黝黝的额头后面究竟隐藏着一些什么想法呢？

格罗·马查诺夫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大家都称他为“马查电台”。他在整个战壕里跑来跑去，爱到处管闲事；他满脑子新闻和引起惊慌的谣言，并到所有土洞里散布。他给小斯蒂利亚精神上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啊！小斯蒂利亚编辑手抄本《战地简报》，自封为全权发言人。他常常同格罗吵架，总是威胁他，说要在报上把他描述一番。但斯蒂利亚没有威信，因为他娇生惯养，是个白面书生，受不了前线士兵生活

的苦。他非常害怕虱子，怕脏和臭气。只有托多尔·佩尔尼恰宁多少有点同情他，保护他免遭攻击。但托多尔是个难以相处的人，说话粗野，不讲文明，斯蒂利亚往往为这种帮倒忙式的袒护而感到脸红。

所有这些人早在听说派伊凡来当班长时，就仿佛说好了似的，都不理他。只有当过修道院侍役的帕特里科夫马上信任他，给他讲修道院的生活，每说完一句话就要不干不净地骂一声。帕特里科夫从箱子里掏出一张褪了色的照片，指给他看：以周围种着黄杨树的修道院建筑物为背景，端端正正地站着一群修道士，成半圆形排成三行，帕特里科夫带着痛苦的表情跪在他们脚下。

“这是伊诺基神父，”他激动地解释说，同时弯着食指指着照片中间。“他用拐杖打过我十一次，说我在修道院厨房里吃荤菜。而这个人用脚踩过我。等回去时，我要拔掉他们的胡子。”

接着，他高兴得红了脸，讲了五桩神父和修道士非同一般的丑闻，在土洞里引起哄堂大笑。

然后，伊凡想起了自己班里一个最不幸的青年。廷科·瓦拉迪诺夫十五岁就开始当挖土工，有一次塌方时，他被土和石头压住了，受了严重的内伤。从那时起，他的后脑勺和太阳穴老疼。他天生善良、宽厚，总是闲不住。

昨天晚上他疼得倒在铺板上，低声地哼着，由于强忍疼痛，不叫出声来，他那变黑的脸上布满了大粒汗珠。但当快轮到他去战壕里站岗时，他便站了起来，不声不响地开始准备。这时，伊凡命令他躺下，并代他站岗去了……

但是，好象真的开始天亮了似的。阴沉沉的乌云不知不觉地消散了，高空中隐隐约约闪烁着星星，美丽的雪景一直延伸至闪耀着玫瑰色光芒的地平线上，一条小溪象条黑带似的将笼罩着一层薄雾的田野分割开来。再往前出现一片黑压压的树林，德国人的战壕就挖在那里。整个阵地上非常静寂。过了一会儿，伊凡听见背后有谈话声和餐具的叮当声，大概是炊事员送来了茶吧。接着，有人在他那结实的肩膀上拍了一下，换岗的人来了。

伊凡交了岗，沿战壕走着。不一会儿，他用手打开土洞那扇熟悉的麻布门帘，他心里顿时觉得非常舒服。这里有一个小炉子，火苗愉快地发出噼啪的响声，散发出热量；这里缸子里沏好了热乎乎的茶；这里放着弄脏了的背包，里面有一大块边上已经发黄的腌猪肉；这里有香烟，熟悉的人味和刺鼻的烟味扑鼻而来，战友们都在这里。

战士们围坐在火炉旁，正吃着早饭。他们在床铺上给他让出一个地方，于是伊凡便把冻僵了的脚伸出去取暖。格罗·马查诺夫大口地喝着茶，一面讲述早上的新闻：

“昨天晚上，三连有一个同乡受了伤，他的右耳被打掉了，可能会聋。”

他停了一下，想看看大家对这条消息的反应如何。接着他继续说：

“昨天晚上一排两个同乡吵架了，军士罚他们多站两班岗。斯塔门·巴卡尔切收到了邮包，里面有家常饼和李子酒。他给了我两块涂了蜂蜜的饼，而烧酒不给任何人尝，真是个吝

畜鬼。一连的炊事员挑着茶水经过没有战壕的地方，德国人用机枪扫射，没有伤着人，但茶全撒了，现在战士们正喝雾和风呢。”

“今天‘马查电台’可不怎么样！”斯蒂利亚插了一句。

“那你的报纸肯定会报道更多的消息喽！”马查诺夫受委屈地说。“既然你知道得更多，那请你说说昨天晚上团部的两辆卡车运来了什么？”

“这算什么新闻？肯定是军需品呗。”

“放屁！运来的是礼品，首长！十点钟将召集各班班长进行分配。不过我们班长那样讲客气，未必能拿到好东西。”

伊凡没有回答这种毫不掩饰的攻击，在半明半暗中他无法看清其他战士的脸，但他知道他们也是这么想的。从头一天起，他们对他就不怎么样，那种看法一直保留至今。当你知道这些人不愿意对你打开自己的心扉，而你又将要跟他们一起度过许多艰难困苦的日子，甚至有可能牺牲在异国土地上时，是多么令人难过啊！

一个低而温和的声音打断了伊凡痛苦的沉思。

“你怎么不吃早饭呀？我给你烤了两块面包，趁热吃吧！”

这是昨天晚上伊凡代其站岗的那个有病的青年。头一次友谊终于出现了！首次胜利！他仿佛找到了通往一颗心的羊肠小道。

“你怎么样？不疼了吧？”

“好多啦。”

“那你跟我到村里去一趟，好不好？”

"可是你不休息吗?"

"有一件事得马上去做。"

"你真会找人!"斯托约·明科夫大声说。"一出战壕，他就会吓得大哭起来的。"

不一会儿，伊凡和廷科离开了土洞，穿过了战壕。他们猫着腰，走出了德国人火力圈内的危险地带，然后直起腰来，在雪地里迅速赶路。他们前方远远地可见被匈牙利人抛弃的村舍的屋顶。高高的杨树上积满了雪，活象房屋之间冒出来的喷泉。教堂的尖顶跟树干平行地耸立着。

"昨天我收到了信。"廷科对他表示信任地说，同时涨红了脸。

"怎么样，老人都好吗?"

"不是他们，而是未婚妻寄来的。"

廷科不善于向别人吐露心里话，他那样激动，开始用肩碰伊凡，并难为情地微笑着。他的未婚妻曾在一位太太家干活，太太很富，是那种只知道睡觉和骂人的人。从前她学过缝纫，为了给她买缝纫机，两年来廷科一直攒钱。他还需要再积五千列弗，然后就结婚。她在信中说很好，求上帝保佑他健康，并说将给他寄衬衫和饼干来。而他在回信中说，假如可以的话，给他寄一瓶李子酒来，好为她的健康干杯。

他们就这样边谈边走，到了村里，走进第一家院子。

伊凡心里想：应该为本班的土洞弄一两件东西，把它收拾得整洁和舒服一些。

二

这一天，伊凡特别高兴。他在村子里找到了需要的一切，把土洞装饰得真的象一间小房子，舒服多了。从前门口挂着脏麻袋布，北风呼呼地往里灌；而现在钉了一扇咖啡色木门，门的上端安装了名副其实的玻璃，白天，柔和的光芒可以透射进来。还有一个装了镜子的洗脸架，两把椅子，甚至还弄到了一个鹿角做的衣帽钩。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铺上。伊凡还从村里弄来一些画报，从中剪下许多漂亮的匈牙利姑娘的照片，将它们挂在墙上，看上去令人愉快多了。每人各有一张长着淡褐色头发和黑眼睛的姑娘的照片，她们长着淡褐色长腿，黑绒线衫衣里胸脯高耸。只有托多尔·佩尔尼恰宁挑选了一张比较朴素的——一家农舍的院子，鲜花盛开的苹果树下，一位姑娘在喂养家禽。

廷科从村里带来了搪瓷盆和水桶，并从军需库要了些面粉和猪油，现在又在炉子上安了一口绝妙的锅，于是土洞里第一次有了共同语言，两面焦黄的热乎乎的油煎饼被牙齿嚼得咯吱咯吱响，所有人的嘴唇都沾满了油，而脸上都流露出感激之情。伊凡觉得必须继续扩大已有的成绩。

“委任你当炊事员。”他愉快地对廷科说。然后他指着斯托约·明科夫弄脏了的腮帮说：“你将负责供应。”

“你什么时候能看见自己的耳朵，我就什么时候干！”斯托约龇牙咧嘴说，但他的口气很温和。

下午，伊凡收到了团部送来的礼品，战士们都参加分配，他们有说有笑。斯托约·明科夫得到一件领子上绣了花纹的家织布白衬衫，感到特别骄傲。他请人将那封用针线缝在袖子上的信念了好几遍："陌生的战士，请穿上这件衬衫，要知道我们这里的人都想念你，祝你战胜法西斯强盗，胸前佩戴着勇敢勋章胜利归来。"

斯蒂利亚得到了可以出几期《战地简报》的纸，他死死抓住纸不放，因为格罗·马查诺夫硬要他给几张，说是好给村里写信。托多尔·佩尔尼恰宁戴着一双厚毛手套，不愿意脱下来。大家都说萨利·伊勒里亚莫夫穿上新绒衣后，刀枪不入。他们都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眼睛里充满了友好和激动的神情。

第二天，还发生了几件小事。托多尔·佩尔尼恰宁从村里弄来一张小桌子，把它摆在斯蒂利亚的床前，大声说：

"让你舒服地写稿子办报！"

接着，萨利·伊勒里亚莫夫说了几句话，使大家都感到突然：

"伊凡先生，我想请你给我妻子写一封信，不过别人不能听。"

这使大家都感到吃惊，于是他们都挤在一个角落里，低声交谈着。斯托约·明科夫唠叨着离开了土洞。伊凡和萨利坐在小桌子旁的灯光下。

"写吧！"萨利低声说。"亲爱的埃舍，我很想你。当我坐下来吃饭时，每往嘴里送一勺食物，我都想到你。"

伊凡忍不住要笑，只好把这个伊斯兰教徒的话语一一写下来。

斯托约·明科夫直至傍晚才回来。他以无所谓的样子把一条大鲤鱼扔在铺板上。

“给你们弄来的，解解馋吧！”他生气地说，同时又带点微笑。“当我走近钓鱼区时，德国人差点儿送掉我的命。”

“可是禁止到湖边去呀！”斯蒂利亚责备地说。“你不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我要在小报上点名批评你。”

“真是个不好打交道的人！班长不是说要我负责供应吗？你有什么理由点我的名？”

在如何做鱼这个问题上，帕特里科夫和廷科又发生了小小的争执。最后他们一起洗鱼，齐声哼起了小调……

不知不觉地过了几天，伊凡一步一步地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胜利。这时，严重的考验来临了。

连长把伊凡叫到观察指挥所。中尉年轻的脸上显得很紧张，一双蓝眼睛仿佛考验他似的，锐利地望着他。

“给你一项艰巨的任务，”他说，“我相信你有能力去完成。你已经开始控制住全班，他们都说你夜间视力很强，而且非常勇敢。”

听了这番话后，伊凡觉察出自己的脸红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连长把望远镜递给他，用手指着黑压压的小溪那边的小树林。

“对准小树林边的目标，看见那里有几棵砍倒的树和一大堆树枝没有？看清了吗？”

伊凡肯定地点了点头。

“必须弄清楚那里究竟是什么，还有——德国人的战壕从那里挖到什么地方，需要搞清方向，我觉得其中有诈。你到现在为止，只到过小溪边，对吗？”

“是的，到过小溪边。”

“可现在必须涉过小溪，它不怎么深。晚上从这边过去，尽可能接近敌人。你从班里再挑选两名战士，来我这里接受任务。”

伊凡行了礼，猫着腰沿战壕往回走，常常是这样——当需要决定重要的问题时，他的脑袋瓜就发涨，思想不集中，简直乱如麻。从班里挑选两人！可是究竟挑选哪两人呢？托多尔和斯蒂利亚吗？或者萨利和帕特里科夫？突然他心里发了狠，马查诺夫和斯托约·明科夫！对，正是应该挑选他们！一个很狡猾，爱多嘴多舌；而另一个不遵守纪律。应该千方百计治他们一下。这里是前线，这里是战争，每个战士都肩负着重要的任务。马查诺夫和斯托约！让他们的心也提到喉咙里来，让他们明白应当如何战斗！

三

晚上三点钟，伊凡、马查诺夫和斯托约·明科夫象穿着白长衫的幽灵似的，走出了土洞。班里其余的战士同样跟着他们走到外面，为他们送行。他们这样做，并没有人打过招呼，大家默默地站在黑暗中，等待三人抽完手里的最后一口

烟。伊凡心里非常激动，他知道现在他们在向他表示兄弟般的支援和忠诚，而这正是他从当班长的头一天起就盼望的。他踩灭了烟头，挨个地跟大家握手，然后跃出了战壕。

“喂，注意保护伊凡！”他背后传来了廷科象哭似的声音。

伊凡在雪地里爬在最前面，他的心确实跳到喉咙里了。开始时，斯托约·明科夫不声不响地跟着他，然后低声地咒骂战争，骂德国人，骂连长和伊凡。他象往常一样，一骂起来就没完没了，变换花样骂。马查诺夫受到他的感染，气愤地说：

“我要是再干这种事，就是畜牲！要是再干，我就是畜牲！”

三个人在冰冷而粘滞的雪地上朝前爬，确实很艰难。灰蒙蒙的夜幕笼罩着他们，而前面是一片寂静的田野，暗藏着埋伏，敌人在暗处窥伺着。

他们三人爬到了小溪岸边，水象条黑带似的轻轻地拍击着堤岸。伊凡抬起头来，仔细观察前方，百来步开外就是那片黑压压的小树林，整个阵地上一片寂静。他打了个手势：

“下来吧，水齐腰深！”

但这时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情。

“我不想动了！”斯托约·明科夫低声埋怨说。“死到那边去，我又不是疯子！”

“我也不想去！”马查诺夫低声说，“从这里什么也都看得见。”

“但这是违抗命令！”伊凡愤怒地说。“别浪费时间了！快！”

接着，他轻轻地下了水。

“我怕死在路上！你自己去吧，既然你那样愿意去！”斯托约声音嘶哑地说。

马查诺夫没有吱声，他把头埋在雪里，全身颤抖着。这时伊凡拿定了主意：

“如果他们发现了我的话，你们就赶紧开枪，好让我过去！”

他开始下到齐腰深的冰冷的水中，他的心重又跳到喉咙里了，他敏锐地预感到自己大概会死，这种想法象针一样刺痛着他。他仿佛看见自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穿着冻成冰的白长衫，身上盖满了雪。他又想到可能会这样陈尸许多日日夜夜，也许他们会完全把他忘掉。当人们埋葬他时，不知道在他的墓碑上写上什么名字。

伊凡爬上了对岸，卧倒在雪地里。他的长靴灌满了水，但奇怪的是仿佛他的双腿变暖了，寒冷移到身上去了似的。他看了看天空，灰色的云层断裂了，露出一颗小星，它在一小块黑暗的天空中友好地闪烁着，也许这是他的星，他的福星！为什么他不能有福星呢？

伊凡鼓了鼓精神，又朝前爬起来。他没有听见任何动静，这正是黎明前的黑暗笼罩在站岗人疲倦的头顶上，他们正靠着枪打盹儿的时候。他继续往前移动，然后停下来，朝四周看了看。那片黑压压的小树林就在旁边，三棵被砍倒的树和堆在树干上的锯屑和树叶都清晰可见，那儿低低地、几乎跟地面一样平地露出一个黑洞口。“掩体！”伊凡猜想着。这是枪

眼，现在大概机枪正瞄准他。瞬息间，他觉得大地拖住了他的手脚，他连手指头都不能动弹了。接着他想起上级命令他侦察掩体右边的阵地，于是他使劲克服了将他压在地上的那种重力，用胳膊肘和膝盖支撑着身体，开始朝旁边爬。

伊凡继续这样爬了很久很久，他的眼睛机警地注视着前方地面上每一个隆起的目标。但是他觉得寒冷慢慢地透进了他的血液中，再也不能这样极其紧张地支持下去了。这时他往后转过身子，朝着小溪往回爬。他这样爬着，当胳膊肘和膝盖碰到坚硬的地面时，他心里很慌，连忙把头埋在雪里。别让他们发现才好！千万别让他们发现——那他就可以把德国人的战壕方向和枪眼告诉中尉。

爬到小溪岸边时，伊凡停了下来，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济了。在这里他又经受了今天晚上第二次料想不到的事情：两个白影从后面爬到他跟前，与他并排躺着，他们跟他一样呼呼地喘着粗气。

伊凡把头转向其中一个人，然后又转向另一个人，但在黑暗中看不清他们的脸。他根据呼吸认出了他们，于是一股暖流冲入了他的心窝。

“就是说，你们没有扔下我不管喽！”他无力地说。

但他们没有回答。

四

他们并没有扔下他。

当伊凡过了小溪，他那白色的身体跟雪融为一体，在黑暗中消失时，一种觉得可惜和后悔的情感突然冲击着斯托约·明科夫的心，使他醒悟过来。他低声骂了一句，急急地责备在他身边怕得要命、全身颤抖的战友。

“下水，卑鄙的小人！”斯托约低声骂道。“当心我打碎你的脑袋！”

马查诺夫试图从那双来势凶猛、骨骼粗壮的手中挣脱出来，他们在堤岸上斗了一会儿。当他们想到自己的行为卑鄙，表明两个人都是胆小鬼时，他们便用拳头你打我，我打你，相互埋怨。然后他们无力地放开了手，斯托约低声说：

“让班长一个人去送死，我们两个简直是畜牲！”

接着他就下了水，马查诺夫也紧跟在后。

到了对岸，他们默默地分开了，根据战斗要求，他们分别爬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以便保卫自己的班长……

当伊凡发觉他们在自己身旁，听见他们喘着粗气时，他差点儿哭出声来。等到他仔细观察好德国人的阵地时，已被紧张和孤独感及被抛弃的想法弄得疲惫不堪了。所以，为了爬完剩下来的这段距离，他不得不拽住斯托约的大衣。

他的战友没有抛下他不管，这种想法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温暖着伊凡的心。当他们中午坐在一起喝汤或围在小炉旁，回忆和平时期的生活时，伊凡便温柔和幸福地观察他们黑黝黝的脸。从外面传来了射击声和大炮的轰隆声，但斯托约不再咒骂战争和上级了，帕特里科夫也不怕他那双长手了。萨利·伊勒里亚莫夫低声地唱起了一首伊斯兰教思乡曲，而托

多尔·佩尔尼恰宁低着满是皱纹的额头，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读着前线报。斯蒂利亚和格罗·马查诺夫争论累了，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见。廷科被他们的博学多才所感动，慷慨地给他们递烟。

但是，伊凡知道战争不是安闲的田园生活，战争有自己的规律和逻辑，它要求立过功的人一次又一次地立功，到最后结束还要求立很多功。他模模糊糊觉得昨天晚上侦察的结果非常重要，大概司令部已经在研究了。如果不作出跟这个孤立的德军掩体有关的决定，不恰恰是叫他去执行这项决定，那是不可能的。

伊凡没有猜错。象往常一样，马查诺夫头一个打听到了这个消息。

“今天司令部将召见我们全班。”一天早晨，他说。“是连部通讯员告诉我的，大概十点左右，做好准备吧！”

“‘马查电台’又用长波播音了。”斯蒂利亚笑了起来。

“你敢打赌吗？”马查诺夫委屈地说。

但没有必要打赌。

必须把这个离阵地仅有二十多米远的危险的德军据点拔掉。一个勇敢的两人小组就可以深入到那里，朝里面扔几颗炸弹。为了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从半夜起我们的大炮将开始轰德军阵地，而这时……

……而这时，伊凡和萨利·伊勃里亚莫夫已被小溪的水湿透了，带着冷冰冰的心，在雪地里沿锯屑和树叶的方向爬着。夜晚一片漆黑，炮弹发出可怕的呼啸声，那颗注视着两

位战士行动的小星已不见了。他们左边，稍往后一点，斯托约·明科夫和马查诺夫在朝前移动。托多尔·佩尔尼恰宁和斯蒂利亚在右边，中间是廷科和帕特里科夫。全班人都跟着自己的班长走向危险地带。

伊凡停了下来，等待萨利跟上他。他们环顾四周，发现了前面德军的掩体。伊凡想，他可能被爆炸声震聋了，已经不再需要听觉，因为可能会完蛋。胸脯中可能没有心脏了，里面一切都仿佛结满了冰。再过一瞬间，他的脑海里除了冰和宁静之外，大概也不会有别的东西了。然后他打了个手势，开始一步一步地往前爬。"别出声，萨利！别出声！必须没有任何响动！决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已经跟掩体平行了，不要有任何响声，萨利！再稍微往前一点，再爬几米，我们就会超过这个机枪正瞄准着我们的可怕的枪眼。先移动一只胳膊，一只膝盖，然后再移动另一只胳膊，另一只膝盖。再爬一点，再爬几步，好，准备，准备，取下炸弹。现在跃起来——跟着我，萨利……"

两人几乎同时朝掩体扔了手榴弹，传来两声爆炸声和绝望的叫喊声，里面一片混乱。"再扔一颗手榴弹，再扔一颗！往后撤！萨利，我的同伴！我们完成了任务！我们是英雄，萨利！"但萨利在空中翻了个觔斗，然后一头栽在雪里。牺牲了吗？……伊凡没有时间考虑这个了，因为有什么东西烧伤了他的背。他倒在地上，开始迅速往回爬。难道没有人来支援吗？其他的人都到哪里去了？透过眼前蒙蒙的雾霭，他模模糊糊看见了斯托约·明科夫的身影……朋友们及时来了，

这多么好啊！最后他觉察出有人用手抱着他……

转眼间雾就消散了。伊凡知道自己躺在土洞里的铺板上，四张很大而又有点长得出奇的脸俯在他身旁，他慢慢地一个一个认出了他们。这是斯托约·明科夫，他身旁是托多尔·佩尔尼恰宁，接下去是马查诺夫，最后是廷科。

“萨利、斯蒂利亚和帕特里科夫在哪里？”他试着问，使劲抬起了身子。

但他明白他们已经牺牲了，在灼人的疼痛中，一种剧烈的痛苦撕碎了他的心。

他的四位战友默默地从头上摘下弄脏了的军帽。

（樊　石译）

卡·卡尔切夫

在卡车上

〔**作者简介**〕 卡门·卡尔切夫(1914—)生于贫农家庭，毕业于索非亚自由大学财政系。先后担任保加利亚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外国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九月》杂志主编、作协主席等职务。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索非亚的故事》，中篇小说《相思鸟》，长篇小说《工人阶级的儿子》、《纺织工人之家》、《新城奇缘》、《在生活的源泉里》、《假面具》、《火热的夏天》等。曾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所有在场的人唯有医生尚未发表意见。他站在一旁，即站在桌子的另一边，靠近上校，默默地摆弄着餐巾。晚餐早已结束，服务员准备端咖啡来，可那些老同志仍然没有领悟到该去深深的软沙发等待着他们的客厅，得有人提醒一下，不用说，又是年纪最大的上校来做这件事。他站起身来，用

开玩笑的口吻说了一句习惯用语："排成一路纵队，跟我走！"接着便以军人的步伐朝用劈柴烧得热乎乎的客厅走去。这些至今还不习惯于坐软沙发的老战士慢慢围坐在火炉旁，一下子又象当年的游击队了。

这个山上休养所实际上完全是另外一种环境，人们所关心的也是另外的事情：他们中一些人在工矿企业当领导，另一些人在指挥兵团，还有一些人从事党务工作。总之，在这十年间，大家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医生——一个瘦而沉默寡言的人，淡褐色头发日渐稀少，灰白色眉毛盘绕在眼镜上方——还是内科医生，象过去在游击队一样，现在在自由和平的生活中，他也是这样给人们治病，复活他们的生命，跟死亡作斗争。这种职业连同他那全身表现出来的热情和诚恳的性格，仿佛使他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更加可爱似的。

他瘦高个，手特别长，举止不十分灵活，长着一张知识分子的白脸，一对近视眼藏在角制大眼镜框镜片后面，根本见不到。他谦虚、腼腆，即使现在跟"绞死法西斯"游击队的战士们相会时，他也不插话，沉默不语，入迷地听战友们讲述各种事情。他为他们在这十年间所取得的成绩而高兴，真心地为他们的幸福发出微笑，默默地点着头，仿佛不愿以任何事情跟他们发生矛盾，仿佛同意他们所讲的一切。

而今天晚上，这些光荣的人谈了许多自己的往事和现在生活中发生的故事，他们保持了自己的青春、热情和相互之间的爱，仿佛这是忠诚的战士们所应当具备的。

"同志们，"上校端着给他送来的咖啡，开始讲话了，"现

在让我们的邦丘克，我们光荣的医生讲讲他的情况吧，在我们整个游击队生活期间，他内心里只抱着一种理想：活捉一个德国人，反绑着他的手，将他直接送到游击队……是这样吧，亲爱的医生？”

上校将锐利的目光转向医生，笑了起来。其他围坐在火炉旁的老游击队员们也都笑了起来，他们的脸上显得比火苗更愉快。

“讲吧，讲吧，医生！”大家坚持说，“我们最后总该知道你是怎样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同志们，说实在的，”上校继续说，“我们大家都痛恨希特勒分子，但象我们的邦丘克恨德国鬼子恨到那种程度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说实话，在三年游击队生活期间，我们连半个德国人也没有俘虏过，未能解我们这位亲爱的朋友的心头之恨，对此我至今仍感遗憾……”

上校不断开玩笑，其余的人也附和着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回忆起各种各样的事情，突出了医生对德国鬼子的仇恨。不用说，这些说笑话的老手只有一个目的——引出医生的话来，应当承认他们成功了。医生坐到沙发上，把给他端来的咖啡放在一旁，一面对因苦于失眠而未喝咖啡表示歉意，激动得红了脸，开始讲起来：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说我仇恨德国鬼子，说得很对。我的确就是这样开始游击队生活的。德国人进攻法国时，我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步兵连当预备役医士，我们部队

驻扎在斯维伦格勒周围的山上。当希特勒匪帮进攻苏联时，我们团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了无法理解的操练，加固工事，阵地上拉起了铁丝网，疯狂地进行反苏宣传。我们预备役军人，还有一些其他的青年，简直被这种宣传窒息死了。电台每日大肆宣传所谓德国人在东线张开了口袋。我们兵营有一个高音喇叭——昼夜播放希特勒军团的闪电战，简直可怕极了！我们象被开水烫了似的非常难受，恨得咬牙切齿。一天晚上，连部炊事员——一个可爱的小伙子，切断了高音喇叭的电缆，整整一昼夜军官先生们得不到东线的任何消息。于是我们散发了传单，连队变得一片混乱，发生了流血事件，简直一言难尽。全连被捕了，打呀，侦查呀，直至最后把我们分派到各部队去了……

"医生，这些我们都清楚。"有人插嘴说。

是的，我知道这些情况你们都清楚，不过还是应该解释一下我生活中的某些片断，正是这形成了我对敌人的仇恨心。莫不是你们对此不感兴趣？

医生以疑问的目光扫了周围的人一眼。当见到的都是赞同的目光时，他便兴致勃勃地继续讲起来：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一个医学院倒数第二年级的大学生，正如通常所说的，年轻活泼，乐观愉快，而且还是一位诗人，在一本蓝皮练习簿上秘密地写了许多诗，

经常参加秘密文学小组的活动；特别喜欢旅行，崇拜苏联电影和苏联文学；是工人青年团团员，严肃的预备党员……还有什么来着？啊，对啦，我差点儿忘了：偷偷地爱上了一位姑娘，而后者一点也未觉察出他那忘我的、痛苦的爱情。最后让我再补充一点：热衷于事业，不喝酒，反对跳舞，总之，是个理想的教派信徒。其他的特点嘛——没有了，当然罗，假如不把我们大家的共同特征，我们阶级的特征——贫穷算进去的话。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就是我父亲有一所简易木房，他不分昼夜地为穷人区的人们缝补鞋子，活一直干不完。我们周围是赤贫的穷人世界。至今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景时，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怎么能忍受到最后，不知是怎么活过来的。但是看起来贫穷比死亡更有力量，因为我父亲临终时对我说："听我说，还剩下几双鞋没有缝，告诉他们后天会缝好的。"可怜的他连想也没有想到，后天他就要躺在地下了。不管怎么说吧，正好在德国人大举入侵我国时，他摆脱了痛苦。要知道，他死得正是时候，因为他不会见到我们遭受的侮辱，不会生气了。我可以想象得到，假如他不死的话，准会用锤子在鞋楦上猛敲，大声嚷道："你们这群饿狼，连我们的耳朵也被你们吃掉了！你们这群小饿狼！……拿去吃吧，要叫你们卡死！胀破你们的肚皮！"我父亲是个急性子，爱动气，很难经受住希特勒分子的掠夺。我本人也经受了很大的痛苦。不仅如此，我整夜整夜地站在那间空荡荡的木板房里，怒气

冲冲地听德国人的飞机如何在索非亚上空咆哮，细看没入黑暗中的城市，满怀仇恨地注视着见不到尾的德国摩托化部队，对他们的谈话几乎无法忍受。说实在的，在这以前，我曾多年努力学习德语，甚至在大学图书馆里阅读他们的医学杂志。但当他们的士兵来到我国，尤其是他们进攻苏联时，我同他们的语言，同他们的信仰，同他们的一切都切断了联系……请原谅，我很穷，但很自豪！我母亲带着五个孩子，难以糊口，老母给人洗衣，而我的兄弟姐妹各自寻找生路：有的当佣人，有的在工厂做临时工，连最小的妹妹也跟着母亲一道去给人洗衣服。只有我这个幸运儿不知怎么勉强地跟他们分开了，成了大学生，而且还是个医生……这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我得告诉你们，我进医学系与其归功于我父亲，不如归功于一位老教师，他非常欣赏我的“特殊才能”。又因为这位善良的老人把医学看成是世界上最崇高的职业，所以他不顾我家境贫寒，不顾我那个对教育不感兴趣，对前途不闻不问的父亲的冷漠态度，千方百计让我进医学系。总之，是那位老教师让我走上这条路的，甚至还为我缴了两年学费，而后来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小伙子，从现在起你自力更生吧，你会找到办法克服困难的。我们当初也是这样学习，也是这样跟生活的浪头搏斗。”啊，这个可怜的理想主义者，他连想也没有想到将怎样的把绞索套在我的脖子上！每天上午我去听课，下午和晚上在一家小旅馆里当服务员，解决吃饭问题。

放暑假时，为了多挣几个钱，我便去工地运砖，拌水泥，搭脚手架……这种活没有意思。比较有意思的是我慢慢进入了一个和医学院同行们之间的世界根本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让我补充一点，在那里学习的大多数学生是富人子弟，是医生、高级职员、富裕农民的子弟，象我这样的是极少数，在那一伙饱食终日、洋洋得意的富人子弟中间象拔光了毛的鸟儿，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想去国外进修。不过。还有三、四个象我这样的学生，我们从一开始就感到憋气，不声不响地相互团结在一起，仿佛害怕那些洋洋得意、高傲自大、娇生惯养的富人子弟似的。要知道，我们无法跟他们相抗衡，就把希望寄托在学业上，看书直看到头脑发涨，至少在文化修养方面要努力超过他们。正是这时，我开始努力学习德语……说实话，关于诗歌我不敢对任何人讲，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否则他们准会嘲弄我。我将自己的诗歌创作保守秘密，这倒很好，因为我的自尊心未受伤害。要知道，我是穷人，是鞋匠和洗衣女工的儿子，但我能学医，通晓德语，而且还写诗，这些诗迟早总会问世，会在全系博得很大声望……是的，我是个普通人，没有在医学系外博得声望的幻想。可是你瞧，我的一种自尊心被破坏了……

怎么对你们说呢，德语已没有什么值得我骄傲了，从前我是为它而骄傲的，海涅①、马克思、恩格斯……

① 亨利希·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

而现在，突然间可恶的希特勒匪帮用我曾经为之骄傲的同一种语言，在索非亚街道上哇里哇啦说话，于是，我一下子变成了哑巴，突然停止说话，闭上了嘴。“不，”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讲这种野蛮人的语言！不，不，不！”我的愤怒情绪一天天地增大，仇恨和狂热一天天地加强，简直把我窒息死了。然而我的不幸并没有就此结束。

有一天，我们系来了一个德国教授。他究竟是不是教授，我不清楚，因为他把全部兴趣放在法西斯学生团体方面。你瞧，要我给这位“教授”当翻译。直至现在我也还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恰恰落在我头上……我估计这要么是误会，要么是挑衅，管他是什么原因吧，有一天系主任把我叫去，对我说：

“姆拉德诺夫，今天您陪同维克尔曼先生去鲍扬教堂，还有别的学生跟他一道去，但您的德语比较好，要热情地向他介绍我国的名胜古迹，要完全听从他吩咐。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老实说，开始时我被这种注意弄得不好意思，没有立刻表示反对。但是，在我镇静下来后，便马上有礼貌地说：

“教授先生，我语言毕竟掌握得不到家，此外，对这些教堂的历史我也是外行，连我这身衣服也……”

我没有把话说完，只是指了指身上破旧的上衣，这件衣服我勉强穿了好多年。系主任看了看我，皱起了眉

头，严肃地说：

“衣服有什么关系？很好嘛！何况维克尔曼先生一点也不计较这种事，他是国社党党员，清楚地知道贫穷并不可耻，我甚至认为这将会使他感到高兴。”

“还是请不要让我去，”我坚持说，“有不少比我更合适的学生，他们会更好地完成这一崇高而重要的使命。”

“不，姆拉德诺夫，我们已经决定了，正是要您去陪同维克尔曼先生。”

我沉默着，一团怒火在我胸中升起，简直无法抑制住。“不干，不干！”我反复对自己说，一个劲儿望着自己的腿。“我过去没有干过，任何时候也决不当纳粹分子的奴仆……不，不，不！”象所有固执的人一样，我直率到绝望的程度。我们那位不幸的系主任被我这种固执态度急出汗来了，他甚至对我这种耍无赖式的行为感到惊讶。

“姆拉德诺夫先生，”他以一种既保持一般礼貌，而又显得冷淡和凶狠的语调说，同时用一块小白手绢擦额头上的汗珠。“您的拒绝使我感到惊讶，除了您对我们这位客人持特殊态度外，我无法用别的理由来解释这一点。我估计在您拒绝的深处隐藏着一些政治原因。”

我沉默不语。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请坦率告诉我，我不会强迫您的良心。不管您这样做看起来多么难以令人置信，我们还是能够宽容人们的信仰的……维克尔曼先生是国社

党党员，请很好地记住这一点，一方面是国家主义者，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者……我估计这个政治概念的后半部分会使您感到满意，对吗？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就请您陪同他去吧，您会跟我们这位客人找到共同语言的。”

我忍耐不住了，便摘下眼镜，毫无必要地擦着，将模模糊糊的目光死死盯住那个矮胖的小人。他坐在写字台后面，正为自己巧妙的挑衅而洋洋得意，满脸通红。

“教授先生，”我一面重新戴上眼镜，一面说，“必须坦率和直截了当地告诉您，无论是这个政治概念的前半部还是后半部，都不会使我满意，这是一；第二，我不会当内心里鄙视的人的奴仆；第三，我不会当叛徒……”

我未能把话说完，因为某人在我肩上打了一拳，将我推出系主任办公室的门外。记得这个“某人”就是警察局的便衣密探，他当时以学生身份被派到大学来。他那只手沉重地打在我肩上，此后很长时间我走路时身子总是歪向一边，肋部隐隐作痛……把我推出系主任办公室时，动作那样迅速和突然，我甚至连透口气都来不及，只听见有人在我身后喊：

“你这个坏蛋，最后露出马脚来了吧，是不是？露出了马脚没有？”

是否露出了马脚，我不清楚，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能自由地把自己的全部仇恨朝这些人发泄出来，对此，我并不感到遗憾。

不用说，这件事发生后，我很快被指控为背叛国家和无礼地对待保加利亚的同盟者，于是我被大学开除了，我受的医学教育也就此结束。请注意，当我走到街上时，我感谢他们没有监视我，没有把我关进监狱……但是法西斯分子是不会放过我的，这一手终于使用上了……不过，发生得晚一点就是了。当我们被动员去土耳其战线时，那里出现了传单，于是我们连被解散了，说我们是造反分子，不可靠。当时我藏了起来，逃跑了。我觉得自己做得对，否则就有可能被绞死。

医生坐到沙发上，沉思起来。他感到疲倦，同时为由于个人的事情而耽搁了大家这么长时间而感到抱歉。他习惯于默默无闻和谦虚，这一次说得过多了，显然同志们的回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挂钟缓慢而均匀地发出滴嗒的响声。在这间安静下来的客厅里，寂静仿佛显得更加不平常，因为这里有许多老同志在亲切的气氛中聚会，他们不仅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同过去连在一起，而且同象以往一样英勇地战斗和生活的现在连在一起。

同志们，医生继续说，我不想再谈参加游击队前我生活中的那些波折，不想回忆我是怎样到达山上和头一次尝游击队的玉米粥时的愉快心情，也不想描述头一次参加战斗时所经受的恐惧和开枪打死第一个宪兵时那种

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动摇心理……只想告诉你们一点，就是我对德国人的仇恨具有某种特殊的，可以说种族主义的性质……而这是令人惭愧的！憎恨希特勒分子的同时，我开始鄙视和痛恨德国的一切。只要一听见他们的谈话声，我就立刻怒发冲冠。我无法想象《资本论》是用德文写的，马克思讲德语。我简直象个凶狠的孩子一样仇视和憎恨德国的一切。不用说，很快我就成了全队的笑柄，你们比我更清楚我那种狂热，所以我不详细讲这一点。只是有一件事我不能谅解你们，就是你们不仅不给我医治种族主义的毛病，而且还故意逗我，甚至还有人给我起了个“德国鬼子”的绰号，因为我身材高，戴着眼镜，象德国人。一般说来，我的外貌确实有点象德国人，但这个绰号毕竟超过了某种限度，尤其是那个年代，我又处在那种心理状态之中……

医生笑了笑，他的朋友也跟着笑了起来。他们肯定在回忆发生在他们和这位有趣的朋友之间那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吧，医生继续说，我坚决忍受了这种欺侮。德国鬼子，德国鬼子……绰号最后总会被忘掉的，但要改变一种信仰，而且是在反希特勒运动处于高涨时期，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老实说，我有两种感觉：一方面高兴，另一方面为自己的狂热行为，为自己达到

疯狂程度的凶狠和极端的顽固而感到惭愧。但是，我要做一名始终不渝的战士。

请回忆一下一九四三年秋天，当时德国人在东线被粉碎了，全线溃败。我们那种高兴劲简直难以描述，常常去农村活动。正是那时，假如你们有人还记得的话，我被派往索非亚，去完成一项党的重要任务，然后应途经普罗夫迪夫返回游击队。我全力以赴地准备去完成这项任务，身穿军装，带着休假证，象个征服者似的到了首都。你们无法想象，当我漫步于这个有朝一日会落入我们手中，会请求饶恕的城市的街头时，我是多么高兴啊！毫不奇怪，我有点放肆，对此就是现在我也不能原谅自己——我的行为是那样自信和冒险，比如说，无论我走到哪里，跟谁谈话，东线总是不离嘴：那里情况怎么样呀，我方是否向前推进了呀，德国人是否溃逃了呀，俘虏了多少师呀，击毁了多少坦克和飞机呀等等。我忍耐不住，简直憋死了，希望自己兴奋的心情能受到每一个遇见的人的肯定，希望从他们嘴里不断地听到："我方正在朝前推进，德国人溃不成军！"我对"希特勒完蛋了"这句话简直百说不厌，我非常喜欢"完蛋"这个词，它跟希特勒连起来很合适，听起来象谚语。甚至在一个地方我差点儿挨打，假如不是穿着军装和在场的人政治上还算不错的话……但最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从索非亚去普罗夫迪夫的卡车上。

这是一辆普通军用卡车，空车去普罗夫迪夫。我请

求司机让我上去，他见我跟他一样——是个又瘦又饿，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士兵，便马上给我作了个从后面上车的手势，我立刻利用他那军人的热情爬了上去，坐在一只汽车轮胎上，这才放了心。

九月的太阳晒得叫人难受。我用装着面包和二十盒香烟的袋子当枕头，躺下了，开始打起盹来。到了城外，大概是弗拉尼亚附近，卡车突然停住了。我听见附近有谈话声，是用令人讨厌的德语讲的，我顿时毛发竖立，站了起来，发现离卡车几步远的地方有十来个德国士兵，他们年纪都不小，穿着破旧的绿制服，戴着皱皱巴巴的绿军帽，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但仍然不能丝毫减少我的愤怒。不仅如此，我本来睡着了，正当我沉睡时，他们吵醒了我。"你瞧，在这里也不让我安宁，这群恶棍！"我心里想，重又躺下了，免得再看他们。但他们吵吵嚷嚷的谈话声没有停止，尽管我德语懂得不怎么好，但还是听明白了：他们要求上车，也是去普罗夫迪夫。这使我感到害怕。跟他们一道去普罗夫迪夫！一方面这为我提供了方便，因为夹在他们中间我能更好地掩饰过去；然而另一方面，我又很生气，因为我得跟他们挤在一起，听好几小时德语。不管怎样，我只好屈从于自己的命运。

这伙德国鬼子一面笑，一面说着萨克森方言，沿卡车周围爬了上来，各自找个地方坐下了，甚至没有发现上面有我——当时他们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老实说，

这使我很生气。"你瞧他们，都是目空一切的条顿人①，连'你好'也不说一声！"于是，我被伤害了的自尊心完全缩进壳里了。他们都找好了位置，一个个直挺挺地躺着，然后给司机做了个开车的手势。汽车开动了。在凉风吹拂下，德国人高兴起来，谈得更欢，好象是赞赏大自然的风光，最后抽起烟来——他们中大多数抽烟斗。我警惕地站着，象一条受了委屈后夹着尾巴的小狗，斜视他们，一声不吭。我心中的仇恨愈来愈大，暗暗想道："这就是世界的统治者，他们挡住卡车，爬了上来，一分钱也不用花……而且他们抽的大概是我们保加利亚烟丝，背包里装的肯定也是保加利亚的腌猪油、黄油、香肠、水果……吃吧，卡死吧，胀破肚皮吧！"……我就这样在心里诅咒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当时他们既没有吃，样子也不象统治者。实际上他们看上去年纪都很大，满脸皱纹，头发花白，甚至秃顶了。眼睛由于缺觉而显得非常疲倦，他们的穿戴给人一种可怜的感觉。这一切仿佛使我更加幸灾乐祸。突然间我的想象力急剧地活动起来："他们显然是从东线回来的，是希特勒'不可战胜的'军队的残兵……"我愈来愈幸灾乐祸，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决定跟他谈谈东线的情况。

我旁边一个德国人面孔黝黑，用胳膊肘支在汽车轮胎上，嘴里衔着烟斗，默默地望着收割完了的田野。微

① 条顿人即日尔曼人。

风吹动着他那花白的头发，军帽滚到了脚下。他敞开衣襟，把衬衣领掏出外面，我觉得他不象军人，倒象普通老百姓。

“是去普罗夫迪夫吗？”我用不怎么熟练的德语小心地问。

“是呀，是呀！”那个德国人大声回答说，并友好地看了看我。他那种客客气气的态度使我感到惊讶，尤其是士兵开往哪里和去干什么，从来是不告诉别人的。

“看来，”我心里想，“这位朋友不保守军事秘密。”于是我装出一副发愁的样子，继续进攻。

“前线情况怎么样？看来不怎么好，是不是？”

“是呀，是呀。”德国人又回答说，同时从嘴里拔出了烟斗。“完蛋了。”

这个我当时最喜欢的词，希望从每个人嘴里都能听到的词，使我感到惊讶，这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从一个德国士兵的嘴里听到了。我被开头的胜利所鼓舞，便继续以更加忧愁的语调说：

“是的，真可惜！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真可惜！”

那个德国人默默地吸着烟斗。我叹了一口气，又添上一句：

“牺牲那么多人，真可惜！”

但我说的“牺牲”究竟是指什么和为什么“可惜”——天知道！我的潜台词完全是另外的意思，我在幸灾乐祸中失去了镇静。“至少我要把一切告诉他们，他们已经神

气够了!”接着，我继续讲东线的情况，并试图使坐在我身旁的其他士兵也参加进来。我装着唉声叹气的样子，给大家讲了我所谓觉得“可惜”的一切，德国人对此一点也不注意。说实在的，直至现在我一想起自己当时那样冒冒失失，就感到害怕。我怎么那样丧失警惕呢？要知道我用赤裸裸的方式嘲笑他们在东线的失败，他们有可能在卡车上就把我掐死，干掉我呀！有可能把我扔下卡车或者逮捕我呀！有可能打死我呀！我只身一人，而他们有十来个，而且是德国人，是统治者！……我是多么不谨慎，多么鲁莽啊！……可是，达到疯狂程度的仇恨之心知道限度吗？

我舒服地用胳膊肘支撑着身子，几乎感觉到了身旁德国人的肩膀。他抽完了一斗烟，抖了抖，将烟斗放在上衣口袋里，一直望着远方，继续那样沉思和沉默不语，仿佛身旁没有人似的。卡车高速飞奔，灵活地拐了个弯，后面尘土飞扬。玉米被骄阳晒干了，牛群一头接一头地跑进收割了的玉米地里。一匹脱缰的马嘶鸣着，从汽车前面飞奔而过。牧羊犬在后面追赶着汽车。但无论是自然景色，还是羊群的咩咩声和狗叫声，都已经不能感动德国人，他们都陷入沉思之中。我头一次从另一角度观察他们，莫不是他们现在正思念着自己的故乡、家庭、树木、农田和牧场？这促使我去问身旁的人来自哪里。他高兴地看了看我，仿佛我对他的故乡感兴趣使他很满意似的，于是他马上回答说，他来自萨克森，生

在莱比锡。

"莱比锡?"我钦佩地大声说，并毫无警惕地补充了一句："在莱比锡见到了审判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吗?"①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德国人一面笑，一面肯定地大声说，同时不断点着头。"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

他发"P"音有一定困难，就象发"X"音似的，这赋予季米特洛夫这个令人心醉的名字一种特别动听和具有吸引力的色彩。而谁知道呢，也许是当时我这样觉得罢了，因为我非常激动，几乎丧失了任何警惕。

"是的，"我继续说，"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头一次给法西斯以打击……"

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只是提高嗓门说：

"很好，很好!"

"是的，是的!很好!"那个德国人肯定说，一直那样友好地微笑着，略微带点沉思。我的胆子更加大了，开始琢磨他的眼神，想看看他的态度是否诚恳。这个"很好"意味着什么呢?这微笑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察看

① 1933年，德国法西斯分子制造了所谓"国会纵火案"，逮捕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季米特洛夫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敌人的诬陷。经过九个月的英勇斗争，帝国法庭被迫宣布季米特洛夫无罪。这一审判史称"莱比锡审判"。

他的眼睛，它们象两个小湖泊那样平静．周围的皮肤布满皱纹，象张牛皮纸，看上去很老，这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他的年龄。“他在想什么呢？为什么不看我？究竟是害怕呢，还是设下圈套，等我完全暴露出来后抓我？”我继续审视他的目光，突然间他将视线转向我的肩章，仔细瞧了瞧，然后又沉思起来。

卡车单调地发出呜呜的响声，尘土在我们后面飞扬，气流扑面而来，驱散了太阳的炎热。很久以来未曾有过如此干燥和炎热的秋季。

其余的人铺着绿色军大衣，躺在车底板上——一些人吸着烟，而另一些人早已入睡了。只有我们两人默默地站在那里，相互紧张地窥伺着。他继续假装望着远方，而我一个劲儿注视着他的脸，寻找机会再进行交谈。季米特洛夫是个合适的话题，我不想轻易放过这种可能性。我不是急切地希望再谈吗？于是又开始提起莱比锡审判：

“就是说，您还记得莱比锡审判罗？”

“啊，是的！”德国人颤动了一下。“那是一宗很大的诉讼案……”

他再也忍耐不住了，迅速而激动地开始给我讲述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发表的著名演说，它已闻名于全世界。德国人讲得很快，激动得喘不上气来，当他说到季米特洛夫的名字发“P”音时，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我死死盯住他那双蓝眼睛。

“那么戈林①呢？戈林怎么样？还记不记得他象一头可怜和无可奈何的猪一样站在季米特洛夫面前，如何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记得吗？”我一面注视着那个德国人，一面又加了一句：“记得吗？”

“记得，记得！”德国人笑着说，开始描述戈林、戈培尔②和整个希特勒匪帮在这次审判中是如何失败的。他有些话没有说明白，我得紧张地猜测他的想法，但这并不使我感到难受，相反我更加愉快。我故意重复一些话，用这种办法迫使他也说，于是他不断重复那些话。我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季米特洛夫的名字和他在法庭上驳斥戈林的火一般的演说……我带着孩提般的好奇心，顽强而固执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个德国人被谈话所吸引，毫不怀疑我为何这么高兴。他继续讲述在审判期间他和工厂里的几位同伴如何为保卫季米特洛夫而散发传单，纳粹分子如何包围工厂，在整个审判期间连鸡也不让从周围飞过……他也同样谈到了自己的母亲，说她准备了包裹，匿名寄给了这位伟大英雄。他以满意的神情描述德国人如何在街道和广场上听广播，发表有利于季米特洛夫的评论……此后，希特勒分子又如何停止广播审判情况，如此等等。我听着，内心充满了愉快，仿佛我胜利了似的。

---

① 戈林(1893—1946)，希特勒统治时期的普鲁士总理、国会议长。

② 戈培尔(1897—1945)，希特勒法西斯宣传头目。

从他的谈话中，我得知他是钢铁工人，是轧钢工，战前有一段时间被关进集中营。他的妻子也是工人，因为是党的积极分子而被纳粹分子杀害了。他们唯一的孩子战前死于肺结核。我心里想："真奇怪，这是另一个德国，我对此一点也不了解，我们大家都把这忘了……地下的、沉默的、被推入集中营和监狱的德国，它血迹斑斑，遭受法西斯分子的蹂躏，但仍然生气勃勃和富有智慧，这就是台尔曼① 的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国！"于是，我怀着学生般的热情，开始朗诵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曾经引用过的歌德② 的诗，以便向德国人民指出在这决定命运的时代需要的是大锤，而不是铁砧……那个德国人边听边笑，并点着头，同时还坚定地表示"对，对，对。"最后，记得象今天一样，我握紧拳头，为了不让其他人看见，我低低地用胳膊肘靠在那个德国人身上，利用卡车的响声，断断续续地说："胜利属于红军！"使我感到吃惊的是，那个德国人也握紧拳头，低低地靠在车底板上，同样回答说："胜利属于红军！"我们相对微笑着，头一次愉快而久久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感到问心无愧。这时，我觉察出他和我的心都完全松弛下来了。他开始对我讲述由于工人不够，如何将他从集中营放出来，派往生产岗位，然后又动员他当兵，因为东线青年人愈来愈少。象他这种年纪的都被派去当工兵，

① 台尔曼（1886—1944），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② 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

修筑工事……没有派他们上前线打仗，因为他们这些老工人憎恨希特勒分子和他们发动的战争。德军开赴东线时，人们咒骂不已。德国人民迟早要对这种全民大屠杀报仇的……

“在东线，”他带着特别满意的神情说，“红军正在朝前推进，我们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红军身上。我们可能回不去，可能会死，但自由之光也会照耀德国人民的……德国恢复自由之日，就是刽子手们难受之时。”

他说，他们这一班人是去希腊，去那里修筑海边工事：卡车上的这些朋友都是从萨克森各家工厂来的老工人，他们都是参加过革命运动、经过考验的同志和反法西斯战士……

我听着，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过去对德国和德国人民的看法完全不对，我觉得自己是瞎子。现在仔细瞧瞧，发现自己身旁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又抽起烟斗来，文静地抽着烟，从容不迫地跟我说话……这个人就是德国人！他的语言我听起来重又觉得亲切和有力，大概就象马克思当年所说的语言一样。于是，我愈来愈放弃自己盲目的狂热，尽管由于顽固我内心仍在抗拒。

我们快到普罗夫迪夫了。城郊的三个小山岗象三堆干草似的现出了轮廓，这马上使我想起包围着我的严峻和充满危险的生活。可是我却毫不警惕，而且是个过分热情的青年，不停地证明自己憎恨法西斯，常常带着特别满意的神情说“法西斯完蛋了”。

我的交谈对手是个比较谨慎的人，他一般只简短和断断续续地说声“是”，这就排除了任何怀疑和不信任的可能性。我拍拍他的肩，拉拉他的上衣袖子，为了让他听得清楚，便附在他的耳旁大声说：“你瞧瞧我是什么人，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象我这样的共产党员！”……我还想告诉他我是游击队员，天知道不知怎么克制住了，没有做这种蠢事，也许是时间来不及了吧，因为我打算把自己火热的和跳动着的心掏出来，给这位极不寻常、使我感到吃惊的德国人。

我们已经到了我国南都的郊区，我痛苦地感觉到很快就要跟这位朋友分别了。老实对你们说，我当时希望行程没有尽头，愿卡车永不停歇。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再谈点什么政治问题好，尽管我们已经谈了许多。最后，当找不到话题时，我突然问起对方的名字。他怀疑地看看我，但仍然回答了我的问题，虽然有点难为情：

“弗里德里希·瓦斯培尔。”

我重复了一遍：

“弗里德里希……”

我不是想谈政治话题吗，所以我又补充了一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是的，是的！”那个德国人幸福地微笑着，从嘴里拔出了烟斗。他好象想说点什么好听和亲切的话，但我是个急性子，未等他开口，我已经讲了一番有关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具有高度思想性和动人心弦的话。我们的交

谈重又转向政治方面。

在快进城的一个地方，卡车突然减速，并且停住了。德国人动作起来，站着往四周瞧。离卡车几步远的地方有一些木板房，德国哨兵在周围走来走去。从中间的房子里走出两个未长胡子的青年人，他们穿着干净而讲究的瓦灰色制服，歪戴着无沿帽，挑衅地露着几绺淡褐色头发。他们走到卡车跟前，大声喊叫，仿佛吵架似的。我和跟我谈话的那个德国人相对看了一眼，一种相互不信任感重又攫住了我们的心。“完了，”我想，“只要他对我的信仰吐露一个字，这群恶狗就会撕碎我！”

两个过于自信的士兵傲慢地看看这些受歧视的工兵，不耐烦地要他们出示证件。究竟是否需要这样做——我不清楚，我总觉得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子没有必要来这手，他们只不过是想耍威风，显示自己的权力罢了。在他们刺耳和愤怒的喊叫声中夹着一种“滚开，滚开，滚开”的恶语，对此我无法忍受。尤其使我气愤的是，他们走到跟我谈过话的那个人跟前，从他手里把一张揉皱了的白纸夺过去，看了又看，接着又翻过来看，然后把纸伸到他眼皮底下，说没有盖公章，又大喊大叫起来。最后他们开始商量。

我们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那两个家伙又哇里哇啦乱叫一阵，把那张揉皱了的证件朝这个老年人的脸上扔去。他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说，只闭上眼睛，可能是不愿意看他们吧。其他上了年纪的工兵也都没有吱

声，用锐利的目光瞪得两个黄口小子不知所措，他们大概是希特勒匪帮最后的后备军。

检查证件持续了好长时间，使我们能足够地认识这些两腮红红的野兽。可是，他们对我理也不理，这更加激起我对他们的仇恨。

“检查完了吗？”最后我说了一句，想提醒他们还有我，但两个希特勒分子理也不理。其中一个高个子活象长颈鹿，已经站在卡车旁，给司机打了个手势，喊道：“滚，滚！”汽车马上开动了，仿佛它也想尽快摆脱这些大喊大叫的家伙。

“真是些可怕的家伙！”我用德语大声说，同时看了看那位朋友。他正在沉思，但听到我的声音后，哆嗦了一下，连忙把手指放在嘴唇边，表示不再说话，向我示意谈话已经结束。是的，我们已经进入另一个地区，应该沉默了。于是，我也不再说话，但我知道此时此刻我们有着同样的想法，这使我感到高兴。

我很想给这位新朋友留点纪念品，以使我们这次不平常的会见永远印在各自的心中。我想给他一点能使他记住我的珍贵物品，于是我在自己口袋里翻来翻去，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从连底都翻过来了的游击队员口袋里能找到什么呢？倒出了几个断刀片，一截铅笔和一颗不知什么时候留下来的纽扣。还能不能找到别的东西呢？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离终点愈来愈近了，我们已经进入普罗夫迪夫的中心大街，很快就要到达广

场，到了那里我们就得下车。

“弗里德里希，”我郑重地说，“我们就要分别了……也许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但是，弗里德里希，我希望只要我们活着，互相就不要忘了对方……”

我两眼泪水汪汪。那位萨克森老工人以父亲般的柔软心肠望着我，他理解我为什么如此激动，不忍心打断我。

“弗里德里希，”我继续说，“我想送点东西给你作纪念……一种保加利亚的纪念品，我个人留给你的纪念品……”

我的目光落在身旁的背袋上。我马上拿起袋子，几下就解开了，从里面掏出了二十盒香烟——我给游击队买的全部香烟。我一刻也没有犹豫，这突然想起的办法真不错，是的，就送香烟！没有别的可送了。于是我急忙说：

“弗里德里希，拿去作个纪念吧，我送你的，真正革命的保加利亚送给你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咱们这次会面……”

我只顾说，没有听见自己说了些什么——看来这番话过于伤感，是完全多余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无动于衷吗？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吗？

我把一包包金黄色包装的香烟倒在弗里德里希的大衣上，而他又把烟分给其他的士兵。

“谢谢，谢谢，谢谢！”这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一只

只粗糙、干裂的工人的手伸向我，表示感谢。我拉着这些手，热烈地紧握着，象是跟自己的兄弟们离别似的。他们也确实是我的兄弟。我们虽然各奔前程，但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合着同一个节拍。

“再见了，同志们！”我一面说，一面把空袋背在肩上。“遗憾的是不能赠送你们任何其他物品。”

弗里德里希·瓦斯培尔把手放在我的肩上：

“这已经足够了！”他明确地说。

接着他抽了最后一口烟，从嘴里拔出了烟斗，抖了抖烟灰，把它送给了我。

“请把这拿去吧，这是我们德国工人赠送给你的！”

我颤抖了一下，稍微往后缩了缩。但他微笑着，把那个抽得发热、跟随着他度过了整个劳动一生的木制烟斗塞到我手里。

“拿去吧，拿去吧，保加利亚有好烟丝！”

我本想告诉他我不抽烟，但卡车已经停住了，德国人一个接一个地下了车，一面抖掉衣服上的尘土。

我和弗里德里希·瓦斯培尔是最后下的车，分别时我们拉着手，握了很久很久。我很想拥抱他，但我的军装似乎妨碍我这样做，而且一种旧的尚未完全消失的成见提醒着我，在普罗夫迪夫不能跟德国士兵作多愁善感的表示，我只以一句简短的但很有表现力的话为满足：

“弗里德里希，胜利属于红军！”

“胜利属于红军！”他悄声对我说，这只有我们两人能

够听见。

往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弗里德里希和他的朋友们慢慢朝德军警备司令部走去，而我则去无产阶级居民区，需在那里跟游击队接上关系。

医生突然中断了自己的故事，出神地望着跳跃着的火苗。他的眼镜反射着红光，但他苍白的脸上的亮光和影子若隐若现。他深深陷入沉思之中，在场的人谁也不想打破他的沉默，唯有上校决定插嘴。他微笑着说：

“是的，医生，现在我来解释一些情况。”

姆拉德诺夫医生微笑着：

“真的，不管你怎么硬要，烟斗我决不会送给你，上校同志！……”

“可是，你不抽烟呀，医生！”

“虽然……现在烟斗还在我办公室，放在特制的玻璃罩里……它是一位亲爱的朋友留给我作纪念的。”

“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们讲这段故事呢？”有人问。

“自尊心不允许我……而且也不方便说，他毕竟是德国鬼子呀。我做得多么不对，是不是？”

医生望着同志们。

“你看，”他继续说，“去年我在东德时……”

大家震颤了一下，一齐将好奇的目光凝视着他。

“不，不，”医生微笑着，“我并未见到弗里德里希·瓦斯培尔，也许你们以为……也没有找他，尽管我很想用某种办

法实现这个奇迹……咳，这种事情一般只能在小说和电影中见到……但请注意，我毕竟重又见到了另一个德国，就是十多年前我遇见的萨克森工人弗里德里希·瓦斯培尔的德国……”

“医生，你又诗兴大作了。”有人插嘴说。但这个玩笑被那些听得入迷的人当做耳旁风。

医生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继续说：

“同志们，我很幸福，法西斯主义已被我们踩在脚下。但在我的恨中又添上了爱，明白吗？爱一个为全世界贡献了卡尔·马克思和萨克森工人弗里德里希·瓦斯培尔的民族。我去了莱比锡、季米特洛夫纪念馆、过去的帝国法庭……怀着激动的心情听人们讲富于表现力的德语。这常常使我想起过去，想起头一个使我认识了真正的德国，将我从不必要的误解中挽救出来的老朋友弗里德里希·瓦斯培尔……”

已是午夜了，而交谈仿佛刚刚开始似的，在黑暗中清晰地听得见医生的声音。

（樊　石译）

留·斯托扬诺夫

手枪和小提琴

〔**作者简介**〕 留德米尔·斯托扬诺夫（1888—1973）生于乡村教师家庭，中学肄业。先后主编《盾》、《文学评论》、《斯拉夫人》、《九月》等刊物，曾任作协主席、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并当选为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主要作品有诗集《剑和语言》、《人类之母》，短篇小说集《上帝的惩罚》、《在先进岗位上》，中篇小说《马托夫上校的银婚》、《霍乱》，长篇小说《黎明》，剧本《拉科维查之死》、《狼儿看守羊群》等。曾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一

每天傍晚，青年们排着队，唱着歌从工地回来，停在祖国阵线①市委会前面。他们一张张古铜色的脸庞开朗豪放，

①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人民革命胜利后，保加利亚建立了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民主力量结成联盟的人民民主政权——祖国阵线政府。

挂着微笑，眼睛里闪着快活的光芒，牙齿洁白晶亮。一天的劳动已经结束，娱乐活动开始了。广场上举行了小小规模的游行，劳动队员们列队行进，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再聆听轻松的歌曲和诗歌朗诵，最后跳起了民间霍罗舞。霍罗舞把城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卷了进来，有些波马克① 姑娘也大着胆子参加娱乐活动。

工地地处高山上——在那儿干活又艰苦又危险。已经修好的一条道路把通往各镇的距离缩短了几十公里，大大方便了这座城市和周围的村庄。现在，劳动队员们凝望着国境线这边的悬崖陡壁，思考着自己的劳动、美好的明天和新的生活。然而，国境线的安危又象幽灵般在他们心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星期六的娱乐活动总要延续到深夜。在这个外客罕至的偏远的一隅，大家都自寻快乐。边防军军官杜伊切夫上尉也常来这儿，他喜欢跟青年们聊天，同他们一起游玩。他骑着一匹骁勇的枣红马，告别山崖和森林，从他那批山鹰栖息的高处下来，混杂在人群中。他来自人民，酷爱人民，竭尽精诚地履行职责，为祖国效力。

但他有什么心思。一段时间以来，他脑海里翻滚着对往事的回忆。这些回忆犹如秋风扫落叶，纷至沓来。他经历过的事件的旋风已经过去了，——但是，那一桩桩往事，一个个奇怪而令人费解的问题又涌上心头。他坐卧不安，睡不好

① 波马克人，亦译波马基人，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

觉。他不知道这种使人忧虑的怀疑是从哪儿来的。那些光荣的、雷鸣电闪般的日子已过去快三年了。法西斯的惨祸已象乌云一样沉入脑海，自由的太阳撒下了千万道紫红色的霞光。

青年们雄壮的歌声中夹杂着小提琴悲凉的音韵。拉小提琴的是区政府的绘图员迪科·佩特罗夫。为什么杜伊切夫上尉每回瞅见他那张惨白的脸和他那略微倾斜的左肩，心中就升起前所未有的愤懑呢？有些人能记住别人的相貌，但难以记住他们的名字，杜伊切夫上尉就是这种人。

迪科·佩特罗夫演奏小提琴是出于自愿，因此，劳动队员们都喜欢他，城里人也不拿他另眼相看。至于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是怎样当上区政府的绘图员的，谁也不感兴趣。区政府需要绘图员，他就被录用了。市民们喜欢他，是因为他乐于替他们办事，又懂得谦让。他深居简出，但碰上了热闹却喝得很多，从来不醉。杜伊切夫上尉有一回貌似随便地问他：

“您面孔好熟，可我不记得在哪儿见过您。”

迪科·佩特罗夫胸有成竹，咧嘴一笑，笑得很不自然，就象一个抄别人答案的小学生被当场抓住了一样。他一耸肩膀，回答说：

“这有可能，上尉先生，世界大得很……”

“您好象去过库布拉特，要不就去过普雷斯拉夫……”

迪科·佩特罗夫稍稍红了脸，但马上又镇定下来，一摆手，用一种想奚落上尉无知的口气说：

“我是小特尔诺沃人……”

“啊，看，这倒有可能……”杜伊切夫上尉似乎宽了心，“我以前去那儿视察过……”

他笑了笑，和蔼地审视迪科·佩特罗夫一眼，意思是说：那好，就算是这样吧……。他如释重负，回忆里的疑团烟消云散，他决定不再想这件事。青年劳动队员们干得很欢，他们正在筑路，修水库。波马克人和保加利亚人都为自由感到欢欣鼓舞，都在建设新生活。杜伊切夫上尉凭他的经验，知道同法西斯匪帮斗争是怎么回事；往事历历在目——巴尔干山上的斗争、狂暴的宪兵、牺牲的同志……

这次谈话的地点是开展业余文艺活动的学校院子。院子里摆着几排椅子，椅子后面有个游廊，可以站许多人。迪科·佩特罗夫是业余文艺活动的核心人物，他指挥合唱队，还表演小提琴独奏。他演奏一些古老的俄罗斯乐曲、罗马尼亚乐曲和新乐曲。他站在霍罗舞的圆圈的中心，微微伛着腰，入迷地从左到右晃动他的肩膀，小提琴奏出的乐曲便在挤满人的院子里回荡。最后，他一手拿弓，一手拿琴，张开了双臂。他累了，无力拉琴。

“拉得好！再来一个！”大家向他喝彩，鼓掌。

观众对演员的要求没有个完，迪科·佩特罗夫想自卫。

“不行不行，兄弟们！我累啦！”

杜伊切夫上尉在迪科·佩特罗夫坐到他旁边的椅子上时说：

“祝贺您，佩特罗夫同志……”

迪科·佩特罗夫开朗而抱愧地笑着，略微红了脸，上尉在一片嘈杂声中勉强听见他在喃喃地说：

“没有办法，上尉先生。人民……”

他顿了顿，又连珠炮般斩钉截铁地说：

“我爱人民，自小就懂得他们的甘苦，把心都掏给他们了！”

他把垂下的头凑过来，但没有看上尉的眼睛，继续说道：

“我看见您，上尉同志，就羡慕您！我也喜欢边防工作！要知道，这也是为本国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

但是，观众仍不饶他。女孩子们、劳动队员和波马克姑娘们又来请他演奏。

“佩特罗夫同志，这可是劳动队的命令……”

于是，小提琴手拗不过去了。他站起来，奏出了当地的波马克霍罗舞曲。青年们发狂了，娱乐活动一直进行到深夜。

杜伊切夫上尉曾对祖国阵线市委书记戈乔·多切夫说：

“这个迪科·佩特罗夫真有能耐。把整个劳动队弄得懵头转向。好样的！”

戈乔·多切夫长得胖胖的，有一张和善的脸，他也把迪科·佩特罗夫称赞了一番。

“他什么时候来城里的？”上尉问道。

“快两个月啦。”戈乔·多切夫对上尉的这个问题感到纳闷：什么时候来的有啥意思？“他从索非亚带来了可靠的介绍信，我们就同意了。区政府没有绘图员。谁也不愿到这儿来受罪，可他是自愿来的。”

“从哪儿来？”

书记耸了耸肩膀。他觉得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不过他想，要是把家喻户晓的小提琴手和波马克姑娘杜达谈恋爱的事跟上尉说说，他一定更有兴趣。上尉听了这段插曲，一声不吭。

二

九月九日快到了。杜伊切夫又隐隐觉得不安和心中无数。那张惨白的脸又在他眼前晃动，仿佛在讥讽他：你不认识我吗？

迪科·佩特罗夫拼命工作。合唱队正在排练新的进行曲和其他歌曲。他马不停蹄地从业余文艺小组赶到了少年队员那里。说不定他这回能捞个突击手的称号吧。他也确实很卖力，惹人注目。

边境小城的节日过得很热闹。人们在学校院子里兴高采烈地跳起了霍罗舞，迪科·佩特罗夫也不知疲倦地伴奏。他拉琴入了迷，热情饱满。他那件咖啡色的旧上衣摆来摆去，一绺头发披在额头上，他不时把它往后撩撩。不知怎的，他撩头发的动作又引起了杜伊切夫上尉的注意，这个动作象影

子一样罩在上尉的心上。

青年们围着小提琴手，要他演奏新歌。迪科·佩特罗夫又拿起了小提琴。他拉得矫揉造作，但技术娴熟，那深沉的音调特别惹姑娘们喜欢。许多姑娘不加掩饰地跟着他转，而他却故意躲开她们，红了脸，装着没有发现她们的青睐。他只注意和顺从杜达一个人。要是她叫他拉点什么，他就满口应承，不管自己有多累。

“真棒，杜达！你这个魔女！”青年劳动队员们嚷道。

杜达刚刚脱下她带面幕的长衫，那张胖乎乎的、通红的脸在花头巾的映衬下显得过大。她脸上最漂亮的地方要数那两撇眉毛：高高的、黑黑的，卷曲得象歌里所唱的“两条水蛭”。眉毛下面有一对深陷的、不动的，但又充满热情的眼睛。

杜伊切夫上尉想，能为她着迷的不单单是迪科·佩特罗夫这样一个小提琴手。她笑得那般自然，声音清脆，仿佛天空都变得更蓝了。她一开始笑，红润的嘴唇后面便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

她的两个哥哥围着她转，他们不大乐意看她卖弄风情。她在保加利亚学校中念完了三年级，正准备升中学。他们是用旧时的宗教狂热者的眼光来看待她的放纵行为。

迪科·佩特罗夫同他们搭讪，领他们到小卖部喝汽水，然后又递给他们香烟。二哥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九月的太阳散射出柔和的光芒，劳动队员们的灰布上衣同本地五花十色的衣服混在一起，显示出特殊的生活情调。各种色彩融进人声和歌声，使整个院子好象在空中飘荡。

杜伊切夫挎着照相机走来走去，把一些精彩的场面拍了下来。杜达要波马克姑娘们别那么土里土气，但她们总是躲躲闪闪。劳动队员和突击队员把她们围起来，跟她们一起照相，才使她们顺从下来。她们害怕回家后挨骂。

小提琴手低着头，侧着身子，似乎在偷偷把背冲着照相机。在他光着脑袋，用下巴把提琴夹在肩上，往琴弓上涂松香而顾不得瞅前面时，上尉抓拍了一张他的头像。他没有发现上尉倏忽关好了照相机，把它装进了皮套。

娱乐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业余文艺小组表现出色。他们朗诵了瓦普察洛夫的诗歌，唱了保加利亚和俄罗斯歌曲，跳了霍罗舞。迪科·佩特罗夫累极了，但他赢得了姑娘们的掌声和称赞。

杜伊切夫上尉很快回到自己的住所。他这一天想得很多。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使他不能平静。他现在仿佛看见了那条小路，他正随同支队下了巴尔干山，进城去。他仿佛看见了聚集在广场上欢呼的人群，也看见了那些罪恶深重的刽子手和杀人犯胆战心惊的神色。

这是怎样的一天啊！似乎天空更高，地平线更远，人们都陶醉了。那一件件往事、一幕幕场景是难以置信的、感人肺腑或令人揪心的，它们现在正接踵而来。女人们正呼唤和拥抱她们的丈夫，失去儿子的母亲在哭泣。空中回荡着雄壮的游击队歌……他，杜伊切夫，支队的政委，几乎不相信这个奇迹，因为胜利的到来确实象神话一样。只有欢喜雀跃的人们才使他敢于相信……苏联的第一批摩托化部队是这天下午

开过去的。他还记得那个满身尘土的下士，记得人民的喜悦和几个包着黑头巾的老年妇女的眼泪……

这些回忆触动了上尉的心，他难于避开它们。他也想摆脱另一个思想——不久前困扰他的思想，但是办不到。那张脸使他忧虑——额头上耷拉着一绺头发，一张苍白的手把头发往后撩……这是一张和善的脸——又是一张凶手的脸……这可能吗？要不就是他想得太多，又犯了疑心病？

他躺在柔软的毛毯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想控制住自己飞得很远的思绪。但是，这些思绪仍然缠着他。怎么办？死在额上的那绺头发上，这合算吗？是呀，那人是另一副模样，另一种声音，还有那把小提琴……不，这完全是另一个人。再说，库布拉特和小特尔诺沃又不是一个地方……

第二天早晨，上尉冲洗了照片。照片烘干后，他瞅了一眼那张枯瘦的惨白的脸。“不是，”他一甩手，“这纯粹是瞎想……脑子死板，自以为是。”

但他仍然把照片装进信封，附了几句话，把信送往索非亚，送到他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朋友那里。发了信，他就动身到边境上去了。

他随之放了心。他认为，这不会有什么结果，最好是管好自己的事，守住国境线。

一个没有通行证的波马克人被带来了，他脸上冷冰冰的，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在靠近国境线的地方转悠什么？上尉好象认识他。

“我在哪儿见过你吧？”上尉问。

"当然见过，在下边城里。"小伙子似笑非笑地回答。"你不是跟我们照过相吗？"

上尉的眼睛一亮。

"你不就是杜达的哥哥吗？"

"是她哥哥……"波马克人神气活现地回答。

"你来这儿干什么？"上尉继续问道，"又没有通行证……"

"我爸爸有一片山林在这儿，"波马克人指着对面的树林说，"我来砍柴，马就拴在那边。"

"可离这儿很远，"上尉说着，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补充了一句："你们这些波马克人……你们当中有坏人。"

波马克人中确实有些不要命的走私犯、叛徒和敌对分子。可是这一位……对面确实有一片树林，马也确实拴在那里。一株老橡树树桩旁边有一把斧子。这已经查清楚了。

"哎，你走吧，"上尉心里很矛盾，慢腾腾地说，"可你要放聪明点。要是再抓住你，我就要派人脱了你的裤子打你一百大棍。"

三

上尉收到了索非亚打来的电报。电报上说："卡尔塔洛夫中尉。宪兵队匪徒。害死过二十三名游击队员。曾在库布拉特人民法庭受审。"

上尉把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把它放在桌上。但他

接着又拿起来看。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坐在床上。透过哨所宽大的窗户，他看到了对面斜坡上的绿地、稀疏的松树，再过去就是悬崖峭壁、树林和沟壑。周围的寂静令人沉闷。上尉的心中也是一潭死水。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卡尔塔洛夫中尉的形象。这是同一张脸，只不过那时比较呆板、迟顿，现出一副绝望的神情。那只手慢慢抬起来，把不断耷拉到额上的一绺讨厌的头发往后撩。他常常用手遮住眼睛，仿佛羞于看见人民法庭审判员们的一张张正直的脸，羞于看见杜伊切夫——人民的公诉人。也许他心里在为自己被抓起来而打颤，并且在捉摸，要是他还有力量和权势，一定会好好教训教训这些家伙……

杜伊切夫上尉一骨碌站起来，翻寻书架上的书籍和卷宗。他抽出库布拉特人民法庭对被告们的起诉书，找到一百二十八号材料，念了起来。这份材料曾打印和分发到全县，征求人民的意见。杜伊切夫随身带着这些材料，常常翻开来参考。他是人民公诉人——深知现时被抓起来的所有这些罪犯的嘴脸，深知他们凶残的、至死不改的本性和他们骇人听闻的恶行。卡尔塔洛夫是第三十五号罪犯。这就是他：

"……潘特列伊·亚内夫·卡尔塔洛夫，瓦尔纳人，现年三十二岁。他当师参谋时，曾下令杀害人民战士。一九四三年任讨伐连连长时，曾在名为'波里亚扎'的地方同一批游击队员作战，残杀了二十名被俘的游击队队员，其中有十一名是邻近村庄的交通员。他们的尸体被运到各区示众，以儆效尤。

“人民公诉人问：‘是你亲自下手的吗？’被告没有回答。副官基斯基诺夫在回答同一问题时供认：‘是的，是他亲自下手。他起先命令士兵们开枪，但当他们累了时，他就掏出手枪，向游击队员们射击，把枪里的子弹都打光了。他还枪杀了士兵们曾经请求饶恕的女游击队员玛拉，她当时有孕……’”

“就是他。就是他。白纸黑字。”杜伊切夫想道。材料表明，卡尔塔洛夫还有别的杀人放火的罪行。因此，法庭是果断的——卡尔塔洛夫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自那时以来已经过去三年了。日月如梭呀！卡尔塔洛夫和其他几个同他一样杀人不眨眼的罪犯被枪决了。他的坟堆无人问津，已被夷为平地，上面长满了冰草、毒人参等野草。可现在，他的形象又复活了。杜伊切夫煞费苦心地思索他是怎样复活的，但不得其解。也许这是搞错了，是巧合，是长得相象，是白费劲吧？

是呀，当时人们急不可耐，满腔仇恨，情绪激昂。这里有遇难的游击队队员、交通员和其他无辜者的一大群母亲、姐妹、父兄——他们的房子被法西斯分子放火烧了。他们团团围住充作人民法庭的那所学校，对法庭的审判拖泥带水表示愤慨。杜伊切夫未能使他们安静下来。他们扬言要亲手打死被捕者，把审判员和人民公诉人抓起来……

“同志们！”一位包着黑头巾的年轻妇女说道，“人民法庭开庭两个月了，可这些作恶多端的家伙仍然活着。法西斯分子在杀害我们的兄弟和丈夫时，根本不讲法律，他们的法律就是手枪和绞架。而我们的人现在却在推敲法律，自作聪明，

只不过是要为这些杀人犯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溜走。这公平吗？不公平。我们要人民法庭干点实事，不要光讲空话。绞死这些凶手！”

发言者一个比一个坚决。人群中爆发出喊声：

“处死凶手！”

“人民法庭要名副其实！”

杜伊切夫记得，他当时需要站出来安抚这些群众，因为他们确实受了许多苦，有权清算老账。但是他说，审判必须按照法律程序进行。

“我们是实行法制的国家，要依法审判。我们不是法西斯分子！人民法庭会称职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情节最重的一些罪犯得到了公正的惩罚。他们之中也有卡尔塔洛夫。一共是七个人，七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恶魔……人们怒发冲冠，只等一声命令……为了避免出现私刑的情况，判决是在深夜执行的。人们借着区上挂起的两盏马灯，看见了那些幽灵。当时刮起一阵风，树林里发黄的干树叶沙沙作响。光秃秃的山梁上响起了低沉的枪声。拥在黑洞洞的山谷里的人们马上就散去了。杜伊切夫回到城里，派人去掩埋尸体。

上尉把两手插在衣兜里，踱来踱去，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考虑着对策。他又看看电报——也不知是看了多少遍了——最后决定采取行动。他拿起电话听筒，通知区长马上逮捕迪科·佩特罗夫。区长惊奇地问道：

“怎么？迪科·佩特罗夫？是那个小提琴手吗？”

“就是他。”

“那么个安分守己的人……”

“是呀，他很安分守己。他欠了二十三名游击队员的血债……”

“你说什么？不，这是误会……这儿的人都喜欢他……”

“我不想跟你争论。”

“好吧，马上把他抓起来……不过，我总想……”

杜伊切夫火了。

“由你想去吧……”

半小时以后，他又拿起电话听筒。

“怎么样？逮捕了那个匪徒吗？”

“什么？”区长吃惊地问道，“啊，是呀，你是说迪科·佩特罗夫吗？”

“我想问，事情怎么样？”上尉不满地说。

“他走啦。”

“上哪儿去啦？”杜伊切夫气冲牛斗。

“去普罗夫迪夫办事。”

“快通知普罗夫迪夫，要不然就把你抓起来，要你负责。”

“是”。

“你采取措施，逮捕小学生杜达·萨利耶娃和他的两个哥哥。”上尉的声音在颤抖，“明白吗？”

“明白。”

“但愿咱们不要再有麻烦。”

他放下电话听筒。

匪徒失踪了。他当然清楚地记得人民公诉人杜伊切夫的面容，还在第一次见到杜伊切夫时就采取了防范措施。不知他是否查看过杜伊切夫守卫的那个地段——很明显，他的目的是越境逃走。对他来说，小提琴是一种负担，是用来掩人耳目的工具，而他真正的武器却是手枪。上尉攥紧拳头，诅咒自己，诅咒世上的一切。

四

那一夜犹如一场恶梦留在从前的中尉卡尔塔洛夫的记忆里。一切都是那样严峻和井井有条。从九月九日起，他的肩章被摘掉了。接着，他的所有情况都被调查清楚了。他自己最后也认了罪，说他思想糊涂，执行了命令——尽管谁也没有命令他枪杀游击队员和用手枪射击一个孕妇。

因此，他被押到枪口下，没有逃脱不可避免的结局。他看不到一线希望。当下令"开枪"时，他把眼睛一闭，昏过去了。往后，他什么也不知道……

……他惊讶地看见了天空和繁星。这是另一个世界的天空和繁星。他好象是在深不可测的井底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还活着。一个木棚后面有说话声。他们在开会吗？

这是些什么人？他们在窃窃私语，他们的声音中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随后，他们消失了。他这才感到，自己的衣服被剥光了，身上冰凉冰凉的。这是有生命的感觉。一个念

头象闪电一样从他脑子里掠过：他还活着。他躺在一动不动的、同样是赤条条的尸体中，但他马上感觉到了他和他们的区别：他们已经死了，而他还活着。

夜晚一片漆黑。天空飘浮着灰色的云团。他觉得，这些云团就象一个个大陆。他轻轻抬起身子，从土坑里一看：周围是一片光秃秃的平地、杂乱的树丛。

他一翻身站起来，隐没在漆黑的夜色中。

他马上认准了方向：他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想，他现在自由了，可以行走了，无需担心游击队的哨兵在他身后开枪了，他也可以思考问题了。这一想法是那么古怪，以致他揪了揪手，想证明自己不是在做梦。黑暗遮住了他赤裸裸的身子，在这深更半夜，谁也看不见他，谁也碰不到他。一个赤身裸体的人在赶路——这真是荒诞不经。因此，他跑得气喘吁吁，想趁天亮以前多赶一段路程。他觉得肩膀疼痛，伸手一摸，明白自己受了伤。伤势显然不重：大概锁骨被打断了，周围血糊糊的。小意思！重要的是性命保住了。他一再想：有命了，有命了……

他有了目标：从头干起……就象被赶出了天堂而地狱又不肯接受的亚当一样。他盘算着种种计划，但又把它们一个个否定了：所有计划都碰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赤着身子，这是个生命攸关的问题。

东方的天上慢慢泛出了鱼肚白。同时，一个光身子的轮廓在路上也显露出来。公路干线上偶尔开过一辆马车或卡车。必须找个地方藏起来，远离开人们的目光。

他不习惯赤脚走路：两脚都磨破了。他走得吃力——张开双手，一跳一跳地显得可笑。他长得干瘦，肋骨外露，两腿又细又长。他冻得瑟瑟发抖，便蜷缩在一个废弃不用的茅屋里，躲在那儿碰运气。天亮了，空中露出一轮十一月冷冰冰的太阳。时间过得很慢，天气寒冷而多风，但他庆幸他还活着。他在脑子里一遍遍地重复着一句土耳其格言：宁做活狗，不做死狮。确实，一条丧家犬未必会落到他这步田地，但他毕竟可以透过茅屋上的窟窿，看见高高的蓝天、低低的云朵、河流、收割过的庄稼地、漫着轻烟的山岗，再往前看还有巴尔干山冰冻的雪冠。这些景象都引起了他模糊的、忐忑不安的喜悦。只要看得见东西，听得见声音，身体有感觉就行！

这时节，葡萄快采摘完了，他决定夜间去搜寻漏摘的葡萄充饥。下面那条河流懒洋洋地发出哗哗的水声，似乎时间也过得懒洋洋的：天黑下来了，他又准备上路。他知道他该往哪儿去，并相信自己能成功。匪徒也有自己的同伙，自己的交通员。他在作生死的拼搏。

到了深夜，他碰见人了：一老一少和一头驮着面粉的毛驴。父亲蓄着花白的短胡子，十岁的儿子或孙子赶着毛驴。父亲看见一个赤条条的汉子，失声喊道：

"哎哟，真主。一丝不挂！站住！你是谁？什么人？"

卡尔塔洛夫停了下来。他羞答答地用土耳其话说，他遇到了坏人，强盗，他们抢了他的东西，剥光了他的衣服。土耳其人咂咂了半天舌头，一再说"扎瓦利"(不幸)。走近村子

时，他好心好意地说：

“你在这儿等着，孩子。我去做件好事吧——真的。”

卡尔塔洛夫等着等着，等得不耐烦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对他来说，时间是宝贵的。正当他准备再走时，土耳其人快步赶来，塞给他一包东西。

“给你，孩子，遮遮羞吧。”他说着就走去了。

卡尔塔洛夫高兴得忘了道声谢谢。他躲到路旁穿衣服。

他从从容容而又精疲力尽地上路了。他饿得发慌。他害怕有人盘查他的证件，就绕开村子赶路。他穿着褴褛的衬衫和坎肩、很旧的灯笼裤，打着赤脚，深夜里去敲镇子边上一间低矮的房子的门。漫长的路程、恐惧和饥饿使他浑身乏力。老妇人没有认出他。女儿却叫道：“天哪！”然后惊讶得闭上了眼睛。他们进了天花板很低、灯光微弱的房间。他的第一个问题是：

“搜查过吗？”

“没有。”老妇人回答。

他坐下来，深深地嘘了一口气。开始说话前，他捂着额头沉思了几秒钟。他讲了些可怕的、不连贯的事情，两个女人由此知道：他正在东躲西躲，幸好还没有危险。最初的可怕的几个月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小心。真奇怪！他有一回曾在这里过夜，邻居们都知道那女儿接待过他，那母亲也对他很好——那是在法西斯统治的黑暗时期——可你看，现在谁也没有兴趣来看看，来问问她们同这个匪徒和宪兵有什么关系。他在法庭上已经听惯了“匪徒”这个词，他几乎也认为

这个词正确地说明了他的身份。况且，他也顾不得自己的名声，只能顾命。大概两个女人把他看成了“受害者”，以为他只是来过夜，不会胡作非为、抢劫吧？

他宽心了。

他喜形于色，怀着一线希望。

“姑娘，”他弯腰对那女儿说，“你会救我。我以后要报偿你，重重地报偿！”

“不行，中尉先生，”已平静下来的母亲马上说道，“现在是另一个世道，这你也清楚……”

“就是说，你要赶我走吗？”他又冲着那女儿问道。她愣愣地一言不发。

“我不知道，潘特列伊，”她痛楚地说，“这儿很危险，等你镇静下来，就上别处去吧……”

其实，他也不想留在这儿。这里有他的行李，有一些需要销毁的文件。这里还存放着几个被杀害的游击队员的照片——他曾想拿他们去请赏。一个人头五万块！这已经来不及了，现在需要使狼披上羊皮。要是人们发现他已逃走，他们会追捕他；要是象他希望的那样，人们夜间没有清点尸体就把它们掩埋了，那也并不安全——还会认出他来。不过，只要活着就算运气，他值得为此作出各种牺牲。

不，那女儿并不完全冷眼旁观。她为他准备了衣服、食物。她不知道他已被判处死刑，相信他的恶劣行径已经成为过去，他还会重新做人。她想，他为什么不去打德国人呢？过去的许多军官都上前线去了。是呀，他也许会去。

他一直睡到第二天很晚才醒来。醒来时，浑身是劲。他的脑子转得很快，生的欲望更强烈了。

他撕去了游击队员迪科·佩特罗夫的照片，这个人的相貌和年纪同他相仿；他巧妙地在身份证上贴上了自己的照片：道路畅通了。

一切都变得多厉害啊！火车里挤满了人。人们赶往四面八方，都在谈论新生活。新生活象一股汹涌澎湃的洪流。全国的人民法庭还在审判。有些案子已经了结，法西斯匪徒和凶手受到了惩罚。他相信过的一切——国王、上帝、法西斯政权、"新秩序"——统统都不复存在了。他恨之入骨的一切——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红军——却自由地挂在人们嘴边。到处都搭起了欢迎苏联军队的拱门，拱门上挂着绿叶纷披的树枝和标语："欢迎无往而不胜的苏联军队——各国人民的解放者！"……

负伤的游击队员迪科·佩特罗夫住进了医院。他肩上的伤已经坏死。伤员的性格呢——文静、温和、寡言——这马上赢得了大夫和护士们的好感。锁骨真的断了——这是在哪次战斗中打断的呢？他详细叙述了游击队的生活。有谁能比他更清楚呢？

病人们把他团团围住。伤口长好了。尽管左肩矮了一点，不大方便，但他仍然拉起了小提琴。在医院里听小提琴——这好比在沙漠里听夜莺鸣啭。迪科·佩特罗夫不仅在医院出了名，而且还在全城出了名。

"现在上哪儿去啊？"出院时，大夫半开玩笑地问他。

他耸耸肩膀。

“哪儿也没有工作。”他回答说，把耷拉在额上的一绺头发往后撩了撩。

一个英雄、过去的游击队员——能没有工作吗？这说不过去。这是在祖国阵线执政的新保加利亚啊！医院为他到处打电话——说这太不公正了！必须改正。

迪科·佩特罗夫在普罗夫迪夫公安局混了将近一年。这真是活受罪。他提心吊胆地翻看每一件公文、每一份电报，生怕这些材料提到他。上面要他的材料——问他加入过哪支游击队？参加过几次战斗？在哪次战斗受的伤？他跟首长说他写信要材料去了，还没有回音，需要等待。于是，首长只好等待。

有一回在车站上，在国王的显贵流亡到国外去时，一位清洁女工按照民间的风俗习惯，在火车后面泼了一桶水——让他们永世不再回来。……他的心揪紧了。但是，在接着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当讲演人讲到“君主政体已彻底完蛋”时，他又跟着鼓掌。他同情反对派，还偷看绿党的《旗帜报》①。他经常在萨哈特佩站岗，从那儿望着连绵不断的罗多彼山脉，心中升起了邪念。那儿就是国境线，逃到那边就有救了。国境线那边有他的朋友，他可以免遭子弹的袭击，可以有所作为，大显身手。他的手痒痒的，情不自禁地摸了摸套里的手枪。世界上有人打捞珍珠，捕杀鲸鱼和长颈鹿——他

---

① 《旗帜报》，保加利亚当时的反对党农民联盟的机关报。

这个猎人却专捕游击队员。这是他自鸣得意的。在国境线那边，他可以捕到很大的猎物。

真正的迪科·佩特罗夫已长眠于波里亚扎的一丛野蔷薇下，而他的替身却盗用了他的名字。大家常常要连喊他几声“迪科”，他才转过身来。有一回，他在军事学校的老相识当着一大群警察叫他：“你好，潘特列伊！”他装着没有听见，那人便扫兴地走了。他的工作使他总是担惊受怕，怕他的材料被传来传去，跟着他跑。他着急，由于孤立无援、不能自拔而怒火中烧。他辞了职，当了公共汽车司机，跑普罗夫迪夫——切佩拉雷这条线。糟糕的是，开汽车也不方便——全保加利亚有许多人要坐这趟车。他白天黑夜都怕有人把他认出来。就在这时，林业合作社需要一个事务长，迪科·佩特罗夫于是当上了事务长；在这个小镇上，这是一个肥缺，他决定保住这个肥缺。他需要取得社员们的信赖，需要熟悉这一带的树林。可这又倒霉了。镇上的中学校长是瓦尔纳人，过去教过他。老人好奇地瞅着他，眨着镜片后面的两只眼睛，似乎想说：我可认识你哟，你不就是潘特列伊·卡尔塔洛夫吗？

他决定赶快溜掉。

他一打听到斯莫梁区正在物色一个绘图员，便递了申请，被录用了。这里的工资少些，但工作也轻松些。

五

杜伊切夫上尉责备自己太优柔寡断了。他这个当年的游

击队指挥员和现在防备各种敌人和破坏者的边防卫士，竟让一个真正的匪徒、野兽、人民公敌从自己手里溜掉……他不能原谅自己手软——似乎是在对付一个高贵的伯爵或者美国外交官。

第一步，他加强了岗哨。他通知战士们和他的副手们说，企图偷越国界的是个危险的匪徒、杀过二十三名男游击队员和一名女游击队员的凶手。要是他还没有越境过去，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挫败他逃跑的阴谋。

毛蓬蓬的边防军军犬奥菲士摇着尾巴，用它的一对聪慧的眼睛瞅着上尉，似乎想从他脸上的表情和手势看出他在想些什么。

军官到城里去了。

匪徒没有搭车去普罗夫迪夫。这已经查明了。可他在哪里呢？他也没有在他的住所过夜。他的女房东——好心肠的帕拉什凯娃奶奶谈起他来就象谈论自己的儿子一样——又疼又爱。

“奇怪呀，孩子，他上哪儿去了呢？我给他洗好了衣服，可他不在。”她说。

杜达·萨利耶娃和她的两个哥哥被带来了。

“你知道迪科·佩特罗夫的什么情况吗？”上尉问杜达。“他藏在哪儿？”

杜达抬起一张宽圆脸，奇怪地问：

“干吗要藏起来？”

“因为他是罪犯、凶手。”杜伊切夫干巴巴地说。

杜达把她的两只大眼睛睁得圆圆的。

“天哪！我跟他毫无关系，什么也不知道。”

“不知道？那谁知道？……”上尉皱起眉头，转向她二哥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穆罕默德。”年轻人傻乎乎地笑着。

“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吗？你那天不是去过哨所吗？是不是把路指给他看了？”

上尉气呼呼地瞪着他。

“不，没有。”穆罕默德若无其事地说。

她的另一个哥哥又聋又哑，上尉觉得没有必要审问他。兄妹三人是不是知道这个逃犯的情况呢？他大概并不相信这个很嫩的小姑娘和这两个傻头傻脑的青年。他有别的更可靠的人，要不就是他凭本事一个人干。

消息在城里传开，警备司令部前聚集了一大群好奇的人。大家议论纷纷，都对这样一个匪徒能够逃走并窝藏了这么长时间感到奇怪。他真的逃走了吗？大家对他的印象是他少言寡语，腼腆，跳霍罗舞时拉他的小提琴，真想不到就是这只演奏苏联军歌或保加利亚民族复兴歌曲的手，竟举起手枪对准英雄的游击队员的头颅。但是，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他的逃跑就是雄辩的证明。

杜伊切夫上尉站起来，走到另一间屋子。有人给他打电话。

随后，他告别了大家，出了门。他骑上枣红马，向丛山疾驰而去。那儿发现了匪徒。匪徒同战士们交火了，看来他

不是单独一人。

差不多在上尉守卫的地段的尽头，在离边界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响起了枪声。那地方坎坷不平，怪石嶙峋，松树稀稀落落。烈日当空，周围的土地冒着热气。野草枯黄了，被枪声惊飞起来的几只山鹰在蔚蓝色的天空中盘旋。

杜伊切夫仍然在想，匪徒是逃不出去的。他的眼前又浮现出匪徒在法庭上受审的样子。那时，匪徒用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打着瞌睡，或是懒洋洋地站起来回答问题，无动于衷地讲述着他杀害游击队员和放火烧毁农民的房屋的情景。但上尉记得，那个匪徒叫卡尔塔洛夫，而现在这个人叫迪科·佩特罗夫。那时的被告有将近一百五十人，另外还有几百个证人……上尉正竭力证明自己没有搞错。

他沿着陡峭的山径朝下走去，后面跟着两个勤务兵。枪声越来越稀。当他走到岗哨那儿时，便完全听不到枪声了。

军犬奥菲士发现了他。光荣的奥菲士！准尉随即向他报告了情况。

“我们沿着小路巡逻时，奥菲士挣着想朝沟底跑去。我们放了它，它拚命叫了起来，跑进树林，那儿便响起了枪声。奥菲士窜到树林边上，继续吠叫。它的腿有点跛。它的肩胛骨受了伤。”

上尉摸摸它的鼻嘴。它伤势不重。准尉继续说：

“它很勇敢，好样的！匪徒从一棵树后躲到另一棵树后，不断射击。我们起先以为他不是一个人。一颗手榴弹炸响了，但接着便鸦雀无声。我们找到了他仰面朝天躺着的尸

体。我们想检查一下他是被别人打死的还是自杀的。

“我们走上前去。

“逃犯仰面朝天躺着，半睁着眼睛呆呆地盯着明洁的天空和黑魆魆的松树。奥菲士站在高处，若无其事地瞅着躺在地上的逃犯，似乎知道他已经不再有危险了。”

（佘志和译）

安·卡拉利切夫

索科尔的庄稼地

〔**作者简介**〕 安格尔·卡拉利切夫（1902—1972）生于特尔诺沃州斯特拉日查村，曾在索非亚大学化学系就读，后毕业于自由大学外交专业。担任过多种刊物的编辑。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黑麦》、《希望》、《索科尔的庄稼地》、《最珍贵的礼物》、童话集《神话世界》、《走运的人》、《巨人与蟒》、《无尾狮》等。曾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斯托伊尔大爷回到家，摘下高高的多布鲁查皮帽，甩了几下，抖掉落在帽子上的小水珠，说道：

“这场小雨下得好啊！土地湿润了。”

他将刚才拄过，并用来赶狗的石枣木拐杖放在角落里，内心对村委会广播员充满尊敬之情。他蹲在壁炉前，把冻僵了的手朝火边伸去——想烤烤火。

玛努什卡大娘端来一个木盆，放到他跟前，然后用木勺从铁锅里舀了几勺热水，倒给他洗手，并壮着胆子说：

“斯托伊尔，你回来得太晚了，参加这种会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象别人一样早点回家休息呢？你在地里忙了一整天啊。今天晚上，在你敲门之前，我纺了三捆麻线。难道你能改造现在这个世界？让青年人去干吧！”

“青年人干劲倒是很大，但他们冒冒失失。我象安装在车轮边的木闸，支撑和制动这辆载得满满的车子啊。去拿点吃的来，我肚子饿扁了。回来的时候，我朝法切托的酒馆里看了一眼，科利奥·别连卡呆在那里，喝得酩酊大醉，他就这样借酒解闷，直喝到全身麻木为止。全村只有他没有交出土地，他说：‘就是用锯锯我，把我放在油锅里炸，我也不交出土地。嗨，看你们把我怎么办？’有人为他火上浇油，他象个瞎子一样在黑暗中乱撞……啊，玛努什卡，我活到了今天，看见了新世界。青年们高举红旗，出现在密梨坡，而他们后面拖拉机发出嘟嘟的响声，一小时就铲平了全部地界，平整了土地，那地方简直变得象远古时代一样了。我们一直象蜗牛生活到现在——各人藏在自己的蜗牛壳里，谁也不敢把头伸往外面，而现在已经砸碎了蜗牛壳。我们这里将要安装电灯，修建配备浴室和烘干室的面包房，建造酿酒厂。村里将会出现奇迹啊！来了一辆眼睛象火球一样的汽车，公路都被它压弯了，而别连卡却拚命想挡住它——象头公牛似的冲着它跑去，想用自己被砸碎了的角去撞它……老太婆，汤很好喝，我最爱喝这种野薄荷汤。”

“明天拖拉机开往哪里？”玛努什卡大娘问。

“将平整斯雷登这边的地。”

“那我们的呢？”

“也会耕的，将彻底铲除那条很宽的地界，推倒梨树。拖拉机力大无比，你可千万别跟这种熊斗。我打算用梨树做雪橇，你不是知道那根伸向地里的树枝吗，我要用它做雪橇角。”

玛努什卡大娘勉强地喝了一口汤，她的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手中的汤匙啪的一声掉在地上，一个劲儿凝视着门外。小果园发出柔和的沙沙声，这不是雨点的响声——凉风使劲吹拂着熟透了的麦穗和梨树叶，梨树长在斯雷登那条地界上，在风中颤动和歌唱，而她的孩子小索科尔睡在摇篮里，伸着一双小手，在梦中微笑着。他的摇篮过去就吊在斯托伊尔打算做雪橇的那根树枝上。这块地为他生产最好的粮食，怎么能不使他感到亲切呢？这块地在他一生中为他唱出了最甜蜜的歌儿，怎么能不使他感到心疼呢？他是个硬汉子。当索科尔和佩特列什科夫兄弟仨牺牲在巴尔干山时，斯托伊尔大爷紧咬着牙，未曾掉一滴眼泪……

“你为什么不吃呀？”老头子转向她。

“我心里难受，吃不下去。”

老头子闷闷不乐，吃完了一盘菜，便把三脚凳移至火炉旁，坐了下来，凝视着火苗。“老伴是为那块丰产地发愁，这也难怪她……”玛努什卡大娘收拾完餐桌后，来到他跟前，用眼睛琢磨他在想什么，但没有猜透他的心思，于是便开始翻动烧得通红的炭。

“斯托伊尔，我没有说不让你把地交出去。既然你拿定了主意，那就交出去吧。你更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只有一件事使我难受，记不记得你和我在斯雷登那块地上堆起来的庄稼垛？谁见了都会说：‘这是斯托伊尔的，只有他能有这样的好庄稼，捆得这么好。’人们见了我们养的牛都说：‘象天牛一样，只有他会喂养这样的牲口。’你的庄稼垛堆得最高。当我采摘最美丽的花朵，捆成花束，把它放在庄稼垛前时，我是多么高兴啊！可是从今以后什么也不能说这是你的了。”

“你可要坚强啊！”

“娘儿们议论纷纷，我不知道她们说得对不对。她们说往后村里只建造一个炉灶，大家同饮一锅水；说你们要拆掉各家的房屋，全村只建一排大房子。”

“胡说！玛努什卡，你记不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从科利奥·别连卡手里买的那块地？”

“怎么会不记得呢？当时正涨大水，连屋顶都被淹了。正是那时我的兄弟分了家，给了我七十三块金币，我用围裙包着带回家，而你把这些钱都给了别连卡。”

“别对我提起这些钱啦，都掉进了他的无底洞。”斯托伊尔大爷叹了口气。

“当时我们的儿子才两岁，我总是把他的摇篮吊在那棵老梨树上。它摇曳着催他入睡，用树荫遮着他，并为他防雨。啊，我多么想跟我那黑眼睛的孩子亲切地交谈啊！他刚长大成人——就成了全村的领路人。亲爱的索科尔，我没有白白

养他！我为他而感到高兴……”

“行啦！”父亲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别说啦！眼泪并不能救活他。睡觉去吧！”

午夜的漆黑笼罩着房间。

“你怎么老是翻来翻去？为什么不睡呀？”

“那你呢——整晚哼个不停。”

“没有什么，我心里有事。鸡叫过第二遍了，我得去喂牲口。”

斯托伊尔大爷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门外。细雨继续飘落在树叶、黑糊糊的干草堆和屋顶上。狗见了他，在黑暗中乱蹦乱跳，开始闻他的双手。当他回到屋里时，被家务和心事弄得疲惫不堪的妻子正打着呼噜。黎明时，老头儿打了一会儿瞌睡，做了一个这样的梦：他站在斯雷登那块水浇地上，面对一辆大机器，它闪耀着火红的眼睛，噗噗地喷气，土地在它的轮子底下颤动着。机器以雷鸣般的声音喊道：

“你是谁？为什么呆呆地站在我前面，不让我把这蛇蝎出没、荆棘丛生的地界铲除掉？”

“我是这块地的主人，地界是我的，这块泥质土地还是我父亲留下来的呢。调转头去，远远地走开吧！我不会交出土地！”

“让开！否则我就要从你身上压过去。”

“你？”斯托伊尔大爷浑身颤抖着。

这时，有人附在他耳旁低声说：

“斯托伊尔，你还等个什么劲儿？难道怕这个哒哒响的玩

艺儿不成？”

斯托伊尔大爷转身一看，原来是科利奥·别连卡。

“拿着！”别连卡递给他一根枝节多的拐杖。“马上动手干吧，拆掉零件！砸碎这个哒哒响的玩艺儿，把它砸个稀巴烂，叫它变成碎片，把它的螺丝扔掉！”

斯托伊尔大爷接过拐杖，朝闪耀着火红眼睛的机器冲去。

“滚回去！”他大喊一声，挥起了拐杖。但在他将要打下去时，忽然间他已故的儿子索科尔出现在他面前，瞪着愤怒的眼睛。

“爸爸，你要干什么？”索科尔大声问。“你能阻挡住前进的车轮吗？”

斯托伊尔大爷放下手，朝前一看，发现索科尔坐在方向盘边，还是从前那副样子，头发蓬松，敞开衬衣。他紧握方向盘，刚刚刹住那部铁机器。而他后面——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千百万人。

“索科尔，”老头儿激动地说，将拐杖扔在地上。“是你在开这部机器吗？”

“是我，爸爸，给我让开路吧！”

“给你让路，孩子，我怎么会不给你让路呢……”

当他让开时，泪如泉涌，全身颤抖着。

“斯托伊尔，你为什么哭呀？”玛努什卡大娘俯在他身上，抚摩着他的前额。

斯托伊尔大爷哆嗦了一下，醒过来后说：

"没有什么，刚才梦见了我们的儿子……啊，玛努什卡，从鲍伊克山到卡门谷的整片土地，今后将命名为索科尔的庄稼地，我们儿子的战友们做了这样的决定，给那片地这样命名了。从石头缝里涌出来的那股冰冷的泉水，你不是知道吗，将变成两个喷泉，喷泉之间将竖立我们孩子的头像，还是铜铸的呢，我们儿子的战友们已经这样决定了。而现在我得去干活，已经晚了。"

斯托伊尔大爷打开门，雨已经停了，太阳正冉冉升起。

（樊　石译）

伊·沃伦

维绍向前看

〔**作者简介**〕 伊利亚·沃伦(1905—1982)生于洛维奇州厄格伦村，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担任过《九月》杂志副主编等职务。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祖人》、《两个世界之间》、《战时的农村》，中篇小说《约夫》，剧本《黑暗的时代》、《向着新的地平线》等。曾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我不会虚构，所以我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周围的村庄都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兹拉托谢尔村尚无动静。

“包围着我们的乌云真厉害哟，”一些农民说，“但愿它绕过我们!”

可是，一个秋天的晚上，召开了党员大会，决定在兹拉托谢尔村也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维绍听说了这个决定后，万分高兴，逢人便说：

“这有什么？早就该在村里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难道我们大家都当尾巴吗？等别人都超过我们后，那我们就难堪了。别的村实现水利化，电气化，机器在地里歌唱，修建了水库……现在我们将征服自然，瞧着吧！”他讲完后，透过眼镜上方，瞟对方一眼。

维绍是农民党党员。欧洲战争①后，他成年了，感到浑身是劲，热心于农村工作。那时农民党执政，参加农民党是一种时髦——尤其是农村。使他喜欢的是农民党追究战争罪魁祸首的责任；没收财主的土地，并把它分给穷人。当时的村长潘科——一个年轻和精力旺盛的人——用劳动在河上修建了一座新石桥，为村里和山间的排水沟修了许多小桥，还修了街道，修了使人致富的路。村里和县里经常召开的各种会议，索非亚轰动一时的代表大会，都使维绍感兴趣——于是他成了农民党党员，当选为青年友好会主席。

小时候他酷爱学习，是优秀生。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把他推出了校门——巴尔干战争期间，他失学一年；欧洲战争爆发后，他又离开了学校，帮助母亲干活。此后晚上他出去闲逛，跟比他大的小伙子一起去参加村里晚间集会②，谈情说爱，一种更大的热情——爱情——控制了他，于是他告别了过去那种渴望学习的理想。但是，后来这种渴望又从他心间冒了出来，于是他开始从阅览室，从还在继续上学的

---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② 农村青年晚上聚在一起说笑娱乐。

同龄人那里寻找书籍，开始混在农村知识分子中间，模仿他们的穿戴和举止谈吐——有点不自然，所以引起农民讥笑。一个冬天，他娶了班卡——米托·帕尔查兰纳的独生女。第二年开春后快要耕种时，他们搬到了班卡的娘家住。帕尔查兰纳有不少地，但这是个落后的山村。老帕尔查兰纳性情孤僻，不论夏季还是冬季，总是呆在家里，或到空地里转转，只在过复活节时才去村里走走，这时他穿着节日盛装，去酒馆和跳霍罗舞的人们中间。正如人们常说的，他连鸟儿也不让飞过自己的庄稼地——朝别人的家畜扔斧头，为了一棵玉米或一条犁痕，他会拔出刀来。他白天黑夜在庄稼地里或围着羊圈转来转去，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不洗衣，不刮脸。他把田地、房屋和牲口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

当维绍来到帕尔查兰纳家后，看见房屋周围一大片这么好的庄稼地，心里非常高兴，于是便去阅览室阅读有关农业、畜牧业和养蜂等方面的书籍。首先，他用注有淡绿色商标的浅青色大铁犁代替了帕尔查兰纳用梨木做的犁，又用母牛代替了公牛，因为母牛驯服，而且也好养。然后他去国营农场，购买了各种精选的种子——小麦、玉米和大豆，进行培植，把收的种子再分给农民们。村里头一次种了豌豆、四季萝卜和谷子，人们觉得他可笑，感到奇怪，而后来他们也开始种起来。有一个时候，他忽然想出一个办法，索性把母牛也卖了，买了两匹马；不知又从哪儿弄来一头花母牛——身上有咖啡色斑和白斑——专门产奶。当一匹母马发情时，他把它赶到农场，跟良种公马进行交配。此后，他一心想买收割机，但人们劝他不

要买，因为没有那么多地，他这才违心地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当然罗，这一切在这个家庭里不是轻易能通过的，话都说尽了——说服呀，争吵呀，生气呀，例如他买马和大车时，家里就发生了这种争吵，以致好几晚上他不得不回到父母那里去睡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绍站在俄国人一边；时而问问这，时而问问那："我们的人推进到了什么地方？"而"九月九日"①后，他听说到处成立了合作社。有一回，他碰见了党委书记佩尔万·希波昌斯基，便拦住他，瞪着眼问："喂，我们这里不组织合作社吗？""稍微再等一等。"佩尔万回答说，把目光转向远方。"我们用不着去敲打枝叶，梨子熟了自然会掉下来的。""马上就让拖拉机在……整个平原上……"维绍的眼睛里闪着光芒，他非常激动，话都说不成句。而现在，当党组织已决定成立合作社时，维绍跑遍全村——哪儿都能见到他，到处讲这个消息，劝说农民入社。

"土地应当属于种地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好？"他激动地说。"为什么你播种，而斯拉沃夫斯基收割？何苦呢？为什么非要象蛋壳里的小鸟那样缩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呢？砸碎蛋壳，飞向高空吧！全部土地都是你的，你能种多少，就种多少，需要多少粮食就有多少粮食。人的力量就在于他的劳动。你再不会用手指刨地了，而是坐在小椅子上，一按操纵杆，拖拉机就会哒哒朝前跑，把拱嘴深深插进土里，直至

---

① 1944年9月9日，保加利亚人民推翻了法西斯政权。

碰到硬土为止，然后把土翻过来。而夏季，康拜因将会在金黄色的田野上穿来穿去，把黄金装进蓝围裙里。我是这样理解合作化的！……农艺师手里拿着笔记本，站在你身旁，说：'现在该开始播种了，大叔！……这里种……这块地应这样翻……而国家随时都面向你，会问你：'需要什么？要机器吗？给你派！要人吗？给你找！'我是这样理解合作化的！……我就是这样理解生活的！……"

夏末开始的旱灾延续到秋天。天空高悬着，一片湛蓝，没有一丝云彩；太阳象夏天那样火红，从早到晚晒得人难受；河里只剩下一线流水，有的地方已经断流；土地被太阳晒得烫人变成灰色，龟裂了——仿佛张开口等待雨水似的；村庄周围的高地上耸立着干得发红的树木，院子里的果树也枯焦了。

宣传组挨家挨户动员入社，但他们中谁也没有跨进过帕尔查兰纳家的院子。据说自从农民开始登记入社后，帕尔查兰纳家经常吵架，维绍消失了——不再露面。"他们家闹得厉害呢，白天黑夜吵架！"邻居们在村里散布说。

维绍刚开口说要入社，班卡——一个瘦高而又难看的女人——就冲着他跳了起来，仿佛在等待这个时刻到来似的。

"入社！……就是砍下我的脑袋，我也不入！入社，你瞧瞧那个二流子！入社！！"她的目光象一道道白色的闪电，直逼维绍。

"唉，不要这样……"他透过眼镜上方，瞟了她一眼。

"什么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她急不可耐地打断他。"你

看看她吧！”她指着女儿说。“她已到了结婚年龄，眼看就可以用这些好地给她找个好小伙子，可是……合作社！问她吧，问她吧，看她愿意不愿意！她会同意吗？”班卡用被某种希望所活跃起来的眼睛指着自己的女儿。

他们的女儿——象母亲一样腿长难看——用手掌捂住脸，跑到外面去了。她父亲弯腰坐在小床上，双手夹在两膝之间，这时朝她转过头去，一直望着她。

“我儿子累死了，现在你又想让我女儿失掉土地！”班卡继续用眼睛瞅着他。

“关于孩子……关于儿子不准……不会再……”维绍急了，用火一样的目光盯着妻子。

“什么不会？……你不会！”班卡的嘴角边流露出凶狠的冷笑，同时察颜观色，看自己的话是否刺痛了他，并继续给他以新的致命打击。“你，你把他累死了！是你！……你那套教育方法害死了他！我们大家都求你：‘孩子体弱，还不到上中学的年龄。’‘不，我要使他成为学者！’脑膜炎传染了他，于是就死了……而现在你又盯住我女儿不放……我就是不交出地！我的力量就在于我的地！”

维绍两手颤抖地一根接一根划着火柴点烟。然后他猛地站起来，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到外面去了。

突然间，帕尔查兰纳也从山上茅舍里下来了。不久以前，当他的老伴还在世时，他们把面粉和家具都放在那里，所有的家畜——羊、牛、猪、鸡都饲养在那里。整个夏天，一群黄小鸡在茅舍前的草地上吱吱叫。白天，老伴孤单单的

身影不时在屋前晃几下，整天可以听见帕尔查兰纳的喊叫声和树林的沙沙声，沐浴在阳光之中的山坳响起了回声，仿佛他在跟山丘交谈似的。偶尔从灌木丛中跑出一头牲口来，平静的周围动听地响着羊铃声，毛茸茸的牧羊狗一见陌生人和陌生的牲畜，远远地就狂吠起来。但是自从老伴死后，只有羊群在茅舍里跟老帕尔查兰纳为伴。现在，既然班卡由于跟维绍吵架而叫他，于是他关好羊圈，火速赶到村里。

帕尔查兰纳是个身材高大而又结实的老人。他的脸由于风吹日晒布满斑斑点点，很久未刮胡子。凶狠而不平静的眼睛透过如同灌木似的睫毛闪着光芒，帽子一直罩着额头，腰间系着一条配有铜扣环的宽皮带，从踝骨到膝盖打着一层裹腿布。红而光滑的石枣木拐杖，假如不在他那长而结实的手里的话，那也准在他身边。他全身都散发出草药和羊粪味儿，仿佛随身带来了自己的地似的。

当他们在家里为入社而争吵时，他说：

"要我交出土地和牲畜，可是我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我还有什么奔头？我不要红色护身符！"帕尔查兰纳大声说，连架子上的锅都被震得叮噹响，就象有人在推架子一样。"你说用这种……用机器耕地更轻松，更方便，按什么……科学种地，加上随身带着笔记本的农艺师帮忙，会产更多粮食，那好。可是就不能……不！"他威胁地大声说。"我就是不交出土地！土地一大片，牲畜满圈，你还要去当希波昌斯基的雇农，还要去当村里的牧人！我就是不交出土地！"

"为什么是当雇农，为什么是当牧人？"他试着反驳他。

“还会象在私人的地里一样干活，只是更轻松，收入更多就是了。”

“就是当雇农嘛！‘今天你去那里收割！’‘那块高地上种这种农作物！’我干吗要让别人指手划脚？”帕尔查兰纳用骨节粗大的手指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没有必要考虑！”

“你为什么不考虑呀？”维绍心事重重地说。“你应当考虑，大家都在考虑啊。一人出主意固然不错，大家出主意就更好了。何况佩尔万·希波昌斯基只是执行会上的决定，他也跟我们一样是农民。我是这样想的……你已经老了，青年人干活，我们干活，而你休息就行了。”

“我休息，可是谁来养我？斯拉沃夫斯基告诉我，说戈里切沃村有一个象我这样的老头，儿媳妇不让他吃饭，说什么不劳动者不得食，于是老头上吊了……我就是不交出地！！我有地，大家就会尊敬我。谁有地，让他带着地入社吧！我不交出自己的地，我不入社！！”

这样，维绍自己便带着父亲留下来的和结婚时帕尔查兰纳送给他的那几块小地入了社。

组织了生产队，社员们拿着丁字镐、斧子和鹤嘴锄，清除了蛇蝎出没和引起村民结仇的地界。拖拉机队来耕地了，维绍常常围着拖拉机转来转去，用手摸摸，对它很感兴趣，不时跟拖拉机手交谈。鉴于他对拖拉机很有兴趣，所以便委任他当拖拉机队队长，从此，他不分昼夜寸步不离拖拉机。机油呀，拖拉机手的生活呀，种子呀，擦洗机器外壳呀，耕地深浅呀等等，他时刻放在心上。他穿着浅蓝色棉布裤、已

经褪了色的粗呢上衣和满是洞眼的胶鞋，戴着一顶破鸭舌帽，脸晒黑了。无论是站着不动还是走路，他总是低着头，象在考虑什么事情。一会儿见他去村里拿什么东西，身影慢慢变小了，在远处变成一个小黑点，然后就消失在房子里；一会儿又见他在耕种的地里急急忙忙走来走去，从油桶到拖拉机，从拖拉机到种子袋，从耕种了的到尚未耕种的地——老是这样走来走去。有时他干完了活，感到累了，就躺在麻袋上，出神地望着拖拉机哒哒哒从他身旁驶过。九铧犁轻松而戏谑地翻着土地，在它面前土地裂开了，活动起来了，变得生机勃勃，九条土带就象九股奔流不息的水似的从铧里冒出来。拖拉机迅速开过去了，后面撒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尘土，仿佛向人们致敬，接着慢慢消失在广阔的田野上，消失在远方，已经不见了，只清晰地传来马达的哒哒声，犹如大地的心脏在欢快地跳动。维绍望着这无边无际的田野，望着长得没有尽头的垅沟，多么高兴啊！受到多么大的鼓舞啊！他的心随着拖拉机一起跳动，变得象大地一样宽了。也可听见发红的树林后面拖拉机的哒哒声，微风还送来了远在高地那边耕地的拖拉机轻柔的响声——时而高，时而低。在秋天蔚蓝色的高空下，一辆又一辆拖拉机在洒满阳光的田野上象歌唱似的发出哒哒声，多么动听啊！又是多么美好啊！仿佛大地在歌唱，仿佛辽阔的空间在歌唱一样。

大地被秋天温暖的阳光晒得很热，显得特别明亮。热气象轻呼吸似的从休闲地里冒了出来，明净的空间飘着朵朵残云，树林里庄严的红花活象从地心流出来的鲜血。

当维绍还只是登记入社时，他家里的人一直以为他是装装样子，希望他不会真的入社，所以他们有时不说话，有时吵几句。但是，当开始组织生产队时，当帕尔查兰纳家肥沃的土地也被划进生产队里，用牧场边贫瘠的土地跟他交换时，当维绍那一部分地——包括从父亲继承下来的和帕尔查兰纳给他的地——同时并入生产队时，帕尔查兰纳家的争吵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头几天，他们不等他回来就吃饭，不给他留饭菜；班卡洗衣时，不让他换衣服。而后来，当他回家晚了时，他们索性关上门，维绍怎么敲也不给开，他只好去草房或畜圈跟牲口一起睡觉。于是吵得愈来愈厉害，白天黑夜吵，在家里吵，当别人的面也吵。

社员们的牲口和农具开始集中使用。维绍登记了马，于是队里便去他家收牲口和马车，但怎么也找不到犁。他们把班卡叫到村公所，问她把犁放在哪里。当她发现维绍也在那里时，便气得全身发抖，大叫大嚷起来：

“是你把我叫到村公所来的，对吗？你这个坏蛋！……你这个坏蛋，我要揍死你！”她气得脸色发白，可怕地鼓起眼睛，举起拳头朝他扑去，人们几乎拦不住她。

翻遍院子后，最后在柴棚里找到了犁，但已经被弄断了。当人们把它拿走时，班卡伸开四肢躺在院子里，想堵住路，号啕大哭。傍晚，维绍回家时，见所有的东西都被扔在外面，他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他无论是从姐妹还是兄弟们身上都找不到同情——世界上唯有妈妈理解他，因为要理解一个人，就必须爱他，可是

他妈妈早已入土了。他现在孤零零的，从这儿弄来一张床，从那儿弄来炉子，稍微收拾一下，就安置在仓库的一间小房子里。仓库分两层，下面是畜圈，上面为仓库，是维绍修建的，归他所有。

播种结束后，维绍又着手为生产队修建畜圈。新畜圈修在河对岸，就是葡萄园那里。维绍喜欢那个地方——地势较高，正好在河的拐弯处，座落在南岸，朝着村里。下面树林之间美丽的峭壁鲜明地标出了弯弯曲曲的河道，从这里可以看见俄土战争期间村里二、三十户人家的妇女和儿童被土耳其人活活烧死的山洞，上面耸立着纪念碑；也可以看见通往戈里切沃的公路的路标，有一个晚上村里两名游击队联络员英勇牺牲在那里；还可以看见人们在自家院子里和村里的大路上来来往往的情景。他们忙着盖畜圈，从早干到晚——挖地基呀，砌墙呀，上梁呀，盖屋顶呀等等。天气不好时，他们就在室内敲敲打打——造牲口槽，平整地板，安窗，总是那样忙个不停。雪下得很晚，天气不算冷，他们就一直这样干活。

晚上回到家时，维绍又是和面，又是做饭，又是洗衣，又是缝补。他的面包总是烤裂了，有时从火里取出来时就变成了碎块。他做的饭菜不是咸就是淡，要不就是酸，或者味道不正——总是做不好。他的衬衣洗得不干不净，补丁露着针脚。当房间被炉子烤热后，梁上一只苍蝇苏醒过来了，开始在天花板下打转，以低沉和仿佛不好公开的嗡嗡声为这间房子带来了一丝生气。而在漫长的夜晚，维绍醒来时，听见

一群老鼠在天花板上跑来跑去，其中有一只特别勤劳，每天晚上在梁上咬什么东西，而另一只则无忧无虑，异常快活，整晚跳着舞，不停地吱吱叫。

农民们跟自己的土地和牲畜分开后，被刚刚成立的合作社里乱糟糟的景象弄得灰心失望，对前途感到渺茫，因此，他们不断提出抗议，羡慕那些为数不多、尚未入社的农民，拒绝上工。他们也不让维绍安宁，因为他热心于合作社的事。

“把他开除出合作社！”一些人恶狠狠地说。“这是怎么回事——他人在合作社，而土地却不入社，他妻子也不入社。我们了解这种人，一只脚踩在俄国人一边，另一只脚踩在美国人一边，他们是商量好了的。”

“他入社是为了当官要威风，不是为别的！你瞧他，一入社就抓住拖拉机不放！”另一个人说。

“我不想上工！”第三个人固执地说。“我也可以象维绍一样整天蹲在拖拉机旁。”

当他去参加合作社农艺师为青年们开办的农技训练班时，姑娘们的父母抗议说：

“他丢下自己的妻子不管，而跟一伙孩子搞在一起！我们的女儿跟他毫不相干！”

这样一来，维绍不再去训练班了。他跟农技师交上朋友，从那里借些书籍，晚间躺在床上阅读。

春天来临了，农民们开始耕地——社员们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劳动，单干户则在自己小块庄稼地里干活。帕尔查兰纳

把羊群赶到村里，卖掉一部分，剩下来的交羊倌放牧，而他套上牛，跟女儿和外甥女一道去种地。他离开茅舍后，完全衰老了，他女儿班卡变得更加瘦弱，衣服从她身上耷拉下来，就象挂在劈柴上似的。见到社员们、突击队员们和在大片土地上耕种的拖拉机后，他们内心深处不时被新事物所吸引，闪出某种火花，犹如远方的灯火一样，但这种火花很快就被许多世纪以来的强大的黑暗所吞没了。

合作社成立各种机构时，推选维绍当管委会委员、生产队长和拖拉机队队长，但都遭到他的拒绝。"普通社员，我就愿意当普通社员，跟大伙儿一起干活。"他回答说，并忧愁地沉思着。他表示愿意参加园艺组。"我爱在河边干活，"他解释说，"我只要一看见水往什么地方流动，内心就感到很愉快……"

园艺组开始整理菜园，栽种秧苗，浇水，锄草，施肥。

他们在村头河边的菜园里干活，男男女女象仙鹤似的排成一行，用小窄锄不声不响地松辣椒地，只听见锄头挖进土里的沙沙声，飘起了被砍断的青草苦涩而好闻的香味。

干了好一会儿活后，他们把锄头放在地边，慢慢朝河岸走去，在绿柳荫下休息。整个冬天，社员们无论走到哪里，总是谈论合作社，现在也是这样。

"我们掉进海底了，看看以后会怎么样吧！"一个长着黝黑长脸的人开口了。他站起身来，用手把坐过的土扒平。"据说戈里切沃的社员象神父一样——没有钱理发，今年春天跑到多瑙河一带去买粮食……好在还能从私人手里买到去年的

存粮。”

“用得着去看戈里切沃吗？”另一个人狂妄地说，神气十足，脖子上青筋鼓起老高。“我们这里是怎么回事，难道我看不见吗？还去说戈里切沃！冬天他们把喂养得好好的牲口都弄瘦了，现在连犁一条沟都没有办法！而他们刚刚调换职务，刚刚各就各位——还不满意！既然是党员，口口声声说合作社好，那就应当在这里，呆在最困难的地方，不要望着索非亚……孩子病了，我连一滴牛奶也没有。前天我想去磨点面粉，可是无法把麦子运到磨坊去，只好用肩扛，麻袋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差点儿被石头绊倒，我象狐狸一样自言自语说：‘你瞧吧，妻子，合作社！’……戈里切沃！我们急得要死，可……维绍，你是怎么想的？”他改变了口气，挑衅地转向维绍。“你不是总说‘好啊，好啊’吗！”

社员们笑了起来，都把脸转向维绍。

维绍低着头，从眼镜上方瞟了他们一眼，闷声不响地继续抽烟。

“不知道是哪个合作社，大概还是戈里切沃吧。”头一个人又说起来，“据说秋天他们的粮食都烂在地里，无人收割。干部们在饭馆里喝酒，社员们不乐意出工，因为一个劳动日挣不了几个钱。”

“为什么非出工不可呀？我们象鬼一样在太阳底下晒了一夏天，而年终结帐时，他们对你说：‘你这么多。’……我这么多，可你呢，你的仓库堆得满满的，你可以挑选最好的粮食，尽管整个夏天你躺在树荫底下。你向会计昆多夫要什

么，他就会给你什么，何况他的牛吃的都是粮食。假如一直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不要说象神父，简直要变成乞丐了。”

维绍扔掉了未抽完的香烟。

“说吧，说吧！”他微笑着说。“一切都会改变的，会整顿好的。将会发生很大变化，会出现奇迹！只要你们健在，会见到的，会高兴的！”

“让我们听听是怎么回事吧！”一个青年感兴趣地大声说。

“兄弟们，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事业，要彻底改变一切——使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你们刚把葡萄藤埋在土里，马上就要它流出葡萄酒来，要是可能的话，我也愿意呀，可是这办不到！你花上两三年功夫大量种植葡萄，到时候卷起你的破裤腿挤葡萄汁吧。让我们忍受一下目前的困难吧。兄弟们，重要的是国家愿不愿意让我们生活得更幸福？愿意！为什么剥夺财主们的土地和工厂？为什么又建造这么多工厂？为什么购买农机？如果有些事出了偏差，那会纠正的，今后还会出现偏差。我们也应当帮助国家，我们愈帮助它，美好的日子就会来得愈快；反之，我们愈拉后腿，好日子就来得愈慢。至于象昆多夫之类的人，兄弟们，你们不用担心，国家会管的，绞死他一两个，情况就会改变。”

“咳！在没有绞死这种人之前，情况是不会改变的！”有人狂怒地说。

“那么我们呢……假如我们中间有人不懂道理，继续阻挡的话，那么也会让他去阴间见斯拉沃夫斯基的。”

这时，河对岸公路上，青年突击队员们高唱歌曲，走过

去了——他们去除草。园艺组的人久久地、不声不响地望着他们。

“看见他们了吗？听见他们的歌声没有？”当青年们消失在山丘那边后，维绍打破了沉默。“他们会改变一切的。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中了不少毒，老是往后看。”

“维绍，”一个社员站了起来，同时把一朵红花放在鼻子边。“那里是怎么回事……现在你女儿，你家里的人怎么样……据说你未来的女婿弗拉奇克已经入了社。”

“既然她们愿意找他，那么他入社，她们也会同意的，还能怎么办呢。”维绍笑着说。

“维绍大叔，前天晚上你在合作社办公室说的桥是怎么回事？”那个青年又以宏亮的声音插了一句。

“什么桥，就是那座桥呗！……冬天，我们盖畜圈时，挖出了一尊塑像的手、古币和不知什么时候的碗片……特里方老师说这里古时候是一座城，城对面是一位将军镇守的城堡，有一座桥将城堡与城连起来。我们也应这么做，为什么我们不能超过古人呢？……在葡萄园建畜圈、办公室、作坊和饲养员宿舍；在下面低地上，即河旁的合作社磨坊边，盖上养猪场和家禽场；河上——两岸峭壁之间——修一座石拱桥，休闲地那边修建羊圈和养蜂场；羊圈后面，即拉奇科夫水库，修建鱼场。这样，河两岸的建筑物构成一个美丽的花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中间是一座绿茵环抱、景色壮观的拱形桥，傍晚青年们在桥上弹琴唱曲……过去曾有过这样的画面……象进了电影院一样。”

“你简直象拿破仑！十足的拿破仑！”园艺组里年纪最大的一个突然活跃起来，他留着薄薄的灰白胡子，低额头上布满皱纹，稀里胡涂当了三年炮兵，经历了三次战争。

一架客机在高空中呼啸而过，它每天在同一时间经过这个村庄的上空。

“哎呀，快瞧！”一个青年社员用手掌罩着眼睛，仰望天空，他已经站起来，准备干活。“真怪，象我的手指那么大，而里面有许多人……他们谈笑风生，朝下望着我们。人连飞上天都想出来了！……兄弟们，世界上什么奇迹不会出现呀？”

“你们还会看到更多的奇迹呢！”维绍亲切地看了那个青年一眼。“你们帮助拖拉机，它会给你们粮食。人们将会忘记怎样哭，而笑的时候，从他们嘴里会掉出白玫瑰花来……”接着，维绍沉浸在幻想之中，也摘下帽子，用手指理了理头发，已经出现一绺绺的银丝，就象开的花一样。

在五月的骄阳照射下，在蔚蓝的天空映衬下，河水象绸子似的柔和、清澈，闪耀着粼粼波光；波浪调皮地冲击着悬崖，掀起一道浪峰，在峭壁间发出令人愉快的巨响，并摆出一副淘气和好斗的姿态撞击着岩石，然后愠怒地往后退。高高耸立的岩石边缘上开放着鲜花，开放着紫丁香。再往前就是庄稼地，呈现出五月里绿茵茵的景象，大地洒满了春光，世界洒满了春光，仿佛整个大地是一朵朝天开放的大花。

（樊　石译）

格·卡拉斯拉沃夫

新　　路

〔**作者简介**〕 格奥尔基·卡拉斯拉沃夫（1904—1980）生于普罗夫迪夫州德伯尔村，先后在索非亚大学和布拉格卡尔洛夫大学学农。作过教员，主编过多种报刊，当过“伊·伐佐夫”人民剧院院长和作协主席。曾被选为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一生创作了大量小说、戏剧、游记等，其中以短篇小说集《在岗位上》，中篇小说《农村通讯员》、《探戈》和长篇小说《儿媳妇》、《普通人》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曾两次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烈焰当空，尘土飞扬——这是八月的一天。大地被毒热的太阳烤得发烫，薄薄的一层暑气在地平线上微微颤抖。恰好在这样一个日子，工程师达莫夫到了一个小乡镇。五十年前，他在这个镇上念完了初中。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过去每

每想到这个小镇，心里就不是滋味。

当时，勃拉特尼切沃这地方正在为四五个村庄的土地修水库，局里要他去出几天差。他虽然很不乐意，感到为难，但他到底还是答应了。他当年开过商行，而现在快要退休了，因此不便推脱。他无需向任何人表白自己的过去，而且也没有谁能理解他。勃拉特尼切沃是他的老家，他大学毕业前一直呆在这里，大家是认识他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最感到为难。

二十年前，在他父亲亡故后，他曾回村变卖他父亲留下的遗产。他父亲在垂暮之年胡里胡涂地冒险娶了一个老婆，挥霍了一些钱财，但剩下的财产仍不算少。老达莫夫的手里掌握了一些邻居和亲戚的欠账单，穷人们埋怨说，他们至少已加倍还了钱，因而要求继承人别再讨债。但是，达莫夫工程师根本没有理会，一算完账就把穷人们搜刮得分文不剩。他用这笔钱修了一座别墅，这座别墅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①以后被没收了。

进了小镇，达莫夫问了问本单位驻乡上的办事处，便心事重重、垂头丧气地寻找起来。不消说，他的故乡象整个保加利亚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会怎样对待他——当年的财主的继承人、稻田的出租者呢？

办事处占用了过去的水霸的一部分邸宅，里面那个饶舌的、长着浅黄色头发的年轻人，表情冷漠地向达莫夫抛出了一连串问题。工程师紧锁眉头，不想多吐一个字，回答得干

①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君主法西斯政权。

干巴巴，因为他一向不屑于同小职员交谈。他想刺一刺这个饶舌鬼，可又怕他是个重要人物。谁知道呢，说不定他当过游击队员或者政治犯。世界被颠倒了，不能根据职务或衣衫来评判一个人的影响和实力……

年轻人一面盘问，一面好奇地、嘲弄地打量着他。他瘦高的个子，衬衣领子笔挺，领带结得很象样，外衣是白色的，帽子是杏黄色的，手里还拄着一柄扣好的雨伞。饶舌鬼禁不住心里问道："此乃何人？"

还在根特①上大学时，达莫夫就把那些敞着领口，不穿外衣，不戴帽子的男人统统视为阿飞流氓。在四年大学生活中，在法兰德斯淫雨霏霏的天空下，他学会了出门带伞，而回国四十多年来，虽然国内下雨不多，他依旧改不了这个老习惯……许多人悄悄提醒过他，他却我行我素，把雨伞看作受过西洋教育的特殊标记。

饶舌的年轻人把客人打量了一番，说了声"对不起"，便去寻找能去水库的交通工具。隔了一会，他回来了，还在门口就一声长叹。

"活见鬼！"他愤然叫道，似乎在为工程师生气。"乡党委第一书记刚坐小车到勃拉特尼切沃去了。错过了机会。乡人委的'胜利'牌小车去了索非亚，而我们的卡车都在工地上运东西。"

年轻人唠叨了一通后，又照他在军营里养成的习惯，说

---

① 根特，比利时北部城市。

了声"对不起"，冲出去了。他隔了很久才回来，见达莫夫工程师急不可耐，满脸怒气。

"有一辆大车要去工地，坐不坐?"年轻人抱愧地问道。看来，他愿意侍候上级，这使客人感到高兴。"我们有一辆安了特置弹簧座的拖车，把它挂上，是很舒服的。"他解释说。

工程师想了想，只好同意。他不喜欢坐大车，可也不愿在小镇的旅店里留宿。勃拉特尼切沃的事情办得越快越好。

拖车确实很舒服，工程师稳稳当当地坐在上面，想起了过去的一大堆事情。是呀，在他起初念中学，后来又念大学时，每回放假回村，老人就用这种大车接送他。殊不知过了这么多年，情况大不一样了，他回故乡仍然同先前一样要坐马车。先前，生活是轻松愉快的，就象插上了幻想的翅膀……他如今又踏上了那条老路，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永生不忘的对青年时代的回忆。

"伊利亚大叔，路不好走，多留点神。"年轻人向车把式吩咐道，向他招了招手，祝他一路平安。

伊利亚大叔的脚上套着一双胶皮便鞋，身上穿了件衬衣，头上戴着顶皱巴巴的鸭舌帽。他把帽沿拉得很低，罩住了眉毛。他晃晃脑袋，表示什么都懂，然后轻轻一拉缰绳，马车便辘辘行驶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街上，一辆辆大车装满了西红柿、青椒、粮食、西瓜，一辆辆卡车喘着粗气，司机频繁地按着高音喇叭。达莫夫愁眉苦脸地把头一扭，甚至轻声骂了几句扑面而来的尘土。车把式熟练地驾着大马，时不时睥睨自己的乘客。他觉得，他在哪儿见过这个人，那说话的

声音蛮熟的。

“这街上车多，”伊利亚大叔同情地说，“乡里去工厂的车，去仓库的车，都打这儿路过……过不多久就该运棉花啦，到那时您看吧，挤得很哩……”

工程师好象没有听见。他似乎到了一个陌生的、奇怪的地方。小镇的这个部分从前是光秃秃的田野，田里布满了由于挖土烧砖而留下的一个个奇形怪状的深坑。在这儿念初中时，达莫夫同伙伴们捉过迷藏，玩过打仗。这儿曾经是真正的战场。孩子们躲在深坑里，藏在荆棘后面，冷不防袭击“敌人”，然后又撤退……不过，这座小镇如今不仅仅在这么一个地方扩展。达莫夫一下火车就看见，一座座房子伸展到四面八方。这些房子全是新的，既漂亮，又整洁。在小镇外河流经过的地方，即从前的牛市场后边，一座新村已拔地而起，它以坚固的建筑、突出的房檐、迷人的两层住宅而引人注目。

“这是我们的机器拖拉机站！”车把式洋洋得意地说。

在机器拖拉机站后面，公路的右侧，有一排大型蓄油池。这儿的土地吸足了机油，散发出汽油和柴油味。这儿当年离小镇有三公里远，由一条河流同小镇隔开，现在却矗立着一座座建筑物。工程师不知不觉过了一座崭新的大桥。过了桥，大车顺着一面斜坡朝左拐去，工程师好象猛地从梦中惊醒。

“等一等！等一等！”他高声叫道，迷路似地东张西望，“咱们这是上哪儿去？”

“去水库哩。”伊利亚大叔不慌不忙地回答，紧紧勒住缰

绳。大车停了下来。

“为什么……走这儿？”

“上公路去。”

“什么公路？通到哪儿？”

“这是一条新路，一直通到勃拉特尼切沃。”

“可为什么……不走那儿？”工程师往东边的公路指了指。

“想避开陡坡。”伊利亚大叔耐心地解释说。

“走老路吧……经过磨坊的老路。”达莫夫命令道。

车把式只犹豫了一秒钟，便抿着嘴唇，把缰绳一抖。大车拐了个弯，大马奔跑起来。马跑了一百米，身上冒汗，又放慢了速度。车把式挪了挪身子。

“你熟悉这儿的路？”他奇怪地问道。

“我是本地人。”工程师吞吞吐吐地说。伊利亚大叔一惊，象是被什么东西击了一下，扭过脖子来。

“啊！是吗？那你是哪家的？”

“我在这一带混过……常去下面的水田。”旅客支吾搪塞道，把手一挥，指着磨坊的水沟和河流之间的那片土地。这条河拐了个急弯，流到平川，在炎炎赤日下，象吸足了果汁似的懒洋洋地缓缓流去。“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啦，”工程师又说道，脸上微微现出缅怀往事的表情，“那还是在巴尔干战争以前……”

伊利亚大叔把帽子往后一抹，似乎捕捉到了工程师的思绪。

“哎呀！”他眯缝着眼睛，在脑子里探索着一个人的形象，

“你该不是……”他犹豫起来，脑子飞转，“你该不是……达莫夫家的吧？”他满有把握地对自己的旅客晃晃脑袋，一扬鞭子，说：“真是的！嗨！看你！俗话说，山与山不交往，人与人能见面！……我就想……到底猜中啦……那时候你留着胡子。”

工程师唯恐勾起对往事的回忆，于是蜷缩在车座上，暗自责怪自己嘴巴不紧。

“是呀，是呀，留着大胡子！”车把式象是有了什么重大的发现，微笑着，兴奋地自言自语。

“那时候兴留胡子。”工程师干巴巴地说。

“你当然不记得啦，”伊利亚大叔说，“我也在你家稻田里干过活。”

车把式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的过去，把他说过的话、见过的世面、经历的事情，一一和盘托出。旅客瞅着他那张好奇的、干燥的、布满皱纹的脸，发现这张脸神采飞扬，脸上的一双眼睛隐隐闪射出光芒。

道路的右边是稻田，而在左边的大地块上，一辆拖拉机正在耕地。拖拉机是冲着道路开过来的，它开得不紧不慢，稳稳当当。机身微微颤抖，象是一座移动的小房，使人感到力量和信心。车把式瞅了一眼拖拉机，把浓重的眉毛一扬，满有精神地晃晃脑袋，得意地用主人的口吻说：

“‘基罗维茨’牌的。正犁葡萄园。这是我们的土地。”

达莫夫咬着嘴唇，然后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

大车到了拖拉机跟前，一个年轻的女拖拉机手敏捷地从

拖拉机宽敞的驾驶室里跳了下来。她身穿褪色的工作服，扎着淡褐色的头巾。

“伊利亚大叔，要是你在下面看见塔纳绍罗娃·佩卡，叫她赶快来。”她天真地笑着，但看得出来，她有点生气——不是生车把式的气，而是生同伴的气。

“我们不到下面去，明卡。”车把式亲热地回答道，又遗憾地闭紧嘴唇。

“哈，你们准是去稻田。”姑娘象是自言自语。她灵巧地一转身，钻进驾驶室，把拖拉机开走了。

车把式望着耕过的高低不平的土地。

“大机器，了不起！”他说，“总也看不够。”

达莫夫工程师茫然若失地盯着拖拉机，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想说点什么，但又一时找不到话语。

“这姑娘……是谁？”他含含糊糊地问道，想摆脱窘境。

车把式诡谲地使劲挤了挤眼。

“看见她啦？”他笑容满面地说，“跟她奶奶长得一模一样。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你还记得她奶奶吧？肯定记得！克尔卡，克尔卡，磨坊主乔勃里亚的女儿！”他又挤了挤眼。“当年大家都围着磨坊主女儿转，其中也有你哩……当然啦，应该承认——也有我……晚上翻来复去睡不着觉，在磨坊边上的葡萄园里把裤子都挂破啦，就一心等着她回家，听她说话……”

车把式长叹了一口气，若有所思地晃晃脑袋。大马迈开

步子，马车在铺满尘土的道路上向前移动。

“同这姑娘一模一样！”工程师惊讶地想到，“真凑巧——正好在磨坊边上遇到她！”

许多年前，老达莫夫租了邻村的一片草场，建造了三四十狄卡尔① 稻田。有一年放暑假时，年轻的达莫夫从比利时回来，路过这儿，向水稻工吩咐什么，偶然看见了磨坊主、出租者的女儿。不知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工程师也想不明白，他怎么就被她的美貌、她的机灵劲、她的歌声给迷住了。当时，由于流水全被稻田占用了，磨坊闲了起来，但磨坊主一家在附近还有耕地，又养了两三头猪和许多鸡，仍有农活可干。年轻的达莫夫本来打算当晚就走，可他灵机一动，留了下来。尽管草房很不舒适，令人反感，他仍然在里面留宿，一心要看看磨坊主的女儿，同她见见面。水稻工们心里有数：他是为姑娘留下来的，因而悄悄地相互努嘴碰胳膊。而他，一个财主的儿子，从西欧回来的骄傲的大学生，虽然轻视普通老百姓，把跟他们说话看作一种侮辱，仍然不得不睡在草房里，同满腿黄泥的水稻工滚在一起！年轻的达莫夫找了一个借口，进了磨坊，还同姑娘开了几句玩笑。他以为，对一个乡下姑娘来说，这是莫大的荣耀。他等着姑娘扑到他手里。然而，姑娘却巧妙地反唇相讥，后来终于生气了，不再理他。这更使他心潮澎湃，抓住不放。于是，一个名叫斯坦乔的水稻工——善于溜须拍马的男人只好对他说，

① 狄卡尔，保加利亚面积单位，一狄卡尔合一亩半。

磨坊主的女儿已经有心上人啦。

“记得吗，那一年你留在草房里过夜时，我也正好在稻田干活。”车把式继续说道，“克尔卡爱上了我们当中最年轻的马林。你是记得的，这个人很壮实，沉默寡言……说起来，长得不算漂亮……”

车把式把左脚放在马车的踏板上，倚着靠背，津津有味地讲述马林和克尔卡之间的爱情。但是，工程师没有听进去，他陷入了对那些日子的回忆：当时，他一心一意要占有磨坊主漂亮的女儿。为了排除竞争者，他付给马林双倍的工资，要他去帕扎尔吉克①的稻田干活。马林坦然地走了。但是，第二天，克尔卡也不见了——回村去了。年轻的达莫夫在草房里那张怪不舒服的硬板床上被跳蚤咬，蚊子叮，心里酸溜溜的。由于夙愿未偿，他痛苦至极。他回勃拉特尼切沃不久，就动身到根特去了。

自那时以来，他经历过的许多事情，都已经淡忘了。有些事曾使他激动，但他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他爱过的一些女人，说是永志不忘的女人，也早就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只有他同这个带着野性的磨坊主女儿的几次既故意又偶然的晤面，才使他无法忘怀。只有她那可望而不可即、令人惊叹的形象，才在他干枯的、瘠薄的、冰冷的心灵上闪闪发光！……而现在……再过一会儿，他又要看见田野边上的磨坊的白房顶，看见磨坊前面的那棵橡树，看见笼罩着磨坊的柳树、蔷

① 帕扎尔吉克位于保加利亚中南部。

薇、铁线莲的浓密的枝叶，他的心中将涌出对青年时代、对昔日的美好时光的甜蜜回忆……

“她怎么样啦……那个姑娘？”工程师非心所愿地问道，旋即又为向一个普通农民袒露自己的感情感到窘迫和遗憾。

“克尔卡吗？”车把式满怀喜悦地笑着，脱口问道，“她嫁给了马林，俩人生了孩子……现在的乡党委第一书记就是他们的儿子……可你知道，她运气不好……”

“为什么？”工程师又好奇又同情地问道。

“她受了许多罪，守寡……那个马林，就是她男人，在索非亚教堂谋杀案发生后给抓起来了。那是在一九二五年。听人说，他参加了米丘·加内夫的游击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关进警察局啦。我们这一带有不少人就是这样死的……”车把式心情沉重地停了片刻。“看看今天的一切，我就明白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会死……法西斯统治时期，她的大儿子，哎，就是这个拖拉机手的爸爸，也遇难了……他这个游击队员从巴尔干山下来后，被子弹打死了……”

“可她……还活着吗？”

“克尔卡吗？活着哩，还活着……马林被抓走后，她等了他两年，到处找他，后来又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和女儿。她跟第二个丈夫生的那个儿子是个军官，不知是上校还是将军，据说现在在莫斯科学习……”车把式又跷起左腿，对走得懒洋洋的大马吆喝了一声，打四下里一张望，于是又想起什么，继续讲道：“克尔卡真受了不少苦，可到底活下来啦，过上了舒心日子。……她还跟从前一样……爱干净……

眼下在领导农业社的养鸡场……”

大车慢慢翻过一个高坡，到了一片不大的平地。平地上有棵树干粗壮的老橡树，一群羊正在橡树的阴影下啃草。达莫夫工程师从座位上站起来，凝视前方。他不住地眨着眼，象是在寻找和观望什么一去不复返的东西。是的，这就是从前人们套着牲口来磨面的地方。但是，磨坊已经毫无踪影。只是在被废弃的干涸的水沟对岸，还看得见沟底的石块。沟底差不多跟泥岸一般高。从田野的高处，在当年柳树成荫而如今已被辟为果园的地方，送来一股难闻的铁锈味。只有那条铁皮水槽，才使人想到这儿过去有一家磨坊。而在田野的低处，在村子那边，在骄阳照射的地方，是一片浓密的、沉甸甸地低下头来的水稻。

“我们前些年也想种水稻！”车把式高兴得象孩子一样，“这条小沟能灌溉两三百狄卡尔土地，我们真担心它干了。可现在呢，扬水站把一条河的水都抽上来啦……”

工程师毫无反应，他并不对此感到吃惊。他低着头，沉思默想，就象被强盗抢了一样沮丧。

橡树后面钻出个老人，他缠着灰色包脚布，套了双猪皮便鞋，身上穿了件薄坎肩，头上顶了块家织蓝毛巾。

“帕纽，你在放牲口吗？”车把式扬起鞭子向老头打招呼。

“是呀，”帕纽走过来，打量着旅客，“你们去稻田吧？”

“不，我们去勃拉特尼切沃水库。我送工程师同志去。”他朝拖车点了点头。

“还要兜风吗?”帕纽奇怪地问。

“兜啥风?”车把式恼怒了，“想找一条便道——一直去勃拉特尼切沃。”

“嗨，伊利亚，这哪能去勃拉特尼切沃!”帕纽惊讶地说，“你土生土长，居然不识路!”

“这不是老路吗?”车把式来了火。

“老路已经没有啦!”帕纽着急而又满有把握地说，“给犁掉啦。你看，那边是果园，再过去是棉田，嗨，一直到那条干线，就是葡萄园那地方。”

“糟糕，现在怎么办?”车把式咬着嘴唇，抱愧地瞅瞅旅客，“再没有别的岔道吗?”

“哪来岔道?”帕纽神气活现地一笑，“‘基罗维茨’把啥都犁掉啦——管你三七二十一——然后又开走啦。真是了不起——六十公分宽，六十五公分深……早先开葡萄园时，挖了整整三年，才刨了三公亩。可现在——一条犁沟就有一公里半。”帕纽走上前去瞅瞅工程师，“咱们活着见到了多少新鲜事啦!”

“那就只好返回去罗?”失望的车把式打断他的话，抬头望了望太阳。

“转去吧，转去吧，”帕纽有点幸灾乐祸地说，“只有走新路才能去水库……你怎么就不知道?”

“怎么说呢，我三年没有来过啦，”车把式一面辩解说，一面拨转马头。“哎，没有办法，工程师同志!还得走公路。”

达莫夫皱皱眉头，蜷缩在拖车的角落里。他心里又苦又

涩，脑子里象塞了一团乱麻。

大车往回走了。

“一路平安！”帕纽很有礼貌地挥着手，“下次可别忘啦。”

达莫夫工程师没有听见牧羊人的祝愿，也不明白车把式向他提出的问题。他软绵绵地瘫在车座上，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想听……只有“基罗维茨”刺耳的、单调的轰鸣，震耳欲聋地灌进他的耳朵……

（余志和译）

阿·纳科夫斯基

基罗和他兄弟伊凡的故事

〔**作者简介**〕 阿塔纳斯·纳科夫斯基(1925——)生于索非亚，毕业于索非亚经济学院。担任过《九月》杂志副主编、作家出版社总编辑等职务。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三天》、《春天》，长篇小说《玛丽娅反对皮拉尔科夫》、《漫长的街道》、《河岸》、《朝夕世界》等。

基罗是本市区最后一个私营企业者，修理电机设备，并出租自行车。他家来了客人，来者是他兄弟伊凡。那是一个早上，基罗刚喝完咖啡，吸着烟，而他妻子伦切站在房子中间，双手叉着腰，气势汹汹地威胁说：

“你说我做什么饭呀，要不干脆中午你别吃啦！你倒好，老是叫我操这份心！”

兄弟俩三年没有见面，他们紧握着手。基罗说：“瞧你长得

这么高了！”而伊凡愁眉不展地耸了耸肩。接着他们交谈起来：

“就是说，你来了……好，好……是来玩玩，还是常住下去？……可我们以为……伦切，给我大衣！就是说要常住下去罗……哈哈！……”基罗带着不怀好意、亲切得有点过分的微笑说，眯缝着眼，偷偷地察看自己的兄弟。

伊凡与其说长高了，不如说身体发育得很健壮。他肩膀很宽，一双手粗壮结实，脸晒得有点发黑，略显呆板，嘴唇厚实，眼睛显得聪明而又谨慎。

“好啦，走吧，来这里吃午饭，下午我们再好好谈谈。你知道佩绍有什么样的葡萄酒吗？”

他们并排站在一起，一点也不象是两兄弟。在粗壮、结实的伊凡面前，基罗显得非常瘦小，脸上布满皱纹，头已经谢顶，显得苍老。

基罗在门口朝伦切使了个眼色：“准备午饭，明白吗？”伦切点了点头，一对耳环叮GH作响。

当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时，她便悄悄地走到窗前。兄弟俩默默地走过院子，到了街上，然后就分手了。基罗走进修理店，伊凡则急急忙忙去什么地方。伦切又稍微等了一会儿，接着走到伊凡的大木箱旁，用带着手镯而又肥胖的手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它。箱子一半是空的——几件干净衬衣和一些书。“哎！”伦切摇了摇头，耳环又叮GH作响。“就会叫我生气！”

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希望找到什么，但这个人费了三年功夫，在多布鲁查一带寻找石油，而且很骄傲，总是沉默不

语，皱着眉头看人，显然他应当有一些稀奇的东西。当伦切了解到伊凡既没有发财，也没有给她带来什么礼品时，她马上想起了三年前他是怎样离开自己的哥哥的。当时，基罗教会了他手艺。伊凡本应至少再给哥哥干几个月活，以表感激之情，可他不仅抛弃了他，而且还找他要路费。这已是往事，但伦切不能不想起它——她是个公平的女人。过去的委屈使她内心充满了迟来的愤怒。“我给他做饭！”她想。“呸！科尼奥维查家的伦切可不是这种人，不做任何人的奴仆！我父亲有一百辆运输马车！”

她在家里气得呼呼的，使劲撞门，骂个不停。然而习惯战胜了她——一小时后，她点燃了炉子，放上了锅。

当兄弟俩坐到餐桌旁时，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不管怎么说，伦切还是操劳了一番——有肉菜、凉菜和从佩绍那里买来的葡萄酒。

“坐吧，弟弟，重新尝尝家常饭！”基罗一边说，一边头一个坐下了，正好坐在墙边自己的照片底下。

从照片来看，基罗是另外一个人——比较胖，头发梳得光光的，身着新装，露出小骗子那种心满意足的微笑和目光。

伊凡按照自己的习惯耸耸肩，默默地坐下了。伦切已经倒好了酒。

午餐就这样静静地开始了。基罗象大多数瘦弱的人那样贪婪地吃喝，他张开露出金牙的大嘴，迅速而灵活地把肉、面包和凉菜往嘴里塞，不停地倒酒。伊凡随随便便吃了一点，显然他的思想飞到别处去了。只有伦切不时说几句话。她抱

怨说，本来饭食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但各种原因妨碍了她。对她的话谁也没有注意。

当感到自己已经吃饱时，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基罗用手擦了擦嘴，把身子靠在椅背上，说：

"就是说，你们找来找去，最后终于找到了石油，是不是？"他喝干了杯子里的葡萄酒，一个响嗝将酒倒了出来。"就是说，你们已经成了石油行家罗！"

伊凡没有回答——吃了一片肉。

"就是说，"基罗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继续说，"你已经知道什么地方有石油，对吗？"

伊凡把叉子放在桌上，瞟了哥哥一眼。基罗长着长鼻子和一双耷拉着的耳朵，瘦小的脸上汗津津的，略带微笑，只是一对小眼睛露出凶相，这使伊凡心里难受。

"是呀。"伊凡回答说。

"那你应当知道家里有多少罐瓦斯罗！"基罗一边盯住弟弟的眼睛，一边严肃地问。"知道吗？"他再也忍不住了，笑得前仰后合。

伦切也跟着笑了起来，尽管她不明白究竟什么事可笑。伊凡默默地等待他们平静下来。他喝酒喝得全身发热，于是便脱掉外衣，只穿一件衬衫，并卷起袖子，解开领扣。他那肌肉发达的手和脖子黑黝黝的——在旧的黑色褪掉之前，紫外线又在他的皮肤上打上了一层新的印记。衬衫前襟上有一大块缝得不怎么高明的补丁。

"你说，你说家里有多少罐瓦斯？……"基罗笑得咳嗽起

来，瞪起大眼睛直望着伊凡。“你知道，你知道个屁！……既然你知道，那为什么不留在那里？为什么不留在那里？要不就是你在那里干够了？”

“也可能我干够了。”

“瞧你这身打扮！啊呀，我的妈呀……”

“有什么办法，我们大家都不象你这么富！”伊凡讥讽地回答说。

“也许我不富，但我是老板！有肉吃，有酒喝，人们见了我都脱帽……而你呢？我欢迎你，亲爱的弟弟，只是我已经不需要学徒工了，而且家里房子也很挤……”

“不错，是挤。”伊凡说。“所以我决定住集体宿舍。”

基罗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这对我的学习有利。”

“啊！”基罗张开了嘴，但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你干什么工作呢？”最后他问。

“什么也不干，就学习。”

“谁都知道学习，可是这里要吃东西呀！”他指着嘴说。

“国家会养我的，国家派我来学习，会养我！”伊凡平静地解释说。

“哦！……”

基罗紧张地思考着，他的大鼻子变长了。伊凡觉得他会马上弯下腰去，象啄木鸟那样猛击桌子。基罗双唇紧闭，然后一挥手，说：

“国家会养你！……没有的事！国家只会要，从来就不

给！”

他拿起酒瓶，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杯酒。伦切不赞成地摇摇头。

“你喝得太多了！”

“用不着你管！”基罗瞪了她一眼，非但没有平静下来，瞬息间他的怒火反而更大了。基罗忍受不了伊凡的沉静态度和他对某种事物不可动摇的信念，而这种事物他基罗既不了解，也看不见。伊凡仿佛是故意让他更加生气似的，懒洋洋地搔了搔耳朵，遗憾地望着门口。

“别急，别急！”基罗暗暗想道，突然间他以某种令人极不愉快的固执态度自吹自擂起来，说自己赚了很多钱，每天都有上百个孩子来租自行车，来得太多了，以致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伊凡又搔另一只耳朵。

“这不是说大话，象答应养你的国家那样骗你，你根本就不能相信！……我还有许多新工具，你连见也没有见过哩！”

伊凡无精打采地打了个呵欠，用手掌擦了擦前额和脖子。

“我走了一整夜。”他表示歉意地微笑说。

基罗咬着嘴唇，沉默了好长时间，突然来劲了，说：

“我打算最近再买一辆摩托车！”

他狡猾地眯起眼睛，敏锐地注视着伊凡的脸。可那张脸仍然那样平静，略微带点倦意——这条新闻既不使他感到惊奇，也不使他感兴趣。

伦切的耳环又响了一下：

“我们就缺少这样东西！”

基罗严厉地瞪了她一眼，大声说：

“男人说话时，女人就得闭嘴！明白了吗？我要买摩托车，明天就买！”

伦切生气地站起来，开始收拾餐桌。

“就这样！”基罗又说，“我要买摩托车！如果我乐意，也可以买两辆。”

他象根拉紧了的弹簧那样，觉得自己了不得，等待伊凡开口，看他是表示不相信呢，还是挖苦一番……但伊凡又打了一个呵欠，接着站起身来……

谈完话后，基罗怒气冲冲地去干活了。刚吃过午饭，孩子们没有来租自行车，于是他便把车推到外面——共五辆，都擦得象新的一样，一辆接一辆地摆在墙边，然后他回到屋里，坐在对着门口的柜台旁。从他的位置放眼望去，街上的一切尽收眼底。那里是新开设的加油站，正面装着玻璃，圆柱清晰可见。站的两边，卡车、汽车、摩托车摆成长蛇阵，等候加油，人声嘈杂而又热闹。司机们不停地挪动地方，相互争吵，叫喊……而有一个时候，也曾有卡车和小汽车停在他的修理店前，可那时他也不是基罗，而是基罗先生，带着金表，不仅仅修理煤气炉和电炉。

突然间，他从柜台边站起来，转过椅子，背朝门口坐着。那里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还望着那个可恶的加油站干什么！但当他不再瞧加油站时，脑子里又想起了伊凡，他的

脸一下子变得通红，脖子和前额上青筋鼓起老高。"他还来教训我，这种人我不知道见过多少！"

基罗想起他们的谈话，气得心脏突突直跳。要知道他是在自己家里受到嘲笑和欺负啊！一个乳臭小儿，一个无用的笨家伙！……不过，他要给他讲个明白，要教训教训他……基罗握紧拳头，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开始在修理店里踱步，无论碰上什么就一脚踢去，嘴里不停地咒骂当权者、亲人、加油站和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包括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怎么样？我就是要买摩托车，你们去说好啦！坏蛋！恶棍！"

吃晚饭时，他一言不发，不时看看兄弟一眼，脑子里还在想摩托车。他暗暗想道：一定要买，要使这个目空一切的畜牲感到望尘莫及，要让他明白他是蠢货，石油和学习都是蠢事。他基罗也许只会剩下一个可怜的修理店，但他的运气还没有完。

第二天早上，买摩托车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基罗早就发现人们愈来愈令人难以忍受地鄙视他，可是今天早上，当他去商亭买烟时，售货员装出一副既没有看见他，也不认识他的样子，一个劲儿头也不抬地往盒子里装安全针。他骂了一句，在报纸上猛击一拳。往回走时，他又碰上了加油站的出纳员。他见过不少高傲自大的人，但这个人比别人更傲气，而且恰恰是经过他身旁时，开始傲慢起来。基罗无法忍受，便转过身去，极其厌恶地吐了一口唾沫。

那是个不可多得的美丽的早晨，是一个地面布满金黄色的树叶，空中霞光万丈，旭日开始东升的秋天的早晨。但是，

对基罗来说，它是个充满愤怒和忧虑的早晨，他对任何美丽的景色视而不见，所见到的只是人们眼神里流露出来的讥笑，甚至连他妻子伦切也反对他。唯有买摩托车这一念头给他以鼓舞，使他觉得有指望，比别人高明。

中午，伊凡说要去集体宿舍，提起自己的行李箱。基罗假惺惺地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摇摇头说：

“既然这样更方便，那就去吧！”他假心假意地请他明天再来跟他们一起吃午饭。

接着，他瞒着妻子，拿走了存折，里面差不多有购买一辆摩托车的钱，也许还能余下七八百列弗①。然后他出去了。他在橱窗前转了整整一下午，对各种型号的摩托车进行比较，跟无事闲逛的人争论摩托车的质量，拿不定主意买哪一种：ЯВА牌还是АВО牌……也不知道挑选哪种颜色的好：红、蓝、绿、黑……总之，他度过了一个极其紧张的下午，内心充满新的极不平常的感受，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恢复了内在的平衡。

第二天一大早，他去储蓄所排队等候。当时那里人不少，但没有一个人取这么大的数目——基罗满意地发现了这一点。然后，他迫不及待地朝商店走去，一路上他有意无意地不时摸摸自己的口袋，大概是想检查一下钱是否还在里面。

一路上他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人——普通公民和军人，青

① 列弗，保加利亚货币单位。

年和老年人，带帽的和不带帽的，骑摩托车的和不骑摩托车的，然而现在他对他们的傲慢态度已经漠不关心了，只在过一个十字路口时生了气。那儿站着一个留小胡子的矮个子民警，指挥来往的车辆。民警那乡下佬似的布满皱纹的脸立即就使他起了反感。基罗站在人行道上，等待民警转向他。可是，民警继续值勤，朝违反交通规则的公民吹哨子，将指挥棒转来转去，忽而指向左，忽而指向右。"等我走了以后，你再来注意我吧!"基罗愈来愈生气。民警的出现直接玷污了他那隆重而不复再来的时刻。

挑选摩托车，再一次跟无事闲逛的人争论，付款，找运货车，装车——这一切，基罗都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他非常激动，犹如在云雾中一般，不仅看不见周围的人，而且他的思想也很不集中，杂乱无章。

然后，他故意让运货车经过那个站着满脸皱纹的民警的十字路口，可民警这一次也没有注意他。运货车经过买烟的商亭时也是这样，售货员在打瞌睡，根本不注意街上发生的事情。只有一群小孩从拐角处就跟着车跑起来，忽而跑到车前，忽而跑到车后，吵吵嚷嚷。基罗一动不动地坐在马车夫身旁，骄傲地昂着头，全身包括磨得发亮的衣服，光秃秃的头顶，长长的鼻子和耷拉着的耳朵，都流露出一种极其傲慢的神情。随着孩子们的叫喊声，不时有些好奇的人从院子里出来瞧瞧，但谁也没有跟着车跑，更没有人问基罗从哪买来的摩托车和花了多少钱。

孩子们好奇心强，一直跟着基罗和摩托车到了修理店。基

罗给车夫付了钱，于是车夫走了，而孩子们仍然不散，甚至有些比较机灵和胆子大的孩子走进修理店里，想用手摸摸摩托车。基罗气势汹汹地撵他们走，这可把孩子们激怒了，他们站在不远的地方，齐声喊道：

“基罗真能耐，基罗真能耐……”

基罗气得发狂了，一面咒骂，一面用石块赶他们。可他们只是退到了安全距离里，重又喊起来，并且还伸舌头，作鬼脸。

“基罗真能耐，基罗真能耐……”

这时，他关上了店门，并从里面闩住了。房子里黑洞洞的，基罗点上了灯，可怜的黄色光芒照耀着这间更加可怜的修理店：墨黑的墙，脏柜台，久未扫过的土地面，一堆堆的废白铁、锈铁块、铁丝……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新买来的摩托车闪闪发光，周围的一切都跟它格格不入，并敬而远之，它仿佛是由于误会而陷进了这里似的。

基罗瞧着它，突然间觉得这辆摩托车一点也不使他感到高兴。他瞧着它，丝毫也不激动，他的心灵反而比以前更加空虚。

有人用拳头敲门，同时用尖嗓音喊道：

“基罗真能耐，基罗真能耐……”

基罗熄了灯，用手指堵住耳朵，沉重地倒在柜台上。孩子们又喊了一阵，但既然没有理睬他们，很快也就感到没有意思，于是各自走散了……

修理店一片寂静，只有闹钟在黑暗中发出嘀嗒嘀嗒的响

声，这均匀的响声仿佛使空气浓缩了似的。基罗觉得自己被压住了，将被埋葬……突然间，他跳起来。后门开了，透进一线灿烂的阳光……

伦切看见了摩托车，但一下子还没有想到基罗果真把大话变成了现实。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存折里的钱花光了。由于愤怒，她脸色变得很难看，大声骂道：

“蠢驴！糊涂虫！畜牲！”

基罗慢慢地站起来，以呆板的目光莫名其妙地望着她。她继续高声喊叫：

“明天你光着屁股出去吧！真没有想到你会买摩托车！电车就压不死你吗？”

他沉重地抬起手来，狠狠地打了她一记耳光……伦切沉默了一瞬间，然后又喊叫起来……大门又敲响了，孩子们喊道：

“基罗真能耐，基罗真能耐……”

（樊　石译）

德·阿塞诺夫

贵　宾

〔**作者简介**〕 德拉戈米尔·阿塞诺夫(1926—1981)生于职员家庭，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法律系。曾担任《文学阵线报》副主编、《祖国语言》杂志主编、作协秘书长等职务。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严厉的教育》，中篇小说《我们排》，长篇小说《咖啡色地平线》，剧本《生日》、《周末漫游》、《可靠的后盾》等。曾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我们离开水库时，紫色的夜幕已笼罩着周围的群山，远方的山峰和悬崖峭壁变得象墨汁一样黑，状如尖笋，鲜明地刻在蓝色地平线上；而比较近一些的斜坡看上去象涂了一层黑漆似的，森林茂密，显得那样神奇。路的两旁耸立着整整齐齐的松树，这些树把我们头顶上那条布满繁星和光明的无限的天河与外界隔绝开来。从山峰上吹来一股凉风，周围的

树木沙沙作响——响声拖得很长而又显得忧愁，仿佛预示着暴风雨既将来临似的。

马车上除车夫外，我们三人坐在装干草的麻袋上。第一个人——又矮又瘦，没长胡子，一双小眼睛无精打采，穿着厚里子长皮大衣——刚找到合适的位置，就把头蒙在竖起的衣领里，开始打盹。另一个人比较有意思，他高个子，宽肩膀，象一座山，已年过五十，尽管他的浓胡子里没有一根白丝。他折腾了好一阵子，尤其注意一个四四方方、仔细包好的小包，最后把它放在两只靴子之间。接着，他从上到下扣好粗呢大衣，把帽子拉到耳根。他是个心肠好而又爱说话的人，转向我说：

“去哪里呀？”

“进城！”我回答说，感到很高兴，因为途中可以用闲聊来驱散寂寞，而且我也喜欢这个山里人。

“就是说，我们同路罗！”他微笑着，脸部变得宽了些，成椭圆形。

“您也是进城吗？”

“进城，还要继续往前走……回农村去……”

我困惑莫解地抬起了眉毛：

“要离开水库？”

那个山里人大笑起来，嘴里露出了一颗大金牙。

“暂时是要离开这里……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八月份要品尝一下……哎呀，我心里真搁不住事……”

“现在是去休假吗？”

“你猜对了，休息四、五天……后天就是五一节，乡亲们都尊重我，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庆祝活动。你知道吗，推翻法西斯政权后，我是村里第一任村长，当了两年……打那以后，每逢‘五一’和‘九九’①，他们总是叫我回去……请我主持群众大会……称我为贵宾！而且我的家也在那里，入了合作社……一冬没有见到他们了。”

山里人动了动，从座位底下掏出一条小被子：

“拿去吧，裹在身上，这里很冷。到山里来只穿一件时髦短上衣哪成呢？这地方地势很高，一直要冷到七月……这是大山啊！”

我表示衷心感谢，便把被子裹在身上。看来我的同路人说得对，尽管离五月只有两天了，空气还是这么稠密和寒冷，从我们嘴里呼出来的象蒸汽，衣领上蒙上了一层银白色的霜。

“大山呀！”过了一会儿，他又重复了一遍。“现在倒没有什么……冬天你瞧吧——那真厉害，北风怒号，大雪纷飞，假如你敢出去，准会把你卷走。好厉害的暴风雪啊，好厉害的……”

“那你们呢？”我感兴趣地问。“你们怎么受得了呀？”

“我们是指谁？”

“就是你们这些住在水库附近的人呀……”

“我们？我们是些特殊的人，大部分是山里人……经过锻炼的小伙子……更奇怪的现象我们也见过……不过，老实对

① 即九月九日，保加利亚国庆节。

你说，头一个冬天，开始人很多，后来有些人逃走了……那些娇生惯养的人受不了，山威胁着他们……”山里人大笑起来，这次笑得更欢。他以调皮的语气说：“开始我也想打退堂鼓，家里催我收拾行李回去，家里多暖和呀……不过，我坚持下来了，人到了这个年纪，何必再落得人笑话！你知道吗，只要熬过一个冬天——往后就比较容易了……当兵时我就记住了这一点……”

“是这样！”我表示同意。“万事开头难。”

“真难啊！我多亏了打赌……是由于固执留下来的……为了一次玩笑而留下来的……”

“是由于固执吗？”

“就算是由于固执吧。你知道吗，我是个固执己见的人，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这个样。有个时候我祖父还由于固执而坐过牢呢。他跟村里一个财主吵架，那人朝他骂娘，我祖父要求对方赔礼道歉——老头子人穷，但有自尊心——财主拒绝了……我祖父说：‘我要象拧小鸡一样扭歪你的脑袋！’他真的扭起来，差点儿把那个人掐死了。穷人的自尊心一触即发。可是你瞧……从那时起，人们都称我们为‘吃小鸡的鹰’……如果你在水库问斯托扬·卡拉斯托扬诺夫在哪里，大家只会耸耸肩；可是，如果称我为‘吃小鸡的鹰’斯托扬，那么石头也会告诉你的……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名字。”

“你究竟打过什么赌呀？”

“会告诉你的，耐心一点吧！这件事有点可笑，但很有意思……当我们开始施工时，我在上面口子里工作。你去过水

库，肯定会知道上面的口子比下面正好高出五百米，在悬崖上……爬上去得花十五分钟，下来又得这么长时间……假如要去商亭买东西——面包或香烟，得浪费很多时间。这真叫人伤脑筋……你知道吗，我这空脑袋瓜里产生了一种想法……”

“是合理化建议吗？”

“谈不上合理化建议……我建议在上面口子上工作的青年人自己办个小卖部，与其下去买东西，不如大家一起筹集些钱，多买点商品，放在我们的工棚里，眼下我们的时间连几分钟都很宝贵啊！他们同意了……‘可是谁来管理呢？’我问。他们吃吃笑了起来：三百列弗算什么——不需要人管理，我们将会自觉地办好小卖部。不管怎么说，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不是出了这个主意吗——他们便选我当负责人。说干就干，每人收了五列弗，我背着麻袋，去买了一些必需品，带回工棚里。我把商品摆在箱子上，分别标明价格，便开始营业了……可以说销路很好。我不时观察应如何周转，有没有必要再添些东西。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有一天，我发现少了十七列弗，莫不是弄错了吧。我拿起笔，左算右算，还是少了十七列弗。咳，怎么会少呢？我才不会从自己口袋里掏冤枉钱哩。在头一次会上，我就发了言。同志们，我说，我建议撤销这个小卖部！这话如晴天霹雳似的使大家感到震惊。为什么？他们大声嚷嚷，小卖部好呀，帮了我们的大忙！也许是有好处，我回答说，也可能是帮了忙，不过自动售货部只能由自觉的人组成，不能跟手长的小偷搞在一起。干这种事你们还差得远呢，太不自觉了！

“天啊，我说完这番话后，大家简直闹翻了天……叫的叫，喊的喊，有的威胁，有的抡起拳头……尤其是兰格尔，他站了起来。你，他质问我，为什么败坏工人阶级的名誉？为什么侮辱我们？接着他一下子朝我扑过来……”吃小鸡的鹰斯托扬又大笑起来。“他就是这种人——好生气，喜欢吵架……可是我也不让他。我没有侮辱人，我气愤地对他说，我没有败坏任何人的名誉。我说的是真的：十七列弗不见了。如果有人大手大脚花钱，难道要我来赔吗？对不起，我可不干！

“对照表，兰格尔没有让步，你做了收支对照表没有？你的账算得准不准？你要什么对照表？我大声说，我们又不是什么大企业！三百列弗的小事情，而他要对照表，去他的！别人都支持兰格尔，就是说应该造对照表，不能取消小卖部！

“就这么着。散会后，我回到工棚，再次查了一遍帐，写呀，算呀，弄得汗流浃背。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兰格尔进来了。你好，他给我打招呼，而我没有理他，还在生他的气。

“斯托扬大叔，”他和颜悦色地说，“前几天你为钱吵吵嚷嚷，是白费劲！”

“对呀，是白费劲！”我摇了摇头。“会不会从你的钱包里跑出来……”

“而他——没有事儿，好象我没有说他的坏话一样。要是以前，他肯定会发火，会暴跳如雷的，而现在——没有事儿，这使我感到很奇怪。你来干什么？我问。我是来还债的，他

说。什么债？怎么还不明白，那十七列弗是我拿了。前天进城时，我从小卖部买了几盒烟，还拿了些水果糖……当时我没有钱付款，后来给忘了。

“我生气了。就是说，是你拿了罗！是我，他回答说，连眼睛也没有眨一下……可是为什么字条也不给我留一个呀？我问，我很急……他就是这么个人，你知道吗……”

吃小鸡的鹰斯托扬整了一下衣领，摸了摸两只靴子之间的小包，继续说：

“哎，我收下了他的钱。正当我给他找钱时，黑伊凡进来了，他是我们那里的一个小青年，是个好小伙子，为人谦虚——真象个大姑娘，而干起活来顶两个人。斯托扬大叔，黑小子问，小卖部有鞋刷吗？有，我说，七列弗一个。他拿了一个，付给我二十五列弗。找我一列弗吧，他说。为什么一列弗？为什么吗？因为刷子是七列弗，再加上少了的十七列弗，我忘了付那笔钱……前天，我从小卖部拿了两把梳子……

“我很吃惊，看看兰格尔，又看看黑小子，简直把我笑死了。我说，你们两个相互说好了吧……他们两人开始吵起来，争得面红耳赤，大声嚷嚷……工棚里挤满了人，大家也争吵起来。最后，我站在椅子上，大声说：

“假如每人出一列弗，就会凑很多钱——会补上损失！我知道你们都想挽救小卖部，可是这不是办法——我们中有手长的人，还会拿的。”

“大家又吵起来了。

“你往工人阶级脸上抹黑！”兰格尔又忍耐不住了。“你不相信人！”

“我相信！”我生气地说。“我相信！但是不相信你们，你们年纪还小，会把小卖部抢光的……会把它葬送掉……”

“我们不会葬送它！”

“肯定会失败，我敢打赌！”

兰格尔走到前面：

“我也敢打赌……假如失败，我就当众承认自己是蠢驴……假如支持下去了的话，我要求吃小鸡的鹰斯托扬大叔在会上当众承认自己阶级觉悟不高，自己刮掉自己的胡子……”

“我们就这样当着大家的面打了赌。后来就等着瞧——一个月，两个月……”

“那谁输了呢？”我忍不住打断了山里人的话，同时看了看——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漂亮的胡子。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输了……打那以后，一分钱也没有少过，有时甚至还多出几分钱……那个偷钱的人是害臊呢，害怕呢，还是良心变好了——这我说不清，也无法告诉你。不过小卖部已营业一年半，那头蠢驴觉悟了，大概觉悟了。至于胡子嘛，大伙儿原谅我，兰格尔原谅我……只是他们不了解吃小鸡的鹰从不食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刮掉了……”

“真的刮掉了？”

“刮掉了，彻底刮掉了，所以现在长得这么浓密，好象还要猛长……小卖部也扩大了，现在工棚里有两三千列弗的商品……青年们甚至跟我开玩笑。前天，兰格尔对我说：‘斯托扬大叔，九月九日前你不可能当资本家，而现在却变成了大商人，成了批发商！当心有朝一日我们会没收你的财产罗！’”

山里人放声大笑，用手摸摸胡子，愉快地继续说：

“不过，我也不会让你欠债的，我回答说。当我为党工作时，你还在叫妈妈给你擦鼻涕呢！我这样对他说。”

斯托扬大叔突然停了下来，不安地动了动，又弯下腰去，把我的腿往旁边挪了一下。

“当心别踩在包上！”他严肃地提醒说。“会踩坏的。”

我礼貌地往后缩了缩身子。

“里面有什么呀？是玻璃品吗？”

“什么玻璃品……是唱片！我女儿来信说，村里建立了阅览室，每逢星期日青年们都去那里跳舞，可是没有唱片，老是放一张唱片，叫什么拉拉夫人的曲子……”

“是‘克拉拉夫人’！”我纠正说。

“我答应让青年们高兴一下，给他们带件礼品……我不是贵宾吗……”

我们没有再说话了。在一片寂静中，清晰地响着马蹄的得得声。北风送来了新雪的香味。而我们头顶上，夹在两排松树冠之间的那条无垠的天河，继续闪烁着光芒四射的星星。

（樊　石译）

斯·瓦塞夫

飞 燕

〔**作者简介**〕 斯拉夫乔·瓦塞夫(1906—)生于佩尔尼克州扎勃梁诺村，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哲学系。先后主编《曙光报》、《文学阵线报》，担任过科学、艺术和文化委员会副主席、记协主席、人民剧院院长等职务。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尤奇布纳尔之夜》、《德拉瓦的火光》、《红鹳》，游记《我们在莫斯科》等。

献给国营列宁钢铁厂①的青年们

伊万娜坐在驾驶室里，看见春天爬上了树梢，染绿了河谷和山岗的南坡。

① 国营列宁钢铁厂位于索非亚西南的佩尔尼克，紧靠维托沙山。

天车沿着曲折蜿蜒的索道运行，绕过平炉车间，隐没在工场的南面。布满深壑的山岗就从那儿发端，它自南而北环抱着钢铁厂。沿着山岗有一排伸出双臂的高压线铁塔。就在这儿，在工场的尽头，工人们换了吊车后，天车便拉着矿石返回平炉车间。

伊万娜靠着车间的房檐运行，透过驾驶室的玻璃窗瞅着场上的动静。她看见一辆从迪米特罗沃开来的公共汽车停在公路上，旅客们下了车，各奔一方，但多数人涌进了工厂的大门。

有时候，伊万娜也眺望公路上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载重汽车，但见它们你追我赶，穿梭往来，象是被河谷里的风儿刮着一样。火车的轰鸣吓得她直打哆嗦。她觉得，总有一天，在那些透过车窗往外探望的旅客中，会有一个人在工厂这个车站下车，打听她的情况。她心旷神怡地望着一列火车奔驰而去，消失在树林和山岗后面。车头冒出的缕缕青烟飘到空中，慢慢散尽。她以前常常凝望群山，凝望山梁上的雾气，感叹那些雾气如此神速地飘散又聚拢；她还看见隐约传来流水声的河谷的远方慢慢昏暗下来。

但是，伊万娜最喜欢看人。本厂的人，她老远就能分辨出来。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外边的人也几乎天天都来，她也一眼就能认出他们。这些人停在场上，不知该往哪儿走。他们翘首观望高高的烟囱，观望从他们头顶飞过的天车，惊叹不已。这天车是她开的。

“哎，你们这些人呀！这是咱们的工厂，咱们的列宁钢

铁厂。你们知道些什么呢！要知道，我在这驾驶室里一览无余，真棒！”伊万娜想着想着，只觉得轻松愉快。

一天早晨，伊万娜在穿过工场的行人中发现了一个陌生人。他挥着两手，踢着路上的石子，走得很带劲。红围巾的两端在他肩上晃悠。

她的心象被螫了一下。说不定，他就是她象盼望清晨一样盼来的人？他长得标致，脸上有一对大眼睛，笑容可掬，还会唱歌、跳舞。这不是别人，正是她朝思暮想的那个人来啦。伊万娜第一次生了天车的气，埋怨自己没有站在地面上，把他看得清楚一点。

陌生人拐了个弯，朝平炉车间走去，她看见他松散的红围巾火焰般地飘逝了。快下班时，伊万娜死死盯着从工场上走过的人。但她没有发现他。第二天也不见他的人影。她还仔细查看过那些在这节日前夕成群结队来参观的客人。又过了一天，她才看见他从平炉车间出来——她瞥见了他的围巾。他走到工场中央，朝天车望了望。她觉得他看见了她。她的心揪紧了。直到她意识到天车正一股劲朝平炉冲去，平炉射出的白光直晃她的眼睛，她才猛醒过来。她马上用劲刹车。缆索上的轮子发出刺耳的声音。天车尖叫着停了下来。吊车摆来摆去。此时，一位正在监视年轻助手处理冒着金星的铁水的老铸工转过身来，惊讶地望着她。这个姑娘怎么啦？伊万娜把罩着眼睛的头巾往上掀了掀。自动吊车翻转过来，把长臂往上一抬，画了一条弧线，矿石就倒进了正张着大口的平炉。火星飞溅。烈焰晃着铸工们的眼睛。伊万娜赶

紧折转回去。当她飞过工场时，她不敢再往下看。她怕他不在下面，而他也确实不在下面。

接连几天，她没有看见他。当她再发现他时，她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同他贴得很紧了。

伊万娜探听到了他住在哪个宿舍，在哪张桌上吃饭，上哪个班，还知道他什么时候到车间里来。她开始唱歌。唱一些她并不喜欢的从俱乐部学来的进行曲，还唱收音机播放的歌曲，以及她似乎已经淡忘的乡间小调。这些歌现在宛如清泉突突喷涌。这些歌在工场上空回荡，使得人们在缆索下收住脚步，耸耳细听，等着天车飞过去，向她招手。

有一回，在太阳落山以后，伊万娜唱着歌，把矿石运到平炉车间。正在驯服沸腾的铁水的铸工们全都向她扭过头来。歌声融进了吊车的铿锵声和火花的呲呲声！铸工们围聚到伊万娜的天车要经过的地方。她打开驾驶室的门，看见了一张张额头上系着墨镜的笑脸，看见了平炉的白光在墨镜里跳跃。铸工们向她鼓掌。有人喊道："唱得好！"

这是他。伊万娜一眼就认出了他。红围巾象沸腾的铁水。她的心砰砰直跳，象是冲到了喉咙，就要飞出来。她勉强看见他走出人群，站在她旁边，爽朗地笑着，那一双笑眼仿佛叫出了她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

"看我这只飞燕！"

她眼前一黑，屏住了气息，慌乱中抓住了驾驶室的门把，关了门，一抬操纵杆，把天车开走了。

她听见了还在鼓掌的铸工们的笑声。在一片掌声中，在

一张张笑脸、一双双笑眼中，她看见他了，看见他挥手向她致意，看见他鲜红的围巾在晃悠，看见他满脸堆笑，也看见他脱口叫道:“飞燕!”

眼睛在笑，嘴唇绽开了鲜花，两腿不停地舞蹈，双手异常地灵活，手指轻轻地抚弄，心儿剧烈地跳动。伊万娜早就准备好啦。离钢铁厂“五一”晚会开幕还有整整一个小时。她又想起了——不知今天已想了多少回——那平炉车间的晤面，那回宿舍路上的结识(这是一个令她永志不忘的夜晚)；还有那些要在“五一”晚会上倾吐心曲的许愿，也不停地振动她的耳鼓。

飞燕！她想冲出房间，在工厂院子里奔跑，让铸工们都能看见！他也会在那儿，就象那次她打开驾驶室的门时看见的那样……

伊万娜舒展舒展双臂，抚平头发，向楼道跑去，想照照那面大镜子。兹维塔站在镜子前面，理着她那件天蓝色连衣裙的翻领。伊万娜站住了。她的心隐隐作痛。厂里的姑娘今晚都要去参加晚会，大家都要穿上崭新的连衣裙，漂亮的连衣裙，他能在五光十色中认出她来吗？他喜欢她的连衣裙吗？

“多漂亮呀!”兹维塔在镜子里瞥见她，叫道。那姑娘转过身子，上下打量着她，又摸摸她的头发，把她的手抬了起来:“你在谈恋爱！别嘴硬，你在谈恋爱!”兹维塔还没有等她回答，就悄悄问道:“是谁?”

伊万娜又高兴，又害臊，随口说道:

“谁也没有！谁也没有！唉，谁能看上我！”

“要不是恋爱上啦，哪个姑娘会打扮得这样漂亮！”说着，兹维塔依旧瞅着她，为她高兴。

“谁也没有！谁也没有！”伊万娜矢口否认。她抱住兹维塔，两脚直跳。

兹维塔走后，她一人留在镜子前，惊住了。她的脸蛋红扑扑的，眼睛水灵灵的，连衣裙在微微抖动，那洁白柔软的绸领裹着她的脖颈，闪闪发亮。

伊万娜一拍巴掌，蹦到了院子里。工厂举行“五一”晚会的大厅在公路那边，但伊万娜巴不得它再远一点，使她能跑着去，跑得比风儿还快，碰见更多的人，让大家祝贺她，她也祝贺大家。她会看见他，不过是躲得老远地看他。她要偷偷地看他。

前来参加晚会的第一批人已经到了。大厅里越来越挤。来人中有她在平炉车间的熟人，还有许多人是轧钢车间和小铸造车间的。她觉得大家都在瞧她，于是赶忙躲到本小组姑娘们中去。青年团的负责人坐在主席台上，舞台上挂着绕以旗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画像。伊万娜满心喜悦地看着那些负责人。她一遍又一遍地默念墙上的标语。她摸了摸脸，觉得脸上发烫。

他还没有来。厂里的工人们络绎不绝地涌进大厅、休息室和走廊。青年们脚步匆匆。结了婚的人成双成对结伴而来，男的把大衣交到存衣处，让女的走在前头。乐手们到了，他们坐在紧靠舞台的大厅的右角。角落里的大鼓引人注

目，数支萨克索风①吊在坐椅的靠背上。过了一会，乐队旁边的幕布拉开了。

晚会是怎样开始的，合唱队和演员们唱了些什么，晚会上有哪些节目——这一切，伊万娜全然不知。她偶尔听见舞台那边传来歌声，但她马上又打了一个哆嗦，把思想拉回来。他呢！他在哪儿？于是，她又在众多观众中搜寻着他的身影。她觉得有人粗暴地碰了碰她的腿。一个长着浓密的鬈发和鹰勾鼻子的青年工人坐在她旁边的空位上，并没有向她道歉。

节目演完了。接下来是舞会。乐手们一坐定，整个大厅的椅子便一阵风不见了。乐手开始演奏。厂长在熙攘的人群中邀请一位女队长跳舞，这位队长胸前的金星奖章闪闪发光。大厅里响起了一阵掌声。乐手们全都站了起来。萨克索风响了一下又停了。顷刻间——大厅里一片寂静。但是，小提琴手马上一举琴弓，大厅里又回荡着华尔兹舞曲。厂长和女队长带头跳起舞来。接着，许多人找好了舞伴，踩着华尔兹舞曲的节拍轻快地旋转。

伊万娜只身一人。她心里怪不是滋味。她朝大门跑去，但被一位长着连鬓胡子的舞伴拦住了。他向她一鞠躬，没有等她回答就拉着她在人丛中跳了起来。直到两人转到大门边，伊万娜才摆脱了他。她奔到休息室，靠在一根圆柱上。华尔兹舞使她头晕目眩，她合上了沉重的眼皮。乐曲声传进她的

---

① 萨克索风，一种吹奏的铜乐器。

耳朵，一股热气向她扑来。她睁眼一看，只见面前站着本车间那位老铸工。

“哎，年轻人，累啦！”他瞅了她一眼，继续朝前走去。伊万娜又听见兹维塔在哪儿叫她，但她马上躲在圆柱后面，紧紧贴着冰凉的大理石。她觉得自己就要哭出声来。这时，一对舞伴随着乐曲声来到圆柱旁边。她认出了他。这就是他。同他跳舞的姑娘长着一头鬈发，满面春风地拉着他的手。

“行啦，亲爱的！”他喃喃道，“我要，我要……”他的眼睛扫着大厅里攒动的人头，还瞅了一眼休息室的出口。伊万娜更紧地贴在圆柱上，绕着圆柱躲闪，不让他看见。

“瞧你！”那姑娘埋怨了一声，又抓住他的手，两人便消失在人丛中。鬈发姑娘的脸蛋红得象一面“五一”节的旗帜。伊万娜紧盯着她，似乎心脏停止了跳动。然后，她朝工厂大门跑去，差点跌倒在院子里。她在原野上没命地奔跑。天上缀满了繁星。工厂沐浴着静静的、银白色的月光。伊万娜跑着跑着，觉得连衣裙在簌簌作响，寒风砭骨。

“飞燕，飞燕，飞燕。”有谁在她耳边絮语。她讨厌这个声音，但又不能避开这个声音。

节日后的第二天早晨，伊万娜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地来到车间办公室，硬梆梆地问道：

“伊利亚·格罗兹达诺夫上哪个班？”

“头班！”有人在窗口后边头也不抬地答道。

“那我上第二班！我是伊万娜·塔内娃。”

派班主任出现在门口，奇怪地瞅了伊万娜一眼。

“干吗上第二班？”

“就这样！”伊万娜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在晚会上没有看见你，到哪儿去啦？”主任笑嘻嘻地问道，想跟她搭话。

“在家里！”伊万娜还是那样表情严肃、一本正经。

“躲在宿舍里？”

“用不着大惊小怪！是在宿舍里。”她又说了一句，抬腿就走。她真想马上登上天车，在工场上空飞翔，浏览群山和山上的云朵。

她在办公室门前停住了：在晚会上同他跳舞的那个姑娘正冲她跑来。鬈发姑娘挥着手，喘着粗气，象是老远地在跟谁说话。伊万娜听见她叫道：“伊利亚正找你。他打那儿来啦。”

是他！他来这儿找她。伊万娜鼓足勇气，准备赶快下楼。她想跑开，躲开，但又两腿发软。

“找到啦！找到啦！”这是他。她听出了他的声音。

正当她呆然若失，摸不着头脑时，她看见他脚步生风地踏着楼梯上来了。他象她第一次看见他时那样爽朗、愉快，披一身平炉耀眼的白光。他朝她走来，戏谑而又热情地说道：

“哎，飞燕，我又换到你那一班啦！”

伊万娜想溜掉，但他把她拦住了。他抓住她的肩膀，好象就要拥抱她，然后又紧紧握住她的手，叫道：

“列娜，这就是她！这就是她，飞燕！”

鬈发姑娘跑了过来。

“我们在晚会上到处找你！”她亮开云雀般的嗓子说，向伊万娜伸出了手。

“这是我妹妹。你们认识一下吧！”他仍旧爽朗地说，理弄着自己的围巾。

当伊万娜再次登上天车，在工场上空靠近车间的房檐飞翔时，她看见河谷里李花似雪，山岗郁郁葱葱。维托沙山的天空洁白无云，河水潺潺作响。两只白鹳的翅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根根烟囱不紧不慢地吐着白烟。钢铁厂里一片繁忙。

伊万娜放开了歌喉。下面的工场上，人流穿梭不息。从平炉车间出来的人披一身白光。伊万娜的天车掠过他们的头顶。

厂里的工人打工场上走过，翘首望着她，聆听她的歌声。

飞燕在歌唱。

（余志和译）

留·斯塔内夫

阴冷的房子

〔**作者简介**〕 留本·斯塔内夫(1924—)生于普罗夫迪夫，毕业于医学院，当过军医，担任过电影制片厂总编辑。著有短篇小说集《蟋蟀之歌》、《阴冷的房子》、《一个失眠的女人》，中篇小说《拉斯科夫一家》，长篇小说《冰封的大桥》等。其短篇小说多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向人们提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索非亚一家日报的编辑留德米尔·科瓦切夫出完差，正往家赶。他在火车上津津有味地同旅客们闲聊，海阔天空地问这问那，还说他过去是个大夫，可眼下却在搞新闻工作；但他对改行并不感到惋惜，因为医学能使他轻而易举地深入人的心灵。包厢里的旅客全神贯注地听他高谈阔论。听说他是医生，大家向他抛出了一大堆健康方面的问题。而且，在他

向这些陌生人透露了自己原来的职业后，就象他过去所见的那样，大家马上就对他另眼相看。他的交谈者不再拘束，一个个拉开了话匣子。最重要的是，周围的人起初只把他看作一个记者，同他交谈时心猿意马，可现在，相互之间的这层薄冰已顷刻消融。

但是，科瓦切夫后来渐渐不言语了，他蜷缩在包厢的角落里，陷入了沉思。车窗外，光秃秃的原野毫无生气，黑糊糊的树影飞快闪过。这些树上只挂着一两片金黄色的叶子，它们在十一月单调的天空下，越发显得孤独和凄怆。远处，巴尔干山的座座高峰裹着灰蒙蒙的雾气，阳光似乎想穿透深秋厚厚的雾幔，但看来在很远的地方给挡住了。

留德米尔睁大一双蓝幽幽的眼睛，神不守舍地瞅着空荡荡的原野。他面颊绯红，鲜红的嘴唇轮廓分明，小胡子稀稀拉拉，年轻的脸上露出一副不安的神情，漂亮的浓眉不时扬起。这一切，表明青年记者心事重重……

两星期前，在他离开索非亚时，他母亲还没有出院。最近几月，她的老病更行加重。由于工作繁忙，特别是要张罗买房子的事，留德米尔和他父亲都没有顾得上她。在父子俩的日常生活中，母亲的病已经司空见惯，假如她有一天突然痊愈，他们反倒觉得奇怪。

动身前，留德米尔只听大夫们说，他们准备为他母亲作一次全面检查。出差期间，他收到了父亲的一封短信，父亲的这封信同过去的每封信一样，甚至也同他大半生写过的所有信一样，使人感到高枕无忧。老科瓦切夫写道：“你妈现

在感觉甚佳。我以为，不，我敢肯定，使她病情好转的原因是房子的事。我要告诉你，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我要在你们娘俩回家前搬家，把我们的新房收拾停当。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我近来总是这么想着进入梦乡。吻你——爸爸佩罗。”

留德米尔猜想着：该是哪一栋房子？前不久，他同父亲一起看过一些房子。他的父亲，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当时为之洽谈的有好几个“目标”，因此，年轻人不太清楚究竟买了哪一栋。何况他父亲一向粗心大意，根本没有在信中说得稍微准确一点。近来，一种私欲骤然出人意料地使教授神魂颠倒，似乎他此前不曾有过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事。两个月前他曾说起，有个犹太人想卖房子，只要四万列弗，这真是一宗便宜的买卖。十来天后，教授又说，这个犹太人被警察局拘留了，因为他同时收了几个人的押金。不过，教授已不是当初的傻瓜，他没有跳进犹太人的漩涡。留德米尔感到纳闷的是——为什么住宅一事竟成了他的双亲口角的唯一原因。母亲常说，要是留德米尔有个更精明一点的父亲，现在别说一栋房子，就是两栋也有了。然而，全家早就不再议论这个话题。可你看，教授乍地又开始筹划买房，说什么两层比一层或三层好，并且去跟那些满鞋尘土、提包发亮的男人晤面。留德米尔的母亲虽然此时已经患病，可她仍然听从丈夫的安排，怀着一种胆怯而痛苦的期望。

不久，留德米尔也被卷了进去。他同父亲一起看了许多“目标”，用绳子量窗户，用指甲抠墙壁。他很喜欢这样奔波。

在他看来，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买房，不如说是使他有了天赐良缘，去见识一些嘴脸，同各种有趣的人物、骗子、滑头、破落户、拨弄是非者和奉迎拍马者打打交道。年轻记者发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新天地——肮脏交易、投机取巧和无比贪婪的天地。于是，留德米尔日复一日地迷上了这种游戏，他甚至开始对自己与这些人的周旋夸夸其谈。

“我要买房。”他有时在跟朋友和同事聚会时说，得意地摸摸额头，似乎想强调指出，他们对这种错综复杂而又引人入胜的事情一窍不通。

当有人暗示他，怪他最近爱管闲事时，他为大家对他的印象感到惊讶。他确实相信，使他快慰的不是将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他压根儿就不相信能买到房子)，而是他有机会钻进同事们了解甚少的全新的现实生活中去。

最近几月，他父亲也令人奇怪地精神振奋，劲头十足。他停止了著述，不去辅导学生，前一阵还休了一个月假。当留德米尔还在袖手旁观时，教授已经纵身跳进了寄卖者、房产者和继承者的漩涡。他不仅接受了这些人的恭维，而且还学会了一套手腕。

不管怎么说，留德米尔仍然怀疑，这样急如星火地来回奔走，未必会有什么结果。他父亲过去也曾为搜集邮票、布置书房东奔西跑，但他先前的这些嗜好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以致后来连教授自己也讥笑这些事情的无聊。

不过，你看，留德米尔万莫料到，现在居然收到了教授的信，说是他们已经有了房子。但他呆在那个小城时，根本

顾不得考虑他父亲捎来的喜讯。他忙于调查一桩复杂的案子，这桩案子是由麻木不仁和官僚主义造成的。那位姑娘遭到同志们的诬陷——说她道德败坏，因而被开除出团，并被调到另一所学校任教。青年们全都不理她，还奚落她，侮辱她。姑娘的母亲已经去世，于是她企图服毒自杀。尽管州团委和团中央都进行了干预，但姑娘仍然没有得到平反，仍然是小城里的“破鞋”。最后，这桩案子传到了报纸编辑部，科瓦切夫于是就赶赴现场调查，想“震动”一下市团委。留德米尔这回也象过去那样，听到了许多申辩，说什么市团委曾煞费苦心地帮助这个姑娘，但她就是不愿参加青年活动，还对市团委进行指责。留德米尔这次也确信，象通常那样，在这场纠纷中，谁也没有过错，表面看来一切都很周到——没有违反团章，还找姑娘“谈了话”。可是，实际上，团组织已经把一个青年永远拒之门外，使她的心灵受到了无法愈合的创伤。

留德米尔离开小城时，兴致很高。他答应姑娘说，他要在报上把这件事和盘托出，甚至已草拟了小品文的开头。他感到满意，因为他确信，那篇尖酸刻薄的文章将击中头脑僵化的市团委领导人的要害，帮助那位无辜的姑娘。可是现在，当维托沙山① 的雪峰在远方依稀可见时，当火车在原野里奔驰，发出某种熟悉而又均匀的撞击声时，这位记者的脑子里又乱成了一锅粥，思想越渐模糊。是栋什么样的房子？父亲是否真的把全部家什搬走了？搬家时不会扔掉和毁坏他的东

① 维托沙山位于索非亚南郊。

西吧？为什么信中只字不提他母亲的具体情况？留德米尔竭力想使自己相信，既然她要出院，就会恢复健康。但他又意识到，他的担心正是来自他的母亲，这使他感到压抑。

他恰好在午饭时分回到首都。此刻，太阳暖融融的，早晨的浓雾也散尽了。人们高声说笑，不时仰望蔚蓝色的天空。留德米尔迟疑了几分钟，不知往哪儿去好。他仿佛觉得他父亲买的那栋房子是他们一道看过的，但他仍然决定先回老地方问问邻居家那个妇女。他们的老邻居记得不大准，可她听"教授同志"说，他搬到了沃迪查街七十一号的一栋宽敞的房子里。这个邻居感到奇怪的是，怎么留德米尔竟然对此一无所知。她暗示说，他们原来的那套房子马上就搬进了"某某"，并且使劲一耸肩膀，代问了他母亲一声好，就突然板着面孔进屋去了。

不多一会，留德米尔来到一条小街。街上连个人影也没有。路面上杂草丛生，人行道毫无遮掩，一间间老房懒洋洋地散落在宽阔的院子中间。他喜欢这条街，再说离编辑部又近。留德米尔看了许多家的门牌号码，但没找到七十一号。于是，他走进第一家的院子，东张西望。门前的凳子上坐着一个老人，他穿着深色下装，戴着黑色帽子，脚上是一双高腰套鞋。他在那里晒太阳，打盹。留德米尔在院子里站了片刻，没看见门牌，也就走了。正在这时，他背后响起了嘶哑的声音。

"站住！"

他扭转身。老人抬起头，艰难地扶着拐杖欲站起来。留德米尔跑过去，想扶他一把。

“您要起来吗？”

老人用怀疑的眼光怯生生地扫了他一眼。

“你是谁，到别人院里找什么？”

留德米尔向他作了解释，但老人什么也没听懂，还觉得受了侮辱。

“我认识你这小子！现在遍地是扒手……听说那天晚上有家人被抢了……我看见你提着一只箱子出去。……”

留德米尔出门时觉得十分好笑，也略感受了戏弄。他沿街行走，数着房子。两边的房子共十九栋。就是说，不会有七十一号。真倒霉！或者是他父亲记错了，或者是那个装腔作势的邻居搞错了。要是门号没错，会不会弄混街名呢？留德米尔对父亲忿忿不满。怎么这样粗心？……他突然想到，门号可能是十七而不是七十一，于是就问一个小孩十七号在哪里。

“那是我家！”男孩一本正经地说，好奇地打量着记者，“你是不是房东家的海员？”

“不是！”留德米尔答道，心里更为恼火，“喂，最近有没有人搬到这儿来？”

“是呀，有人搬来，”男孩说，“哎，就在那，街那头。”

“你见过搬家的人吗？”

小孩皱起眉头。

“他不让我们上车，还用树枝抽了一下佩丘。”

留德米尔大惑不解，想：“我父亲从来不打小孩。”

“那你带我去吧！”他对小孩说，可小孩纹丝不动。

“不去。那个伯伯说，别老在他眼前晃悠。”

“为什么?”

“那里有个大院，我们常在里头玩，可新来的伯伯不让玩，还说要是再看见我们，就把我们的耳朵揪下来。”

留德米尔越发感到奇怪。他朝男孩所指的房子走去，来到一溜已经破损的铁栅栏前。栅栏的里侧长着几棵歪歪扭扭的墨绿色针叶树，它们早就失去了观赏价值。再往里是一栋房子。这房子只有一层，很旧，正面呈黄色，斑驳陆离，两扇方形木窗同墙壁处在一个平面上，令人想起蒙古人的眼睛。房子的两侧各有一条小道，看来是通到后院的。门边的墙上有一个涂得乱七八糟的牌子，上面标着十四号。

留德米尔穿过散发着油漆味的狭窄过道，走进半明半暗的宽敞的前厅，里面摆着家具。在年轻人的眼里，这些家具本来就简陋、小气，现在就更加显得寒碜。他快步穿过前厅，到了一扇敞开的门边。眼前是间很大的空屋，他父亲正背朝着他用一只脚蹭地板。

“爸爸!”留德米尔惊喜地叫道。

他父亲转过身来，头一眼就盯在他的两只脚上。

“快脱鞋！哎呀呀，怎么穿着鞋走过来。”

父亲已经消瘦了，两道眉毛间除了早就有的很深的皱纹外，现在又添了一道又短又细的皱纹。高高突起的额头汗渍渍的。他那蓝色的、清澈透明的眼睛看上去既有神，又愁苦。他没梳理，花白的胡子使他的脸显得呆板、肮脏。他穿着一件浆硬的衬衫，黑色旧裤的裤脚上沾满尘土。

教授看了看前厅——留德米尔在擦得发黄的地板上留下的脚印十分明显——然后喟然一声长叹，说道：

“要爱护……你刚到吗？吃午饭没有？”

留德米尔点了点头。他父亲的变化使他感到惊讶。

“好吧……等一等，刚才还想跟你说什么呢……呵，是这样，”他父亲露出一副疲乏的、似笑非笑的面容，“你赶在今天回来，太好了。你妈也是今天傍晚回家。”

“她干吗要回家？”留德米尔哆嗦了一下。

“让她出院啦。所以我才忙得不可开交。我想把所有东西都拾掇好……午饭前来了两个妇女，但我把她们打发走了。她们根本就不会擦地板。”

他审视了儿子一眼。

“快脱下大衣擦地板！你擦过地板吗？”

教授很清楚，他儿子从来就没有擦过地板，可他常常提出这类问题。

“妈妈怎样了？”留德米尔边脱大衣边问。

“还好，就是瘦了点。这是医院的环境造成的。不过倒有精神……”

“大夫查出了什么？”

“没有确诊。肾里有什么东西。”

“肾里？”

“这是电话告诉我的，”教授把脸转到一边，“我已有五六天没去了。搬家……快来看看你的房间！”他突然快活起来。

留德米尔跟他走去，发现父亲的裤腰上竟系了一条夹大

衣的腰带。“他的皮带是丢了呢，还是搬东西弄断了？”留德米尔寻思着，不觉对父亲产生了某种难以言状的怜悯之情。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栋房子的？”留德米尔走进摆着他东西的大房间，问道，“我以为你买了另外一栋。”

“哪个另外一栋？”教授突然恼怒起来，“那个要押金的吗？唉，我不象从前那样犯傻啦。他们骗我，说有一百平方米，其实只有八十八平方米。”

“这栋有多大？”留德米尔想讨他父亲高兴。

“一百二十平方米，既大又结实。外表不太美观，可我们要修理……你喜欢吗？”他胆怯地问道，静静地等着回答，似乎比儿子矮了半截。

“不赖。花了多少钱？”

“八万。”教授说得很快，“三万押金。”

留德米尔没吱声。钱的事有他父亲管。

“我开头以为比这新式一点，”儿子说，“至少乔拉科娃使我产生了这种印象。”

“哪个乔拉科娃？……别提她！一个下贱女人。她要我给她点钱，说是你妈答应她的。”

“就为这个，你就告诉她假门号？”

“怎么是假的？我告诉她是十四号。”

“可她说是七十一号。”

“撒谎！”教授轻声说道，不由自主地挪动一下花瓶。留德米尔看得出来，他父亲心里在打鼓。

“啊，让我想想！”他过了一会说，“可能是我搞错了。帕

伦索夫街的另一栋是七十一号。”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接着有个头发蓬乱的年轻人冲前厅走来。他身着邮政服、粗呢裤，裤脚上别着回形针。

“喂，有人吗？”他喊叫着，想继续往前走，可教授把他止住了。

“请等等，先别进来！”

他拿来一搭报纸，从门口一直铺到沙发跟前。

陌生人小心翼翼地踩着报纸进来，停在前厅，东张西望：

“都上地板蜡了，还在收拾。”

教授打量着他，心里一阵厌烦。

“有事吗？”教授问道，两眼死死盯着他那双鞋。

邮递员踩着报纸进来，直言不讳地说：

“想看看你们是些啥样人。那天见你们搬东西，我就说啦：‘全索非亚到底有这种傻瓜，要了这座古堡。’……现在见敞着门，我就进来啦。我是给你们送邮件的。”

他环顾一下四周，又说道：

“别敞门，这一带的小偷可多啦。一星期前，这儿还有人翻窗进来。”

教授有点懊丧，但不好说什么。留德米尔想起了那个老人。

“是真的？有个老头也这么说，可我不信他的。”

“哪个老头？”邮递员问道，既感兴趣，又有些不安。

“他坐在自家房前的凳子上。”留德米尔解释说。

“若格拉福夫！”客人放心地点了点头，“他痴呆了。想当年，还是个了不起的教授哩，这你知道。住在这儿的都是教授。”

邮递员接着列举了几个人的名字。

“这儿的人全是吝啬鬼，连死了也舍不得贴张讣告。不到一星期前，有个人完蛋了。那天我送一份养老金到三号去，他老婆对我说：‘他去世了。’没人让我把养老金给别人，我就在汇款单上写上‘死了’。因为我写了‘死了’而没写‘去世’，唉呀，那老婆简直要把我吞下去。可我也不是好惹的，就说：‘你不喜欢我写他死了，那你干吗不贴张讣告，让大伙知道他死了，不再说出来呢？’”

留德米尔笑了，而他父亲却盯着邮递员，感到伤心难过。

“你也象个教授。”邮递员打趣地说，可怜巴巴地扫了留德米尔的父亲一眼，“哎，多少钱买的这房子？”他毫不客气地问留德米尔。

教授激动起来。

“这不关你的事，我求您别再啰嗦……”

“不赖！你不肯说就拉倒，”邮递员一抬手，狡黠地挤了挤眼，“我早就听房主说啦，现在不过是想问问你们。我只对你们说一句——你们上当啦。”

“为什么？”留德米尔问。

“这房子阴冷。就是把狗拴在屋里，它也要挣脱链子逃跑的。这房子不是用砖砌的。”

“那用什么？”

“水泥板。是些什么意大利人，或者法国人，不骗你们，修来做广告的。他们想让人看看他们修得多快，用了些现成材料，六个星期就得啦。”

“你从哪儿听来的？”

“你们一个街坊。他已经死了……就这么回事！我得走了，还有两三份电报。”

他道了声“谢谢”就出去了。但是，一分钟后，他又出现在门口。

“忘了问你们：要不要给你们送报？”

“用不着！”教授大声回答，随即关了门。

回到前厅，他显得异常激动。

“乱弹琴，六个星期！我还找过建筑师！这房子挺结实的，又……暖和。哼，古堡！……胡说八道！”

留德米尔笑了，温柔地看着他父亲。

“当然啦，爸爸，我甚至认为，你买得很合算。”

“是吗？”他父亲又眉开眼笑，“房主先要十万，嘿嘿，要二十万也行，可谁愿意出呢？我苦苦等了六十年，直到现在才决定买。人越老，就越不容易上当……”他不安地看着儿子的脸，又问道：“你不冷吧？”

“不冷！”留德米尔骗他说。

“也许冷点，”教授承认道，“这是刚刚粉刷的关系。咱们布置布置你妈的房间，就会暖和的。你看我就不冷。”

留德米尔跟着父亲进了一间空房。他不明白，为什么在

邮递员使他开心地发笑之后，现在却有某种伤感涌上心头。他父亲的举止令人奇怪，有些反常。他过去与众不同的是，不拘小节，不识分寸，做事毛躁，但他今天的行为却包含着某种狂热和痛苦，似乎过去不曾有过幸福，而今天是平生第一次打定主意，一鼓作气完成夙愿。因此，留德米尔又象在火车上时那样，再度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掺着无限悲怆的不安。

“你把房子的事告诉妈妈了吗？”他在帮父亲安床时问道。

“当然告诉她了。她很喜欢这块地方，特别是院子……你还没看院子吧？三百六十平方米，从早到晚有太阳……你根本就不要听那个傻瓜的胡诌，说不定他自己就是小偷。”

房间布置好后，教授左看右看，想发现点毛病。

“很好吧？我故意没给这间屋子粉刷，免得潮湿。你妈在这儿会感到舒服的，你说呢？”

“大概会吧，”留德米尔说，“大夫到底讲些什么？”

他父亲似乎没听见。过了一会，教授吞吞吐吐地说：

“要不是为了你妈，我根本就不会费这股劲。诚然，在同事中，唯独我没有自己的房子，但这不是最要紧的。值得你妈高兴高兴……她跟着我不太幸福。”

教授愧疚地瞅了儿子一眼，扭过头，出了门。

留德米尔到了自己的房间。这里潮湿而又昏暗。青年记者整理好办公桌，拿出他新写的小品文，坐下来润色。他把小品文的开头连看几遍，不知怎的总是觉得不过瘾。他那些

大胆泼辣的思想，现在看来都是奇怪的、多余的。留德米尔同时还发现，小城里那桩案子在他脑子里已经淡漠了。这个案子留给他的只有疲劳和某种令人不安的疑虑。他的小品文果真能帮助那个不幸的姑娘吗？他应该这样帮助人吗？或者，只有他自己才认为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吧？

留德米尔打了一个寒战，又想起了邮递员的话。看来这房子确实阴冷。他母亲怎么能住在这里？直到此刻，他才想起她来。在这以前，他只考虑怎样放书，怎样摆家具，以及请客时是否舒适。至于终日呆在这房子里的他妈会有什么看法，他还没有想过。大概他父亲对此也想得不多。要不就无法解释：父亲为什么对她的病过问得不够？

留德米尔觉得，他不完全理解他父亲，但是，他同时又对父亲有着某种恻隐之心，感到在他母亲的不幸之中，也有自己的一份。

年轻人走进他妈宽敞的房间。教授正在往床上铺毯子。

“要给她垫得厚实些。”他说。

“要厚点！”留德米尔说着，动手帮他父亲，“要知道，用暖水袋也不坏。”

他父亲略显不安地看他一眼，沉默了一下，一溜烟跑了。

“可不，我就没想到这层。现在就去烧水。”

“谁送她回来？”留德米尔过后问他。

“一个护士答应用救护车送她。这个护士住得不远……我今天早晨给她送衣服去了。”

他们坐着，相对无言。现在，在过了两个小时之后，他们才觉得再也没有更多的话好说。留德米尔在想他母亲新添的疾病，同时又想，作为一个医生，他无法解释他母亲原来的慢性病同肾脏有什么关系。他越来越感到不安和悲戚，怀疑他父亲有什么事情瞒着他。

外面传来汽车戛然刹住的声音，父子俩同时蹦起，朝大门奔去。

母亲已经下了救护车——她当年是很灵活的——现在望着房子。教授搀着她的一只手，而留德米尔用肩膀挎着她，就这样把她架到了院子里。

“好吗，留德科①？没感冒吧，这天气不好。”她悄声问道，发现儿子惊愕地看着她，就赶忙解释说：“我瘦了吧？我吃不惯医院的饮食。”

教授在门前突然扶着他妻子拐了个弯，兴致勃勃地说：

“你到里边看看院子，以后就出不来啦。只看一眼。”

他走在前面，弯着腰，不时回顾母子二人，生怕他们跟不上趟。

院子很大，但又荒凉。灌木丛、杂草、歪歪扭扭的树木和石块在宽阔的土地上构成一个神秘的荒园。留德米尔温情地注视着母亲。她的表情含着某种从未有过的东西——超感情的、怀疑的东西，似乎这位老妇人觉出了什么、又怕别人道破。留德米尔发现，她几次用奇异的目光瞅着他，似乎想

① 留德科，留德米尔的爱称。

证实一下他是否看出了她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他母亲从未发胖过，红润过，现在则完全憔悴了。她两眼深陷，嘴唇发白，皮肤暗黄、透明。除此之外，留德米尔还觉得，她的脸浮肿了。“更象贫血症。”他想，但后来又觉得，慢性肾病也会有这种土黄色。“她早就有肾病啦?”他浑身发木了。“不，不，这不可能。她从来没有过这种症状……”

他母亲喜欢这个院子，只发现了几点小毛病。她冷得两肩哆嗦，便往回走。还没走到墙角，她又转过身，再看院子。她的眼神极其严肃和紧张，留德米尔的心收紧了。

他们进了门，教授领着妻子挨个看房间。他详详细细地向她述说了搬家和刷墙的经过，以及将来布置厨房和澡堂的计划。妻子一声不吭地跟着他，到处都瞟一眼，哪儿也没有要他停下来多说几句。但他不住地点头，仿佛要记住每个细节。教授时不时问她喜不喜欢这栋房子，她嗯嗯地回答，并未表现得特别高兴。留德米尔觉得，他母亲的感情根本就没有外露。他见父亲的脸越来越现出失望，便想，要是没有他母亲鼓劲，他父亲也许从来就不会做完一件事情。留德米尔同时又感到奇怪，恰是这回，教授终于如愿以偿。但他又觉得，这同他母亲的病似乎有某种联系。

他们把病人安顿在床上。教授拿来热水袋，给她放好枕头，然后又扯了几句房子的事。但留德米尔看见，他母亲眼睛发呆，心不在焉。于是，他问起她的病来。她突然一惊，轻轻吸了口气，勉强说道：

“给我查了，肾病，留德科。看来，这病早就有了，可我不知道。你知道，咱们以为全是肠子在作怪。”

她住口了。显而易见，她说话很累。但留德米尔苦苦央求她说完，她才继续说道：

“大家都认为，我最近不舒服，是由于肾病。你还记得，两个月前，我很瘦，吃了很多肉，想恢复元气，可那是毒药。”

留德米尔是记得的。他自己就劝过她多吃肉，壮壮身子。他哪能想到，他母亲还有别的病。他沉浸在寻找“目标”里，往往忘记自己的母亲。他一心以为买到房子会使她高兴，但她对他的这种想法却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你现在感觉怎样？”他问。

“哪都不疼，就是虚弱。”

“别的感觉呢？”

“别的……嘴里发苦，总是噁心。晚上失眠。”

“尿毒症！”他脑子里“轰”地一响，“得了尿毒症！”一阵恐惧袭来，他拚命压住，死死盯着他母亲，仿佛现在是平生第一次看见她。“全是由于肾脏，是我把她推向死亡，我，她的亲生儿子，一个医生……”他感到可怕，感到极度疲乏。三个人沉默了几分钟。头一个开口的是教授：

“你会好的。要注意饮食，是吗？”

留德米尔对他父亲若无其事的口气感到莫名其妙的恼怒。

“是呀，饮食制度很严格。”他母亲回答说。

他不敢看她，尽管她的话里毫无责备之意。她甚至也不想责备他，尽管他是该受责备的。他可以同陌生人谈上几个小时的医学，却不曾想过亲生母亲的疾病。医学仿佛是他的装饰品，他故意用它来增加自己对周围人的魅力。“我是吹牛大王，”他突然想道，怨恨自己，“还是个自私鬼，啊，多可憎的自私鬼！”他还想到：当他和他父亲陶醉在很快就会给她带来幸福的幻想中时，她母亲却中了毒，毁坏了自己的器官。然而，难道他们不正是为了她才竭力要买房子的吗？

屋子里暗下来，教授揿了一下电灯开关。电灯未亮。

“保险丝又烧了！”他说，“电炉短路……我就去换。”

他点上蜡烛，出去了。

留德米尔留在他母亲旁边，周围黑洞洞的。他看不清她，只有她瘦削的脸在黑暗中隐约可见。他母亲轻轻喘了口气，接着又喘几下。

“看来你爸爸什么也不懂！”她低声说道。

“不懂什么？”年轻人惊恐地问道。

“是说房子。要大吃苦头的。”

她沉默了一会，又继续说道：

“你以后要多多照料他。他完全是个孩子。”

留德米尔战栗一下。他母亲的声音里含着绝望和无限的悲伤。

“怎么这样说？没什么可怕的。”

勉强听得出来，她在床上动了一下。

“不，留德科，你很清楚我是怎么回事，但不要让他知

道。”

“你会好的，妈妈。”留德米尔嗫嚅着，感到无法忍受的痛苦。

难道她已知道真情？不会的，不会的，她从哪里知道？……留德米尔意识到，他母亲过去喜欢看他的医书……。他现在坐在黑暗中，骤然想到他并不了解这个瘦小的女人。是他们爱她，还是她仅仅是他们舒适、安宁的一部分？近年来，他和他父亲已习惯于她每晚迎接他们，给他们端来可口的饭菜，然后是他们给她叙述一天的工作，听她千篇一律的夸奖，再往后就是父子俩到另一个房间里埋头写作，或相互阅读作品。就这样，他们不知不觉地使她远离了他们的生活，对她的喜怒哀乐一无所知。可是，今天晚上，他突然明白了，他们很快就要失去她……

留德米尔按了一下额头，再次感到空虚和疲乏，就象刚才读他小品文的开头时那样。他想起了小城里的姑娘。难道这位姑娘和他母亲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吗？对于那些相信自己愿意帮助姑娘的人来说，姑娘的心扉仍未打开。“也许我们大家都把极其简单却又重要的事情忘记了，”年轻人想，“似乎我们的生活里只有大话和宏愿，而缺少人的热情。”

外面传来教授的声音。留德米尔走出屋子，借着昏暗的烛光向过道走去。他父亲站在保险丝盒下方的小凳上，正在费劲地往窗台上放蜡烛。

“拿好蜡烛，保险丝全报销了！”父亲生气地说。

留德米尔接过蜡烛，高高举过头顶。当他瞥见映在墙上

的他父亲可怜的影子，感到房子里死一般的沉寂时，一阵莫名其妙的悲哀涌上心头。霎那间，他觉得所有的东西——他们为房子而进行的奔波，他父亲关于保加利亚人的著作，他想赖以助人的大胆泼辣的小品文，都是毫无意义，毫无希望的。

“干吗不拿下来修理？”他生硬地问道。

父亲沉默了很久，然后用嘶哑而走调的声音回答说：

“别教训我！”

留德米尔突然对他充满愤懑。不知怎的，他蓦地想到，他父亲当年竟让他放弃医学，改攻文学！

“干吗发火？”年轻人毫不客气，“是妈妈不喜欢这房子，你觉得难受吗？”

教授的身影晃了一下。留德米尔害怕了，马上觉得自己说过了头。他父亲沉重地从凳子上下来。蜡烛照着他的脸。他的脸是苍白的。他沾满尘土的手指捏着保险丝。

“她不喜欢？”他抬起头，惭愧地看他一眼，“是她跟你说的？”

接着，他放声大哭起来。

“留德科，你妈要离开我们啦！”

留德米尔觉得有什么东西从头到脚传遍全身。他把嘴唇咬得发痛。他手上的蜡烛晃动起来。

“你也知道了？”他轻轻问道，浑身发抖。

教授叹了口气，发出某种不清晰的回答声。留德米尔看见，泪水顺着他苍白的两颊流了下来。他蹲在父亲面前，把

蜡烛举到一旁，生怕烧了他的头发，然后用另一只手去揩他脸上的泪水。

“别这样，好爸爸！……原谅我，我不知道……”

摇曳的烛光照着他们站了很久，父子俩就象僵了一样。周围一片寂静，只能听到蜡烛的嗞嗞声和蛀虫啃木头的声音。前厅里送来一股寒气。

“最多能熬一年，”教授终于说道，擦着眼泪，“这是大夫说的。她两个肾全都坏了。”

他还想说什么，但突然间又哭起来，一头栽在留德米尔的怀里。

“他们说是尿毒症吗？”儿子喃喃地说。

“是呀，他们认为，这是老毛病了……我们现在要特别留神，不能让她知道……留德科，你发誓吧！……你妈多珍贵啊！”

他呜咽起来。留德米尔想，父亲此刻感到的罪过或许不亚于他。他现在完全理解了父亲。但是，正是由于这样，他才越发感到难过和痛苦。当他父亲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都已前功尽弃的时候，在他萌发过晚的爱情中，在他要给她带来幸福的拚命努力中，自然包含着某种极其冷酷的东西。

留德米尔又想起了小城里那位姑娘和他自己的小品文。他本来以为写这篇小品文是在实现一种重大的、人道的事业。市团委那些年轻人的面孔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们斩钉截铁地说过的曾帮助姑娘的那些话又在他耳边回响。是的，他和他父亲也曾同样认为，他们是在使她幸福，确信他们所

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但在实际上，这已经太晚了，太晚了。

“咱们去你妈那儿吧！”他轻声说道，迅速转过身子。

（余志和译）

鲍·拉伊诺夫

六七点钟

〔**作者简介**〕 鲍戈米尔·拉伊诺夫(1919——)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哲学系。先后担任过《艺术家》、《艺术》等杂志和《文学阵线报》主编,作协第一副主席等职务,并被选为保加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角落里的人》、《雨夜》、《晚间的林荫道》,中篇小说《路茫茫》、《黑天鹅》,侦探小说《某位先生》、《好不过坏天气》,自传体小说《岁月流逝的哀歌》、《这个奇怪的职业》等。曾两次获得季米特洛夫奖金。

六点一刻,马让塔林荫道交通阻塞达到了最大限度。这是城市退潮时分,大家都想从市中心,从阴暗潮湿的办公室,从机关的混凝土笼子里逃开。成千上万的小汽车拥挤在交通要道上,好尽快回到安静的居民区或远郊去。

林荫道开始堵塞。拐角处的红灯亮了，以便为旁边街道上的车流开道。但车流刚刚动了一下，信号灯又变了，这回轮到林荫道上的车辆行驶。无数小汽车呜呜地叫起来，笨拙地开动了。一分钟，两分钟，然后重又亮起了红灯，这些小汽车重又在淡蓝色烟雾中停了下来。

克洛德从驾驶室里望去，街道上的堵塞状态一目了然。小汽车沿圣德尼成厢下坡道汇成了黑压压的巨流。瞬息间，他觉得要撞车，觉得那些车辆都会摔在林荫道上，把它塞得满满的，直至堆得齐楼房那么高。

克洛德看了看方向盘前的刻度表，晚点了十五分钟。到现在为止十五分钟，而到达终点站时，肯定还要晚这么多，又会跟检查人员闹不愉快。以前，当他还是新手时，他曾发牢骚，为自己辩解说：

“你要我怎么样？交通堵塞难道是我捏造出来的吗？”

但他的话总是被别人打断：

“既然呆在巴黎，就得会在交通堵塞中开车。如果不成，那去里昂好了。”

实际上，他也可以去里昂或其他任何地方，那有什么关系，只要原来的女朋友不在那里就行。

车队更密集了。公共汽车前空出了一小块地方，克洛德挂了头挡，慢慢地踩了一下油门。这时，一辆敞篷运动车从左边超了过去，占住了地方。他抬起脚，踩住刹车，重又关闭马达。运动车里坐着一个女人，这是很自然的，象她这样的傻女人到处乱窜，对她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交通规则。克

洛德看了看那个女人经心梳理的发式和刚刚理过的后颈，很想有一只长两三倍的手，以便轻轻敲打一下这个无赖的脖子。

拐角亮起了绿灯，克洛德准备开动马达。真没有办法，等前面的车辆开始动，后面的车跟上去时，等整个车流开始移动时，准会又亮起红灯来。

真的是这样。不过，车流毕竟朝前移动了一下，克洛德也前进了十五米。车站很近了，但在红灯那边。正当道路快要畅通时，公共汽车又得停下来，好让乘客上下车，而等它开动时，路重又堵塞了。

司机靠在方向盘上，试图想些别的事情。他从装着玻璃的驾驶室里，将整条街的情况尽收眼底。从前，刚刚学开车时，这样坐在高处，驾驶着一辆大车，别的车辆在它面前显得象蟑螂似的，这使他感到很愉快。他随意用力将方向盘左右转动，超过那些蟑螂，在它们前面占据有利的位置。让那些小昆虫当心吧，让它们当心吧，他并不担心这辆大车会被撞坏。

后来有一天，克洛德碰了碰一辆雷诺牌小汽车，仅仅碰了一下，因为那辆雷诺牌车乱闯，钻到了他跟前，他来不及刹车。只听见咔嚓一声响，仿佛一个硬壳被砸碎了似的，小汽车后面一截突然不见了，被压得象个纸袋。

在他尚未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之前，驾驶室周围已经挤满了人。两个警察把一位受惊的胖先生从雷诺牌车里扶了出来。人们吓得脸色惨白，纷纷骂道：

“不能让这种暴徒无法无天地开车！”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妇人喊道。

“把他拽下来，畜牲！”老妇人的丈夫提醒说，并用长面包指着克洛德。

接着，他跟检查机关、法院调查人员，以及在罚款等问题上，闹得很不愉快。后来，当克洛德重又坐在方向盘边时，他害怕极啦，再也不觉得这辆大车安全可靠，而觉得它象个陌生的不受管束的生物，随时有可能朝人行道上的人群冲去，或扑向某一辆不结实的小汽车。那一天，他觉得从文森至克雷兰库尔这段路特别长，简直没有尽头，甚至比长得可怕的阿尔及利亚公路更长，他曾开着军车颠簸在那条公路上，大炮把周围轰得飞沙走石。当他到达终点站时，脸上汗水直淌，衬衫紧贴在背上。

“要不要喝一杯？”售票员列昂问。

可是，当列昂看见了他的脸时，便惊叫起来：

“啊呀！朋友，你怎么啦？莫不是感到自己不行了吧？”

现在，克洛德开车不害怕了，只是也没有什么劲头，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去上班，直工作到厌恶为止。上班头几小时，他就产生了厌恶情绪，胃里积满了某种令人讨厌的金属味，头被大雾弄得昏昏沉沉，直感到恶心。

“是汽油引起的，”克洛德想，“是燃烧的汽油引起的。别的气味还可以，并不难闻。”

汽油确实会损害他的肺，因为挤在公共汽车四周的小汽车不停地放出臭气。有时他关上玻璃窗，但这时驾驶室里又充满了燃烧的石油味，更加令人恶心。

现在他也直感到恶心。他支起玻璃窗，接着又放下来了。

也可能这种气味不仅仅是来自汽油，天气也是原因之一，整天象要下雨的样子，可一直没有下。铅色的乌云低垂在洋铁瓦房顶上，夏天的午后简直如同秋天的傍晚，暗淡的黄色灯光透过各家窗户照射出来，使这座城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显得烟雾沉沉，象一件破烂的脏衣服那样旧而难看。

克洛德解开领扣，把身子往后一靠，叹了口气。红灯，还是红灯。他重又感到极度疲乏和束手无策，仿佛这种堵塞状态要永远延续下去，而他也将永远呆在这凝固住了的车流之中似的。

车流终于移动了。这位司机也开动了马达，几乎和公共汽车前面的那些小汽车同时朝前行驶。必须紧贴着你前面的车辆，否则，只要空出一小块地方，别的无赖就会马上钻过来堵住你。到了十字路口，克洛德放慢了速度，提起右边的操纵杆，等了一刹那。待前面比较畅通后，他双手紧握方向盘，将车靠近人行道。

“迪洛斯特站到啦！”从后面传来了列昂的声音。

“如果马上开动，”克洛德想，“那至少还可以往前再走二十米，可惜动不了。”

他听见列昂在跟后面的乘客吵架：

“上五个人，我说过了。车上挤得满满的，不能再上了，先生，您听明白了吗，不能再上了！”

那位先生嘟哝了几句，声音低得叫人听不清，大概是说他并非普通乘客。列昂生气地拉响了信号铃。

“现在你爱拉铃就拉吧，”克洛德心里说，“我总不能从这

些小汽车的顶盖上开过去。”

列昂倒是轻松。不错，他整天站着，但时间过得很快。更主要的是他不感到孤单，卖票时跟人们说话，对这位或那位乘客微笑，车进站跟乘客争吵，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而克洛德独自坐在四面紧闭的驾驶室里，他永远是孤单的，甚至离开驾驶室也是如此。有时他对自己说，应当想法摆脱这种孤独的境地，但他又觉得无法可想。大概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命运吧。上学时记住的一句话总在他脑海里萦回：“人独自诞生，并独自死去。”看来确实是这样，他在敦刻尔克①时最先觉察到了这一点。

他常常想起敦刻尔克。只要一闭上眼睛，便会看见由退潮形成的宽阔而潮湿的浴场和成千上万奔向大海的人。接着，突然间空气变得浓密和沉闷起来——响起了飞机引擎的隆隆声。随着不祥的号啕，第一批炸弹把那片广阔的地方弄得千疮百孔，爆炸声此起彼伏。克洛德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他趴在海滨浴场上，下意识地用手刨沙。一种想使自己变小，尽可能深地钻到地底下的奇怪的愿望紧紧地逼迫他。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他是独孤的，孤独得可怕，躺在周围的成千上万人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是孤独的。

这位司机把手从脸上挪开，重又看了看大街。回忆了一阵敦刻尔克后，他觉得情况稍微好了一点，并且常常是这样。克洛德发现了这一点，总是加以利用。每当感到困难时，他就

---

① 敦刻尔克，法国城市名。

闭上眼睛，回忆敦刻尔克。他知道经过一番回忆后，再睁开眼睛时，就会觉得现在的情况并不怎么坏，几乎是可以忍受的。

你瞧，亮起了绿灯，车流慢慢地、一行接一行地开动了。克洛德也动起来，他很难跟前面的车辆保持一两寸距离，这是危险的。假如前面的车突然停下来，那么公共汽车就会从它们顶上扑过去。必须小心谨慎，思想不能开小差。这倒很好，当你很忙时，时间就过得比较快。

绿灯还亮着，大概警察在打瞌睡吧，要不就是在跟某位不听话的司机吵架。这倒也好，让他们吵吧，再吵一会儿，克洛德就会到站了。只是不会出现这种奇迹，尤其是六七点钟的时候。

绿灯熄灭了，亮起了黄灯，紧接着是红灯。而离站还有百来米远，经常是这样。

从后面传来了列昂的声音：

"告诉您，这不是站，明白吗？"

"我对站不感兴趣！"一个女人高声说。"让我下去！"

"请跟大家一样，到站下车。"

"天啊，多么固执！你究竟让我下，还是不让？"

"不让，有规章制度。"

列昂倒轻松，在争吵中日子就会过得快些。而克洛德一直呆在驾驶室里，即使在家里也是独自一人。回到家时，他觉得象钻进了坟墓一样，房间没有窗户，准确地说，有窗户，但旁边一座楼的墙壁紧贴着它，透过玻璃只能看见没有粉刷

的砖。钥匙咔嚓一响，房门开了，里面充满暗淡的黄色光芒。灯泡愈小，电费就愈少。克洛德把旧袋子放在桌上，取出了晚餐食品：一小截香肠，一块奶酪，半个压扁了的长面包和半瓶葡萄酒。这些食品都是中午剩下来的。他总是从林荫道上出售削价商品的那家大百货公司购买食品，外面货摊上摆着最便宜的东西：香肠九十法郎一份，奶酪六十五法郎一盘，葡萄酒每瓶七十法郎，再加上面包，共二百五十法郎。克洛德无法买更贵的，有时为了换换花样，他买一小块沙丁鱼，但这是不理智的，因为不能为晚餐留下食品，即使剩下了沙丁鱼，也无法带走。

他在桌上铺了一张旧报纸，便坐下来吃饭。他没有食欲，又出现了令人讨厌的金属味，仿佛有人用青铜塞满了他的胃似的。他拔出瓶塞，使劲喝了一口酒，铜臭味减弱了，一股暖流冲进他的脑海。假如有更多的钱，那他每天晚上准会喝一瓶，甚至象无底洞贝纳那样喝两瓶。无底洞贝纳是他的同房，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喝起酒来简直没有个够。克洛德知道，此时此刻贝纳坐在拐角处那家咖啡馆的柜台前，列昂大概也在那里，还有别的人，他们肯定在掷红骰子，以便看看下一次该谁付咖啡钱。晚饭后，克洛德同样可以去咖啡馆，但他知道自己不会去，他已经没有零花钱了，而光叫别人掏钱是不行的。就象以往一样睡觉吧，就这么办。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点，左邻右舍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个郁郁寡欢的人。

“朋友，你不是生来当司机的，而该做掘墓人。”有时贝

纳对他这样说。“司机都是乐天派。”

“你倒是很轻松，”克洛德想，“两公斤葡萄酒下肚后，谁都会愉快的。”

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吃完晚饭后，克洛德用手仔细扫掉桌上的残渣，把它们扔进纸篓里。接着他就躺下了。入睡之前，他翻开那张包过面包和香肠，在袋子里揉得皱皱巴巴的报纸，这是列昂的。列昂吃午饭时看过了，然后给了克洛德，让他开开眼界。列昂参加了组织，克洛德什么也不是，在他看来一切斗争都是白搭。他参加过罢工，因为大家都参加了，何况罢工毕竟有某种意义。你要是有困难，需要十个法郎，同伴们会为你慷慨解囊，但其他的都是白搭。如果要发生什么事，没有他克洛德也会发生，只不过什么也不会发生罢了。

外面黑暗中什么地方，教堂的钟声响了十下，于是这位司机叠好报纸，熄灯就寝。再过一会儿，贝纳大概就要回来了。他回来时总是醉醺醺的，并且说个没有完，而克洛德不想聊天。不仅如此，贝纳醉成那样，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明白说了些什么。跟这样的人同居一室，有什么用？等于你单独住一样，唯一的好处是房租费分成两份，如此而已……

绿灯已经亮了两分钟，而克洛德仍未动一下，前面一位新司机大概关闭了马达。对各色各样连开关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的傻瓜也发给驾驶执照，只要蒙混过检查员的魔爪，驾驶执照就会在你口袋里。如果有大笔钞票，没有驾驶执照也好办。

车流慢慢移动了，那个新司机毕竟也开动了马达。克洛德紧跟别的车辆朝前移动着。继续开放绿灯，但每时每刻都可能变换信号。公共汽车刚刚驶到十字路口，就亮起了黄灯，但克洛德加大油门，猛地从突然空出来的十字路口穿了过去。拐角处的警察被弄得晕头转向，喊道："你疯了吗?"

克洛德很满意。当然罗，他这样做是危险的，从旁边街上开过来的汽车可能撞着他，可是这样争取了五分钟。他提起操纵杆，将车靠站停住。

"巴贝斯—罗歇苏阿尔站到啦!"列昂大声报了站名。

"这个巴贝斯—罗歇苏阿尔是个肮脏的洞。"克洛德想。

由于上面横跨一座水泥大桥，十字路显得格外昏暗和阴森。在变黑了的高层建筑物和大桥这个庞然大物之间，只能看见一小块带形天空，而现在连一小块天空也布满乌云，就象有人点着破布，往洞里灌烟似的。

突然间，路面摇晃起来，象发生了地震一样。汽车的玻璃窗咔嚓直响，车流开动的声音被突然传到十字路上面的巨响吞没了。瞬息间，克洛德陷入心灵空虚之中，就象在敦刻尔克炸弹爆炸时曾经感受过的一样。不过这仅仅是一瞬间——接着心情又轻松下来了，原来震动是由于地铁通过引起的。

对面拐角处，两边都有伤风败俗的咖啡馆，门口闪着霓虹灯，里面照耀着白光和蓝光，青年人和金发女郎在里面转来转去。克洛德知道他们是些什么玩艺儿，但有时也羡慕他们，与其整天呆在方向盘边，被堵塞在街上，还不如象他们

这样活着好，在角落里卖一小时走私香烟，然后跟朋友们玩两小时牌，再去卖烟。还有更容易的，那就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掏别人的口袋，这有点冒险，靠碰运气，不妨请一星期假试一试。还有最容易的：女朋友在上面客房里为你挣钱，而你暖暖和和地坐在咖啡厅喝几杯。不，这不是最容易的，至少对克洛德来说不是这样，一想到女友扎克琳，他就受不了。但其他的确实容易，当然只要你会干，只要你有本事。

列昂早就拉响了信号铃，而克洛德仍然来不及动。周围的车辆象群蚂蚁，超过了他，急剧地拐到了公共汽车前面，连一寸地方也不剩。那些司机一点也不注意，他就更应加倍小心。最后克洛德发现间距大了一些，便踩了一下油门，可是这时一辆绿色小轿车超到了他前面，车身挡住了他。克洛德赶紧急刹车，公共汽车震动了一下，象碰在墙上似的，在离那辆小轿车两指远的地方停住了。就在这时，车流重又停下来了，克洛德把头伸出窗外，说：

“喂，你这个滑头！算你走运，我没有再往前开，否则，准会把你连同你的小轿车压成肉酱！”

小轿车里坐着一个青年男子，他脸部有点浮肿，看上去象个无赖。一个身穿白大衣的女人伸开腿躺在他旁边。那男子以无所谓的态度望着前面，仿佛挨骂的是别人。

“我会教训你的，畜牲！”克洛德想。他使劲握着方向盘，把车轮打正。只要前面一动，他把车略拐一下，然后马上打直，那辆小轿车就会被甩在后面。克洛德瞧了瞧绿色小轿车里的两个人，更加使他恼火。“他们装着没有看见我，这些贵

族！受过教育的人对各种司机理也不理。”

那个女人调皮地挥动着白手套，象是指着什么东西；男子微微弯着腰，听她说话。他们既不是忙着去上班，也不是急于回家，大概是去爬蒙马特山，去山顶游玩，或者是去某家舞厅跳舞吧。他们愈是想往前钻，就愈觉得时间晚了。而克洛德，你瞧，他等后面的人都过去了再走也可以，平民有什么要紧事，等就等吧。

前面的车辆在慢慢移动。克洛德从驾驶室里发现该轮到他前进了，于是便开动了马达，用一只脚踩着离合器，注视着前面。两辆车刚一开动，他赶紧动起来。绿色小轿车只晚了一瞬间，但这已经够了。克洛德机灵地拐了个弯，便挡住了它的路。“跟在我屁股后面爬吧，你们这些贵族！”

车流加快了前进速度，公共汽车飞快地驶过大桥昏暗的拱门，在这里马达总是发出沉闷的隆隆声。然后玻璃窗重又亮了——汽车开到了巴贝斯街，到了这里交通堵塞有所缓和。克洛德几乎每次都无需等待，顺利到达沙托鲁日站；并能补上几分钟。现在也会顺利的。

他使劲踩了一下油门，挂上第三挡。但在这一刹那间，又有人超过了他，就是那辆绿色小轿车。那个人想进行报复，超过公共汽车后，便故意挑衅地放慢速度，迫使公共汽车司机同样减速。克洛德几乎难以克制自己，想朝那个无赖冲过去，把他撞到人行道上，叫他的汽车摔成碎片。为了消气，他一个劲儿按喇叭，尽管禁止这样做。在刺耳的喇叭声中，那辆小轿车哆哆嗦嗦地加快了行进速度，但马上镇静下来了，重

又减速。那个有点浮肿的青年把脸露出车外，蛮横无礼地瞪着克洛德：下次你小心点！

这已经过分了。克洛德一面机械地继续开车，一面也将头伸出车外，使劲喊道：

“听着，你这个混账东西，你这个娼妇和匪帮养的！你要是再碰到我手上，就要找你算账！我要给你点厉害瞧瞧，叫你直接进医院，你这个可耻的小财主！”

到了拐角处，公共汽车被红灯挡住了，而那辆绿色小轿车已飞驰而过，但克洛德还在骂，声音愈来愈大，骂得愈来愈厉害，因想不出更带侮辱性和更肮脏的词令而结巴起来。在周围一片轰隆声中，他就这样坐在驾驶室里，独自喊叫着，谁也听不见，直至最后骂累了才停歇下来。

现在他感到轻松了些，气已经消了，留下来的只是疲劳，需要恢复精神。他用手掌擦了擦脸，然后往后一靠，无力地松开了手。数八下，不，数十下，绿灯就会亮的。克洛德脑子里慢慢数着，绿灯果然亮了，只不过这种把戏已经不能使他获得愉快，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几乎每次都猜中，而且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从前，他指望扎克琳，指望在一个月内找到住房，还有别的指望。

公共汽车又开动了。再过一会儿，列昂就会报站：

“沙托鲁日……”

但是这一次列昂没有报站，大概是由于跟乘客说话而忘了吧。克洛德直接听到了开车的信号铃。“与其一个劲儿拉铃，不如稍微积极一点好。”克洛德低声埋怨说。“现在有你等

的了。”

沙托鲁日街道纵横，六面交叉，各条街都被小汽车和卡车挤得水泄不通。从库斯坦街开过来的车流看来没有及时停住，整个交通被堵塞了。两个警察喊得脸红脖子粗，从车辆中穿来穿去，怒气冲冲地挥着手。本来早就为普列街开了绿灯，但由于没有空道，车辆无法通行。有的人失去了耐心，便一个劲儿按喇叭，其他的人也跟着按起来，于是瞬息之间，整条街上响彻着各种喇叭声，有尖细的，也有低沉的，十分刺耳。不一会儿，杰让街也响起了喇叭声，紧接着是奥纳诺街，最后六条街上的喇叭声响彻云霄。警察们狂怒地挥动着指挥棒。一张张愤怒的脸伸出车外，司机们凶狠地张开大嘴说着什么。附近楼房里的居民们都跑到阳台上看热闹。

喇叭声愈来愈厉害和刺耳，仿佛全城要用这种无法忍受的金属声发泄一整天积下来的怨气似的。在这一片混乱中，每一个烦恼的人都可以任意咒骂。一些从来不受注意的人热情地投身于这种混乱局面之中，到处帮忙，提出各种建议，瞬息间他们觉得自己也是有力量的。被单调的家务弄得疲惫不堪的家庭主妇都从窗口探出头来，看看这一切如何收场，并暗暗希望这种场面不要马上结束，在无事可乐的情况下，交通堵塞场面毕竟也是有趣的。

克洛德继续坐在驾驶室里，靠在方向盘上。从前，遇到这种乱糟糟的场面时，他也同样帮过忙，跟人争吵，帮助疏通车辆。但这是过去的事。现在他就这样坐着，看会堵塞多久。

突然间他感到有点奇怪——呆呆地坐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间，却觉得自己很孤独。整个十字路口响彻着喇叭声，人们相互咒骂，无数张脸接二连三地露出车外，而克洛德却感到万分孤独，比鲁滨逊① 在荒岛上还要孤独。一种荒诞的感觉笼罩着他：拐弯处高高耸立、颜色变黑的建筑物，车辆和行人混杂在一起的乱糟糟的场面，喇叭的尖叫声——这一切也许不存在。假如仔细擦擦眼睛，可能发现是做过梦后，只有妈妈带着和善和疲倦的神色，弯腰站在他的床前：

"起来，克洛德，起来，我的孩子，上学要迟到了……"

他仿佛觉得闻到了烤面包和热茶那差不多忘记了的清淡香味。紧接着就是令人振奋的冷水浴、早餐和逗猫玩。实际上那是只公猫，但不知为什么给它命名为玛尔戈，它毫无怨言地接受这个雌性名字。

"天啊，快放下这个小动物吧，你要迟到啦！"

"好的，我就走。只是你给我两个苏② 吧。"

"要两个苏干什么？"

"课间休息时买甜面包呀。"

"哪里有钱罗，你不是知道吗，我们不是富人。"

没有甜面包也照样生活。学校使人感到靠得住，既然让你学习，那就意味着需要你，有地方等你去工作。究竟是什么地方？克洛德不知道，而且也不怎么感兴趣。他本人倒是

---

① 鲁滨逊系英国作家笛福所著长篇小说《鲁滨逊飘流记》中的主人公。

② 苏——法国五生丁辅币，1947年停止流通。

乐意成为北美的骑马牧人，或至少是印第安人……

我们这位司机用手揉了揉眼睛，伸直了腿。十字路口黑压压的建筑物高耸在他头顶上。不，这不是梦，那回事早就过去了。

一辆黑色小卡车顺利开到了对面拐弯处，从上面跳下来许多警察，他们由一位帽子上镶着白边的警官率领着。

“倒要看看这些人有什么办法。”

当警察们在汽车之间转来转去，用罚款和威胁来制服司机们时，那警官站在十字路中间，不停地挥动着手，开始下命令了。

克洛德注视着戴白边帽子的人的动作，他马上明白这个人懂行。警官首先命令那些拥挤在第三条车道上，妨碍广场畅通的那些车往后倒，这要求从很远的地方，乃至从旁边的街开始动起，但没有别的办法。克洛德从一开始就知道，如果警察只在十字路口转来转去，那什么也解决不了，而这个人很懂行，知道从远处着手。

当巴贝斯街左边的路面空出来后，警官为从库斯坦街开过来的、占着广场的车辆放行，然后全部交通重又停止，直至奥纳诺街右边的路面腾出来时，才给巴贝斯街开放绿灯。

克洛德踩了一下油门，头一个飞速穿过十字路口。开始时，林荫道空出了三十多米远。在下一个交叉路口混乱局面出现之前，必须充分利用时间。我们这位司机把油门开到最大限度，挂上第三挡，一分钟后那个危险的拐角已被甩到后

面了。“如果能这样开到马卡杰街的话……”克洛德想，尽管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稍一堵塞就会打乱周围几公里的交通，它象石头投入水中时泛起的层层圆圈那样逐渐扩大。只要什么地方的交通堵塞五分钟，那么三条街上的一切都会搅在一起。而当车流最后从堵塞的地方摆脱出来时，又会被它们自己造成的邻街拥挤的汽车所堵住。克洛德已经发现前面挤满了汽车，于是他减了速，选择比较有利的地方，将车停了下来。他迅速环视了一下十字路口，发现对面的交通并没有搞乱，只不过车辆太多了点，不会等待很久的。

克洛德怀着敌意望着豪华汽车里的人们，那些车大部分是黑色的，克洛德觉得它们象一群藏在某个脏角落里的大蟑螂。当他观察这些蟑螂时，又觉得自己心里空虚得难受，那样一种空虚感，你想把它从心里挤走，可它却愈来愈厉害，乃至笼罩着你全身。

每当跟扎克琳见面后，克洛德就有这种感觉。它不是马上出现，开始是痛苦，然后才出现空虚感。

扎克琳在食品店工作，克洛德常去那里购买午餐食品。她在外面出售熟食，久而久之便记住了克洛德，因为他每次都是那几句话：

“请来一份香肠，一个面包……”

“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老吃香肠会伤胃的。”

“那要我怎么办？”克洛德嘟哝着。“我要是家里有一个象您这样的美人，那……”

“为什么没有呀？谁妨碍您啦？”

交谈一般到此为止，周围许多人等待购买食品，扎克琳根本没有时间聊天。

但是，有一次食品摊旁边没有人，克洛德可以回答她的问题了：

“有钱的男人找您这么漂亮的姑娘。”

“胡说！”扎克琳说。“这是某些人捏造出来的，因为女人不理睬他们。”

“你指的是我这种人吗？”克洛德问。

她看了看他。克洛德有一张光滑洁白的脸，眼睛温柔而富于沉思，完全象个小伙子，只不过是个带着遮檐帽、穿着司机服的大小伙子罢了。

“不知道。”扎克琳微笑着。“假如象您这样的人邀请我去看电影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拒绝。”

当天晚上，他们头一次去看了电影。后来又去过好多次。他们坐在楼上角落里，手拉着手，相互亲吻。所有看过的电影，克洛德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他只记得软绒线衫里温暖的圆肩膀，紧靠在他身上的光滑、凉爽的皮肤和断断续续的话语，这些话毫无意义，但毕竟难以令人忘记。

克洛德不再在车站外面将袋子摊在膝盖上吃午饭，而是跟扎克琳一起在拐角处咖啡馆里吃三明治。当然罗，三明治稍微贵一点，但他可以跟扎克琳度过中午那段休息时间。这样，他们有整整一小时，相互看个够，交谈许多事情，尤其是住房问题。

起初，他们设想临时住克洛德那里。后来，看了那间窗

户紧挨着墙的小房间后，扎克琳傻了眼，失望地低声说：

“这里完全象坟墓……”

“我不是对你说过不好吗?”克洛德难为情地说。

此时此刻，他自己觉得如果他们就这样开始生活的话，那就意味着从一开始就破坏了这种生活。于是他们决定另找房子。

扎克琳的父亲同意他俩结婚，他是铁路工人，尚未退休。

“铁路工人和汽车司机，”老人大声说，“有何区别？我们都一样。有钱者为王，钱愈多，王愈大，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她母亲什么也没有说。克洛德明白，她之所以一言不发，是因为她不同意。他有时甚至还同情她：养大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儿，就把她嫁给一个汽车司机，不是没有痛苦的。克洛德同意这一看法，即他配不上扎克琳。可是，难道仅仅因为配不上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幸福吗？必须尽快找到房子，其他一切都好办。

但是，无法找到房子。有时找到了，房租费又贵得出奇。

“不要灰心，”扎克琳说，“我们再找一下，最终你那间房子总是靠得住的。”

于是他放心了。有一间房子，尽管没有窗户，这毕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可想嘛。

后来，扎克琳调到中心商店去了，她在工作中是把好手，

应当提升。只是现在他们不能在一起吃午饭、讨论房子问题和交谈各自的工作就是了。剩下来的只有晚上，但等扎克琳从市中心回来时，已经过了八点。他们去看电影，要不就跟老人坐在一起交谈，因为不能每天都去电影院。克洛德在老人面前和听了扎克琳讲的一些事情后，感到不好意思。

“你不知道一些穿着什么服装的太太来我们店买东西哟，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这种人会走进我们店。她们穿着虎皮大衣和鳄鱼皮鞋……”

“虎皮，胡闹！”铁路工人以嘲笑的口吻说。“穿衣是为了暖身，而不是为了给别人看。我是这么想的。”

“你怎么想，一点也不重要。”她母亲说。“服装和你的工作服并不是一码事。如果法国驰名遐迩的话，那是由于服装的缘故。”

“得啦，得啦！”老头子生气说。“你知道法国以什么出名？你所谓的服装只有小偷会穿，也只有用偷来的钱才会买。”

“对你来说，除了我们这些衣衫褴褛的人外，都是小偷。”

克洛德沉默着，不好意思地挪动了一下位置。他觉得这次家庭争吵包含有另外的意思，一切都是围绕他而发的。实际上老头子是说：

“小伙子，不要被这些蠢话弄糊涂了，要站稳点！”

而老太太坚持说：

“让孩子走自已的路吧，她要你这位司机干什么？”

他偷偷地瞥了扎克琳一眼，看她是否也这么认为，但扎

克琳完全沉浸在白天的印象之中。

“前几天，商店关门之前，走进一位女顾客。妈妈，你猜她穿的是什么？是黄驼毛大衣，高领子……”

最前面的汽车呜呜地响起来了，但过了好久才轮到克洛德开动。“最多能走十米，”他估计说，“又得停下来。”然而连五米也没有走成，最后一瞬间，变速杆出了毛病。等他开动时，后面的汽车已从右边插上去了，挡住了他的路。公共汽车刚刚动了一下，又被挤在人行道边。

克洛德重又回到他跟扎克琳的那段往事上去了。实际上已经用不着想，因为毫无结果，想又有什么用呢？

开始一切都象从前一样。后来他们之间的幽会慢慢减少了，这一次她说很累，下一次又说是跟朋友约好了出去玩，再不就是店里加班。当他们去看电影时，扎克琳仍然让克洛德拉着她的手，但在整个放映过程中，她聚精会神地看电影。她也很少提及房子问题，有时问一声，只不过是断片时填补一下间歇时间罢了。

克洛德对自己说，也许他有点蠢，但并未蠢到那种程度。他知道歌剧院附近的闹市不象郊区，一些上了年纪或者年轻的有钱人之所以在商店里转来转去，是为了跟女售货员调情。这些商店的女售货员都是些漂亮姑娘，跟她们来往比冒险去找某个时装模特儿或夜总会的舞女要便宜得多。

“一个这样的坏蛋把我的女朋友也给抢走了。”克洛德想。“假如现在还没有抢走她的话，将来也会抢走的。还有什么更容易的，扎克琳光想各种服装。”

他知道自己配不上扎克琳。对一个汽车司机来说，她太漂亮了，她有权享受他不具备的那些东西。他感到问心有愧和无能为力，有什么办法？除了一间窗子紧贴着墙的房子外，他什么也不能为她提供。

“请告诉我，你是不是已经不爱我啦？”一天晚上走出电影院后，克洛德问。

“我的天啊，克洛德，别再提这种可笑的问题了。”

走了几步后，她口气缓和地补充说：

“我当然爱你，可你没有发现吗，我们没有任何可能性，最小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你连一间房子也找不到。”

“还有最后备用的一间呀！”他忧愁地想，但说出来的却是另外一番话：

“我继续找，今天听说圣德尼街附近可以找到。”

“是呀，可是究竟什么时候能找到呢？你不是已经找了好几个月了吗？……”

“近几天我们还见不见面？”他们分手时，克洛德问。

他本来想说“明天我们见面吗”，但话到了嘴边，又不敢这么说了。

“好的，只是这几天不行，我们要为复活节做准备，特别忙。等我有空时，再跟你联系。”

克洛德觉察出大概临近尾声了，但他不知道事实上尾声已经来临，扎克琳不会再找他了。

后来一天晚上，他们偶然在咖啡馆前相遇。当时很冷，扎克琳裹着一件淡黄色驼绒大衣。

“是你呀，克洛德！”她拦住他，多少有点难为情，朝他伸出手来。

他同样感到突然，强装笑脸，战战兢兢地看了看她，但她显得冷淡和难于接近。扎克琳穿着高领大衣，梳着时髦头，散发出异样的香气。

他们不好意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克洛德并非指责地说：

“就是说，你总算穿上了黄大衣……”

“是呀。”她说，“我积蓄了点钱。你怎么样？”

“不怎么样，你想我能做出什么呀，什么也干不了。”

他们就这样分手了。后来他最后见了她一面，但这次是从远远的地方，透过橱窗……

车流又移动了。这次克洛德事先握好操纵杆，开动了马达，只等待加大油门。公共汽车开动了，几乎紧贴着前面的汽车，穿过了十字路口，停在奥纳诺林荫道上。

“马卡德—波阿索尼耶尔站到啦！”列昂大声地喊。

每到大站，他总是郑重地通知乘客。

“这里下车的人多，”克洛德想，“要等好一会儿，等就等吧，现在已经不可怕了。”前面，克洛德视线所及的地方，挤满了车辆，但这些汽车都在行进着。公共汽车已经驶过了交通堵塞地段。

列昂拉响了信号铃，准备开车了。假如到达终点站前不再堵塞的话，那么这次晚点了半趟，加上白天一趟半，共晚两趟。跟检查机关的人吵架是无疑的了，但愿不再发生别的

事情。

当驶近奥纳诺街第二道交叉路口时，克洛德习惯地朝右边看了看。这里是扎克琳从前工作的商店，外面熟食摊旁站着一位穿蓝工作服的姑娘，但这不是扎克琳，而是一个脸上长着淡淡雀斑的陌生姑娘。

“为什么老是发生这种事？”他寻思着。“为什么富人把穷人的一切，乃至连漂亮姑娘都抢走了？”假如偶然来了一位漂亮姑娘，不出一月就会派她去市中心工作，郊区的商店没有美人也可以过得去。

克洛德想起了歌剧院附近那家商店的橱窗。那是复活节前一天，下午他有空，便去买东西。克洛德已经买好了食品：一截香肠，一包奶酪，一条过节吃的沙丁鱼。这样，他可以利用下午散散步。他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金字塔站下，他知道自己会在这里下车，尽管事先并未考虑这一点。拐角处，扎克琳所在的那家商店周围闪烁着红、白色霓虹灯。当时下着小雨，人们都急于从装着玻璃门的大门口进商店里去。克洛德从人群中挤到橱窗前，往里面瞧了瞧。开始他什么也分辨不清，因为很亮，又挤满了人。后来他看见了扎克琳。她穿着蓝工作服，坐在糖果摊后面。该店女售货员都有这种工作服，但蓝色的看起来象是为扎克琳，为她那张无光泽的脸和深栗色头发而特制的一样。这样，当她穿起工作服时，克洛德觉得她重又变成了从前那个可爱的扎克琳。橱窗旁的人把他挤来挤去，妨碍他往里瞧。

“听我说，小伙子，如果你不进去，就给别人让开路！”

他背后一个老头儿生气地说。

克洛德挪动了一下位置，又把脸紧贴在玻璃上。扎克琳离得很远，但他清楚地看见她的手在货架上动来动去，她的脸忽而转向这边的顾客，忽而又转向那边的顾客。你瞧，她这就要笑了，在笑之前，她总是这样抬起眉毛。她正摸着胸前佩戴的胸饰，考虑问题时，扎克琳总是这样摸摸胸饰。这会儿，她用手指指这，指指那：想买什么，自己挑选吧。

人们从四面八方朝他挤来，好几次他不得不往后退。后来下起了大雨，于是人群散了。这一下倒好，现在整个橱窗前只剩下克洛德一个人了，他可以尽情地往糖果柜台那边瞧。过了一会儿，扎克琳转过头来往外面瞧了瞧，他急忙往后缩，拐到角落里。他一拐进角落，就觉得整座城市突然间变得黑暗和毫无意思了，再也没有别处可去，无事可做。他觉得背上有小蚂蚁在爬，原来是汗。他想起了无底洞贝纳的话：当你难受时，就猛喝酒吧。他不想喝，什么也不想干，一切都毫无意思……

“塞姆普伦站到啦！”从后面传来了列昂报站的声音。

公共汽车停在倒数第一站。再过一会儿，就要下班了，这种想法并不使克洛德感到鼓舞。“明天是星期日。”——为了打起精神来，他这样提醒自己。但这也不能使他感到愉快，对他来说，所有的星期日都散发着石碳酸和医院的气味。星期日……

列昂从后面生气地拉响了信号铃，意思是说：“喂，朋友，睡着了吗？你倒是会找时间睡觉啊。”列昂盼望快点下班，他

喉咙干了。

克洛德开动了汽车，挂上第二挡，一只手松开了方向盘，打开了另一扇玻璃窗。他感到闷热。前面，安着烟囱和避雷针的两排长长的镀锌屋顶之间，天空仍然那样低垂着，阴沉沉的，大概快要下雨了。

星期日……这意味着在那间充满毒化了的空气和无底洞散发出来的酒味的房子里可以晚起一点。然后他去最便宜的咖啡馆，那里也散发着烟黑和烧焦了的糖味，接着就得出门了。他穿上从前跟扎克琳看电影时穿的那套节日服装，裤子前面线缝边快要磨破了，但还没有穿孔，一般情况下看不出来。然后他戴上帽子，拿起昨天晚上放在桌上的那包酸糖果，这种糖既便宜，又经吃，一颗糖放在嘴里，可以噙很长时间。贝纳还在睡觉，克洛德羡慕地看了看这位朋友平静而浮肿的脸，然后轻轻地关上门，就出去了。

星期日，公共汽车二三十分钟一趟，需要换好几次车，才能到达萨尔佩特里耶拉。克洛德从这趟车跳上那趟车，在车站等很长时间，一个人在星期日空荡荡的街上，最后终于到了。他经过一座已经变黑的大拱门，走进地上铺着石板的大院，这就是萨尔佩特里耶拉——“穷人的陈尸所”，正如人们所说。克洛德对这地方已经习惯了——第三幢楼，第二层。他刚一走进这座墙上的石灰已经脱落、潮湿而发黄的建筑物的大门，一股石碳酸和令人作呕的浓腥味直朝他袭来。第三幢楼第二层，克洛德走进挤满一排排白床的病室，从门口数去第八床。他母亲试图抬起身子，她那包着白头巾、由青筋

显露的细脖子支撑着的头直打哆嗦。

“克洛德，亲爱的，最后你也终于来了。在车站等了很久吧，我的孩子？”

他亲吻着母亲面颊上冷冰冰的布满皱纹的皮肤，回答说没有等很久，象往常一样，然后坐在早已准备好的凳子上。

老人谈了一些医院的情况，如这一周谁死了呀，护士对病人如何凶呀等等。“但愿她多说几句，”克洛德想，“否则我们就得沉默了。”

他一面听，一面望着床头上表层已经脱落的地方。白漆已经被磨掉了，留下一块斑点，其形状如同法国地图。坐在这里时，他一直望着这个表层脱落的地方。

最后，他母亲讲完了，问他有什么新消息。

“没有什么，跟从前一样。”

“房子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吗？”

“到目前为止还不好解决，不过会找到的。”

他母亲不知道他跟扎克琳的关系已经断了，也没有必要让她知道。

“会解决的，我的孩子，当然会解决，我甚至预感到很快就会解决。最后让你们有个归宿，象真正的家庭那样生活。”

克洛德一直望着那个表层已经脱落的地方，这个地方确实象一张地图。

接着，老人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说：

“哎，为什么上帝不可怜我，让我早点闭上眼睛呀，免得我自己受罪，也连累了你们。”

“别这么说，”克洛德说，同时难为情地挪动了一下位置。“你不是知道吗，你会恢复健康的，而且一点也没有连累我们。”

“知道，我的孩子。我知道医院吞噬了我们多少钱，我也知道你身上连件衣服也没有。怎么没有一个好人给我点什么毒药，让我一下子完结了啊。”

克洛德又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同时疲倦地望着那块斑点。然后他们还是这样坐着，默默无言，各有各的想法。对面的建筑物在黄昏中显得那样寂静和遥远。

“给你带来了一点水果糖。”为了打破沉默，克洛德说。“是便宜的，但清凉可口。”他补充说，因为这小包糖放在口袋里经挤压后，看起来少得可怜。

接着为这笔多余的开支发生了小小的争吵，然后就告辞了。他重又往回走，重又是空无行人的车站，重又是窗子紧贴着墙的房间和黄色灯光……

公共汽车驶出了林荫道，在广场上拐了个大弯，停在装有玻璃窗的站前。

“克林兰库尔门到啦！”列昂在后面比以前更带劲地喊道。

为了准确无误，他又喊起来：

“终点站到啦！”

过了一会儿，他从左边的窗口问克洛德：

“喂，想不想喝一杯？”

“不想喝，”克洛德说，“我等人来接班。”

“行啦！那就这样吧，明天见！”

“明天见。”

克洛德疲倦地靠在坐位上，看了看手表。加上白天，一共晚点了两趟，准备挨骂吧。

从窗外吹进来一股潮湿的空气。广场外面林荫道上凋萎的树木摇曳起来，低垂的天空突然掉起雨点来，最后终于下雨了。

郊区那个阴暗的广场变得更加昏暗。在雨点的猛烈冲击下，那些发黑的低层建筑物几乎变成黑的了。拐角处的咖啡馆闪耀着昏暗的淡黄色光芒。“明天是星期日，”为了打起精神，他这样提醒自己，“可以睡个懒觉。”星期日，又有何用呢？他感到恶心，内心的空虚之感重又增长起来。他趴在方向盘上，闭目养神。

哗啦啦的雨点声使他想起雨滴打在潮湿海滨浴场上的咚咚声。风声愈来愈大，海浪轰隆地咆哮着，然后空气突然变得浓密和沉闷起来，响起了一阵爆炸声，整个大地震动起来，炸弹凶恶的轰隆声撕裂了大片土地，一个、两个、三个，无数的炸弹。巡洋舰的大炮从大洋里令人恐惧地怒吼着。在轰隆声中，警报器发出尖细的叫声。克洛德被震得两耳欲聋，用发抖的双腿使劲往沙里钻，一心想钻到地底下去，以躲避全部压在他身上的宇宙。

他睁开了眼睛，广场上静悄悄的。拐角处的咖啡馆闪耀着绿色灯光。雨点平静地打在汽车玻璃上。

现在好了，又可以轻松地呼吸了。

（樊　石译）

约·拉迪奇科夫

和　　风

〔**作者简介**〕 约尔丹·拉迪奇科夫(1929—)生于米哈伊洛夫格勒州卡利马尼查村，中学毕业后编过《人民青年报》、《文学阵线报》等，从1970年起任国务委员会顾问。自五十年代末以来，拉迪奇科夫以其短篇小说集《心为人们跳动》、《带火药味的字母表》，中篇小说《忆马》，长篇小说《谁之罪》等二十余本农村题材的小说赢得了广大读者。曾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驼子拾掇好了子弹带：他打算到贝基罗夫泉去打斑鸠。斑鸠不在这儿歇脚、啁啾——塔楼上的轮子转动时发出的响声把它们吓飞了。驼子要菲利普老汉帮他看守钓鱼竿。

“现在没有风，”他说，“可一起风，鱼儿就会上钩。”

“大概会起风。”菲利普老汉说。

驼子把黄色弹筒统统塞在子弹带上，只留了一个红色弹筒在外，然后系上了子弹带。

“就让那个黑家伙晒晒太阳，”他说，“咱们过一会儿再看看该拿他怎么办。”

“让他晒晒吧，”菲利普说，“说不定会长记性的。”

他瞅了瞅两大篮子香瓜和那个被太阳晒成紫铜色的吉卜赛人。吉卜赛人坐在两个篮子中间，慢条斯理地卷烟——用舌头舐着报纸的边沿。在篮子那边，一条狗在草地上东嗅嗅，西嗅嗅。

“把狗留下吗？”老汉问道。

“我带它去。”驼子说着，瞅了红色弹筒一眼，“回来时，我要路过佩特洛夫山。”

“眼下不准打兔子，”老汉说，“谁也不去佩特洛夫山。最好把狗留下，它病啦，一早晨都在啃青草。”

“肚子里有虫。”

驼子把红色弹筒在手掌上抛了抛，然后把它塞进子弹带的最后一格，同子弹带的扣环放在一起。

“有虫，”他说，“兽医那天跟我说，它有绦虫病。狗得这种病。狗病也叫这名字。”

“人和狗都会生病，”菲利普说，“都得绦虫病。只有鱼不会病死。”

他又瞅了一眼坐在两篮香瓜中间的不怕晒太阳的吉卜赛人。

“是呀，是呀，”驼子说着，试了试腰间的皮带结得牢不牢。

“迪亚纳！迪亚纳！”

猎狗东倒西歪地从柔软的草地上朝草房跑来，瞅着驼子的双手。由于天气热、狗蚤咬和绦虫病，它疲乏地拖着一条尾巴。老汉看着它那摇摇晃晃的样子，心想，几年前，这狗还满漂亮的，可现在，它长了一脸胡子，眼珠也变黄了。

驼子朝河湾走去。他有点瘸，跟在后面的猎狗也一摇一摆。有什么东西在把猎狗往下拉——也许是大地——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来，可又没有倒下来，仍然在驼子后面艰难地拖着步子，使劲吐着舌头。老汉想到，他年轻时候也曾出外打猎，走起路来步履矫健，神气活现，可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以致他有时怀疑，是他自己去打过猎呢，还是他听别人讲的。

老汉瞥见自己的身影已经变得很短，心想，驼子已走了老大一会了，但他未必能在贝基罗夫泉打到什么。也许这倒更好——他昨天去得晚，回来时两手空空，没完没了地说：“没打到什么，菲利普！一无所获！”

驼子预言鸟群不会飞来啁啾，真说到了点子上。塔楼上轮子的响声把它们吓飞了。它们聚集在贝基罗夫泉饮水，啄沙粒——那沙粒犹如水晶般洁净——然后，它们轻轻拍打着翅膀升到空中，栖息在核桃树的枯枝上。这是些斑鸠、林鸽和野鸽。它们在枯枝上用嘴梳理自己玫瑰色的或红色的羽毛；摆在它们前面的是遥远的路程，因此，它们要查查自己的每根羽毛是否结实。如果它们怀疑哪根羽毛承担不了飘洋过海

的重任，它们就把它拔掉。

它们真的知道，它们只需要结实的羽毛吗？

雄鸟欢唱着，围着自己勤劳的女伴打转。它们象国王一样自傲，可又十分愚蠢：唱歌时竟然闭着眼睛，全然不顾周围的一切。它们的死亡是来得那般突然，即还在空中，还在树枝上，就一命呜呼了，甚至没有时间表示惊愕。随着猎人的枪响，活着的鸟儿惊惶失措地扑飞起来。不过，还没有等到火药味消散，它们就骤然忘了恐惧，又飞回原处。它们急于在夏末唱完所有的歌，然后同其他候鸟一道朝南飞去。猎人们同样急不可耐，因为他们知道，鸟儿很快就要飞走，而它们的肉现在最鲜——又肥又嫩。他们在清晨（迷人的朝霞，震撼大地的枪声！）或者傍晚狩猎，此时，鸟儿在颤抖着的热乎乎的空气中幻影般飞来飞去，喊喊喳喳地叫个不停。

但是，昨天晚上，驼子空手而回。他不明白鸟儿为什么没有飞来。菲利普老汉却是知道缘由的。昨晚的天空一片红，没有一丝风。鸟儿害怕红色的天空，躲进森林里去了。

昨天确实没有一丝风，菲利普气喘吁吁地爬上塔楼，转动轮子。有风时，轮子就自个儿转动，铁链就敲得铁板叮当作响。这响声赶走了瓜地里的野鼠和野兔，也赶走了鸟群。要是刮风，一切都如愿以偿，因为此时可以就着草房后边的阴影躺下来，尽情地休憩或者睡觉，而头顶上的轮子在不停地旋转，发出响声，保护瓜地、葡萄园和麦垛。

现在，老汉只好沿着他熟悉的发亮的楼梯爬上塔楼。要爬得稳当，他不仅需用两手，而且还要把胸脯贴紧楼梯。往上

爬时，他看见了许多怕见阳光的蝙蝠，它们钻到缝隙里，睡得象死了一样。

他把轮子转了几圈，铁链碰得铁板叮当作响。他举目远眺，想看见驼子，可谁也没看见。河里趴着几条水牛，牛背黑黝黝地闪光。牛的右边是佩特洛夫山黑糊糊的树林和葡萄园，而牛的前方和左边则是一片灰蒙蒙的、沉醉在暑热中的梦境般的平川。尽管烈日杲杲，天空仍是一片瓦蓝。老汉一扭头，瞅见了那间草房和坐在两篮香瓜间的吉卜赛人。吉卜赛人听见铁链的响声，扬起头来，一边瞪着老汉，一边用牙齿咬着卷烟。这支烟还在驼子动身前就卷好了，可到现在还没有点燃。

“你没中暑吧？”老汉冲他喊着。

“不抽烟，可就要中暑啦！”那人脸上的肌肉动了动，想笑。

“你看，那儿有火，”菲利普说，“那儿有一堆火。”

吉卜赛人从两个篮子中间钻了出来。

老汉从塔楼上能看清他的脊背——黑衣服上缀满花花绿绿补钉的拱着的脊背。老汉的衬衣上也有两个补钉，可这是白布，又补得象样。那一位呢……

“喂。”菲利普喊道。

吉卜赛人用一双黄眼睛瞅着他。

“要我说，你就这么打发日子？”

“我该死！”吉卜赛人直起身子，“我有五个孩子，要是以前偷过东西，他们就遭天打五雷轰。上天有眼，天晓得。”

他站在塔楼下，想画十字，可又没有画，只是伸出舌头

舐了舐三个指头。看见他那模样，老汉想起了猎狗。猎狗也常常蹲在塔楼下，扬起它现出老相的、长满胡子的脸瞅着他。它的眼睛象吉卜赛人的眼睛一样黄。“大概是由于到处流浪的缘故。”老汉想。

“你是教徒吗？”他问。

“没有。”那人吐出一口烟，回答说。

“没有什么？”

“上帝。”

老汉坐在轮子后边的地板上。黑压压一群鹁鸟飞过草地，飞过水牛的上空。这群鸟时而聚合，时而散开，时而低飞，时而升腾，可它们总是朝着一个方向——朝葡萄园飞去。老汉反过手去抓住轮子，转动起来。鹁鸟听见金属的响声，没有落在葡萄园里，而是朝林木葱茏的山岗飞去。

“不要紧，”菲利普说，“尼科尔乔神甫也信教，可就连他也不相信有上帝。”

“我不认识尼科尔乔神甫。”吉卜赛人点了点头。

“一个酒鬼。鬼迷心窍啦。”

“我也是鬼迷心窍。”吉卜赛人在塔楼下笑呵呵地说。

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缝，老汉难以看清他一双黄眼睛的闪光。他站在那儿，黑得象圣经里的魔鬼，还把一双结实的手放在胸前，似乎在请求盘腿坐在塔楼上的满脸花白胡髭的老汉发发善心。

从高处看人，人就显得小。菲利普很想记起，这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呢，还是别人告诉他的。实际上，这也没有意

义。对他来说，只要符合事实就行。他知道，要是他在塔楼下跟吉卜赛人站在一起，吉卜赛人就同他一般高，并不象现在所见的那样矮小。说不定吉卜赛人还比他高哩。这个吉卜赛人也未必很笨，你看他一开始胡扯就眯上眼睛。这不算笨！是鬼派他来偷瓜的。要动手吧，可又不能用手打鬼，因为鬼有魔法。再说，他也跑不掉——他不肯撂下篮子。篮子很沉，只消赶上五步就能把他抓住。后来，当他感到鬼往他眼睛里撒沙子时，他就倒下来了。“鬼不是人的朋友！”不过，这可不是鬼干的，而是驼子干的——驼子放了一枪。

“他会一枪打死你。”老汉说。

“这我知道，”吉卜赛人瞅了他一眼，“可我画了十字。”

菲利普又想起了驼子端着枪朝吉卜赛人冲去的样子。那样子显得残忍和可怕。他驼着背，怒气冲天。也许他并不那么残忍，只是凶狠，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拿狗来说，要是你剥夺了它们的自由，给它们套上链子，它们也很凶狠。当然，谁也没有剥夺驼子的自由，是他自己要求来这儿看管农业社的葡萄园和庄稼地的。为此，他得到的报酬不赖。甚至真不赖。“不过，我们总得做人。”老汉想。

“你就一个人吗？”他问。

“我有五个孩子和老婆，”吉卜赛人说，“全都住在屯宿地。为了养活他们，我才鬼迷心窍来瓜地的。”

老汉不再悠动两腿。

“需要和鬼迷心窍是一码事。”他说。

他瞅了一眼草房后面的两个篮子——篮子的影子拉长

了。

“你把篮子提走吧，”菲利普站起身来，“下次 再别 偷啦。这是农业社的财产，我们看管这些财产，一天得三天的报酬。要是抓不到小偷，就全完啦。你走吧，要是再来，那就更糟。”

吉卜赛人一把抓住梯子。

“上天有眼，天晓得，兄弟！”

“走吧！走吧！”老汉说着，又开始转动轮子。

吉卜赛人还说了些什么，可是，由于老汉脚下嘎吱嘎吱直响，他什么也没有听见。老汉看见，吉卜赛人慌忙朝篮子跑去，拱着缀满补钉的背，把篮子扛了起来。他朝驼子牵着狗走去的方向奔去。老汉想：“可别狭路相逢。”

吉卜赛人看来也跟他想得一样：他到了赤杨树丛，没有象驼子那样蹓过河去，而是往左一拐，沿着河岸往前走。

从塔楼上可以看见两个篮子和篮子下吉卜赛人两条乏力的腿。在篮子的重压下，他走得异常吃力。

老汉小心翼翼地下了楼梯，从火塘里刨出一块块烧着的木柴，又在热灰上踩了好一阵。然后，他抄起一件旧外衣，躲到草房后面背阴的地方去了。他并不是不喜欢晒太阳，不，他是喜欢晒太阳的。可是，太阳会晒得他眼睛发疼，晒得他眼皮发硬，就象抻在枝条上的兔皮一样。

人的眼睛也会象兔皮一样被晒干的。

坐下之前，他在地上平平整整地垫了些东西。由于他爱惜身体，或者是由于他害怕大地，他总要在屁股下垫点什么。

他已有多少年没打赤脚？……他记不得了。谁也无法骗他。他知道，所有动物都会死的——不管是狗还是鸟——可他不相信自己会死，因为这是不可想象的。“只有星星永远不死。”驼子有一回对他说。这是驼子从兽医那儿听来的。但是，老汉连这也不肯相信。

他每天晚上都观察星星。驼子坐在火塘边，把弹筒塞进子弹带，又在弹筒里装上火药，然后数起来：一共二十八个——二十七个黄的，一个红的。菲利普不明白为什么有个红的，但他没有打听。他瞅着流星坠落——多数掉在南边，少数掉在北边；有一回，他竟然看见一颗星星升上高空，化为灰烬。于是，他懂得，流星不仅会坠落，而且也会升上高空燃烧。这是他亲眼看见的，当然可靠。八月，天穹很低，缀满繁星。整个八月，天空都布满星星，可到了九月，由于减轻了重负，天空就升高了。秋天摘了苹果，树枝也会升高。只有人才不这样。

他对此了如指掌，因为他每年秋天都摘苹果。人则越来越朝下，朝向地面，因为大地对人有吸引力，骗人。于是，人就感到害怕，避开地面，在地上悄悄走路，不激怒大地。正因为如此，菲利普不直接躺在地上，而是坐在外衣上，背靠着草房的草墙。草墙又干燥又暖和。

老汉又想起吉卜赛人，想起他偷瓜的事。他认为，年轻人都蠢，因为他们力气太大。他年轻的时候总是触怒大地，很蠢，也很有力气。可是，为什么蠢呢？为什么那么蠢呢？他那时什么都会干。

那真是一件可怕的事！炮弹在村子那边爆炸，有什么东西砰砰作响——这是步枪，——其时，人们躲进了地窖，而狗逃到树林里去了。下午，大家钻出地窖。村子里缺了点什么：大炮不再轰鸣，教堂的钟楼被炸掉了。整个钟楼被掀在地上，院子里只有一堆堆砖头和十字架的碎片。十字架是铁铸的，也散了架。吉卜赛铁匠用它做了火镰，一锤子下去，火镰不仅烧了火绒，而且还烧了指头……火是神圣的。

谁说该为钟楼报仇？找谁报仇？就找战争……不错！确实如此！穷人想找战争报仇。他们用铁丝网把院子围了起来。秋天下雨时，绵羊都挤在铁丝网上，因为网上挂了一绺绺羊毛，很暖和。不光他们村的农民，而且别村的农民也跑到打过仗的地方打扫战场。

菲利普去迟了，他找到了一个陷在坑里的轮子。有个身材矮小的农民围着轮子打转，他刨松了轮子周围的土——看来是想把轮子弄出来。“搬不动吗？”菲利普问。“搬不动。”那人说。“那你去找别的家伙吧，我来搬！”那人从坑里爬了出来，菲利普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

这是一个裹着结实轮胎的大炮轮子。菲利普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搬动了轮子，两脚深深陷进了松软的泥土。然后，他用胸部抵住轮胎，把轮子往上滚。这轮子真不赖。要是有四个这种玩意，做一辆挺棒的大车，可以用上一百年。

轮子又结实又沉，当菲利普随后滚着它走过平川和佩特洛夫山时，它把地上的青草深深压进泥里，留下了明显的辙印。他担心自己难以把轮子滚过伐过的树林。树桩又高又有

弹性。但是，轮子滚过斜坡时，由于惯性，菲利普稳不住，只好松了手。轮子轰轰隆隆地滚动着，撞击树木，把一簇簇绿叶抛向空中。它象一头受惊的牲口，毁坏了树木，滚进那条小河，溅起银色的水花。然后，菲利普见它划了一道长弧，躺了下来。

菲利普定睛一看——轮子一动不动。只有几根辐条划了些伤痕。他把它翻起来，又开始滚动，可现在更加困难：他累了，手疼。腿也疼。

不过，菲利普把它从战场上搬来，为的是替钟楼报仇。他不想把它留在河边。还得搬一段路，才能弄到家里。前边有一面斜坡，再有一段路就到了斜坡。由于出汗，由于劳累，他两眼变得通红。他的眼前出现了一道道淡紫色的光圈，这些光圈不断膨胀，破裂，在完全消失以前又为新的光圈所代替。不过，他只顾往前赶，几乎感觉不到胸部的沉重。大概他实在太累啦，他的心脏跳出了胸腔，跑到了喉咙那儿。他听见它咚咚直跳。淡紫色的光圈在他眼前不断破裂。

轮子在他前面隆隆滚动，然后离他而去——一条陡斜的街道通到他家围着石墙的房子。他停下来，喘了口气，而轮子发出更大的响声。他看见轮子撞在围墙上，把石头撞出粉末。石头迸出的火星熄灭了，院子里的鸡咯咯地叫，狗也汪汪哀嚎。轮子在房檐下躺了下来。菲利普走进院子，见狗跳上了狗舍，还在一个劲地夹着尾巴狂叫。

随后，邻居们都聚到了院子里。“真了不起！菲利普把大炮轮子搬来了！”“是你一人搬来的吗？”“当然是我一人。这

轮子能装在火车上。""那不在话下！还能对付比火车更大的家伙。""瑞典造的，军用，根本使不坏。"

可是，菲利普拿这大炮轮子干什么用呢？战场上没有别的东西。

真无聊！

大炮轮子现在还躺在房檐下。它已经生锈。轮子下面的泥土也长了锈。铁锤砸不烂它，可铁锈将一点一点地、慢慢地、每日每时地把它毁掉——菲利普看见了一片片鱼鳞状的铁锈。这些铁锈象头皮一样从瑞典的钢材上脱落下来。难道轮子永远使不坏吗？

不管驼子跟兽医嘀咕些什么，他们总是骗不了老汉的。他每天晚上都看见星星象铁锈一样坠落下来。梦中也是如此！……大炮轮子在星星面前旋转，轰鸣，就象它在石头围墙上撞出粉末，在佩特洛夫山伐过的树林里乱滚一样。你看，它现在在旋转，在平展的天穹上发出巨响。

轮子醒来了。

塔楼在他头上咯吱咯吱作响，铁链也懒洋洋地发出哐当声。轮子转得极慢，好象还在犹豫是否该转。天上起了风。怪不得昨晚蓝色的山峰上空呈现出一片桔红色。老汉想起了钓鱼竿。"现在没有风，可一起风，鱼儿就会上钩。"这是驼子走时对他说的。

尽管微风拂着水面，鱼竿仍然没动。河流还在酣睡，河

水轻轻拍打着两岸。它正在酷暑中休憩。

但是，风儿贪玩，抚弄着水面。风是温柔的，这是它的拿手好戏。菲利普的腿下挺凉快的——风儿似在颤抖。

他坐在高高的河岸上，观赏着眼前的一切。河对岸，一群水牛在蠕动。沉重的牛蹄踏着野薄荷。它们慢腾腾地走着，扬着头，象是在水中游动。它们眼睛圆瞪，挺吓人的。一群群牛虻追逐着它们。牲口摆着尾巴，赶着牛虻。

四周弥漫着野薄荷的香味。

河流醒来了。鱼儿也醒来了。老汉看见它们跃出水面，片片鱼鳞在阳光下银光闪闪。这是一些小鱼。它们在阳光下嬉戏。美极了。

可是，他又看见了河水深处的一条条黑影。这些黑影在河底晃来晃去，追逐着小鱼。于是小家伙们分散开来，或者跃出水面。他明白了，它们不是在阳光下嬉戏，而是在逃命。在这些黑影中，老汉认出了鲈鱼又秃又滑的嘴。它们是这条河里的恶霸，要是抓不住小鱼，它们就直摆尾巴。它们从鱼竿的漂子下游过，根本不碰鱼饵。

一只青蛙跃到鱼漂上。它咬住鱼漂，但很快又松了口。它把两条前腿搭在鱼漂上，懒洋洋地眨着眼睛。一个灰溜溜的东西从它背上跳过去，扑通一声栽进水里。这是又一只青蛙，比第一只大得多的青蛙。小青蛙抱着鱼漂沉到水里，但鱼漂又使它浮了起来。一只蜻蜓从它们旁边掠过，可它们没有发现。它们有自己的事情。

老汉观赏着两只青蛙。它们在他的鱼漂上谈情说爱。后

来，大青蛙累了，就游到一张款冬叶旁。河水摇动着款冬叶子，大青蛙就停在那儿休息。可它睡不着！小青蛙又开始玩鱼漂。它小吗？老汉记得，农友们看见小个子女人，总是摇着头说："小吗？……青蛙也不大！"

蜻蜓更小，可它们也谈恋爱。老汉曾看见它们胸脯贴着胸脯飞来飞去；它们在被青蛙吞食之前，匆匆忙忙地在水面上飞行，谈情说爱。

老汉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他觉得，不光河边有薄荷味；而且，整个大自然都散发出野薄荷的芬芳，就象冷杉也有气味一样。刚洗干净的衣服也有味。

他想记起这发生在哪一年。恐怕是老早以前的事了。不过，他对那列旧式列车和意大利人修的铁路仍然记忆犹新。他也记得巡道工的那间小房，记得巡道工站在小房前，而他旁边是一只奶子长曳及地的白山羊。菲利普从美国回来了，他指望有人来接他。可谁也没有来接他。

他的老婆——她在路上对他说——是在车头前等他。她第一次看见火车。当空气振荡、汽笛吼叫时，她两腿直打哆嗦。她以为他会从火车头里钻出来，可那儿只有一个穿着脏衣服的满脸煤黑的司炉——他毫无下车的意思。"小伙子，"她问道，"车上有个从美国回来的人吗？""你到后边看看吧！"司炉回答。她走过噗嗤噗嗤喷着蒸气的铁家伙，停在第一节车厢前。这节车厢装满了牲口——是普通货车。一头头奶牛透过栅栏瞅着她，哞哞直叫。菲利普不在这节车厢。

菲利普看见载牲口的车厢前站着一个惊慌失措、脸色刷

白的女人。这是他老婆？……他用胡子拉碴的脸亲吻她，而她迷迷糊糊地一头栽倒在他的怀里。他身穿坎肩，脚登一双尖头黑皮鞋，衣兜里装了只拴在链子上的“隆任”牌怀表。随后。俩人踏上回村的道路，她不再害臊，笑嘻嘻地贴着他迈着碎步。旁边是条河——就是这条河——河边的赤杨投下浓荫，似乎在引诱行人躺到这幽静的地方。这是天堂的一角。野薄荷绽出了鲜花，他们踏上去，它们就散发出沁人脾肺的苦涩味。她的身上也有一股味——当她躺下，以及她后来整理皱巴巴的裙子时，他都闻得出来。

被他们压倒的薄荷好半天才扬起毛茸茸的蓝色花朵。

老汉在回想这一切时，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他环顾四周，生怕有人看见。他摸了摸脸，想把笑容抹掉，但好象没有抹掉，于是又伸手摸了摸。回首往事，他象孩子一样感到害羞。

小青蛙撇下软木漂子，游到水底。它长着四条漂亮的腿，一张一屈游得蛮棒。

老汉听见了远处的枪声。许是驼子放的枪。他不牵狗去，也能打鸟。“人要行善。”醉鬼尼科尔乔神甫喜欢说这句话。驼子是可以饶了那条没有爪子的狗，不牵它去的。

其实，主人对猎狗也没有什么可以埋怨的。它本能地觉察到主人不高兴，就赶忙去捕捉黄鼠。但是，黄鼠动作灵活，跑得很快，猎狗已经退化的肌肉无能为力。它白费了力气，未能填饱肚子。尽管它刨了半天，仍然没有把黄鼠洞刨开。它记得，它当年干这种事毫不费劲，它把满身长毛的黄

鼠拖到耀眼的阳光下，一口就能撕开黄鼠的肚腹。现在，它只好精疲力尽地走到河边一块不大的大麻地里，在树荫下躺了下来。大麻的气味把苍蝇赶走了，它可以睡一会儿。可是，它仍心神不定，睡不安稳，它那愚钝的脑子里充满了种种幻觉。它怕得哼哼起来，为自己的衰老、疾病和驼子冷冰冰的面孔感到愁苦。就象狗对地震有预感一样，它现在模模糊糊地觉得——而且在睡梦中觉得——灾难就要临头。

菲利普对这一切全然无知。他站起来，检查别的鱼竿。他钓起一条小鲈鱼和一条鲻鱼。鲈鱼吞下了鱼饵，在草地上直蹦。鲻鱼弯着身子，傻乎乎地瞪着两眼。它吞食鱼饵时十分小心。但是，不管是粗心还是小心，它们反正都被钓上岸啦。老汉想，它们在吞食诱饵前，总该动番脑筋。鲈鱼呈绿色和银白色。但是，等到它越来越蹦不动时，它身上便没有光泽了。鲻鱼的鳞片可不变色。

他回到原地，听见了哗哗的水声。一个穿着花衬衣的男孩在河中蹚水。他靠近河岸，蹲在树根上。他的裤子泡湿了，可他没有站起来。老汉看见他总在一个地方摸来摸去，摸出了一条小鱼，又把鱼装进挂在脖子上的口袋。

“喂！”菲利普喊道，“你是谁，在那儿干吗？”

男孩一惊，直起身子。他的口袋和裤腿直淌水。

“捉鱼。”说着，他又蹲下来。

“怎么那样捉？”

“这儿有个洞。”

“鱼在洞里吗？又不是老鼠！”

“可不是。”

他仍旧在一个地方摸来摸去，口袋里的鱼越来越多。

“真不假！”老汉说，“鱼怎么会进洞？”

男孩又在树根下掏摸一阵，然后爬上岸。

“我塞了一只燕子进去。”他说。

“燕子吗？”

老汉困惑不解。

“是呀，是燕子。我在羊圈里打死一只燕子，用石头捣碎，塞进了洞里。这儿有个大洞。鱼都钻进去吃食，很好捉。”

“不赖，不赖！”老汉说。

他流露出不满的神情。

“就是这样！”穿花衬衣的男孩说。

“你们的老师教得真好！伤害燕子！”

男孩说，他们的老师可没教这个。老师教他们写斜体字，所有字母都朝一边斜，可脑袋不准斜，也不准咬铅笔。这可真难啦。

男孩坐下来，把鱼倒了一地。他开始剖鱼。一群胡蜂在鱼上嗡嗡嘤嘤，随后落在鱼眼上。男孩没管它们。要是赶它们，它们就要螫人。

几只燕子从河上掠过。它们的胸脯贴着水面。它们在洗澡，抑或是在玩耍。老汉瞅着它们的翅膀划出的灰色的弧线，想起了大海上的飞鱼。

飞鱼也是这般飞翔，只是它们不是从天上栽下来，而是

从墨绿色的深处跃出水面。他常常想起大海，偶尔也梦见大海。大海是那样辽阔，就连在梦中也看不到它的全貌。同大海相比，天空只不过是小小的圆盖。他还记得那些海豚——他见过的最逗人喜爱的鱼。他也还记得轮船上的那个天主教堂。有一回风暴肆虐时，船上的人都聚集在里面祈祷。教堂里有一座垫着厚玻璃的沉重的圣像，玻璃下是类似甲虫那样的褐色东西。据说这是圣忒瑞俄斯身子的一部分。这位圣徒虽然不胖，但很漂亮。他记得她那雪白的、丰腴的、半掩着的胸脯。她的圣像上没有光轮。“她干吗需要光轮？”一位旅客说，“有这胸脯，光轮就一钱不值。”旅客们围着这座圣像祈祷，他只听见他们单调的声音：“万福玛利亚……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阿门！万福玛利亚……”

他们在海上过得很愉快，一天早晨终于看见了低低的大地。大地在下面，在轮船的下面——这就是美国——他们沿着大海向美国驶去。现在既看不见海豚，也看不见飞鱼。上岸时，他们照了像，然后喝巴拉圭茶。对于没喝过这种茶的人来说，这东西很苦，很难喝——喝时又不加糖。直到后来，他才在一次野餐时习惯了这种饮料。这次野餐很快活，很热闹，有许多保加利亚人。也有美国人，但他们人少。菲利普跳起了鲁切尼查舞①，而一个象用纸剪的没有背部的美国女人轻轻摇晃着细长腿，笑眯眯地瞅着他。还有一些象她那样的薄片似的美国女人，但她们站得离他远远的。男人倒

① 鲁切尼查舞，保加利亚的一种民间舞蹈。

是很厚，他们抽着很粗的雪茄，吐着烟，哈哈大笑。他们很笨。他们笑得越厉害就咳得越厉害，由于抽烟而打喷嚏。谁也没有叫他们把雪茄从嘴里取出来，尽管这很简单——每个保加利亚人都懂。

他很喜欢野餐，打算再去，可他已奉召回保加利亚。祖国在危急中，留在美国的人被宣布为叛徒。菲利普从来没有当过叛徒。轮船又航行在大海上。这是另一艘轮船，教堂里的圣像也不相同。飞鱼又出现在他们身边，就象在河上飞翔的燕子一样。

“能做汤。”男孩说。

“什么?”菲利普问。

“我是说这些鱼能做汤。”

“是这样。”老汉说。

“我很会摸鱼。用鱼竿可钓不了那么多。”

“钓得少些，”老汉说，“可是鱼大。”

“又小又多才好。”男孩说。

他把鱼口袋放在河里涮了涮。

“别涮，”老汉说，“有鱼腥味。”

“好吧，我不涮。”男孩说。

他蹚水到了河对岸。

“你可得听听老师是怎么说的，”老汉说，“不要他说他的，你干你的。”

老汉断定，男孩没有练习斜体字，而且还咬铅笔。

他又站起来查看鱼竿，又钓了一条鱼。但是，这条鱼一

出水就掉进河里去了，鱼钩在空中摆来摆去。一只水耗子夹着秃尾巴，在绿色的水中游来游去。菲利普朝它吐了口唾沫，提着两条鱼朝草房走去。到了晚上，驼子会用铲子煎鱼。这是他的拿手好戏。

轻风慢悠悠地转动轮子。

太阳已经西沉，草房的影子同冷杉的影子重合在一起。老汉坐在草房前，屁股下垫着外衣。他一小片一小片地削苹果吃。这苹果汁多味美，可他不大管用的牙齿嚼起来仍然费劲。要是他的牙齿结实，雪白，漂亮，就象塞内加尔士兵的牙齿一样，那该多好！说不定塞内加尔士兵能咬碎石头，不眨一下眼。

他渐渐忘了咀嚼，侧耳细听着林中秧鸡和山雀的叫声——山雀正用爪子梳理自己的羽毛。牙齿雪白的塞内加尔人当年倒在地下时，山雀正是发出这种连续不断的吱吱声。

他的脑子里浮现出了那天的情景。这情景犹如露天电影的画面——那儿，在村庄平整的场地上——画面很暗，有许多道道，但仍然清晰，能看清上面的人、自己的同志、鞋油盒、刮脸刀、中尉。最重要的是——他在人群中看见了自己。他仿佛从画面上走下来，瞅着电影里的另一个人。

他一眼就瞅见了那个农妇。在她前面，一名士兵正背朝着她干活。远处，在战线那边，空中悬着一个气球。士兵转过脸来，菲利普看见了自己——刚理过发，蓄着胡子。老汉为自己的模样笑了，打心眼里高兴，点着头，似乎在为士兵

鼓劲……不过，他没有缘由为士兵鼓劲，因为他知道后来出了什么事。士兵继续擦着多皱的靴子——嚓，嚓，嚓——刷子移动着，要把皮靴擦亮。他不时往靴子上呵气，然后又用刷子擦。

他当时是勤务兵，熟悉上尉的这双靴子。他天天擦，有时还一天擦两回。靴子已穿得很旧，后跟的左上方有一条皱痕，不管怎么擦总是擦不平展。皮上已划了许多伤痕，上尉为此找过管理员，要他换一双象样子的。上尉为靴子的事着急得不得了，因为有人说国王可能视察前线，有些司令官要去休假。不过，即便国王不来，他也希望去休假。

上尉吹着口哨穿好了靴子，对着桌上的镜子刮起脸来。

“咱们可得有所准备。”他把刀子在皮带上蹭了蹭。

勤务兵瞅着他，有些站立不稳。流行性感冒害得他周身乏力。

“是！”勤务兵说，“我是从美国回来的。我不是叛徒。”

“这很好，”上尉说，“保加利亚就指望咱们。”

刀子没把连鬓胡子修好，还得重来。

“是！”勤务兵说。

他提起水罐，为上尉浇水——上尉刮脸时就得这么着。他看见气球迅速下降。但是，他并不感到惊慌，因为每天都有人把气球升上去再拉下来。勤务兵菲利普压根儿就不明白，干吗非要把气球升上去，然后又拉下来。

“这很好，保加利亚就指望咱们。”上尉说。

“国王也指望咱们，”勤务兵说，“这是那天将军对我们说

的……"

"是呀，是呀，"上尉打断他的话，"可咱们不能指望他们。"

上尉说得对。此刻，当他正在刮脸，而勤务兵提着水罐站在他旁边的时候，国王①——奥地利亲王和王后齐塔却正在被毁坏的"什蒂列·麦谢"大教堂里默默祈祷，然后开始巡视伊若卓-特里亚门托战场。汽车在意大利北部的公路上行驶，满目疮痍的景象真够君主看的。刚打过仗，他们就来到这儿，想看到官兵们的欢呼。他们没看到官兵的欢呼，倒是看到了被遗弃的大炮——其轮子可以装配几千辆嘎嘎作响的大车——，还有其它装备、衣物和散发着臭味的死马。"关好车窗！尸体。""天哪，哼……哼……哼……斯拉夫人是怎么祷告的？""呼唤阿门，陛下。这是教会斯拉夫语。""对，对，阿门！"眼前是遭到破坏的大自然和尸体。天哪，你……哼，哼，你未必到过这儿。只有耗子到这里来，可就是国王的汽车经过这里，它们也不哆嗦一下。"要是陛下有意再走，那就往左去圣米赫列高地吧。""行，行。"国王瞅着右边说。

"是呀，是呀，"上尉含糊其词地说，"咱们不能指望他们。"

勤务兵菲利普从这句话里听出了点名堂，他直挺挺地站着。罐里的水荡了他一手，可他没有动弹。为了祖国和国王，他曾飘洋过海。上尉的话使他怔住了。上尉先生知道海有多

① 这里指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站在轴心国一边。

大吗？

“咱们往后不能指望那些人，”上尉小心翼翼地刮着脸说，“他们的炮弹落在咱们头上。”

老汉菲利普坐在草房边，看见勤务兵菲利普提着水罐站在上尉身旁。他现在仍不理解两人当时所谈的一切，可这一切至今还历历在目：

上尉又往左边脸上抹了抹肥皂——露天刮脸，肥皂水干得多快！——然而，刮胡刀并没有碰上脸。一股气浪袭来，水罐从勤务兵手中飞了出去。当他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时，他看见，上尉已侧身倒在胸墙上。接着，左边响起嗒嗒嗒的声音；那儿的后备机枪连跑出营地，躲进掩体。炮弹撕裂空气，菲利普蹲在胸墙后面，感到头顶上和身子周围空气在颤抖，发出呼啸声。

一阵射击之后，菲利普首先想起的是水罐。这突然飞走的水罐，是使他回到现实世界的唯一重要的物件。然后，他想起了上尉。上尉侧身躺在胸墙上。他抹着肥皂的脸白得象粉笔。一只靴子——有皱痕的靴子——别扭地翘着。

“荒唐！荒唐！”谁的声音钻进了他的耳朵。

皱痕还是老样子，从下至上割裂了牛皮。不管怎么费劲用刷子擦，永远擦不亮了。

“天哪，荒唐！”

他怕得冒出一身冷汗，由于感冒而脸色苍白。他伸出手来，行了一个举手礼。可靴筒上的那条皱痕……

他们是谁？围着上尉的是些什么人？是后备机枪手

吗？……抹着肥皂的脸依旧那样没有一点血色。靴筒上的那条皱痕……傍晚，他看见老远的前线后边又升起了气球。驮炮弹的马队上路了——马和人看上去只是小黑点。他想，我们的榴弹炮将进行反击，也许将发起进攻，挺进奥德林湖。士兵们对此议论纷纷，可军官们对此禁若寒蝉。“兄弟们，士气怎么样？”军官们问道。“士气吗？（这种士气同任何精神的东西一样是看不见的。）很旺盛。”士兵们说。随后，侦察员带来一个塞内加尔人。他身材高大，皮肤发紫，牙齿锃亮。他见了谁都笑着点头。一个乐天派！

哨兵朝他背后开了枪。事后，勤务兵打林边走过，看见他躺在地上，牙齿锃亮。尽管他的脸上露出某种惊讶的神色，但他还没有来得及现出恐惧，仍然在笑。

“咱们不必那么残忍。”机枪连连长说。

“咱们该把他养着。”士兵们说，“可是，没有面包。好象他们就养着我们的俘虏！”

面包确实不够，英国人和法国人未必还会继续养活我们的俘虏。

“用什么养活他呢！又不是我们叫他来的，也不是我们侵犯了他的国家。”

“要是他呆在塞内加尔，谁也不会碰他一下。”

“那地方远得很。我叔叔到过君士坦丁堡，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国家。”

“大概很远，在地球的另一边吧。”

“地球上没有这个国家。我们学过地理。”

“那就在地球以外。”

大家不再议论他，因为他是从极远的地方，从人类之外，从士兵们陌生的世界来吃他们的面包(本来就没有)，杀害他们的。他们被杀得够多了。

他们应该报复。

士兵们最后一次向上尉致敬，然后把他掩埋了。大家在他的十字架上挂了一顶头盔，可当夜又刮风又下雨，头盔被掀到新坟上，勤务兵菲利普第二天早晨发现里面装了水——大概有两捧。尽管在战争中人不象人，勤务兵仍然用皮带把头盔绑在十字架横木的一端，让它下雨时积水。说不定上尉死时想喝水。

塞内加尔人的尸体露置林边，无人掩埋。由于雨水冲刷了整整一夜，他的衣服周正了，双手和指头舒展了。只有他的头发没有直立起来。那一头浓密的鬈发在紫色的皮肤上结成了一小圈一小圈。

勤务兵为上尉挂好了头盔，就去找塞内加尔人的尸体，可是他看见什么东西夹着尾巴跑进了树林。他知道，这是狼，于是扭头就走——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感到恶心。

老汉哆嗦了一下——那只夹着尾巴的野兽，确实在赤杨树丛边探头探脑地走着。他眨巴眨巴沉重的眼睛，认出了猎狗迪亚纳。

“迪亚纳！迪亚纳！”他唤着狗。

猎狗趴下来，用尾巴扫着泥土。它回过头去，什么也没

有看见，于是狐疑不决地朝老汉走来。它走近老汉，低下头，乖乖地准备挨揍。老汉可怜它，同时又怨恨驼子。何必对一条病狗下毒手——衰老、疾病、狗蚤已经把它虚弱的身子折磨得够受了。

驼子还没有回来。

但是，菲利普老汉并不因此感到孤独。

他从来就不象年轻人那样感到孤独。年轻人孑然一身时心里空虚——他缺少老年人那样的回忆，命运之风还没有把他带到天涯海角，就象有朝一日秋风使落叶归根一样。当菲利普回忆自己的一生时，他觉得，这并非回忆，而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或者是一本很厚的书，比《圣经》还厚的书。而且，也比《圣经》可信。书中装满了美和善，对人有用，因为这是真情实感。他有时想向驼子讲述自己的身世，可驼子喜欢跟兽医聊天，要不就去打猎。他有时想跟老婆说说，可又觉得这是多余的，因为俩人心心相印，无需交谈。至于星星，也许它们是实实在在的。他的回忆象他身上脱落的皮屑一样，是实实在在，谁也夺不去的——不管是飘洋过海，还是薄荷，还是战争，都永远印在他心里。他问自己：想不想重蹈覆辙？他想使一切再重复一遍，但他最想同他老婆一起重踏薄荷，要是这可能的话。

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

那些日子，他觉得，他是整个世界的一小部分，谁也不能把他同这个世界分开，因为这会破坏他的安宁。这就象谁也不能使河流离开河床一样。也象谁也不能阻止河水奔向大

海一样。河水越过种种障碍，奔流向前。

驼子对这一切全然无知。不过，老汉总有一天要告诉他的。一个人不该对别人隐瞒什么。每个人对别人都是一种教训——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直到太阳落山，驼子的影子才出现在河边。他身前的皮带上系了三只斑鸠。猎狗哼哼着，躲到老汉背后。

“起风了。”驼子说。

“我早就知道，”菲利普说，“昨晚的天空发红。”

“该给轮子上油了，”驼子说，“又干啦。”

轮子在上边，在他们的头顶上咕咕地响着，似乎正在犹豫要不要掉转方向——风向已经变了，风是从山那边吹过来的。

驼子坐在火塘边，老汉拨着余烬，往上加了些干柴。透过青烟，他看见驼子解下了子弹带。红色弹筒不见了。

驼子把猎枪一折，从弹膛里取出那个弹筒。

“我的迪亚纳有运气。”说着，他把红色弹筒塞进子弹带。

“出了什么事吗？”老汉问道。

“我跟你说过，它有病。兽医要我把它毙掉。”

“真是这样？”

“一点不假。因此，我才经过佩特洛夫山，想在那儿下手。要是它不转过身来，我可真的开枪啦。”

“怎么个转过身来？”

“我一举枪，它正好转过身来。看来已猜到我想下手。我一举枪，它就转过身来。”

“没有逃跑?”

“它不想逃跑。它一逃跑，我就开枪。可它一转身，朝我爬来。它边爬边瞅着我，一直爬到我脚下。它停下，抬起头来。要我说，跟人一样。”

“那当然。”老汉兴致勃勃地说。

“我下不了手啦。”

“那当然!”

菲利普瞅了一眼猎狗。它蹲在火塘边，直瞅着两人交谈。

驼子把铲子放在火上煎鱼。老汉瞅着他的脸，看见那张脸被火光映得通红。一对眼睛也通红。这是另外一对惹人喜欢的眼睛。老汉觉得，鸟的眼睛也是这种颜色，只是驼子的眼睛美丽而又善良。残废好行善——这是尼科尔乔神甫说的。但是，神甫是个醉鬼，老汉现在不信他的话。老汉以为，一个人少了一条腿或者一只手要比少了头脑或少了良心好得多。他想起了前线，想起了那个象狗一样被毙掉的塞内加尔人，觉得这一切都因为少了点什么，太出格了。他想，正因如此，使人致残的战争才是可怕的。

在这儿，在这静静的夜晚，一切都令人神往。坐在老汉对面的驼子也比以往善良。菲利普看不见他的背，他在一个劲地讲可怜的狗。猎狗不会说话，可老汉相信，这动物什么都懂，要不，它就不会满心欢喜地睁大一双黄眼睛。老汉也想起了那个偷香瓜的吉卜赛人，而且断定，驼子向他头顶开枪，不过是想吓唬吓唬他。

“你是个好人，”老汉说着，拨了拨火，“现在只差娶媳妇

啦。”

驼子心事重重地一笑。

“这我知道，”他说，“你是知道的，就这么干！”

“当然要娶媳妇！”

菲利普老汉相信，会有人爱上驼子的。只要他是人，懂得爱，也就够了。谁要想不费一点劲就得到爱情，那他就是傻瓜。要是费了劲而得不到爱情，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思。

放上铁铲的头一条鱼蜷成了一张弓——发出嗤嗤嗤的声音，——这是水淋淋的鱼肉的声音。驼子把铁铲放在火边，然后拿起斑鸠，动手拔毛。

一只飞蛾从暗处飞来，围着火塘打转。它飞近火苗，往上一蹦，掉进火里。它把火光当成了救星。

他们就着鱼肉和斑鸠吃了晚饭。猎狗啃了骨头。人和狗躺在草房前，驼子首先进入梦乡。迪亚纳很晚才睡着，梦中也不断哼哼。它也许梦见了猎枪。驼子在梦中微笑着，大概他遇到了好事，也就是他应该干的和向老汉许愿要干的事。菲利普瞅着头顶上的星星怎样坠落下来，翻着那本关于自己一生的厚书，那本比战争、比海洋加上轮船和海豚还要厚的书；那本书比地球还要厚，因为地球上找不到塞内加尔，而他却看见过塞内加尔人。

晚风抚弄着轮子，终于使它动了起来，开始慢慢旋转。轮子上的铁链也不紧不慢地晃悠着。直到早晨，轮子将一直这样旋转，朝着群山旋转。

（余志和译）

伊·马尔蒂诺夫

九年以后

〔**作者简介**〕 伊凡·马尔蒂诺夫(1912—)生于洛维奇市，中学毕业后当过打字员、排字工人和记者，后编过《祖国阵线报》、《工人事业报》、《斯拉夫人》杂志等。著有四十多种小说、戏剧和特写，其中以《安东·贝林的故事》、《不灭的火》、《希望的花朵》等较为有名。

这女人站在鸡笼门边，瞅着公路。公路上，一辆装满钢管和钢板的卡车深深陷在又粘又稠的黄泥里。卡车司机，一个身体壮实的中年男子，身穿短大衣，脚套胶皮靴，正埋头在汽车马达上拨弄什么。女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就连他胖胖的、微微发肿的脸上的任何一点表情变化，也看得一清二楚。

司机检查马达，排除故障，已经有半个小时了。他淋着

雨，发火，骂娘，也已经有半个小时了。而她始终咬着嘴唇，一动不动地盯着他。她屏住气息，全神贯注，准备在他一抬头发现她在瞅他时马上跑开。女人埋怨自己，埋怨自己的好奇，同时又巴不得凑过去，多瞅他几眼，看看他往下怎么办。

一个小姑娘从院子尽头的白色小房里蹦出来，站在石阶上。她穿着褪了色的花连衣裙，用绸带束着金黄色的头发。她叫妈妈，可妈妈板着脸向她一摆手，示意她别来打扰。孩子又呆了一会，看着雨点打在妈妈身上，可妈妈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她不认识的叔叔。她回到屋里，摆弄卧榻上的布娃娃。

女人身材高大，长着一头比女孩略深的金黄色头发。她似乎忘了自己只穿了一件连衣裙，只缠了一条羊毛头巾，而天上在下着大雨。她那张少女般秀丽而略显粗糙的脸，表情严肃，隐隐透出忧虑。她此刻在想些什么呢？她干吗要瞅那男人呢？有一种连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东西使她紧张得浑身发抖。

司机猛然省悟到马达不易修好，于是抬起头来，绝望地东张西望。他瞥见女人，登时有了主意。然而，还没等他开口，她就一转身，沿着泥泞的小路朝小房奔去。她打着赤脚，那胖乎乎的腿肚，那白皙的皮肤，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

“喂，同志，等一等！”他挑逗似地喊道，尾随上去。

女人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加快了脚步，躲进门里，似乎不想理他。在早春的晨光中，她象幽灵般晃动一下便消失了，他的眼睛只捕捉到她那壮实而灵活的身躯，她那坚定而

急促的步伐和她那火焰般稍纵即逝的粉红色头巾。“一个野人！”司机踏着泥泞，边走边想，“象是怕我把她吃了……”他四下里张望。

院子里空空荡荡。浓重的雾气笼罩着小房和院内砖砌的低矮的鸡舍。在远远的东边——村子座落的地方，晨光撒下了薄明。村子里传来沉闷的嘈杂声。

男子走上去，敲了敲门。门内毫无反应。周围阒然无声。雨点打在铁皮房顶上，象是群鸡拍打翅膀，笃笃作响。他又等了一会儿。怎么办？是回去还是再敲门？他举起手，手刚触门，门就豁然洞开，门边出现了那个女人。她露出了窘迫的、似乎是害怕的神色。一滴滴水珠从她的头巾上滚落在石阶上。她有气无力地喘着粗气。她丰满的胸脯时而隆起，象是要把箍着她双肩的连衣裙撑破，时而又收缩回去，失去线条。他仿佛认识这张长着一对水灵灵的蓝眼睛的绯红色圆脸。他后退了一步。他在哪儿见过这个女人？这张圆脸、这双蓝眼、这头金发在对他述说什么？两人的目光相遇了。直到此刻男子才明白，这个女人为什么不信任他，怕他。他想转身离去，但她一闪身，向他让道：

“进来吧！”

他默默地进了门。在半明半暗的过道里，他觉得一只只小鸡在往他脚上撞，他差点踩了一只。直到进了一间安静的、暖和的屋子，他才放下心来。屋子里空气干燥，充满了野草的香味。她递给他一个三脚凳，自己却坐在卧榻上。一群刚出窝的小鸡吱吱叫着，满屋乱窜，一只母鸡还趴在屋角

里。

接着是一阵沉默——难堪的沉默。两人都象受了处罚一样。女孩不再玩布娃娃，她咬着小指头，好奇地盯着客人。他愣愣地坐着，等着她说话。

“哎，干吗不吭声？说吧！”女人终于开口道，冷冷地瞅他一眼，表现出明显的鄙视。“这些年都干些什么？到过哪儿？混得怎样？”

男子打了个寒战，厚嘴唇露出一丝愧疚的苦笑：

“怎么跟你说呢？到过许多地方……老是走动，一刻也不停……世界大得很！”他伸出粗壮的手，把宽大而粗糙的手掌一摊。

“是这样……哼！没想过我吗？”女人又说，板着的脸蓦地露出温情。

他感到心虚理亏，低下了头：

“常常想你，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生活就是这样！”他又把手一摊。“我跑得很远，到过罗多彼山①……何况我是干这一行的，只得……”他没有找到适当的遁词，于是把嘴闭上。

“干吗不找我？干吗连一封信也不写？”

“唉！怎么说呢？我已对你讲了！”他长叹了一声，“要是不发生那件事，咱们现在哪会拌嘴……”

女人吃力地摇了摇头。她那双已经清亮的眼睛闪耀着曾

---

① 罗多彼山位于保加利亚南部。

经熄灭的压抑的爱情的火光，这爱情就象泉水一样随时都会涌出。然而，看见他那张没有修刮过的沮丧的圆脸和眼睛周围的黑斑，看见他厚厚的湿润的嘴唇，看见他那透出重逢时的喜悦的呆板而自信的模样，她心中又顿生厌恶之感。他不知所措地动着手指，然后摸摸后脑勺。他心中升起一线希望。他沉默了一阵，问道：

“日子过得怎样？”

“你都看见啦！有饭吃，有房住，而且受人尊敬……”

“嗬！真不错，是吧？”他见她居然能独挡一面，便毫不掩饰自己的嫉妒。

“是这样！”她生气了。“我还需要什么呢？什么也不需要，一切都有啦……我在农业社里当个养鸡员，一年养一千五百只鸡。管理委员会的同志对我满意，付给我高工资。你不要另眼看人！”她冲着他指责说，“实话告诉你，现在不象从前啦，我们现在都很好……工作越搞越象样，干一天能挣不少钱，而且大家都变了，变得更好啦……”

“看你说的！”

女人越说越起劲，想惹他生气。

“我的名字上了报，连首都都知道我。政府常常请我去开会，州委会给我发奖……你不信，找谁打听都行！”

“我相信你，只是觉得奇怪……”

“有什么奇怪的！我已经在这里呆了九年，到了彼得日，就满十年啦……”

“九年？”

她破颜一笑：

“可不是！”

“你不害怕吗？”

“怕什么？”

“孤单一人。你知道，什么样的人都有……”

“直到现在还没出过事。而且，已经习惯啦。不过，我……干吗要对你扯这些呢？”她哆嗦了一下，顿时意识到说得过了头。

她熟知这个男人。从前，两人有过约会，她同他有过亲热的关系，这种关系虽不长久，可在她心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象一个伤疤。

从此，她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

他们的村子很小，默默无闻。但是，有一天，人们突然传说，在牧场的另一边，也就是小溪流过的又高又陡的粘土岸边，城里来的人发现了矿藏。不久，一批批工程师和工人纷至沓来，搭了工棚，开始挖土——他们说，他们要修建一座工厂，还要在工厂旁边建设一个村庄。

在运送建筑材料的汽车司机中，有一个无忧无虑、乐观快活的小伙子。他长着一双机灵的浅绿色眼睛，眼神里透出一股滑稽劲。他常常把汽车停在农业社前面的打水台旁边，往水箱里灌水，跟姑娘们开玩笑，嘴很甜。她们挺喜欢他，谁都巴不得同他单独呆在一起，聊聊天，然后由他送自己回家。

有一回，她在打水台上洗脸时，他开车来了。女伴们回

村路过这里，阵阵清脆的笑声回荡在寂静的原野上。她听见了马达的轰鸣，但没有转身看看，仍旧低着头，一捧捧地往自己脸上浇水。小伙子瞅见她，把车停下，提着铁桶下了车，站在她后面。

“哎，姑娘，让我打点水吧！”他逗她说，咧开大嘴，差点没笑出声来。“你这一洗，白脸都给洗黑罗……”

“可不是吗，再没见过比你更黑的吉卜赛人啦！”她受辱似的往旁边一闪，两只眼睛瞪着他。

“干吗这么说？我坏吗？”小伙子笑出声来，“你瞧，我这脸蛋够白的！”他把铁桶放在水管下。

她把头一低，一把扯下头巾，一溜烟追她的女伴去了。他久久地凝望着她的背影。她的白脸象一团光斑在远处闪耀，然后消失在灰蒙蒙的道路尽头。

就从这天起，要是工地上没活，两人便经常晤面，在村外闲逛。他们在原野上蹓弯，直至深夜，尽情地接吻，谁也看不见。傍晚，他们手挽着手回家，满意而又幸福。落日的余晖照亮了牛群扬起的尘土，在他们的眼中，这柔和的、透明的轻纱胜过任何美景……

她父母早逝，跟着奶奶过日子。两个女人整天劳累，得不到男人的帮助和保护，因此，她很想成家。

有天晚上，她感到阵阵恶心。她先是觉得害怕，可过后一想，竟又高兴起来。第二天早晨，她跑到工地上告诉他说，她要做妈妈啦。出乎她意料的是，他听了这个消息，非但没有笑容，反而皱起了眉头，要她别再来这儿找他，说是同志

们会笑话。她回到家里，抱头痛哭。过了几天，她又去工地找他，可大家告诉她说，他不在。她不久又探听到，他那天是躲起来了，后来又不知转到了什么地方……

村里人对她评头品足。她上街时，妇女们向她撇嘴，男人们好奇地瞅她。她不再干活，只顾把自己关在家里，同奶奶一起打发日子。由于痛苦和怜悯，老妇人得了一场病，没过多久就愤然离开了尘世。

最糟糕的是她生了孩子。羞愧倒能勉强忍耐过去，贫穷和饥饿却使人更加难熬。村民们终于同情她了。农业社管理委员会讨论了她的问题，一致决定把她派到养鸡场去，说是这样做，她和孩子都有饭吃，而且离村子又远。

于是，她孤单单地呆在野外的大院的白房子里。

在此期间，他到过国内许多地方，从一个工地转到另一个工地，到处勾引姑娘，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及至后来他才明白，他欺骗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一切都使他厌倦——无论是东奔西跑还是勾引姑娘。然而，悔之晚矣！他已经三十五岁……

男人环顾屋内。房间很小，但收拾得井井有条——他喜欢这个地方。房间的尽头摆着新木箱，木箱上摆着几床被子，而旁边又有桌子和书架。门后是衣架，床上也铺着被子，放着几个花枕头。但是，最受看的是从报上剪下来钉在墙上的一张照片。很明显，这是她——这张全身照是她站在白房前面拍摄的，身子周围全是鸡。照片上方有几个大字："养鸡能手"。男人惊讶得"唷"了一声。他想："你看她，居然……

出了名……唉！"他又惊奇而羡慕地扫了一眼房间。

女人发现了他的惊讶，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不禁油然而生。怎么？就得让他亲眼看看我过得不错！她站起来准备鸡食，而他依旧默默地坐着，等待着……

他的目光倏地停留在女孩身上。

她长得瘦瘦的，但跟她妈妈一样结实和灵活。她爬到卧榻上玩她的布娃娃，兴高采烈地对它们说些什么。他转向女人问道：

"这是你孩子吗？"

"不是我的又是谁的呢！"

男人死死盯着孩子。孩子很象她妈，与她妈不同的只是长着一双同他一样的浅绿色眼睛。他窘住了。他象触了电一样，浑身抖了一下……

"多大啦？"他吸了一口气，又问。

"九岁。过一阵就满十岁。"女人无动于衷地回答道，仍旧用一个大筛子筛着玉米渣，连头也不回一下。

男人的嘴唇哆嗦着，象是要说什么。他的脸霎时变得刷白、难看。

"九年啦。"他喃喃地说。

"我想，是九年……"她停下手中的筛子，直起身来，嘲弄似地瞅他一眼。

"你后来结过婚吗？"

"结过。"

"你爱人呢？"

“死啦。”

“啥时候死的？”

“去年。”

“跟他过了几年？”

“三年。”

他霍地站起来：

“这……这孩子不是他的，是吗？”

她皱着眉头瞟他一眼：

“不是的，唉！”

他又叹了口气：

“是我的吗？”

“是你的。”

“干吗不早告诉我？”男人大叫一声，两腿打颤，眼前一片昏暗。他很快就镇定下来，模模糊糊地想道：“她能原谅我吗？”但他没有勇气开口，继续想道：“嗨！那又怎么样！反正我有了孩子！在我东跑西颠时，她生了孩子，这孩子就在眼前……”他又看了孩子一眼。是的，象我！他脸上火辣辣的，额头沁出了汗珠，双手和两腿仍然在打颤。不，她不会同意的！不过，要是同意呢，要是……他向孩子走去，而孩子怕得缩成一团，靠在墙上，用疑惑的目光瞅着他。

“别动她！”她使劲把他一推。

“干吗这样？”他笑着问道。

“就是不让……”

“难道她不是我的吗？”

“不是你的。”

“怎么？你不才说过，是我的吗？”

“我说过，可我现在要说，她不是你的，不许你动她。你不配，因为你……反正不是你的。”

“不过，要是你同意，我准备……”

女人没有说话，心里七上八下。她到底忘不了过去，她对过去的回忆比她想象的更为强烈。她的胸脯沉重地一起一伏。怎么办？她预感到，要是他多呆一会，她就顶不住，只好让步。但她同时又知道，她早就横了心，同他断绝了关系。他们之间的一切全完了。每一个重修旧好的念头，都只会使她感到屈辱和痛苦。不，她还没有忘记他的冷酷无情！他曾在她的心上留下创伤，而在这创伤愈合时，他现在又回来了。他值得原谅吗？既不值得原谅，又不值得同情。女人重重地一摆手。

“晚啦！”她说，“你过去在干吗？一次也不来找我们，现在又想……我受不了，不同意！”

“你听我说嘛，我可以……”

“我说啦，我不愿意！”女人又重复一遍，“你最好走开……现在就快走！别再来缠我，听见了吗？我已经不错啦，大家都看得起我，而且我一个人过惯了，不需要象你这样的男人……趁我还没发脾气，你就悄悄走吧！”她攥紧拳头，冲他走了一步。

他看见她眼睛里迸出愤怒的火花，看见她满脸怒气，懂得了她坚强的性格。他二话没说，慢慢挪动脚步。她跟在后

面。两人穿过狭窄而阴暗的过道，走到门边，停了下来。

“这不好，”他说，“你错过了机会……”

“嗬，什么机会！”她笑了，“游逛了半辈子，最后又想起我们……可你早在干什么呢？你自由自在，快快活活，不想我，不想孩子，现在又一下子……你走吧！”

他明白了，这里没有他的地盘，他也休想再回来。他沿着石阶朝下走去！

“至少可以给我点水吧……”

“水？”女人坚定地点点头，“我可以给你水，给你面包，只是你要走开，别再来！”

她提来一桶水，默默地递给他。男人慢慢接过水桶，踏着泥泞走远了。

女人透过房间的窗户，看着他往水箱里灌了水，又回来把水桶放在石阶上，然后走到卡车旁边，埋头拨弄马达。她纹丝不动地站着，咬紧牙关，竭力保持内心的平静。她的脸阴沉下来，双唇紧闭，眼睛无光，一对眼球象猫眼似的布满光圈，现出疑惑不解的神色……男人淋着雨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勉强把马达修好。他几次回过头来，往窗户瞧瞧，象是在等她唤他回去，或者向他招手问好。但是，他什么也没看见。他心里阵阵痛苦。“是这样，”他想，“罪有应得！我跑得够受了，跑了半辈子，从今以后只有一个……一个人……就是让我摸摸孩子也好呀！殊不知她这样心狠……在她眼中，我是个格格不入的陌路人，我算完了……是的，完了！”他钻进驾驶室，发动汽车。他最后又看了一眼窗户，觉得那儿什

么也没有，但又不敢肯定。他觉得心跳加剧。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沾满机油的手背擦擦眼，沉重地低下了头。但他突然又哆嗦了一下，省悟过来，手握变速杆。马达轰鸣，车身颤动，卡车冲出泥潭，疾驰而去。

（余志和译）

格·米舍夫

普查野兔

〔**作者简介**〕 格奥尔基·米舍夫(1935—)生于洛维奇州约格拉夫村，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新闻系。当过《人民青年报》编辑和保加利亚电影制片厂创作人员，著有短篇小说集《穿着入时的男人》、《秋季集市》，中篇小说《母权制》，电影脚本《普查野兔》等。

“咱们国家什么都想查个明白，”统计局来人说，“简直可以说，就连这片草场上有多少根草，咱们也得数一数。”

他们在草场上走着，新的一茬柔嫩的绿草温顺地倒伏在他们脚下。所到之处，秋天的露珠滚落在地，他们身后留下一行行黑糊糊的脚印。农民们的便鞋发胀了——这鞋是用猪皮制作的，——统计员却挽起裤脚，露出了一双印着黄色菱形图案的尼龙红袜。

“野物是咱们国家的一笔财富，”他觉得大家在听他解释，

又说，“有一家报纸写道，这是咱们祖国有生命的黄金。因此，咱们国家想要搞清有多少财富。”

他悦耳的胸音使他颇象一位名副其实的演说家，他的话不可能不给听者留下印象。大家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听过名副其实的演说家演讲啦——下来讲话的人，不是不知所云，就是干巴巴地照本宣科。而这位表情严肃的高大男人（加上他那身用高级料子制作的庄重的深色衣服）虽然挽着裤脚，显得有些好笑，却受到大家的尊敬。大家拉着麻绳编织的拦网，紧靠他走着。

这位表情严肃的男人昨晚一下公共汽车，就把狩猎队队员和当地的积极分子召集在一起开会。在成立普查委员会之前，他向大家讲了半天话。随后，他到狩猎队长家吃了晚饭，留在那里过夜。

第二天早晨，他到人民委员会时，普查委员会的委员们已等候在那里了。他们带来了拦网，网子缠在大纺锤般的木桩上，有个青年，大概是新手吧，打扮得象是去狩猎一样——肩上扛着崭新的双筒猎枪。一条深褐色的猎狗拴在他的马袴上，此刻正在打瞌睡。

“准备好了吗？”统计员精神抖擞地高声问道。

“除了没来的，全齐了。”青年猎人回答说。

看来他刚刚退役回家，还没有忘掉军营里的诙谐。

“谁还没来？”统计员又问。

“茨维坦，”狩猎队长说，“一个兽医。”

统计员问兽医站远不远，大家回答说只隔一条街。于是，

普查委员会的人全向那儿进发。

这个兽医正在兽医站前面忙碌，那儿拴着一匹马。马的左前腿红了一大片，鲜血顺着大腿往下流，慢慢凝固，就象从划破的树皮下渗出的一滴滴树脂。兽医捏着一个带凸纹的药瓶，瓶里装着紫药水，他用棉团蘸了药水，涂在马的伤口上。棉团每回碰到伤口，马就浑身哆嗦，腿上的皮肤就皱起来，缰绳便哐当作响。

“茨维坦！”统计局来人喊道。“昨晚就说好啦，可你现在在干什么？”

茨维坦仍然给马搽药，没有理他。

“不能这样，年轻人，”统计员又说，“你是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你应该执行指示。”

“您看，我有事，”国家工作人员说着，直起身子，“事情一办妥，我就赶到米哈拉去。”

他把药瓶放回兽医站，又穿着白罩衫折转回来，手里的一串钥匙叮当乱响。他从马旁经过时，瞅了瞅马，就动身了。

走在队伍最后的是一名小学教员。

“没有办法，伙计，”教员轻声埋怨说，一把抓住兽医的胳膊，“我撂下两个班——学生要找学校的，——可我不得不来。”

“还有一匹病马就要牵来，”兽医说，“要是找不到我，准去告状。每次我不在，总是这样。”

统计局来人听觉很灵，他盯了窃窃私语的两人一眼，说道，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劳动知识分子就是不好侍候。

“我过去数过桑树、葡萄藤和樱桃树，”小学教员说，“到现在为止，我在十来个普查委员会中干过统计工作。”

这个教员还年轻，可他参加过十来个普查委员会。

“咱们国家什么都想查个明白。”统计局来人于是说，接着又扯到草场上的草。

他们在草场上走着，青草在骄阳下泛出白光。他们用肩膀拖着拦网。统计局来人走在最前面，他的皮包带子咯咯作响。

时令已至九月末，已经开始下霜。原野上五彩斑斓，热气升腾。马车道两旁，干枯的玉米黄灿灿的，漆树仿佛在燃烧，野葡萄藤上攀附着结满果子的黑莓。杨树最先开始落叶——它们的树干很高，它们的汁液最先注入地下。

在秋天的一片宜人的浅黄色中，大地只有一个地方呈现出浅绿色和紫红色，那就是种满甘蓝的鲜亮的菜地。

普查委员会的人走到菜地旁边，停下脚步。

“这里的兔子最多，”狩猎队长说，“要是运气好，会抓住点什么。”

“试试看！”青年猎人说。

可大伙在想别的。

“瞧，这菜长得多棒！”有人说，“收了大麦，我们就栽上啦，才两个月。”

拉网时，大家就种菜的问题作出结论：有水就有一切。统计局来人想找点事干，就打开自己的皮包，检查登记本、铅印和铅笔——一支铅笔的笔尖折断了，他又小心翼翼地把

它削好。一切就绪，可以行动了。

“咱们应该把电影制片厂请来，”小学教员说，“有一回，我在纪录片上看过布尔加斯州某地抓兔子，那真有意思。”

“白费劲！”兽医说道。他还在想他那个兽医站，不知那儿现在出了什么事。大概生产队长把受伤的马牵回去了，但是，会不会有人牵来别的牲口呢？……有一次，他被叫到城里开会，恰好有人牵来一条吃撑了肚子的水牛。这条水牛啃了一夜甜菜叶子，肚子胀得象个气球，即便去找教授看也无济于事。牛死后，他被问罪，判他赔偿三分之一的损失。

“放狗吗？”青年猎人问道。他脱了外衣，露出了腰上的子弹带，这条崭新的子弹带仿佛咧开大嘴在笑。

“放吧。”统计员说。猎狗脖子上的皮带一松，它便猛地冲出去，沿着地坎奔跑起来，边跑边嗅泥土。它飞奔如箭，一眨眼就跑到了菜地的另一头。但它没有叫。

“看来啥也没闻出来？”统计员说。

他本来以为猎人会来一句吉利话，可猎人却说，兔子并不象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容易被发现，有时候寻找一整天，搞得精疲力尽，仍然见不到狡猾的兔子。这个猎人虽然刚学打猎，但他并不过份乐观。

“是呀。”统计员听了他的话，这样说道，于是又思索起来。

他早晨的那种执拗劲变软了。未出村前，他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简单容易，好象网一张开，祖国有生命的黄金就会扑通扑通往上蹦。可那是在村子里——那儿的每条街道很容易

被封锁起来，连麻雀也逃不掉。而在这里，在阡陌相连、灌木丛生和庄稼簌簌作响的原野上，情况完全不同了。简直是两样。

这种怀疑蓦地涌上他心头，但他急于把它赶走，因为他有一句座右铭：相信一切。他为自己的座右铭感到自豪。

“咱们开始吗？”当大家拉好拦网时，他问，“咱们先把那边拦起来，做个‘口袋’。”

“慢着，”一个农民说，“那边低，网要拦在高处，兔子是往上跑的。它决不往低处跑，因为它后腿长，会来个倒栽葱。”

“倒栽葱？”统计员想，“又不是球。球才滚动。”

拦网在斜坡上拉好了，由两个人扶着，其他人则在菜地里走来走去，赶兔子。

“仔细看看大叶子下面！”狩猎队长说，“说不定兔子躲在下面。”

他们沿着地陌来回走动，拍着巴掌，又嚷又吹口哨，而统计局来人则拍打着自己的皮包。他的皮包是用狗皮做的，光滑，闪亮，发出扑扑扑的沉闷声，就象一只有病的老狗哼哼一样。大家低着头捡土块，再把土块扔出去。土块在空中散了架，雨点般落在菜叶上。大家象是在撒播种子，只是没挎篮子。

等大家走到菜地的另一头，青年猎人想试试自己的猎枪。他装了一发子弹，举枪朝天鸣放。这一枪在旷野里毫无反应。

“别浪费子弹。”兽医茨维坦说。唯有他把两手塞在衣兜

里，既不叫喊，也不扔土块。

“我这在唤狗。”猎人说，似乎在为自己放这一枪辩护。“猎狗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

过了一会，猎狗真的跑回来了。它抱愧地尖声叫着，鼻嘴上满是寻找兔子时沾上的泥土。

大家往前移动拦网，到了玉米地。统计员这回仍然呆在网子旁边，说是拉网只两个人太少了。其实，大家心里明白，他是怕把衣服弄脏。

“一副绅士派头。”茨维坦在大家离开统计员走远后，愤然骂道。“穿着华贵的衣服下乡，娇生惯养。”

“可能是没 有 旧衣服，”教员说，“你知道这些干部挣多少钱吗？”

“两百块。”兽医说，“一个月两百块，一个子也不少。”

“真不少，”靠他们走着的一个农民说，“是新币吗？”

“那可是旧币！”茨维坦开他的玩笑说，“只有你才会要。”

他们在玉米地里走着，吹口哨，扔土块。快走完玉米地时，大家吹得厌了，就只扔土块，然后到了拦网旁边。

拦网什么也没套住，纹丝不动。虽然微风吹拂，可网子纹丝不动，因为那网眼实在太大啦，风很容易钻过去。拦网纹丝不动。

“白费劲！”茨维坦又说，“一事无成，干脆回家。”

“成不成有啥关系，”有个农民说，“反正付钱给咱们。”

“可这是不义之财。”教员说。

“别唱高调，”农民脸带愠怒，“叫我来，就得付钱。”

“当然会付钱，”统计员走过来说，“我想，算两个劳动日不少啦，难道你们挣得比这还多吗？”

“咱们的合作社搞不好。原因就在这里。”教员说。“那钱柜就象一个筛子——没底，全漏啦。”

“您是会计吗？”统计员问。

“一个小学教员。”

“到你教了中学，你还会明白更多事理。”兽医说。

“这么说，你们好象是怀疑我们的活动会有进展，”统计员说，“怀疑是头号敌人。”

“怀疑一切，我倒不敢。”这是茨维坦的声音。

一个个农民的脸上绽出笑纹，他们对茨维坦回敬的这一句话感到满意。他们过去就听过兽医同城里的来客争论。这个茨维坦能言善辩，天不怕地不怕。再说，这一带没有第二个兽医，要是把他赶走，就没有人给牲口治病。你看，教员就比较克制，他知道州府有座师范学院，乡下不乏小学教员。

“得啦，别扯淡，”狩猎队长开口道，“咱们最好找个凉快的地方，看看老婆往咱们口袋里装了点什么吃的。”

半天确实过去了——南边天上的太阳升得老高——该打开口袋吃饭啦。大家躲到一棵梨树下，取出食品，侧身躺下，就着奶酪，痛饮装在汽水瓶里的白干，谁也懒得去庄稼地里赶兔子，吹口哨，扔土块。

就连统计局来人也迷上了白干，再也不提他是来干什么的。别人也对赶兔子讳莫如深。谁也不会再提这回统计野兔的事，就象村子上空的风暴一样，喧嚣一阵后就无声无息了。

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只有遍地露珠的秋日早晨和浅蓝色的菜地，只有旷野里的喊叫声和那用来套兔子的、麻绳编织的长长的拦网。

（余志和译）

尼·海托夫

无 根 树

〔**作者简介**〕 见本书《山羊角》。

你问我叫什么名字……谢谢你，谢谢！我来到这个城市一年多了，差不多天天坐在这长椅上，至今还没人问过我叫什么名字。没有一个人问过！你是头一个，所以我得谢谢你。我祝愿你诸事顺心，即使你落到我这步田地，我的天哪，你也绝不要进城来！

我是饿着、渴着了吗？没有！要从表面看，我什么都不赖。女儿出嫁了，在乡下过得挺好，她的孩子长得结结实实，丈夫是农业社主席。我儿子在部里工作，人家说他是第一副部长，他是个工程师，他的毕业文凭象床单那么大，每天上班都是车接车送。他媳妇是个大夫，挣着工资，他们在陶瓷盆里洗澡。我嘛，有吃有喝，一个人住一间房。可还是觉得不舒服，不好受，我没有地方可去！我老了，身体虚弱，

一天比一天瘦。我吃不好，睡不着，脑子里成天价装着乌七八糟的事，心里有话没处说……我要是说了，人家准会把我当成疯子。

就拿买酸牛奶这件屁大的小事来说吧。我对儿子基里尔说：

"基里尔，你就让我去买酸奶吧！我这样出去走走，会见到人，人家也能看见我，这也是'散心'，你说对吗？"

"你不能去！"他说，"你眼神不好，会让汽车轧着的，到头来谁遭殃！还不是我吗?!你就呆在家里，过你的舒服日子吧！"这么着，我只好呆在家里。有什么法子！家里宽敞得能跑马，一个多讲究的宅院呀！……屋里摆设得漂漂亮亮，说句难听的话，唯独我在这里是多余的……屋子里地毯铺了满地，叫你走起路来都不敢下脚。地板擦得锃亮，你一不小心就会滑倒！

"你就在家里呆着吧！"儿子对我说，"好好呆着，过点儿清闲日子，吃点、喝点，什么也别想！"

怎么个过法呀，我的心肝？跟谁过呢？儿子和儿媳妇从早到晚不在家，我跟厨房过还是跟橱柜过？……他们大清早就离开家，晚上才回来，只要一回来就盯住那个方盒子看电影，临睡前，才互相说句"晚安"、"晚安"、"再见"、"再见"。一年多来，我们见面或者分手，就只说这样一些话。

咳，小孙子在家时总还算好点儿。可以逗他玩玩，领孩子在屋里走一走，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就会立刻烟消云散，后来，那该死的儿媳妇说什么也要把孩子送进托儿所，

现在一个礼拜才接回来一次。

你听听她是为什么把孩子送走的吧！她说怕孩子跟我学些乡下佬的土话！怕我用乡下土话把孩子教坏了。我教孩子骂人了吗？没有！我只不过说了“小木棒”这么个词儿！我们乡下人都管抽打用的细木条叫小木棒，小木棒能弯曲，好用来抽打。我把这个小木棒给孩子当马骑，我对孩子说：

“给你这个小木棒，可别绊倒了！”

她妈妈看见了便说：

“怎么叫小木棒啊？你用这种话会把刚学话的孩子教坏的，你怎么不教他说，这叫细木条？”

“哎呀，儿媳妇，孩子知道这种词儿又有什么不好呢？把粗木棍叫棒，把细木条叫小木棒，让他知道这种词儿，说不定将来会有用呢！”

“他又不去当牛倌，怎么会用得上这种词儿！他将来要上语言学校，在那儿该学什么就学什么！不需要你那个小木棒！”

小孙子在托儿所又对别的孩子说了小木棒这个词儿。这下子可把事情闹大了。

“我顶好是回乡下去，”我跟儿子说，“让孩子留在家里。”

儿子突然打断我的话说：

“决不能回去！你回去自己孤零零一个人过！让村里人说我的闲话，说我养不了爸爸。你还是在这儿呆着吧，吃点喝点，什么都别想！”

吃！……我吃不惯那种盒装的半热不凉的菜，煎白菜卷

用盒装着，香肠也用盒装着，什么都用盒子装！他们回来把盒子打开，把菜胡乱往外一倒，儿媳妇还往菜里倒上一些色拉子酱……她去过德国，看见外国人往什么里边都放色拉子酱，她也学会了，还自己买了一个做色拉子酱的机器，吃完了就做，没完没了地吃……不管是猪肉菜、牛肉菜，还是煎白菜卷，全放色拉子酱！吃的时候，也弄不清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你还不能不吃，儿媳妇脾气暴，你不吃，她就生气。

有一次我对基里尔说：

"这色拉子酱非送了我的命不成！"

"怎么啦？"

"我一吃色拉子酱胃就痛。"

"这怎么可能，你恐怕是患了什么溃疡病吧！明天我带你去检查检查，要是患了溃疡病，就给你做手术切除！"

只要不再吃色拉子酱，我情愿让他们用刀子把我宰了，把我的胃切成碎块！

有一次我想吃点可口的东西——用葱和蒜拌点盐和醋。吃了那"美味"的色拉子酱，再吃点葱蒜，胃里好比抹了药膏那么舒坦，我接连吃了好几次，有一次我竟忘了开窗子，结果女医生嗅到蒜味了。

"一股什么气味？"她说。

我怎么好骗她呢？我对她说是蒜味。

"家里从哪儿来的蒜味！"

"嘿……是我吃了蒜。"

她气得满脸发青！她发怒时，不那么大声喊叫，没那么

不文明！她小声地数落着，可是这更叫人心里难受。

“好哇，真行啊！我跟基里尔从世界各地好不容易弄来点家当，你用蒜味来熏！这不，立柜已经熏上了蒜味！我要去找木工把它重新油漆一下，不然，家里没法接待客人！说什么也没法接待客人。”

我好不容易说服了她，总算才没毁了那个立柜：

“你就包涵点我这个毛病吧，以后我决不再吃蒜了！但愿咱们和和平平！”

和和平平，和平有什么用！我参加过两次战争：头一次是阵地战，第二次是当师部里的辎重员，老实说，在战争中我没有倒下，也不害怕，而现在，我得承认，为了这和平相处，我可能要无声无息地死去。

我告诉你吧：把一个人关在套间里闲着没事干，让他吃色拉子酱，一天对他讲不了半句话，他这就算完了！

我对基里尔说：

“你去水库开闸门的时候，给我带回一些柳条来，哪怕让我编编筐呢！”

“你的筐早编够了，老实在家里享享清福吧！”

他跟他妈妈一个样，说一不二，话一出口就象板上钉钉，不管是去年说的，还是前年说的！凡是跟你说过的话，一是一，二是二，从来不带改的……真是一个认死理儿的工程师！算起数来，二总是二，零就是零！别的什么他都不闻不问，只会说声“晚安，躺下睡吧！”。躺下又睡不着，一躺下就胡思乱想：这不，还是一家人呢，管我叫爸爸，在一块过日

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一点都不亲热，这是为什么？不亲热已经到了这地步，在给孩子取名的时候，都不肯姓我的姓——伊格纳特，而另叫什么克拉季米尔……祖父姓伊格纳特，曾祖父姓伊格纳特，照样活了一辈子，他们参加过反土耳其的游击队，打过仗，我们家为了国家献出了两条人命，他们的子孙却改姓克拉季米尔！抛开孙子不说，连儿子也把伊格纳特改成伊格纳迪耶夫。电话簿上也写着：基里尔·伊格纳迪耶夫工程师……电话铃一响，我拿起听筒：

“你找谁？”

“工程师伊格纳迪耶夫同志……”

儿子回到家，我当面对他说：

“我姓伊格纳特。革命以前派出所就这么记着的！你借了这个姓的光才进了大学，学了工程专业，坐上了小汽车，你可别忘了本！要么你登报声明不姓我这个姓，要么你就不要乱改我的姓！”

要是从前，他准会跟我吵一通，这一次他没敢吭声。不过，我没敢提孙子改姓的事，还叫克拉季米尔吧！

这是一次小小的不愉快。还发生过大的不愉快哪。闹起大的不愉快来，能把你的心给捅个大窟窿！夜里两点钟的时候，这不愉快使我伤心，因为我常在这时扪心自问，为什么要离开乡下那个家，给关进这个金丝笼子里？为的什么？只要我跟儿子一提起这事，他总是说：“你孤零零一个人在乡下干什么？”我怎么能对他说我一个人在乡下过得挺不错呢。我的园子里有樱桃树……西瓜、葱，应有尽有，有的咕咕响，

有的沙沙响，还有的咩咩叫——我养了一只小羊羔，来这里以前，有两只小白羊，它们真讨人喜欢！每当我累得汗流浃背，回家坐在门槛上，这两只小白羊立刻跑到我身旁，一会儿舔我身上的汗，一会儿转过头舔我的耳根和脖子，因为汗有咸味……小羊边舔边嗅，边嗅边舔，直到舔干净为止，仿佛为我举行圣餐礼似的。后来，我把它们杀掉给儿子吃了，到现在我还不能宽恕自己……这些小羊，只要听见门一开，就咩咩地叫着向我扑来。

我再对你说说我们家的院门。门上安着茨冈合页，那柞木院门挺重，开门或关门时总要发出声来！有时那声音响得象鸫鸟叫，有时又变得嘶哑，象羊羔叫，等太阳一出来，天气清爽起来，门发出来的声音活象拉风琴！我就借门的响声来预测雨天和晴天。我甚至跟农艺师说："小伙子，快让那些给葡萄喷药的人加油干吧，明天有雨。"

"电台没预报嘛！"农艺师说。

"你相信电台的预报，我相信我自己，咱们看看谁说得准。"

天下雨了，就是说，我的话应验了。从那时起，每天早晨生产队长都来找我问当天和第二天是什么天气。

现在我的门开始生锈了。没人去开它，没人去听它的响声，没人以此感到自豪了。我给妹夫写了封信，叫他去看看我的房子是不是还好，房门是不是安然无恙。他给我捎来一封信，信上说：

你好，大哥！

你家的院门，我去看过了，我想告诉你，门还是老样子，挺结实，就是不再叫唤了，也不唱了，它吱吱嘎嘎响得象咬牙，又象打得半死的狗叫。生产队长常常问起你。这里大伙都常常提起你。你要记住这个！

我把这封信拿给儿子看，至少叫他知道我也是对人有用处的，我不是没用的废物。你猜他对我说什么：

“你们这些老人和小孩一样，不过舒坦日子，偏要想这想那。”

瞧，他把话扯到哪儿去了！

有话不跟他说，还能跟谁说呢？我极想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有话无处说，我坐立不安。在公园里，青年人在打扑克，再朝前看，有人在拥抱、接吻，接下去可以看到妈妈们领着孩子闲逛。这里没有与我年龄相仿的人。他们是去排队买东西了，还是怕热不肯出来呢，这我也不清楚，反正这里看不到老年人！有时也能碰见个把这样的人，他们有的是银行职员，有的是抄写员，我跟他们搭不上话。前天，我碰见一个人，让我打探出来，他是一位退役中校。我对他说，今年种葡萄的人可要赶快给葡萄喷药，每天喷一次，要不隔一天喷一次，而他却对我讲起了一个名叫拉扎尔① 的人，说那个拉扎尔打败了敌人。

① Лазар一词可理解为人名或种葡萄的人。

“步兵将代替拉扎尔，而步兵迟早也要覆灭!”他又讲起自己的步兵在一九一八年如何消灭了英法联军的一个旅，一些榴弹是怎么飞来爆炸的，他遗憾地说，拉扎尔将安然地被击毙，雷鸣般的巨响是在对拉扎尔致敬。

他跟我讲起了战争，别人就连这个也不对我讲，他们喜欢讲吃药，讲自己什么地方痛，谁什么地方扎破啦，谁用什么药抹腰啦，什么迪恩科夫教授让他涂一种稠药膏啦，一个克拉斯诺村人，叫约基还是叫约尔基来着，说天天早上在他头上扎针往脑子里输血。还有个面黄肌瘦的人，他脑子里好象一辈子也没流过一滴血。他脖子歪了，左边的眉毛不时地在抽动。他讲的全是这些事!……要是把这些人全都交给我，我发给他们每人一把铁锹，看他们的血会流得多快。三年前，我关节痛，心想：“哎约，天哪!我要死了!”屁股上的针眼象筛子眼一样多，结果关节还是照样痛，病依然如故!有一次我看见妹夫扛着铁锹过来。

“往哪儿去?”

“生产队分给我一块草地，我去平整一下，给羊种点饲料。来呀，跟我一块去吧!”

我一瘸一拐地跟他去了。我们把草地平整完了，荆棘也砍倒了，到晚上我的病完全好了，就象谁用手把病除掉又埋进土里一样。我也跟生产队长要求给我一块草地，我身上还有不少关节，必要时好治治病。

“你过点舒服日子吧，要草地有什么用?”生产队长说。

“你就分给我一块草地吧，以后我会告诉你什么叫舒服

日子。”

他很敬重我，当初，是我把生产队建立起来的，就这样他分给我一块草地，你猜这块草地在什么地方？在老远的荒地里。过去那儿是草地，后来荒芜了。地里长满了荆棘，草被欺死了。看不出有人来过这里。说句不客气的话，我种葡萄是把好手，做这种活，也不发怵，我先把那些荆棘除掉，再割掉那些杂草，草地修整干净了。地里有一棵石枣树，长得根深叶茂，我摇了摇它，怎么也摇不倒。我开始从根上挖，这树长得挺牢，四周长出许多棵小石枣树，盘根错节，一动不动。我把所有的小树全部砍掉，只剩下大石枣树的一条根了，还是拔不掉！我又砍又刨，整整干了一个礼拜，累得我筋疲力尽，心急火燎，终于把它挖掉了，除掉杂草，这块地得到了休闲。后来用耙子把地耙平，围起木栅栏，在原来长着石枣树的地上栽上一棵樱桃树，在草地上还种了梨树和李子树，我又把草篮里三叶草的种籽撒在草地里，为了让草长得好，我经常浇水。

科斯坦丁节那天，我和妹夫去割草，你猜地里是一片什么样的景象？地里三叶草中夹杂着的虞美人花正在盛开，樱桃花儿红似锦，芳香扑鼻，森林里凡是会飞的昆虫全被引来采蜜了！

妹夫说：

“我们开镰割草吧！”

“你快把镰刀放下！”我大声说，“这块草地我不割了！叫这些小昆虫来采蜜吧！也好让它们感谢我这个姓伊格纳特

的。”

晚上我对生产队长说：

“你不是想知道什么是舒服嘛，明天去我那块草地瞧瞧吧。”

他中了我的计，我们来到了草地。

“看那，队长，这就是我说的舒服！”

“好，要是有一大瓶葡萄酒，在这三叶草地上吃烤肉串，一边吃，一边把啃下的小羊骨头往空中一扔，那才真叫舒服呢！正好我还有块咸肉！”

他把咸肉掏了出来，边吃边走掉了，既没朝樱桃树看一眼，也没有闻到花香。

从那时起，只要一想到这件事，我的心里就觉得舒服。一天，我打算问一问基里尔：

“工程师同志，你常常让我过舒服日子，我问你，什么叫舒服？”

“什么叫舒服？睡好觉，看看电影，要是有对手的话，可以打打桥牌。没有人招惹你，这就是舒服。”

“你说的舒服纯属胡扯！”我说，“你天天晚上瞪着一双眼睛看的是什么电影？活象在玻璃上熔化橄榄油一样。我演的才是一部好电影……你说的‘没人招惹你’的那种生活就等于糟蹋生命！”

“要你退休就是让你得安宁，这是合情合理的，”基里尔对我说，“要你好好休息。”

“一个活人要是安闲得没有人去理睬他，可以说就不合情

理。大自然里，你听说过狐狸退休吗？没有！也不可能。你听说过退休的鹰蹲在窝里等小鹰往它嘴里送老鼠吗？老鹰在临死之前，仍然在空中飞翔，最后掉在地上死去。”

接着我对基里尔讲了我在“白河”上遇见的一件事。那天，我去放羊，正坐在一棵小松树底下歇晌，用刀削着木棍。忽然传来呼呼的声音，我一看，是一只老鹰！那鹰从天上坠落下来，嗖地从我头顶上擦过去，随后扑通一声掉在小松树后边。我连忙站起身来，转身看了看，那只鹰张着两只翅膀，身上没有一点儿伤，原来是飞着飞着就掉下来死了！

“儿子，这才合乎情理：边飞边慢慢死去！”我说。“你却把我关在这里，象关在笼子里一样！”我很想把最后一句话也说给他听一听，我寻思了一会儿，又咽了回去。

基里尔看着我，好象初次见到我似的：

“我得带你去看看病，我看你神经有毛病了。”

“把我交给医生是再好不过了，这样，你也好自由自在地去看电影了！”

我以为他能领会我的意思，可他却没听懂我的话！对他来说，话就象数字一样，二就是二，零就是零。我说东，他说西，总是说不到一块儿。

这就是夜里苦恼着我的一块大心病。我苦思冥想，心里急得直冒火，身上出虚汗。我真想爬起来，把窗子打开透透空气，窗子刚一打开，楼下面的摩托车的隆隆声立刻在我耳边响起来，砰砰砰、噗噗噗，一个劲地响！接着轰的一声，摩托驾驶员朝大街冲去，这声音直冲着耳朵响，刺痛我的心。

这么大的城市，约摸一百万人，有市长，他还有一师人的帮手，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想出个办法，把这几千个，就算五千个吵得全城不得安宁的驾驶员都赶跑呢？

我又把窗户关起来，用水龙头冲冲头！这是能救我命的一着，我还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不辞而别！我多么想闻一闻那松软而温暖的泥土味！不过，要是我跟基里尔提出回乡下去，那还不等于同冰箱说话。倒不是儿子有多么不好，他体格健壮、能干、为人老诚，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不是母亲养大的，是在汽油桶里长大的，因此在他身上嗅不到一点儿人奶味，浑身都是汽油味！我跟他再无说话，只给他留下一个字条：

基里尔，我回乡下去了。基里尔，树木要在幼苗时节移栽。你在我上了年纪时把我接到城里来，可是，我在这里不能扎下根来，儿子！我的根扎在乡下，我去找自己的根基去了，不这样，我会枯萎、凋零，死了也合不上眼。

再见，儿子，别来找我！

（金丕良译）

奥·瓦西列夫

送给妈妈的玫瑰花

〔**作者简介**〕 奥尔林·瓦西列夫(1904——1977)生于弗拉查州弗拉尼亚克村，曾在索非亚大学学习外交。解放后先后在广播电台、电影制片厂、“基里尔和梅托迪”人民图书馆任职。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纯朴的心》、《人民之声》，长篇小说《大义弃母的海杜特》、《以牙还牙》，剧本《警报》、《爱情》、《幸福》等。曾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他气喘吁吁地跑进前厅，把几枝玫瑰插进玻璃花瓶。然后，他用颤抖的手指摆弄花枝，使压皱的花瓣舒展开来。他还想跟他妈妈一样，后退两三步，欣赏一番花束，可大门砰地开了：

“他们回来啦！”

男孩穿过一道门，躲进隔壁房间，拉过一个凳子，把一

条腿往上一翘，跪在上面，埋头看起字母表来。他的整个身心——头脑、肩膀、双膝、手指和埋在字母表上的那张小脸——紧张地期待着前厅传来喊声。

他终于听到了——声音是那么柔和、圆润和亲昵：

“呀呀！……”

啊，孩子的一片心意给妈妈带来了快乐！

你看，她来了。

嗬！——她把花瓶捧起来，贴在胸前，那朵朵玫瑰花——洁白的、淡黄的、鲜红的玫瑰花——拂着她的脖颈、面颊和那两片笑得宛如玫瑰花瓣的嘴唇。

孩子还小。他意识不到捧着花瓶的女人的美。不过，他仍然看出，这瓶花吸引了她，使她心旷神怡，充满了幸福。要是没有他——那个格格不入的、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爸爸……就我跟妈妈俩人，那可多好！……

妈妈把脸凑过去，睫毛一抖，深深吸进一口花香。接着，她那双炯炯闪光的眼睛似乎在问：

“是谁送来的，是米尔科吗？”

“谁也没送。”男孩嗫嚅道。

其实，他只动了动嘴唇，没有出声。不过，一看他那张神采飞扬的小圆脸，妈妈自己也猜到啦：

“是你吗？祝贺我生日？”

孩子点了点头。

“哟，亲爱的！……”

妈妈把花瓶放在一边，俯下身来。她两手拿着东西，无

法拥抱自己的儿子，只好将面颊贴在他的头上，吻着他的脑门、头发……

房间里芳香馥郁——这芳香来自玫瑰，来自白皙的脖颈、袒胸的领口，来自金色的卷发。

“谢谢你，乖孩子，……谢谢！……这么好看的玫瑰，你是从哪儿买来的……不，等等！……”

欢乐的气氛蒙上了一层乌云。

这玫瑰有六枝……七枝！……该要多少钱呢？不，这太可笑了——米尔科只有两角钱！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米尔科？……我问你话，听见没有？”

“是偷来的！”丈夫在她背后说了一句不吉利的话。“我还敢断定，我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

“不，斯特凡，这不可能！”

“是这样，亲爱的，这是真的！这就是他用过的剪刀。这位老先生从钮扣盒里把剪刀拿出来啦。”

“不，斯特凡……这些玫瑰……这些玫瑰大概是……”

妈妈宁肯相信，这几枝玫瑰是她亲自买来的，是从楼上掉下来的，要不就是从花瓶里魔术般地长出来的，只要她的孩子别在他面前吓呆了就行。

然而，他已冲过来——一套灰衣服，一张灰脸，一双灰眼睛：

“你从哪儿拿来这些花？…………你说！”

孩子脸色发白。嘴唇也是白的。就连他的那双眼睛——

蓝色的眼睛——也变白了。

“从哪儿……”

“你说！”

“那座院子……伯伯那儿……”

“是他给你的吗？”

“不是。”

“偷来的？”

“不，我……”

“走！……把花拿着！”

“斯特凡……我求求你，斯特凡……”

“你别管。我家里不需要流氓。”

……他们走着。

孩子两腿发软。脚上的凉鞋象粘在石板路上一样。一枝玫瑰掉在地上。孩子想把它捡起来。可是，那一位把他搡了一下。他使劲攥着剩下的玫瑰。两根刺扎进了手掌。说不定还流了血……

“你现在就跟这位同志说个明白。声音要大，要清楚：‘我是小偷、流氓！’你说呀！”

那个丢了花的园丁抢在小孩前面说道：

“别这样，公民！干吗说这些……干吗说这些难听话？……唉，我的上帝！……”

园丁已上了年纪，一条短裤打着补钉，但他却有一副将军的派头——浓密的眉毛，银灰色的胡须，仿佛有股韧劲，

眼里充满了和善和聪慧。

“您放心，公民，”他一摊手说，“我理解这些孩子。他们无非是喜欢我的玫瑰……”

“不，您别护着他！小偷就是小偷。我的家里容不得小偷。”

“对，对，对！”园丁把胡子一撅，“这种行为该受指责，该受指责。所以，请您让我跟他单独聊聊。”

“城里到处是流氓。我们要不严厉点，会培养出怎样的一代？”

“对，对，对！我会给他讲道理的。把道理讲透。您把他给我留下，让他呆一会儿。我求您把他留下——我会亲自把他给您送回家的！唉，这些毛孩子！……”

……园丁坐在一条长椅上，长椅四周长着十来丛玫瑰。他把小男孩夹在他那打着补钉的双膝中间。

“过生日了，对吧？”

“是的……”

小男孩这才哭了起来。无精打采的小脑袋，几乎耷拉到那件完全褪了色的旧外套的衣兜上。园丁抬起右手，抚摩起小孩的头发来。他的手掌沉重而粗糙，但孩子却把它视若靠山。

“那么，你是相中了我的玫瑰，是吧？……因为我的玫瑰漂亮，是吧？”

“是的。”

“你想让妈妈看到玫瑰，好听她说‘呀呀！’……”

“对呀，对呀！”

小孩的两颊还闪着泪珠，但他的脸上却绽出了笑容。这个马林伯伯……真叫他猜着了！连他的声音也象妈妈的一样……毛烘烘的眉毛竖了起来，活象小刺猬。

“你听我说，米尔科……咱们合计合计，行不行？”

“行。”

“你听我说，就在你窗下那地方有一小垅地。他，就是你爸爸……几年前……在那儿栽过天竺葵。这天竺葵是向我要的。要是咱们现在也在那儿栽上玫瑰，你爸爸准没说的，是吗？”

“那好，马林伯伯。”

“好，当然好！我这儿有枝条。你给它们浇水，它们就会长大，开花……。只是我不知道你喜欢哪种颜色：是红色，还是那些……”

“白的，马林伯伯，我喜欢白色的！”

“好，……咱们就栽白玫瑰。你就帮帮忙吧！……”

……孩子锄地、挖土，手指被园丁的手锄和那些小刺弄得针扎般地疼痛。可他浑身舒坦。他累了，一倒上床就进入了梦乡。

小孩的眼睑没有完全合上，眼睑下那对蓝眼睛清晰可见。

嘿！枝条破土啦，长呀长，直朝窗户爬，还接连分出小枝杈，上面挂着嫩黄色的齿状叶片。

“可这是动画片！”

你看，第一个白花蕾也冒出来啦。它长啊，长啊，终于绽开花瓣。鲜花在绿茎上摆来摆去！它点着头，微笑着说：

“你好，朋友，你好！”

可这不是玫瑰花！这是园丁；他一撅银灰色的胡子，笑啦。他的两道浓眉竖起来，活象小刺猬。

男孩的嘴唇动了动。听不清他在悄声说些什么。不过，他大概是在梦中自言自语：

“你好，马林伯伯，你好……”

（张春荣译）

埃·斯塔内夫

“站　　长”

〔**作者简介**〕 见本书《傍晚静悄悄》。

车站离我们镇子有三公里。当年修铁路时，镇委会认为，要是让车站紧靠镇子，火车会吵得居民睡不好觉。因此，镇委会要求把车站修得远点。富豪们的这一要求同车伕和搬运工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后者的利益同他们的阶级敌人的利益完全一致。于是，车站被建在镇外，它和镇子之间有一条泥路相通，泥路的两旁稀稀拉拉地栽了些洋槐。

车站后面是一片充作草场的沼泽地，当间有个不大的水洼，我和米柳大叔常去那儿打野鸭。草场上有成群的鹳，它们在镇上的烟囱旁边和房顶上营造了许多奇形怪状的巢穴。

有一年的秋天，到了八月末，当鹳群迁徙时，一只老鹳留在草场上没有飞走。这位朋友在车站周围转来转去，它样子很丑，尾巴上的羽毛拖在地上，微微发黄，又大又瘪的嘴

壳则呈褐色。大概是由于没有力气随同伴们飞走，由于某种巧合，它逃过了严格的审查。这些鹳在飞往遥远的非洲之前，总要相互审查的。

扳道工米哈尔大叔有一回把它抓住了。他把它关在堆放旧泵的木棚里，一直精心喂养它。为此，米哈尔大叔还常去镇上向屠户们讨猪肺。老鹳很爱吃这种食物。

扳道工关了它一星期，又把它放了出来。但是，它不肯飞出车站，更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恩人。看来它已不怕人，因为它的大半辈子是在房顶上度过的。

米哈尔大叔一把它放出来，它就开始在站台上蹓跶。过了几小时，它向草场飞去，傍晚又自个儿回到木棚，暖暖和和地过夜。就这样，它不再象先前似的害怕火车的隆隆声。旅客们扔给它面包和各种好吃的东西，这种款待使它总是迫不及待地等候客车进站。草场上的蛐蛐不多了，它不再去那儿。很有风趣的米哈尔大叔对此深为满意，他有一天竟在它头上涂了红油漆。

“这位老兄跟咱们一样，是看管铁路的，咱们起码要封它个站长。再说，它本来就天天在迎送列车。”扳道工在给老鹳的脑袋涂上厚厚一层油漆后说。

大家原先叫它“特拉奇科”，现在却用新名字称呼它。油漆了脑袋后，它在站台上走得很神气，单腿停立时显得更得意，惹得大伙不断说笑。

“丹乔，‘站长’可要夺你的饭碗啦。”老制动员冲一位当班的职员说。后者是个小伙子，他胳肢窝下夹着个圆牌，正出

来迎接一列火车。

“它是我的助手，”小伙子笑着说，“只是不拿圆牌。”

“它拿圆牌干啥？你看它戴着红帽子，长着红嘴。”

“站长”确实已能分辨各种声音，知道火车什么时候进站。一听见火车的声音，听见铁轨嗡嗡作响，它就高兴地拍打着翅膀，马上在站台上站好位置。车站的职工们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们把老鹳说得神乎其神。老鹳在火车司机和司炉中也出了名，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把它吹得天花乱坠。只有真正的站长不肯参加大大有损他尊严的说笑，可他是个聪明人，不小气，一味装着什么也没有听见。

老鹳就这样在旧泵房里度过了秋天和冬天。米哈尔大叔喂它食物，它同大叔心心相印。喂食的时间一到，由于严寒或由于天下大雪而靠在木棚上的“站长”就啄得木板砰砰直响，扳道工就给它拿去食物。

春天到了。这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三月，原野上的积雪已经消融，和煦的阳光温暖了种子萌动的土地，光秃秃的灰绿色的草场上，水洼泛着白光。老鹳经不住广阔的原野和依依旧情的诱惑，有一天飞进了草场。它在草场上走来走去，东一嘴西一嘴地啄着什么，晒着太阳，傍晚依旧回到车站。第二天，它走得更远，似乎更深地恋上了草场，尽管草场上食物甚少。但是，与此同时，“站长”又显得烦躁不安。它心绪欠佳，好象有什么疑虑，也不尽心迎候列车。它不思饮食，仿佛已吃腻了旅客投给它的面包。它喜欢静静地站在车站旁边，缩着脖子，把它勋章般的大嘴埋在胸脯里。

“它不舒服，让春天的太阳晒昏了。”职工们打趣说。

“年轻人，这是因为它上了年岁。它老啦，就这么回事。要是年轻力壮，它现在准是站在埃及的清真寺高塔上。”米哈尔大叔回答说。

“鸟兽也怕孤苦伶仃，它们也有感情。”老制动员眯着眼睛瞅着太阳，满有把握地下了结论。

“站长”忽而眯起这只眼睛，忽而眯起那只眼睛，时不时瞅瞅温煦的蔚蓝色天空，似乎在等待什么。

此后几天，老鹳改在车站的房顶上度过午后的时辰。它站在烟囱顶端，望着南方，显得温驯而又阴郁。

职工们猜测说，“站长”正盼它的同伴归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它的所作所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米哈尔大叔断定，老鹳正为今年找不到老伴犯愁。他解释说：

“大概它的太太比它更有能耐，飞到暖和的地方去了。它太太在那儿另有新欢，咱们的‘站长’要打光棍。这就是它的心病。”

“不是这么回事。”制动员反驳说。他装了满肚子关于鹳群的奇谈怪论，总是把它们描绘得很讲道德。“主要原因是它未能飞走。它感到罪过，无地自容。鹳群不会饶恕它，定要把它处死。它们象古代的角斗士——只认强者。士气高涨——体格健壮。”他吐了一口唾沫，急匆匆把争论刹住，似乎想要证明，别的议论统统一钱不值。

一个晴朗的、美妙的早晨，当太阳从披着紫色雾霭的群山后面冉冉升起时，“站长”显得心烦意躁。它早早地占据了

房顶上那个固定的位置，这回是伸长脖子等待。中午时分，一大群野鹅从草场上掠过，它们的叫声很快就充满了周围的空间。接着，它们栖息在庄稼地里。尾随着野鹅从南方飞来的是第一批鹳群。它们舒展着漂亮的、宽阔的双翼，白晃晃地从春天蔚蓝色的天空中徐徐下降，落在草场上。

“站长”发现了它们，不安地在房顶上踱来踱去，不时忧郁地啄啄房顶，象是在自言自语。它显然是想飞到同伴那儿去，可又拿不定主意。它三番五次地准备张开翅膀，可在最后一刻又犹豫起来，继续在两层楼房的房顶上踱步。

午后三点钟光景，沿着铁道和站台的方向掠过了一个同伴的“十”字形黑影。同伴瞅见“站长”，在车站上空飞了一圈，落在烟囱上。两只白鹳对啄起来。它们对啄了十来分钟——同伴好斗而有劲，“站长”却有气无力，很少还嘴。随后，那只鹳向草场飞去，又带着十来只鹳折转回来。鹳群在楼房上空盘旋，而“站长”规规矩矩地垂着染红的脑袋，一动不动地站着，就象等着接受重判的被告一样。

“哎，现在有热闹好看了，”制动员说，“这是审判！”

几乎所有的职工、几个搬运工和来赶中午这趟车的旅客，都聚集在站台上和后院里翘首观望。米哈尔大叔既为制动员的说法惶惶不安，又有点不大相信，他瞅瞅房顶，捡了些石子，准备把鹳群赶走。

蓦地，一只鹳俯冲下来，啄了一下“站长”。扳道工大声吼叫着，朝鹳群扔石子，但鹳群毫不理会。另一只鹳又狠狠啄了一下“站长”，“站长”身子一歪，搧了搧翅膀。于是，米哈

尔大叔再也顾不得会砸坏房上的瓦，扔上去一个大砖头。砖头落在他的朋友的身上。“站长”受了一击，往上一跳，昏头昏脑地跌到房檐边。它看见前面毫无遮挡，便张开黑色的翅膀拍打了几下。其他鹳马上冲上去，四面出击。

突然，“站长”象被枪弹击中了一样，一个倒栽葱掉在土堆后面。

当米哈尔大叔和其他几个围观者赶上去时，“站长”已经断气了。它的后脑勺被某个行刑官的尖嘴啄了一个窟窿。

扳道工来了火，臭骂鹳群。大家都很吃惊，只有制动员为他的预言得到证实而感到得意。

“我就说过，它们要处死它，”他高声说道，想让大家都能听见，“它们不喜欢老家伙，不喜欢体弱多病的同伙。不知这位朋友去年秋天是怎么躲过去的，可现在难逃厄运……强悍的飞禽！”

“坏种！”米哈尔大叔吼叫道，“我鄙视这样的法律。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理它们的执政官。我从前尊敬它们，可现在恨它们。”说着，他扔下“站长”的尸体，朝树林走去。

我们这些当学生的把死去的老鹳捡起来，交给了我们的生物老师。他拿它做了标本。直到现在，“站长”还静静地站在走廊上黄色的橱柜里。每回打它旁边走过，我总是想起它那天的遭遇，总是可怜这只不想违背自己家族的严厉法律的老鹳。

（余志和译）

帕·维任诺夫

讨厌的家伙

〔**作者简介**〕 帕维尔·维任诺夫(1914—1983)生于索非亚，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哲学系。早从三十年代起，维任诺夫即开始其文学生涯，曾编辑《九月》、《火焰》、《现代人》等文学刊物，担任过保加利亚作协副主席等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干旱的平原》、《星星在我们顶空》、《夜驰白马》，中篇小说《第二连》、《障碍》以及短篇小说集《持小提琴的小伙子》等。这些作品以城市生活为主，寓意深刻，描写细腻，深受读者欢迎。曾四次荣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这是我第一次到坐落在黄土岗和碧绿的葡萄园之间的小疗养所去。我站在车窗旁边，一种烦闷的情绪就象从火车头里突然喷出来的蒸气一样油然而生，使我这个兴致勃勃的疗养员顿时感到郁郁不乐。闷热的空气带着黄土和烧焦的干草

气味向我这个城里人的鼻孔冲来，我毫不掩饰地皱起眉头。究竟是什么鬼东西促使我到这块被闷热所窒息的光秃秃的地方来的呢？大概是由于患肾结石的缘故吧。说真的，我肾里的结石是可以晚些时候再出现的。凡事都各有其时嘛。可我的年龄还不到生病的时候。

火车奔驰在被太阳晒得灼热的收割后的田野上，转过最后几个弯，便徐徐开进了一个小站，这个小站实际上就是这条铁路的尽头。一个红瓦顶的白色小亭子展现在我面前，宛如在一块荒地上冒出的一个鲜蘑菇。路边的马车夫们把鞭子耷拉在地上，一位身穿制服、脸上汗津津的乘警一本正经地向这些黑色车厢举手致意。接着火车闸瓦发出急促的吱吱声，最后停了下来。我刚刚走上月台，就感到特别懊丧——外面下着细雨，也还是那么闷热，雨点在玄武岩砌的人行道上显得更加清晰。酷暑，再加上货车厢里飘来的烂菜味，使人不胜烦恼。

“我非死在这儿不可了！”我绝望地想。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下火车的旅客远比我所想象的多得多。他们多半都是附近一带的农村妇女。这些妇女穿着蓝色的、黄色的、玫瑰色的裙子和短袖上衣，围着花头巾，有的穿着胶鞋，有的穿着便鞋，也有的趿着木屐；有人提着篮子，有人拿着包袱，还有人手里握着一束鲜花，花已经晒蔫了，不知为什么，她们依旧用瘦骨嶙峋的手指紧紧地握着它们。他们当中城市的姑娘很少，如果不把那些假装患有各种疾病、拖着沉重的双腿的男人包括在内的话，几乎没发现他们中有男人。其实，我从前就知道，疗养所主要是为女人开办

的，这里历来就为那些患有妇科病的女人所喜欢，所看重。

此刻，人们正急匆匆地奔向什么地方，有的人甚至在你追我赶，各不相让。我下意识地尾随在人群后面，迈开两条瘦长腿，匆匆向前走去。这时，汽车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再也挤不进去了，于是，我走到最后一辆空马车跟前，用力一跃，坐了上去。咳，谢天谢地！……然而那马车夫却磨磨蹭蹭，不肯只拉我一位乘客。我沮丧地打量一下那匹老马隆起的瘦脊背，这匹老马若拉上两个乘客，走不了多远准得累趴下。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

"伊林切夫同志，我可以坐上去吗？……"

我惊愕地朝旁边一看，尽管天气闷热，我似乎立刻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变凉了。这讨厌的家伙，这么闷热的天，是什么又把她弄到我这儿来了？她是玛丽诺娃同志，跟我在一个工厂里工作。我看见她在用一对茨冈人的眼睛嘲弄般地从上到下地打量着我，没等我回答，她就准备跳上我这辆马车。她秀丽的脸颊——摩尔人的鼻子，弯弯的眉毛——丝毫没有经过长途旅行后的那种倦容，看起来，是那么生气勃勃，仿佛刚刚洗过冷水浴。

"您也乘的这趟车吗？"我吃惊地问。

"不是这趟车是哪趟？"她说，一边微笑着，一边把手提箱递给了马车夫。

"奇怪，我怎么没见到您……您这是到哪儿去？"

"跟您一样……去工人之家……"

玛丽诺娃坐在我的左边，我本能地向右边移了移。我敢

断言，她发觉了我的这一动作，她脸上的表情显得更加欢快了。马车夫挥了一下鞭子，啪的一声，好象打在车板上了。

“噢，噢，”我含糊其词地说，“您患的是什么病？”

这问话里包藏着狡滑的挖苦，而她却没有在意。

“我的胆有点毛病……”

“那当然！”我幸灾乐祸地想，“奇怪的是您的胆居然还在！”想必是她猜到了我的心思，她慢条斯理地说了这么一句：

“有你们这号工程师，我的胆还好得了吗？”

我生气地瞟了她一眼。倘若想找出个什么格言警句的话，那就该说：她禀性难移！她怎么可以如此吹毛求疵？我是工厂里的总工程师，厂里人人都爱戴我，尊重我。领导上多次要提拔我去部里工作，我全拒绝了。象这样的工厂在我国没有第二个，厂里没有谁象我这么精通业务。厂长对此十分清楚，所以他紧紧抓住我不放……唯独她这个蠢货瞧着我不顺眼！……要是她当厂长，岂不早就鸡飞蛋打了吗？……

然而，我这位女同事好象忘记了自己的话题，坐在马车上观赏着周围的景色。

“多美呀！”她轻声感叹道，“这里的一切变化多大呀！……您是初次来这儿吗？”她问我。

“初次来……”

“是啊，简直认不出来了！……”

事实上疗养所并不象我在火车上所想的那样糟。我们从长满大树的公园旁边走过去。那些绿荫覆盖的漂亮的别墅排

列在道路两旁。马蹄踏在柏油路上咯嗒咯嗒地响，马拉着我们通过古罗马的拱门，拱门是那样威严，以致我敬畏得深深地缩起了脖子。确实值得一看啊！既然古罗马的皇帝肯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到这里游览，为什么一个普通工程师不可以为此花上半天工夫呢？……再往下看去是花园桥，绿荫如盖的大树……我也许不会死的！……

工人之家建筑在光秃秃的陡坡上。不知是哪儿来的这种传统，所有疗养所都要建在阿吉拉走过的地方，那儿既不长草，也没有树木。正因为如此，通向工人之家的台阶仿佛是通向古埃及的神殿，人们要在这台阶上多爬两倍的路，上边等待我们的不是祭司，而是一位不友好的、满脸疙瘩的男人，显然他被马车的辘辘声吸引住了，用一种疑惑的目光看了看我，问道：

“你们是夫妻吗？”

“不，不是！”我忙跳下车说，“只不过是同路而已！……”

“唔！”他狡黠地哼了一声。

这哼声所包藏的丰富含义是难以捉摸的。其中包含他对我的话产生的疑心，又包含对我们之间真实关系的猜疑，还带有威胁的味道，那哼声似乎想表明疗养所里绝对不容许伤风败俗的事情发生，同时又表明对我们俩人如此幼稚地一起前来抱以轻蔑态度，威胁与轻蔑微妙地交织在一起。

当我们把证件留在办公室时，他冷冷地提醒说：

“半小时后吃午饭！……过时不候！”

“是吗？”我那位女同事用讽刺的口吻问道。

从她投向他的目光里我全然明白了她的意思。同志，有你伤脑筋的！她用三天时间将会浏览完你的文件，查完你所有的仓库。为了弄清你一天的伙食帐目，她会偷偷溜进厨房去摸情况。她将彻底检查你所安排的文艺节目，而且准能从中挑出资产阶级文化的余毒。等着瞧吧，你会知道她的厉害的！……我不愿意提醒他，这个犀牛不配交好运气。看来这犀牛还没预感到什么危险，因此他还大胆警告说：

“我十点钟关门！往后你们可别觉得难熬！……”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等着瞧吧。”我高兴地想。

我住的小房间很漂亮，里边有一张雪白的床，白得简直耀眼。从窗口可以看见一条林木繁茂的深谷，深谷后边是一道道城墙，城墙上长满了草，看上去象长长的绿色花环。城墙有的地方显得雄伟、结实，有的地方因年代久远而风化，现出许多洞孔，还有被人破坏的痕迹。假如我不是这么倒霉，碰上这个讨厌的家伙，那我蛮可以在这里久住的。我敢断定，她准保不会让我安生……

她的确是厂里唯一觉得自己在一些会议上有责任跟我过不去的人。她对我的工作总能挑出她不喜欢和感到做得不够的地方，总能提出过多的要求来。我不管做什么，心里总觉得她不满意，总觉得她在责难我，象一把无形的锥子扎我的屁股，哪怕在我觉得最有把握时也还是如此。我本以为在疗养所里至少可以摆脱她了，没想到……

铃响了，我几乎立刻跳了起来，连忙顺着楼梯跑下去。使我吃惊的是，那些无能之辈如此轻而易举地便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了那些善良、淳朴的人们。在我顺着白色楼梯往下跑时，发现墙上贴着各种诸如“请勿随地吐痰……”、“请勿乱动……”、“请勿乱扔……”、“请保持……”等不礼貌的标语，这些标语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停了片刻，看看到底要“保持”什么。原来是要为我的邻居“保持”安静。那好吧，可是这位满脸疙瘩的疑神疑鬼、总爱发号施令的长官为什么没想到要尊重我的人格呢？本来，我既没有乱动，也没有随地吐痰的习惯，至于说到尊重……

虽说我的动作相当迅速，可是我发现别的疗养员早已在餐桌旁就座了。我在一张空桌子旁边坐下来。当女服务员为我端来一盘汤时，我心里嘀咕起来：既然这位姑娘能那么从容地把手指伸进汤里，可见这汤未必会那么热罗。

“可以坐吗？”

这当然是玛丽诺娃。既然她做事从来不等待别人允许，那又何必问一声呢。

“一切都好极了！”她用一种使我感到润色得很糟的感叹声调说，“朴素而经得起鉴赏！……”

然而当她看见那位皱着眉头从餐桌旁走过的疗养所所长时，她微微一笑，又补充说：

“当然罗，不包括这个阴险的人……”

此刻，我当真觉得这汤比实际略酸了一点。难道偏偏要她来道破这一点吗？

“我想，”她接着说，“为了给人创造一个愉快的环境，花了那么多钱，可他那副面孔使一切都前功尽弃了……”

对她来说，讲这番话未免有些过分了。于是我也耐不住性说：

“说得对……不过，没想到您自己有点象他吗？”

她愕然地望着我说：

“我？……象他？……您有什么根据？……”

“这很简单，您自己想想吧……”

我的这个批评显然挫伤了她的情绪。整个午餐时间，她连一句话也没说。当我们起身离开时，她踌躇地问：

“您不想同我一道去游泳吗？这儿有个非常好的设有浴场的游泳池……”

我委实不愿意，但还是答应了，我刚才对她的批评使我略感内疚。好在游泳池离这儿不远，而且这时里面的人也不多。她穿上游泳衣，我感到她变样了——体态轻盈，真象个妙龄女郎。“恶意是不是把她身上所有多余的脂肪熔化了呢？”我一边困惑不解地想，一边不由自主地朝四周看看，虽然我是个瘦人，但是我这白里透黄的奶酪色的肚子竟凸出来了，而两条腿却那么细弱。

玛丽诺娃在游泳池里游了一刻钟光景，然后来到我跟前。她刚一坐下，那湿淋淋的身子便给我带来了一种凉爽与清新之感。她笑眯眯的，目光里隐藏着一种狡猾。

“依您看，我象疗养所所长，是吗？”她兴致勃勃地问。

她的腔调使我感到不胜惊讶。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吧……”我尴尬地轻声说。

“我在哪方面象他，举例说说。”

“在哪方面?……您跟他一样，总是找碴儿，对什么都看不上眼。”

霎那间，她的神态变得十分严肃。

“原来是这样啊!”她若有所思地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我从来都不是为了什么小事!”

“他同样也认为不是为了小事,”我回答说,“他也认为这样做全是为了维持秩序，为了使别人安宁。”

她看了看我，放声笑起来，用一条腿跳跃着向游泳池奔去。我诧异地望着她那秀美的背影，这背影与我的背影迥然不同，你瞧，她既不同我吵，也不同我争，又不反驳我那些令人不快的见解。在她走近游泳池时，做了一个漂亮的鱼跃动作，跳进蔚蓝色的水中，身边溅起的水花,宛如颗颗钻石，在阳光下闪耀，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了一会儿，她把头露出水面，兴高采烈地叫道：

“来呀,您过来痛痛快快洗个澡吧!您想象不到这该有多么好!”

我站起身来，看了看自己这牛皮色的肚子，羞涩地朝游泳池走去。

她没来吃晚饭，不知为什么，这使我感到郁闷。她也许很坏，也许找碴儿，也许是诸如此类的一个人，但她毕竟是人，在生活中人离开了人是绝对不成的。不然的话我同谁坐在一起，同谁说话呢?这里都是些素不相识的人，既没人了

解我的工作，也没人了解我的思想。晚餐快结束时，疗养所所长走到我跟前，漫不经心地把两本身份证往桌上一扔。

“您的，”他说，“和您太太的！”

从他后一句话里，我听出他的话音里充满着丰富的含义。我不禁愤怒了。我这个人与别人不同，一生起气来，嘴巴就不听使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收起了自己的身份证，也不由自主地打开了她的身份证。是啊，直到如今，我才想起她叫奥尔佳。对，是叫奥尔佳。

当天晚上，我怀着忧郁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次日早晨，奥尔佳更换了服饰，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地前来就餐。这也太怪了，莫不是她只在工厂里才那么好挑衅？她果真有两副面孔？一副用于工作，一副用于生活？我正在惊讶时，她向我解释昨晚没来进餐的原由。

“我通常不吃晚饭，因为我夜里看书，一直看到深夜，假如胃里装满东西，我简直无法睡觉。”

“好了，好了！”我宽容地说，“您显然是在保持自己的线条美！”

“我在保持线条美？”她反问一句，我感到她说得很诚恳。

“是这样嘛！这是显而易见的。”

她摇了摇头。

“不对，用节食的办法不能保持线条美！”她斩钉截铁地说，“一个人内心充满激情，对什么都不抱冷漠态度，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线条美。”

“一个人热情工作，这很好，”我说，“只是别热衷于打旁人的主意……”

她理解了我的意思，笑道：

“瞧吧，到底谁在挑衅？是我，还是您？”

从这天早晨起，我们开始一起进餐，一起去浴场了。我天天进行日光浴，游泳。我感到欣慰的是，我那凸出的肚子开始慢慢缩小。走起路来也显得略微有点气魄了，步履也显得有力。我满心以为奥尔佳能注意到我的这一变化，然而她却一直保持缄默。

当我们躺在浴场的粗沙滩上晒太阳时，我们常常谈起厂里的工作、人以及业务。她给我的印象是，她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是那么惊人地准确无误，这使我深感不安。假如说她对所有人的看法都是公正的、正确的，那我还有什么理由认为她专跟我作对呢？她在会议上对我的话提出异议，以及她那一把不停向我扎来的无形的锥子，说不定其中有某种正确的东西吧？

一次，当我们谈到我们的专题，谈到生产工艺的时候，她讲了一桩事，简直使我惊讶得目瞪口呆。

“您从哪儿知道的？”我兴奋得叫了起来。

“我在一本德国杂志上看到的。”她说。

“在很久以前？”我焦急地问。

“两周之前。”

我稍微感到宽慰一些，但仍旧不很坦然。

“多么愚蠢呀！”我悲哀地叹了口气说，“我还以为这是自

己发明的！……”

她用怀疑的目光瞅了我一眼。

“这和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联系？”

“怎么没有？……您没发现？”

“我看不出……”

我简单地对她作了说明。因为高兴，她脸上显得容光焕发。

“我们应当采用它！”她在白沙土上踱来踱去，几乎激昂慷慨地说，“一回去，我们就立即干起来！”

当天晚上，我们怀着一种异常兴奋的心情回到了疗养所。第二天早晨，她满面愁容地前来吃早点，当时她心绪不佳。开头，我不露声色地闷声不响，后来我忍不住问她怎么了。

“我们不要再坐在一起吃饭了，”她皱起眉头说，“人们在议论纷纷……”

“有什么可议论的？”我问道。

“您心里明白他们在议论什么！”

倘若此刻她朝我望一眼，一定会发现我那惊惶失措的神态。但她没有看我。对，一定要想法消除这种议论。

“既然事情并非如此，议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竭力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况且确实不是那么回事。”

“是啊，”她无精打采地说，“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不光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亲人。”

“您完全不必这么想，”我提高了嗓门说，“人应当尽力诚实地思考问题，诚实地工作。只有不尊重自己的人才会为迎

合那些卑微的、贯于播弄是非的人而活着。”

“是啊！”她点了点头，脸上现出开朗的神色。

当天晚上，似乎为了证明我们自已光明磊落，我们一起来到露天啤酒馆。最初，我们每人喝了一杯啤酒，接着又喝了一瓶名副其实的卡尔洛夫斯克葡萄酒。对一个不喝酒的人来说，这已经相当可观了。

我们纵情快乐了一阵子，跳了一会儿舞，我甚至还随着音乐哼起歌来，我已很久不允许自已这么放纵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自然，我们玩到了很晚，当我们起身回疗养所时，已经深夜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难忘的夜晚！当时气候温和宜人，群星在南方的夜空闪耀。我们沿着山谷旁的小路返回。萤火虫在山谷里不断地闪着光，夜鸟不时拉着长声鸣叫。我觉得自已仿佛年轻了许多，心中充满了自信心，我的自我感觉从未象现在这么好。也许是这样无拘无束的心情和自信心给了我力量，使我温存而快活地问道：

“听我说，奥尔佳，您坦率地告诉我，为什么您在工厂里总是死揪住我不放？难道我是厂里所有人 中 最 最 无能的人吗？”

我感到她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恰恰相反！”她激昂地说。“正因为您最能干！”

“这是什么逻辑，我不太懂。”我反问说。

奥尔佳沉默了一会儿。

“这里没有什么逻辑可言，”她说，“这里只有信念。在这个

世界上我爱慕的是天赋。我爱的不是善良，不是诚恳，也不是那无可非议的勤劳和认真态度，也许我错了，但我最爱慕天赋。我们所有人都靠天赋的思想与灵感成果而活着，我们的一切全靠天赋。倘若世间的一切都只凭那些诚恳而勤劳的人去安排，那生活势必原地踏步不前……”

我并非完全赞同她的看法，但我却惊奇地倾听她的每一句话。这完全不是一个女人所能具有的思想。

“是这样吗？”她问。

“就算是吧……”

“不，正是如此，”她坚定地说，“因此，天赋才比任何别的东西都负有更大的责任。有天赋的人注定要做一番大事业。所以他无权推让，无权安于现状和与世隔绝！而您恰恰与此相反！没人说您不是一位好工程师，但是，您仅仅满足于自己的那一丁点成就，安于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从来不向高处看。您不应当只做一个好工程师，还应当做一位学者、发明家。要用您自己的天赋把您的全部热情焕发出来。这会使您的眼睛更加明亮，会使您焕发青春！您多大年纪了？”

“四十二岁了。”我低声说。

“是吗？可是，看上去您却老多了。这就是您安于现状的结果。我偏偏做不到这一点，当我看到您在浪费自己的天赋时，就气愤、抱怨……”

我们沉默了许久，我非常清楚地感到，在这个难忘的夜晚，她的这一席话听起来是多么逆耳，却又无比正确。又沉默了一阵子，我才迟疑地说：

“也许您是对的，奥尔佳。不过，我一向把谦逊看作至高无上的美德。看来，我过去不是与学者和发明家们为伍，而是在同那些自命不凡和贪心者并驾齐驱……”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好半天，两人绕着疗养所的围墙走了三圈。最后奥尔佳提醒说：

“我们该回去了。”

疗养所的大门自然已经关上了。我突然感到有点忐忑不安——那个满脸疙瘩的家伙会说什么？我们如何向他解释？当时我做好再折回公园的准备，打算在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上呆到天明。正在这时，奥尔佳果断而不客气地按了门铃。

疗养所所长立即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仿佛故意躲在自己的小黑屋里等待着我们。他脸上明显地带着逼人的责难神色，那神色简直能让我瘫倒在地，随时都可以化作一股蒸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打开大门，用蔑视的目光望着我们说：

“你们真不知道羞耻！两个人都是结过婚的人！”

一听这话，先跨进门的奥尔佳立刻停下了脚步，仿佛脑门上挨了一锤子。

“您是个可悲的猿猴！”她气得声音都颤抖了。

“女同志，请注意一下自己的用词！”疗养所所长搭腔说，然而他的话却没有一点力量。

我似乎觉得，她眼里迸发出一道蓝光：

“您给我滚开！”

这一声喊真吓死人了。我看见这位疗养所所长慌忙闪在一旁，好象一辆八个汽缸的大型汽车正高速朝他冲去。

我们来到疗养所里头的一个小广场上，这时她不由得微微笑了，把手递给我说：

“您说得对！也许是我不好，但我只对坏人才这样！”

我熄了灯，在窗旁伫立良久，漠然望着山谷深处漆黑的夜色。那里的萤火虫依然在闪耀，夜鸟依然在拉长声音啼鸣。她人不好吗？不，说她什么都行，唯独不该这么说！现在我可以平心静气地承认，很久以前我就感觉到，她真是一位我所见过的最和蔼可亲的、对生活最有鲜明见解的女人。

十几天之后，我们一起回到索非亚火车站。

她事先给丈夫打了电报，天晓得，我为什么没敢这样做。她丈夫比我略显年轻些，身材相当魁梧，容貌也很漂亮。他一边随便地吻了她一下，一边十分自然地朝我瞥了一眼。

“这是我的同事伊林切夫！”她把我介绍给他说。

“噢！”他提高了声音说，“奥尔佳常常跟我提起您。”

他的笑容不算难看。

不出我所料，我妻子正在家里等我。一阵惊异和欢乐的情绪过后，她陷入了沉思，仿佛对我有了疑心，她的疑心使我觉得有点心虚。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我快活地谈起疗养所、疗养所所长以及我们怎样喝了两木桶矿泉水。我意识到她压根就没听我说话，而是想着自己的心事。傍晚时分，天色渐渐黑下来，城里的嘈杂声从敞开的窗口传进屋来，跟我在疗养所里听到的声音截然不同。她急急忙忙把煎好的鸡蛋端到桌上，自己却没坐下来和我一起吃。

“据我所知，你不是独自一人去的吧！”她突然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我眨了眨眼说。

“这要你来说……”

“我有什么可说的？只不过玛丽诺娃也去了。”

“还要怎么！……这件事就那么偶然？”她盯着我问。

我这无辜的人在这询问的目光下感到一筹莫展。

“我问你，你们是偶然碰到一起的吗？”她狠狠地说。

这问话使我感到愕然。

“上帝呀，我们的关系怎样，你不是知道吗？”

“我想知道的正是这个！”她的声音忽然低沉下来，眼里闪着泪花。

她这样比大喊大叫还要叫人觉得难办。

“玛格达连娜，我向你发誓，我们轮在同一期疗养，这完全是巧合。当时我们相遇时，我都感到大吃一惊……我跟这个讨厌的家伙会有什么共同语言！”

我现在仍然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说出“讨厌的家伙”这个字眼来。为什么？大概是由于我那可恨的胆怯心理，也许是由于我对妻子产生了怜悯之情吧。因为我不愿意她为我平白无故地流泪，无缘无故怀疑我的忠诚，索性不去管是什么原由吧，此刻我深深感到自己很渺小，感到自己这颗心象被尖尖的毒针扎了一般疼痛。我什么都可以说，唯独不该说“讨厌的家伙”这几个字，无论如何是不该说的。

……不过，看来正是这几个字以一种神奇的方式使玛格达连娜平静下来。在我们上床就寝之前，她确实还在唠叨、盘问。我们熄了灯久久地躺着。是不是我在与我同床共枕的

妻子身边虚度了部分年华？是不是她的这种温存、柔顺和娴静的爱使我失去了反抗和进取的力量？而最重要的是，我会不会重蹈覆辙，还象以往那样生活？或者我将沿着在那萤火虫不断闪耀的幽静的夜里所清晰看到的光明的路前进，尽管它充满曲折？

这一夜我什么也没弄明白，只觉得心里无限惆怅。

（金丕良译）

维·留茨卡洛娃

第八序曲和赋格曲

〔**作者简介**〕 维谢拉·留茨卡洛娃(1935—)生于索非亚，毕业于索非亚高等建筑工程学院。当过设计员、助教，先后担任《建设者报》和人民青年出版社编辑。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生活——这无穷无尽的波涛》，长篇小说《支流》等。

每年都在同一个时候，在盛夏时节，实习生就来我们工地。每年都在同一个时候，在盛夏季节，我们就盼望他们到来。我们的目光从厂房高处越过工棚、混凝土搅拌中心和高高的砂石堆，越过一片繁忙的来来往往的自卸卡车队，越过发白的俱乐部楼房，向那被许许多多电焊的蓝色闪光映得通明的道路眺望。

实习生每年都是一大早就从城里乘公共汽车赶来，他们一来就消失在某个工棚里，然后混进我们当中。他们穿的裤

子跟我们一样，上衣也跟我们一样。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一眼就能从他们那娇嫩的、未经风吹日晒的脸蛋上认出他们来，也能从他们那还不习惯于劳动的白净的双手认出他们来。我们的言谈、笑语和目光全都对准了他们，而他们经受不了这种考验，最多在一两周或三周以后就都一个个溜之大吉，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底。这又使我们充满了受过磨练的男子汉的优越感。我们把他们看作娇生惯养的青年，整整议论他们一周，然后便把他们忘掉，直到新的实习生到来为止。一切就这样周而复始。

这一次只来了三个人。傍晚，当我们走出车库，围着水台擦洗肩上的汗水和阳光灼晒的皮肤时，他们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个身高体瘦，满面春风。我们正洗得水花四溅。他们向我们打了招呼，在一旁等候。我们扫了他们一眼，木然地站着。科廖·热利亚佐推了我一下，我闪在一旁。这是两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姑娘。他们多半还没有尝过工地生活的滋味。他们穿着白色牛仔裤、白衬衫，对我们投以淡淡的微笑。

“去把技术员叫来！”科廖·热利亚佐第一个出点子说。

技术员很快就来了。他在铺满阳光的小路上停下了脚步。

“嘿！”他也惊奇地瞧了一眼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给我们派来过这样一些宝贝。穿白衣服的。”

然而，他的玩笑却受到了冷遇，谁也没有随声附和。大家的目光全都落到那位姑娘身上，长时间贪婪地瞧着她，而

她却漫不经心地东张西望。她的目光从工棚移向他们面前的花坛，又从高耸的圆柱移向地面上那些贝壳形的建筑物和另外一些架得高高的悬着吊斗的吊车。这个姑娘和那两个小伙子一样，是来自另一世界。她披着金色的夕阳，令人不可思议。

分给他们的那个工棚离我们很近。他们提着行李和三个旅行皮箱，轻快地走了。技术员为他们打开了门，姑娘首先走进工棚，两个小伙子接着也走了进去。技术员留在工棚外面，应酬了一阵子，便又回到我们这儿。

“这样的宝贝还没有派到我们这儿来过，”他重复了一句，“穿着白衣服，真够我们伤脑筋的。”

仍然是谁都不吭声。我们默默地回工棚去了。我跟科廖也回到自己的工棚，在窗口旁边偷偷往外瞧。

我们看见姑娘在工棚里进进出出。工棚前面两个花坛之间的木桩上出现了一条拉直的细绳。她在绳上晾了几件白衬衫。过不一会，绳上又挂起了几条被风吹拂的白色牛仔裤。那些白色衣裤活象求和的旗帜。它们也在乞求友谊。

晚霞灿烂，哪儿都还没有开灯。

我们聚集在俱乐部里，还是那副样子。不，我们已不是老样子了。大家的脸洗得更干净，胡子刮得更仔细，身上都穿着洁净的衬衫。桌上也不见往常那些白酒杯。我的伙伴们喝着杯中漫着泡沫的啤酒。我们压低说话的声音，谈的全是些我们熟悉的往事，好象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同一个话题重复来又重复去，无非是谈些我们建成后又离开的城市、

在家里等着我们的亲人、我们爱过的姑娘，以及我们想生或已出生的儿女。我什么亲人也没有，科廖·热利亚佐也一样。我和他坐在灯影里，不时地长吁短叹。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俱乐部周围的石板地上响起了脚步声。科廖把视线从酒杯上移开，抬起头来。

新来的姑娘打开房门，默默无言地伫立在门旁。我瞧了瞧披在她肩上的薄薄的白东西——纱巾。姑娘把门推开，贴在墙上，连望都不望我们一眼。我喝干了杯中的酒。姑娘向我们点头致意，她似乎在揣摸大家的沉默的含义。随后，她走了进来。另外两位也尾随她进来了。最后进来的那个小伙子把门关上。姑娘取下肩上的纱巾，朝前走着，环视着我们说：

“我叫玛利娅。他们是安格尔和斯维特洛扎尔。我们在同一个年级，学的是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可以跟你们一起坐坐吗？”

姑娘并没有坐下，她的到来使屋子里顿时充满了光辉。另外两个小伙子个头很高，要是他们一举手，准会摸到天花板。姑娘象是他们的小妹妹。她毕竟是我们迄今未曾见过的一个姑娘。她走到屋子中央，蓦地看见了角落里的一架积了厚厚一层灰尘的钢琴。

“要是你们不反对，我来为你们弹支曲子吧！”

大家都扬起脸来，推开自己的酒杯。那两个小伙子还在屋子中央张望。有人指着椅子让他们坐了下来。接着，音乐声在室内荡漾，这空前的琴声震撼着我们，扣人心弦，在我

们心里引起了共鸣。这不是我们以往听过的音乐，它迫使我们去想想自己，认识隐藏在自己身上的实质……我们熟悉风声和鸟儿飞翔的音乐美，懂得成熟的麦浪和树木摇晃的音乐声，也熟悉那些乖乖倒卧在许许多多伸开两臂的圆柱上面的贝壳形屋顶的震动声，但我们却不了解自己这颗自由的心声。这是要改变我们生活的音乐，我们竟然在与它抗衡。它要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最隐蔽的领域，并将给那里带去光明。它要发掘出我们身上的每一个最细微的美德。它使我们成为各有个性的、幸福的、神灵般强悍的人。我们紧锁眉头，紧紧握着手中的酒杯默默地听着，恋恋不舍地听着。

姑娘转过脸来，我们甚至忘了为她鼓掌。大家都露出惊讶的神色，面面相觑。

“这是第八序曲和赋格曲。”姑娘说道。

她微微一笑。她这是在为我们弹琴——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她忽然朝我们转过身子，立即发现我们个个手里都握着酒杯，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皱着眉头，对她弹奏的乐曲感到疏远和格格不入。她又笑了笑，走近我们，随后朝门走去。两个小伙子也站起身来——在这之前，我们已把他们抛到了脑后。他们三人一起走了出去。

“祝你们晚安。明天见。”姑娘快活地 说 道，似乎在暗示我们：她要压倒我们，打破我们沉寂的生活，踏入我们的世界，把我们的世界变成她的世界。她要战胜我们。于是，她关上了门。

我们听到了他们在石板地上离去的脚步声。直到此时，才有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人鼓起勇气小声说道：

“明天做高空作业时再见高低，你这个小丫头。”

我们用责备的目光看了看说话的人，原来他是科廖·热利亚佐。

第二天，她头一个走出了自己的工棚。她梳洗一新，精神焕发，身着白色牛仔裤和白衬衫。她笑着向大家致意。又是谁也没回敬她的问候，我们全被她那淡淡的微笑震惊了。她尾随在技术员的身后，两个伙伴跟在她后边。他们走进了昏暗的办公室。

“走着瞧吧。”要在高空和她见高低的科廖·热利亚佐小声说道。我们耸了耸肩膀，继续向自己的工作地点走去。我们意识到，姑娘不适于高空作业，她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已经登上脚手架，安装车库顶盖的下一个贝壳形屋顶。我感到身子在摇晃，同时发现人们全都朝下眺望。他们三个人拿着展开的大张图纸，走过挖好的地基，接着又走到暗沟，在那儿稍停片刻，便穿过装备器材场地朝我们走来。

“你们在傻看什么？”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朝开塔吊的人瞟了一眼，这时他正在用塔吊微微向前后左右移动着贝壳形屋顶，直到吊斗轻轻落下来为止。我们用绳索把它拉过来，架在那些圆柱上。我们走到贝壳形屋顶上边，象往常一样感到脚下在颤抖。我们希望那姑娘此刻向上看一看，瞧瞧我们在贝壳形屋顶上忙碌的情景。我们牢牢地把屋顶安装好了。当一只沉甸甸的手落在我那赤裸裸的流满汗水的肩上时，我

摘下了护面罩，转过身去。

我惊讶得屏住了呼吸。人们都一动不动地象我们一样朝下眺望。车库的尽头是一个与圆柱垂直相接的铁阶梯。每天早晨，我们都顺着阶梯爬到上面去安装。此刻，那位一身白色装束的姑娘正沿着铁梯向上爬着。她扶住上端的栏杆轻快而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她身后跟着她的两个同伴，他们走得比她还留神。

“叫他们站住！”有人喊道。

他们三人要到我们这儿来，就得走过一根横木，这根横木象是架在一些圆柱上的蓝色小路，又长又窄。横木有二十五公分宽，这对一个不习惯高空作业的人来说未免太危险了。我回想起第一次沿着这种横木行走的情景，回想起要掉进深渊时的那种心情，回想起每走一步都感受到的恐惧，也回想起有经验的人叫我们目不斜视、特别是别往下看的忠告。后来，当我们跨上屋顶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想到返回去时还须经过这根横木，一种恐惧感又震撼着我的全身。我五年多都没有忘掉两腿发抖、胃里作呕与不寒而栗的那可怕情景……我想甩手不干，可大家说服了我。我后来就习惯了。

然而，这姑娘可能是生平第一次登上高空，沿着这条横木行走，因而我重又感到无法摆脱的恐惧。此时，别人也象我一样感到恐惧，我从他们紧张的面容，从他们脑门上流出的汗珠，从他们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的张开的嘴看出了这一点。就连那位想在高空和她见高低的科廖·热利亚佐现在也站在那儿浑身冒汗，毛骨悚然，象一尊雕像似的一动不动。

姑娘踏上了横木。她的两个伙伴还在铁梯上。下面聚集着一大堆惶惶不安的人，他们在嚷嚷些什么，可我们什么也听不见。技术员也在下面喊叫，他使劲摆动着双手，示意我们叫那姑娘退回去。他是负责她的，如果因为她出了事，他就要去坐牢。他的声音传到了我们耳边，可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我们都吓得透不过气来。

姑娘向前迈了第一步。我们想请求她退回去，但嘴唇却在无声地动着。她没有朝下看，而是向前迈了第二步。她想回头看看，于是一扭头，微微向后望了一眼，发现只有自己一人走在横木上。但她并没有退却，接着迈出了第三步。她笑了笑。此刻，她看上去显得更加纤细、单薄，在蔚蓝色晴空的衬托下显得更白。“第四步。”有人在我身后脱口而出。“别说话！”科廖·热利亚佐说。姑娘仍旧笑着。为了鼓起勇气，在高高的狭窄的横木上继续朝前走，她大概是在向自己微笑吧。她两眼直视着我们。只剩下二十来步了。我们每人都在心里数着，真想叫出声来。我不忍再看了，闭上了眼睛。我想把两眼一直闭到她……可我没有能够再闭下去。我又睁开了眼睛。姑娘还是微笑着，显得更白，面孔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已瞅见她那双睁大的眼睛和两眼流露出来的恐惧——她所感受到的恐惧。我又闭上了眼睛，使劲闭着眼睛。我觉得眼前冒起红色光斑，那姑娘在空中飞翔，她想用张开的两臂去抓住空气，然而空气毕竟不是支柱，它消散了，她的身子在下坠……我差点儿大叫起来。我睁开了眼睛。站在我身旁的科廖·热利亚佐用手掌捂着嘴。他大概也感受到了

同样的恐惧。姑娘走近了，她面带淡淡的微笑，睁大眼睛。还剩下五步了。还有三步……一步。我第一个伸过手去。她抓住我的手，跨上了贝壳形的屋顶。

高空中长时间地响起了抑制不住的喊声，地面上也响起了一片欢呼声。那喊声象她昨天为我们演奏的音乐一样在激励着我们，这音乐想改变我们的生活，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给那里带去光明，使我们身上的每一种美德放出光彩。于是我们登时为她所制服，没有人表示抗拒，一同去跟她交谈、握手。我们笑着，不住地恭贺她，对她的勇敢表示赞叹，甚至那位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示弱过的，想在高空和她比高低的科廖·热利亚佐，这会儿也去拥抱她，吻她的面颊。他满脸通红，连耳根都红了。而她却幸福地说，那会儿她怕极了，简直怕得要命，可是……

打那以后，我们便把她当成了自己人。

直到实习期满，她都在我们这里，尽管她的两位伙伴还在她登高的当天就走掉了。

（金丕良译）

瓦·波波夫

来自苏黎世的飞机

〔**作者简介**〕 瓦西尔·波波夫(1930—1980)生于特尔诺沃州米特尼亚村，在索非亚上过中学。先后当过《我们的祖国》、《人民文化报》等报刊编辑和《文学阵线报》散文部主任。著有短篇小说集《根源》、《永恒的时间》、长篇小说《低地》等。

有时，他一大早就搭班车赶来了。他也许不满三十岁——高高的个子，一头褐发几乎已全斑白。两道眉毛成银白色，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投下浓浓的阴影。他过去总在深夜出现在国际航线的大厅里，当时人们正在等候来自马德里的飞机和来自莫斯科的末班飞机。机场上的人全都认识他，可他却好似旁若无人。他到机场来，的确没有准确的日期或时间，可大家都知道，他准会来的。

“我要是他呀，”酒吧招待佩绍靠着锌制柜台说，“早就不

再苦恼了。”

“总之，一切都会过去的，”海关职员马尔蒂诺夫说着，向上推了推制帽，下意识地抹了一把额上的汗珠。“这不，他又来了。”

白发人的一只黑鞋带进了一片湿乎乎的槭树叶。这片雅致的黄叶宛如展开的手指，它掉在地上，很快就粘住了一位少妇的靴子。少妇的一头假发挺别致，焦油般乌黑锃亮。酒吧招待和海关职员死死盯着这片树叶，不觉想起外面已是秋天。虽然还不曾下雾，但秋天已随着人们的衣服散发出的潮气味、令人心灰意懒的潮湿味和那股好闻的腐熟味来到大厅里。白发人穿过边界镀镍钢管后面的候机室，经过武器检查口，最后来到国际航线大厅。这里聚集着前往卡扎布兰卡的乘客。验票员、海关人员、警察、行李过磅员，谁也没有拦阻他，都朝他轻轻点头。机场工作人员的脸上都现出一种为他人的过失而感到难过和同情的神色。白发人面朝飞机跑道站在玻璃墙前，手里照旧拿着一束鲜花。裹着鲜花的玻璃纸沙沙作响。

“又是双数。”酒吧招待说道。

“什么双数？”海关职员心不在焉地问。

“菊花呗，”佩绍答道，使劲按了一下咖啡器的两个把手，把机器弄得直晃。“你看，花束里的鲜花从来不象是送给活人的单数，而是双数。死人是不喜欢单数的。”

“你怎么数得出来？”海关职员马尔蒂诺夫诧异地问。

“我嘛，什么都能数。”

这时，那片黄色的槭树叶已粘到一位成年男子的鞋上。他穿着一件庄重的黑色风衣，钮扣一直扣到脖颈。他那顶崭新的黑帽子下，一双忧郁、悲伤的眼睛紧盯着飞机跑道。这人拎着一只油黑锃亮的小皮箱，象是踩着哀乐的节奏，踱着小方步。但他没有发现那片粘在鞋跟上的槭树叶。白发人扭过身，用手指点着他那苍白的高额头，似乎想起了什么。飞机象儿童玩具似的冲向主跑道，发动机的轰鸣声缓慢地传来，冲击着高大的玻璃墙。海关职员看了看手表。

“我该走了，”他打个哈欠说道，“过一会再来。”

佩绍点了点头。他的女助手罗扎从边界里面递出咖啡和夹心面包，而他在外面，站在经过所有检查关口等着出去的旅客中接住了这些东西。边界线也经过他的酒吧间。他伸出一双青筋暴露的、白皙的、衣袖一直挽到胳膊的手，利利索索地把咖啡递给了一对容貌相似的姑娘。这两个姑娘留着同样的黑发，穿着一样的毛料衣。一对双胞胎，他想，我敢打赌，她们准是意大利人。他用各种语言跟她们搭讪，一个姑娘现出悠然自得的样子，另一个姑娘用德语回答说，她们是哥本哈根人。白发人点着一支香烟，瞅着外面。飞机跑道湿漉漉的，一辆浅黄色的公车来回兜着圈子。酒吧招待寻思道，他有工作，又年轻力壮，长得漂亮，要是愿意，不要说一个姑娘，就是五个姑娘也能弄到手。真叫人纳闷。一个堂堂建筑师，既掏得出钱，又有小汽车，虽然是旧式“白茹”牌的，可这有什么关系。唉，人哪，多关心点自己吧！白发人好象明白了他的意思，好象是摆脱了玻璃墙边强烈吸引着他的东西，

朝酒吧间走来。他动了动苍白的薄嘴唇，订了杯咖啡。酒吧招待点点头，有些慌乱，象是有人发现他找错了钱。

“是要咖啡吗?”他满脸堆笑，讨好似地问道，接着又点头说:“马上就来!”

白发人站在柜台旁边，嘴边和眼角突然现出皱纹。佩绍偷看了一眼他的眼睛——那双红得象兔子眼珠一样的眼睛仿佛正凝视着酒吧招待背后、机场背后、整座城市背后的某个地方。他身上那件粉红色的衬衣挺干净，皮上衣泛着光泽，纤细的手腕上滴滴答答地走着一块电子表。电子表走起来不会出滴答声呀，酒吧招待想，旋即又看到了那片黄色的槭树叶。这片被人们的鞋跟和鞋掌甩下的树叶，孤零零地躺在出口门前，几乎紧挨着那个高高耸立的筒式烟灰缸。酒吧招待想告诉他，那片树叶是他踩进来的，可又转念一想，一个人怎么知道脚底下踩了些什么呢?于是他改口说道:

“是不是还在下雨?”

“对不起,”白发人猛省过来，把手插进怀里，掏出了钱。他连看也不看酒吧招待一眼，就把钱放到了锌制柜台上。

“我是说还在下雨,”酒吧 招 待收起钱说,“这些天总是这样，按节令还算暖和，又 不 下雾，就是阴雨绵绵。我想说，这季节不该总下雨。”

白发人没等喝完咖啡便走开去，混进了旅客之中。别人手里也捏着花，但酒吧招待已经数过了——全是单数。他笑了笑，心想，这些花自然是送给活人的。这时，警卫基罗夫凑到了他面前——这个基罗夫的结实的下巴刮得发亮，鼻子

不大，两眼下陷，眼框突出，眉毛淡得几乎看不清。

“拿他怎么办?”基罗夫叹了口气。

“没有办法，”佩绍回答道，“我琢磨着，他应当找个女人，结婚。那么个美男子，什么漂亮女人找不到，可他……”

“有一点我不大明白，”基罗夫神情忧郁，慢吞吞地说，“他为什么要带来这些花束?”

“怎么为什么！当然是为了她。”

基罗夫没搭腔。他的目光沿着旅客们的脸扫了一眼，最后停在一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抱着一只跟自己一样大的褐色玩具狗熊。他朝着孩子走过去。孩子的妈妈，一位淡褐发的女人朝他微笑着。基罗夫弯下腰，伸手去拿那只狗熊。可孩子拽着不放，尖叫着哭起来。基罗夫蹲下身，按着他的小鼻子说，“嘷……”孩子笑了，松了手。基罗夫拿过狗熊，摇动着，象是在吓唬孩子。他敲敲狗熊，用手掂了掂，想象磅秤一样准确无误地掂出狗熊的份量。然后他远远向孩子微笑着，把狗熊还给了孩子。他又按了一下孩子的小鼻子，又“嘷……”地一声，朝那位淡褐发的妈妈点点头，回到了酒吧间。

“这么大一只狗熊，不要说手枪，就是一支自动步枪也藏得住。”酒吧招待咧嘴笑着说，一把抓住咖啡器的把手。

“来杯咖啡，”基罗夫说道，全然没有听见他说的话。他喝了口咖啡，眉头一皱，但并没去拿糖罐。“还有件事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放他进来?”

“为什么要阻拦他，”酒吧招待说道，“你没见他来一下就走吗?”

“你呀，根本就不懂这些事，”基罗夫耷拉下结实的下巴说道，“你就知道胡搞，就知道瞎闹，可有的人……”

“什么人？”酒吧招待抱屈地问道。“难道你就不胡搞？”

“我也胡搞，”基罗夫承认道，心里想笑，可脸上却现出了忧郁的表情。“道理是不错，可有的人却爱上一次，终身难忘……”

酒吧招待哈哈大笑。

“嘿，你也来情绪了——爱一辈子呢！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这我不知道，”基罗夫耸了耸肩膀，“我总发誓不放他进来，可一见他来，又不想阻拦他。”

他留下几分钱，就混进旅客中去了。酒吧招待收了钱，悄声吹着某个电影上的一段插曲。出口的门打开了，旅客们蜂拥而去，飞机跑道那边传来了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左后方，孤零零的一架湿漉漉的“图—154”飞机已备好弦梯。只几分钟的时间，候机室就空了下来，只剩下窗口里面的两名检查员和那位白发人。还有那片树叶，那片黄色的槭树叶躺在大理石地板上，恰好位居紧闭着的门前，象是曾经犹豫该跟着谁去阿姆斯特丹而又未被任何人选中一样。白发人毫无察觉，又一脚踩了上去，被他的右脚上的鞋子带走了。这时，他慢慢踱着步子，瞅了一眼一只手上的一串钥匙，另只手握着那束菊花。外面不时有飞机起飞和降落，发动机的吼叫震动了玻璃、大厅和酒吧间。酒吧招待按下把手，一股黑色的液体冒着热气，流进考究的瓷杯。航空小姐玛尔加丽塔站在酒吧

间前。她那顶天蓝色的包发帽罩着乌黑的短发，黑黝黝的脸膛表情丰富，两片宽宽的嘴唇涂着口红，嘴唇后面是两排洁白细密的牙齿。她接过咖啡，掏出一盒“肯特牌”长度过滤嘴香烟。佩绍递过去一只金黄色的打火机。然而，这位航空小姐却朝白发人望去，向他点了点头。

“他在等人。”酒吧招待说，对她的轻慢感到委屈。

她转过身，朝他脸上吐了口烟，悄声说：

“都过去两年多了，可他还来……”

“他总来！既然一切都完了，为什么还来？”

“对他来说，可还没有完，”航空小姐喝了口咖啡，又说，“他这种人是不会忘记的。”

“得了吧，”酒吧招待忿忿地说，“那他拿花来干什么？这些花真叫我讨厌。他倒是去公墓呀。要是想去，就一天去两次，把这些花也带去。这儿可不是公墓。”

酒吧招待不再作声了。白发人转过身来，可目光却躲开了他们。玛尔加丽塔背过脸去，她受不了这样的目光。

“你明明知道她没有坟墓。”

“请原谅，”酒吧招待软了下来。“有的时候也真叫我讨厌。这些花让我怎么处理？每回都是这样，走时把花往这一放，”他用指头敲敲咖啡器前面的柜台，“要是你的话，你也会讨厌的。拿起来一数，总是双数。”

“那当然，以后还会是双数，”航空小姐轻声说道，叹了口气，取出天蓝色的手套，“嗨，佩绍呀，佩绍，你站在这儿倒咖啡……而别人却要飞行。”她声音很低，两眼避开了酒吧招

待的面孔。接着，她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再从天上摔下来……”

航空小姐起身走了。酒吧招待哑然无语，只是目送着她，但见她走到白发人面前，垂下眼睑，同他握了握手。他们彼此都没有说话。玛尔加丽塔落泪了。她扭过身去，用手背擦着泪水。这一切都被佩绍看在眼里。“她们飞上天，”他想，“飞上天，可会摔下来……而她们的佩绍哥哥每天迎送她们，端给她们咖啡喝，晚上又平安无事地回家去。”他苦闷得“哼”了一声，很想说会儿话，又找不到说话的主。罗扎在那边照顾顾客，再说又没有什么可同罗扎谈的，顶多是听她唠叨她给她男人织了件什么样的毛衣罢了。检查员中唯有阿塔纳索夫站在窗口前，可跟他根本谈不来。另一个检查员佩特罗夫呢，你简直就没法同他搭话，他开口闭口是邮票，对邮票完全着了迷。那位航空小姐已经踏上湿漉漉的泛着光亮的混凝土地面，变成了一个深蓝色的小圆点，这个小圆点然后又上了弦梯。酒吧招待这时才发现那片黄色的槭树叶不见了。是她把树叶给带走了，他寻思道，一种不愉快的想法掠过心头。但是，心中的苦闷、恼怒、反感、妒忌，一切都很快烟消云散，他又信口哼起一支电影插曲。这是哪部电影的插曲呢，他怎么也记不起来了。这时，“图—154”的发动机突然吼叫起来，整个大厅颤抖着，玻璃被震得哗哗作响。检查窗口、窗口前面的检查员、黑色椅子、出口 前 的烟灰缸，都被震出了声响。象地面上所有的东西一样，酒吧间也发出响声……每逢飞机准备起飞，酒吧招待总有种特别惋惜的感觉，如鲠在喉，周

身微微颤抖，似乎跟沉重的飞机上的所有部件一样开始震动，似乎他也要加大油门，在主跑道的尽头停留片刻，再高速起飞。声响和震动停止了，只见飞机盘旋着飞向天空，轰鸣声在右上方消失了。海关职员马尔蒂诺夫又走过来，把一包东西放在柜台上。

“这些家伙着了魔似的带连裤袜，”他愁眉苦脸地说着，往上推了推制帽，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有个混蛋，我警告了他五次，可这次竟带来一百双……给我来一包饼干。”

海关职员唰唰地嚼着饼干。他两眼慢慢扫视着空旷的大厅，最后把目光停在白发人身上。

“你知道他手里是什么东西吗？”他张着塞得满满的嘴问道，口里的饼干已经化作一团。

“什么东西，”酒吧招待仔细朝那边看了看，“好象是一串钥匙。”

“是钥匙，”海关职员点点头说，“你知道这串钥匙是谁的吗？”

“我怎么会知道，”酒吧招待活跃起来，身子倾向酒吧间。

“有人告诉我，”海关职员说道，“有段时间他不是同利迪娅飞一条航线吗，”他咽下一口饼干，擦了擦嘴唇上的饼干屑说，“利迪娅最后一次离家时，忘了带钥匙。”

“那又怎么样？”酒吧招待被逗急了，问道，“难道她还能回来取钥匙不成？马尔蒂诺夫，你看他完全疯了。”

“也许是疯了，”海关职员若有所思地说，“总之，我们没有处在他的地位，很难体会得到，你说是不？”

“唉，谢天谢地，但愿如此。”

“佩绍，你别以为这不是爱情。直说了吧，我不相信这是件蠢事。”他深深地打了个呵欠，一颗金牙闪闪发光。“有时候，我一边看他一边在想，要是我的妻子也飞上天回不来，那……”他突然停住不说了。这时，白发人正朝酒吧间走来。酒吧招待用白毛巾在工作台下擦了擦手，等着白发人过来。但是，白发人在柜台前面收住了脚步，一句话也没说。他的眼角和嘴边确乎布满了丝丝皱纹。他把手插进衣兜，那串钥匙响了一下便没声了。他朝他们点点头，把那束菊花准确地放在咖啡机前，

“外面还在下雨。”酒吧招待搭话说。

白发人没听见他的话，转过身，沿着边界上镀镍的钢管走了。

“把这束花放在这儿，”酒吧招待故意大声嚷着，好让检查员们都能听见，“就象往我的坟上放花。”他抓起花，顺手扔进了垃圾箱。

“总之，”海关职员马尔蒂诺夫把制帽往下一拉，慢吞吞地、耐人寻味地说，“谁也不知道他该献花的那座坟墓到底在哪儿，如此而已。不管是在苏黎世城边，还是在奥兰多，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酒吧招待皱着眉头不作声了。检查员们呆在自己的窗口里面毫无反应。海关职员搔着脖子笑笑说：

“佩绍，再来一包饼干！”

（张春荣译）

帕·维任诺夫

我的爸爸

〔作者简介〕 见本书《讨厌的家伙》。

一

他比我起得早，总是第一个抢占盥洗间。只要他头天晚上喝过酒，我就准知道他第二天早晨会闭着嘴唇，没完没了地奏出他令人费解的乐曲。盥洗间的四壁内发出某种特殊的共鸣，因此，里面的响声就象憋在贝壳里一样。他一直演奏到咳完为止。他一咳就是半天，咳得胸腔里翻江倒海。就这样，直到把盥洗间的镜子和墙壁糟蹋够了后，他才安静下来，往他平滑的胖脸上抹些真正的洋香皂。

我无精打采地起了床，钻进厨房。查娜象往常那样，连瞅也不瞅我一眼。可我今天早上觉得，她在为什么事生气，铁青着瘦骨嶙峋的脸。我还小时，她常拍打我几下，可现在，

她大概苦于够不着我瘦削的脸。不过，我有点不大在乎地坐在壁铺上，这样，我们两人就差不多一般高了。她象猫似的“呼呼”了两声，凶神恶煞地冲过来，但没有动手。

“是你往脸池里撒尿啦？”她攻击道，用她的一双绿眼睛瞪着我。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咧开嘴笑了。

“真有意思，不晓得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说。

“我就是知道……”

“这么说，喝了个酩酊大醉！”我声音很高，“连水都忘了放啦。”

她的眼睛射出凶光，使我感到害怕。

“要是我是你爸爸，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她象男人一样吼叫起来，“真有意思，不知你这是指谁！”

“反正不是指你。”我幸灾乐祸地说。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这个只有骨头架子的干巴女人，还没有我的肩膀高。但论起辈数来，她还是我的姑妈——我爸爸的姐姐哩。查娜不住在我家，她只干到中午。她男人每天十二点准来。他与世无争，胆小怕事，几乎没有胡子——是澡堂里的搓澡工。他闷声不响地吃完前一天的剩饭，就象狗一样躲到屋角里。在我爸爸快回家时，他们就走了。

“我们清清白白，规规矩矩，”她在厨房里手脚利落地忙碌着，“我们当过孤儿，可表面看不出来……你爸爸当年是全城最爱整洁的小伙子。”

“他现在也是个花花公子。”我回答说。

她又转过身来，瞪我一眼：

“不许这么说你爸爸！……谁不尊敬老子，谁就不是人！”

我突然意识到，今天不该惹她生气，于是住口了。而且，同她争论一个人也是危险的——她可能搬出老掉牙的处世哲学。她鄙夷地一摆手，继续唠唠叨叨，连瞅也不瞅我一眼。

“我不晓得这世道要变成啥样，总之是变得不大好。你这种人休想建成什么社会……休想，休想！”

“我压根儿就不想活受罪。”

“那倒不赖，”她气呼呼地回答说，“要不，这个社会就全叫你糟踏啦……”

“今天吃软煮蛋吗？”我巧妙地问她。

她端来刚烤的面包。不管怎么说，此人比世上任何人都更关心我。

“要我说，能不能给我三块钱？”过了一会，我问道。

她没有马上回答。

“那两块还没还我。”

“没关系，我会一起还给你的。”

她知道，我确实会还她钱的。查娜是我唯一的债主，我以前有借有还，一个子也不少，因为我清楚，我最缺钱的时候还可以再向她借。她在给我钱时，总是愁眉苦脸，嘟嘟囔囔，不过她知道，我会诚心还她的。

“好吧！”她说。

我的计划顺顺当当地完成了一半。但是，由于另一半计

划不取决于查娜，而取决于我爸爸，看来要落空。隔不一会，他进了厨房，象平常那样不打个招呼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的脸红扑扑的，眼睛也通红，但总的说来还有精神，兴致也高。他同我不一样的是，喝了酒后看上去情绪很好，皮肤圆润，眼睛炯炯有神。而且，他跟所有身材不高的男人一样，看上去很年轻，头上找不到一根白发。直到上个月我才发现，这不仅仅归功于巴尔干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他隔一段时间就要用小刷子往自己头上抹些黑色染发油。当然，我一发现染发油就往便池里倒，他于是又买新的。我再倒，他就对查娜发一通脾气，事情也就过去了。总不能老是指桑骂槐地找一个女人出气。

查娜一声不响地给我爸爸端来早餐。他仍然不看我一眼，仿佛在这个世界上，在这间屋子里，我这个人并不存在。他结实的牙齿使劲嚼着食物，一双近视眼的肌肉拚命跳动。一般说来，他这些地方的肌肉十分发达，脸上总是显得紧张，就象随时都会咳嗽的人一样。要不然，他的面部表情就很平淡——说得更准确一点，不是平淡，而是毫无表情。我总是想，这是他的习惯，因为他内心深处并不平静和冷静。

“这洛普·德·维加① 是什么人？”爸爸突然问道，“是旅行家吗？”

“啊，那可不是……旅行家叫瓦斯哥·达·伽马②，”我回答说，“那人是著名作家。”

---

① 洛普·德·维加，西班牙剧作家。

② 瓦斯哥·达·伽马，葡萄牙航海家。

“写过什么书？”

“作品很多，”我笑道，“其中约有两千个剧本。”

“有那么多？”

“就这么多……”

他想了想，皱起眉头：

“说不定那时候不象现在这样有工资……”

“你说对啦，”我答道，“不然的话就会只写几个剧本，而且写得很糟。”

他没有觉察到这是在刺他——他一味沉默，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他用刀子切下一大块黄油，熟练地抹在面包上。他那张馋嘴总是有点令我生气。

“哎，别浪费黄油和鸡蛋好不好，”我慢条斯理地说，“你那把年纪，不该贪食。”

我知道，一提他的年纪，他准恼火。

“为什么？”他没好气地问道。

“胆固醇高！……对脑子毫无好处！”

“这是医生的胡说。”他很自信。

“说得对！”查娜在他背后插进话来。

但是，我爸爸竟没有瞅她一眼。他从不看她。为了坚持自己的论点，他嚼起夹心面包来更加使劲。嚼完面包，他好象想起了什么，又自信地补充说：

“我认为，不是有了文明才有黄油，而是相反——有了黄油才有文明。”

我略感奇怪地瞟了他一眼——他从不喜欢作这种概括。

"你是这样想的吗？"

"正是这样！……在你看来，哪儿产生天才？譬如说，歌德！……或者莎士比亚！……那些民族吃饭时少不了黄油！"

"很可惜，丹麦和瑞士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天才。"我喃喃地说。

"未必如此！……"他怀疑起来。

"你想想看吧……"

他又不吭声了。当然，不管如何绞尽脑汁，他都想不起来。

"要我说，爸爸，今天晚上能把车给我用用吗？"等我们挪到前厅时，我问他。

"干什么用？"

"跟几个朋友到'马蹄'饭店①去……"

他正在穿夹大衣，我无法看清他脸上的表情，等他最后转过身来，我发现，那脸色一点也不好看。

"你们到那儿喝酒，会把车开下悬崖的。"他气呼呼地回答。

这就是他的风格——虽然他并不认为，我们会掉进深渊。

"我不喝酒。"

"那谁知道。"他紧锁眉头。

---

① "马蹄"饭店，索非亚市郊维多沙山上的一家饭店。该饭店建在峭壁之上，形似马蹄，因而得名。

"保证不喝酒……"

"我懂得当今年轻人的保证值几个钱！"他照旧气呼呼地问答。

"我没有跟你谈当今的年轻人，"我说，"我是说自己。你不承认我是你的儿子吗？……"

我对此人了如指掌：他以为谁也猜不透他。因此，他的一切希望主要建筑在这一点上。他又想了想，换了另一副面孔。无论如何，他是不会承认自己的短处的。

"听我说，我的孩子，问题是我今晚要用车，"他心平气和地说，"要陪几位外宾出去……"

"既是公事，干吗不要公车？"

"你别对我指手划脚！"他严厉起来，"明天给你。"

"好吧。"我沮丧地说。

这是个永远使人纳闷的"明天"……明天决不是今天——这是我们的一句格言。虽然这句格言是被我们赶走的斯特拉希尔想出来的，可它仍然管用。

"这个'马蹄'饭店里有什么？"我爸爸问。

"没什么，有支波兰乐队。可是，除了夜总会，就只那儿可以跳摇摆舞……"

"太重要啦！"我爸爸酸溜溜地回答说。

他小心翼翼地戴上礼帽，站到穿衣镜前。他的眼睛里第一次流露出人的神情。他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模样，好象极为满意。他用脚后跟轻轻一转身，一声不响地出去了。

我愁闷地叹了口气，钻进了他的书房。这是一个不大的、

老式的，然而又是十分结实的、紫檀木结构的书房，它大概是在二次大战前建造的。那时，我爸爸比律师事务所的职员大不了多少。书橱一直顶着天花板，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他那个专业的杂志和书籍。最近，他的确又开始看书，可我怀疑，这未必对他有什么好处。而且，看来就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这种别人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武器，因为大部分书他都只看了一个开头。书橱的右边挂了一幅达纳依尔·德切夫出色的绘画。他们当初是朋友，虽然我并不明白他们怎么就有了交情。我坐到他书桌后面舒适的软椅上，倚着椅子的靠背。我干吗要进他的书房，坐他的软椅？我干吗要翻他的抽屉？这可要分析分析。或者无需分析，因为一分析就会把我同他拉扯在一起。对啦——还是需要分析分析。可我现在没有心思分析，我早晨的脑子懒得很。

左边几个抽屉空空如也。但是，我在中间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把备用的车钥匙和一个漂亮的女用搪瓷打火机。这个打火机大概是昨天晚上外宾送给他的。今天早晨，他压根儿就没有进过书房。要是他昨晚喝多了酒，他现在可能以为他把打火机忘在什么地方了。我要把打火机揣几天。要是在此期间他不提它，我就把它送给比斯特拉。我把打火机连同备用钥匙装进了口袋。右边的几个抽屉上了锁，这些抽屉里装着他的秘密。抽屉的锁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是斯特拉希尔没被我们赶走，他准会在半分钟内把它们打开。但是，在这以后，消息当然会传遍全城。

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起来，我被吓了一跳，然后抓起听

筒。

“您找谁?”

“你是埃夫格尼吗?”她细声细气地问道,但声音清晰而又动听。

“是我,妈妈……”

听筒里有千百种声音混在一起,嗡嗡嗡地响了一阵。

“你爸爸在家吗?”

“上班去了。”

“他不在,可能更好,”顿了一下,她说,“你有空吗?”

“有空,妈妈……”

“那就请你回家来一趟……”

“你为什么没去上班?”我不安地问道,“该不是生病了?”

“没有,没有——我正休假……”

“好吧,我马上就去。”我回答说。

我放下听筒,深深吸了口气。后来,当我猫下腰,让她吻我的面颊时,她两眼盯着我——一双安详而温柔的眼睛。周围很静。我心里隐隐作痛。因此,不管我有多爱她,我平时也不来这儿。自从她离开了我们,我就怀着这种感情——虽然这种感情现在不象当初那样强烈了,但仍然使人觉得象是想到死亡那样难受。不,她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感情。也许这是因为她并不孤独,并不只为自己活着。她的脸上现在露出令人奇怪的平静和温柔的表情——她爱我,但不理解我——要不然,哪会有那么平静?

我脱了外衣,就近坐在一个凳子上。

“别，别坐那儿。”她说。

“为什么，妈妈？”

“这儿舒服些。”

“好吧。”说着，我挪到沙发上。她背朝着我，轻轻开了橱柜的玻璃门。

“想喝点樱桃露吗？”

“好吧，只是——能不能来点白兰地？”

“也好。”她说。

喝了白兰地，当然心里会更难受，不过，也许过一阵，这感觉会很快消失。

“妈妈，你买电视机啦？”

“买啦，”她第一次微笑了，“一杯太少了吧？”

“少了点，但也没关系，”我回答说，“你就把橱柜门敞着。”

她审视我一眼。

“你该不是学会喝酒啦？”

“没有，没有——没有这种危险……”

“不要上瘾，”她不慌不忙地说，“你的习惯象我们。我们谁也不酗酒，酗酒有害……”

“这白兰地是保加利亚的吗？”我问道。

“不是，”她回答说，“是彼得从博览会上带回来的……”

彼得是她的丈夫，可她很少向我提到他的名字。我倒了第二杯酒。从她脸上的表情来看，她对此既无反对之意，也无怀疑之感。她坐在我对面，双手放在胸前。

“我想先说说干吗让你来，”她开口道，“不管怎么样，这对你是件好事……”

她喜形于色。十年前，她和我爸爸各存了一万列弗① 的保险金。根据保险条件，只有在他们当中的一人死后，我才能拥有这些钱。由于保险期已过，这些钱仍然存在他们帐上。不过，事情还没有完结。

“这些钱现在是我的，但同时又不是我的，”她说，“因为我已给了你……用你的名字存在储蓄所……”

她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红本，递给我。我惊讶地把小本翻开。存款折里除了写着我的名字外，还写着一万列弗新币。

“这就是说，我想取就可以取，是吗？”

“是这样，傻瓜，”她抚摸着我的头发，“可不要一下子花光……你都二十岁了……象个大人啦……要是没有钱花，怎么象大人……”

我想了想。

“要告诉他我有这些钱吗？”我不好意思地问。

“我想，该告诉他。”她不慌不忙地说。

“干吗非得告诉他？”我问道，“他干吗从来不提他那笔保险金？”

“你是想问，他为什么不给你吗？”她笑了，“这是另一码事，他养着你……”

---

① 列弗，保加利亚货币名，一列弗略大于一美元。

“可他起码该跟我说说。”我反驳道。

“好象你还不了解他，”她说，“瞒着你，这倒没有什么！……至少该给你一部分钱！……”

她闭上嘴，沉思起来——好象在想别的事情。我乘机倒了第三杯白兰地。

“你见到过利利吗？”她突然问道。

利利是她同第二个丈夫生的女儿。

“是呀，有时见到她……干吗问这个？”

她显然踌躇起来——要不要告诉我呢？

“这孩子出了什么事，”她忧心忡忡地说，“好长时间啦，心神不定……而且在大学里也不顺利……”

我想了想，可什么也想不出来。

“我帮你问问她，”我最后说，“好吗？”

“也好，”她说，“只是要委婉点……”

二

他们坐在橱窗的蓝色窗帘后面的一张普通餐桌旁。当我坐下时，三人中只有比斯特拉盯了我一眼。我陡然觉得，她那目光犹如牙科医生飞速旋转的钻头，直钻进我的心里。我过去就曾惊讶地发现，这个非凡的女孩子竟有本事用她那闪电般旋转的目光，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在你心上钻眼。

“你怎么啦？”她好奇地问。

“没什么，佩佩。”我不动声色地回答。

但她不相信我的话，长时间垂着眼睑，默默地审视着我。我的衣兜里确实装着二十张五列弗的崭新钞票，可这能改变我的形象吗？从外表看，比斯特拉不象一个纯洁的简单的姑娘——她是一只小麻雀——体格脆弱。不过，她那张脸倒是显得刚毅，甚至有点丑——就象一个迷人的小老太太。我把鼻子凑到她耳朵后面——这是世界对我最丰厚的赏赐。

“想喝点吗？”我问，“来点好喝的。”

“这儿没有什么好喝的。”她答道。

“有还是有……”

“你搞到钱啦？”

“够花的。”我说。

“偷来的！”她满有把握地惊叫道，“就象拉兹科尔尼科夫那样干掉一个老太婆……你一进门，我就看出你心虚……”

弗拉多和让终于停止了交谈。对他们来说，事情非常简单——是我靠自己的爸爸使他们得以逍遥。但是，从他们的样子一点也看不出他们因此而责怪我。四个大学生哪有别的收入呢？今天轮到我干，明天轮到他干——这种聚会总得延续下去吧。让坐在我对面，怡然自得地抽着烟——他身穿玫瑰色衣服，系着领带，花花绿绿的，就象一面橱窗。在我们两人之中，他常有钱。弗拉多呢——从不掏钱。不管有多少钱，他总是一人花，真可恶——拿去买书。

“四杯杜松子酒，”我对女服务员说，“加冰。”

“加冰，是方冰吗？”她板着脸走了。

这个愁眉苦脸的女子总跟我们过不去，眼里只有成年顾

客。她显然认为，这不是我们呆的地方。可依我看，她只配去卖牛杂汤。那两位又哓哓不休地谈了起来。实际上，只有弗拉多在说话。让耐心听着。不过，闲聊时，让从来就不肯听。我也耸耳细听，虽然我对科学没有多大兴趣。我的兴趣在比斯特拉，可她又不喜欢有人打扰。她最大的乐趣是东张西望。

弗拉多正在解释癌病毒侵入细胞的方式，他讲得活灵活现，似乎他能用肉眼看见所说的一切。他认为，侵入细胞的仅仅是病毒的核质。细胞内两个核质的作用是一样的——它们是各种生物电流的导体。

“事实上，”弗拉多郑重其事地说，“这些核质犹如微型存储器，里面装着全部遗传信息……”

我惊讶地瞅了他一眼。这个不修边幅、穿着肮脏的风雨衣的小子还真有点头脑。再往下，一切都合乎逻辑——病毒核质取代了细胞核，进而开始传递信息，使细胞开始分裂，病毒任意繁殖。

“这种寄生巧妙无比！”让感叹道。

“这是你瞎想的吧？”我问了一句。

“重要吗？”弗拉多谦虚地问。

一个可怕的人物！要给他点颜色！

“你现在听我说！……在你看来，抗生素只能破坏病毒的蛋白质外表！……数亿个核质却安然无恙地在血液里游动，是这样吗？”

“正是这样！”弗拉多高兴地叫道。

“那么，人类没有死绝，这又作何解释呢?”

“当然！……不会死绝！”他洋洋得意地回答。

弗拉多一扯到控制论，似乎就胡说八道。或者只有他才不胡说八道。他认为，人的生物性和人的意识发展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可悲的、无法解决的矛盾。他断定，一千年后，地球上除了机器人外，再不会有别的生物。这些机器人将具有人的意识和我们无法知晓的精神生活。它们的智力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它们永生不朽。它们自身发展的问题也就是生产它们时的技术完善问题。有意思的是，比斯特拉在听这一切时，总是心怀怨恨，似乎想抠掉我们这位蹩脚的天才的眼睛。她现在又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

“别扯淡啦！……最好是想想晚上怎么办吧。”

我建议坐出租汽车上山，可这不合大伙的心意。那么着，怎么回来？弗拉多提出去找鲁门——他会说服鲁门拉我们上山。大家心存疑虑，沉默了一阵。

“真泄气。”让小心谨慎地说道。

“谁有汽车，谁就不泄气。”比斯特拉回答说。

我总是弄不明白，她什么时候是开玩笑，什么时候是认认真真。不过，她的干预总能解决问题。得啦——去找鲁门。当然也得找兹维兹达——不能三个男人围着比斯特拉转，虽然她是乐于承担这一重任的。在我们作了周密计划后，利利带着一个男青年进了甜食店。这个青年矮矮的个子，穿一件短衫，满脸胡髭。她象通常那样穿得很得体，总之是受看——尽管她光滑的脸上没有一根条线——除了一张长圆脸和

一对明亮的眼睛外，什么也没有。利利看见我，朝我微微动了动嘴唇，算是跟我打了招呼。这也意味着微笑吧。

“那位跟利利在一起的是谁？”过了一会，我问。

“一个乡巴佬。”让轻蔑地答道，“在一群笨蛋中冒充好汉。他要他们相信，女人是一钱不值的……可他们煞费苦心要向他证明，事情恰恰相反……”

我又看了那人一眼。我不喜欢那种头发搭在额上的人——而且是一头肮脏的、黑糊糊的头发。他的头部的这一部分完全看不清楚。他坐在那儿，死死抵住桌子，手掌托着下巴，正在唠叨什么。利利毫无表情地直视着他的嘴，大概是为他平平庸庸的姿态感到压抑。她头脑愚钝，可很敏感，大概也没有毅力——那个畜牲捕到了容易得手的猎物。

隔了一阵，又有两个家伙进了甜食店，他们跟那位朋友的区别只是，他们长着一头鬈发。不出所料，他们坐到了利利那张桌上。利利毫无反应。

“真够腻味的！”比斯特拉不满地说。

“要我说，佩佩，你喜欢那位吧……跟利利一块的！……”

“哼！”她露出厌恶的样子，根本不瞅那位一眼。

“未必利利就那么可怜。”我象是自言自语。

“不，她好得过了头。”比斯特拉回答说。

“你是想说你不好吗？”

比斯特拉莞尔一笑。她微笑时，那双眼睛就开始象星星一样在眼皮底下闪光。

“我是自由的，”她说，“可以好，可以坏，可以华而不

实，可以多愁善感，也可以天真烂漫——只要需要，怎么都行……”

“怎样理解你这个需要？”

“譬如说，见机行事……”

“这不合逻辑，”我说，“不可能又自由，同时又见机行事。”

“随你怎么想吧！”她毫不在乎地说，“一个人要想自由，就要善于随机应变……”

我不知道利利是什么时候靠到我们桌上来的，我只听见她颤抖的声音：

“我可以坐吗？”

我把她让到我旁边。那位头发搭在额上的家伙瞅着前面，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而另外两个家伙却露出讪笑。我发现，利利在竭力克制自己，不露声色。

“想喝点吗？”

“不，不，谢谢你！”利利说。

她的下巴在微微颤动。我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听我说，咱们到底是亲戚，”我说，“因此，恕我直言……“不理那个畜牲！要有点勇气，跟他一刀两断！”

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满脸通红。

“我说得对吗？”我问比斯特拉。

“金口玉言。”

我抬起利利纤细的手，吻了吻她没有血色的指甲。两串泪珠登时顺着她的面颊滚了下来。比斯特拉毫不动心地瞅着

她。

“总而言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她终于说道，“该怎么办，她最清楚……”

当天晚上七点光景，我们坐上鲁门的汽车奔赴“马蹄”饭店。比斯特拉靠鲁门坐着，而兹维兹达又靠她坐着。兹维兹达脖子很长；这条脖子总是勉强支撑着她一动不动的、仿佛随时都会转动起来的脑袋。她的脸上毫无表情，可她的腰肢很灵活。一般说来，她是逗人爱的，因为她就象叶洛奇卡·柳多叶特卡[①]一样，说起话来分外动听，句子组织得很好，总使人感到快活。天黑了下来，路标在我们眼前闪着绿光，收音机送来莫杜尼奥[②]的歌声，可鲁门在收音机播放爵士音乐以前，一直在拨弄他的衣服扣子。除了弗拉多和让外，谁也不吭声。我不明白，为什么正是这位花花公子断言，《托蒂亚平地》是斯坦贝克[③]唯一耐读的作品。六个缸的汽车轻轻喘着气，左右两边的石块象一只只猫眼盯着我们。我们不是坐车行驰，简直是在秋夜中飞翔。山路上铺满了我们汽车的灯光。盆地上的万家灯火渐渐落在我们后面——它们在秋天的潮气中若隐若现。鲁门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狐狸！”他声音很低，好象怕狐狸听见。

两个姑娘的身子猛地前倾，差点撞上了挡风玻璃。确实有只小赤狐，抬起了它轻盈的右腿。它的两眼闪着荧荧绿光，

---

① 叶·柳多叶特卡，苏联小说《十二把椅子》中的人物。

② 莫杜尼奥，意大利歌唱家。

③ 斯坦贝克，美国现代著名小说家。

犹如两只小灯泡。两个姑娘屏住气息，不敢动弹。

“跑啦！”比斯特拉最后失望地说。

现在，汽车好象直飞山顶，发动机冒出热气。要是我爸爸没有想出那个愚蠢的借口，我就会坐在鲁门的位置上，而比斯特拉就会坐在我身旁。只有那样，她那迷人的小脸才会现出某种顺从。当然，甚至在我一人开车的时候，我也同样感到陶醉。车开得越快，我就越是觉得浑身轻飘飘的。

餐厅里空空荡荡，餐桌上插着小旗，摆着餐具和写着“客满”的白牌。在紧靠角落的乐台上，大提琴伸长脖子，瞅着小小的餐厅。餐厅的服务员们正在那儿摆餐具，插花，从他们小心翼翼的样子可以看出，今晚贵宾将至。斯特凡大叔走近我们的桌子，象往常那样扫了我们一眼。我们订的饮食并不使他为难。

“你真的收拾了一个老太婆？”弗拉多问我。从他问话的口气可以听出，他对此信以为真。

“是呀，”我说，“一个矮胖矮胖的老太婆。”

他还想问我什么——可能是想问我把尸体藏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要运走，等等，可他突然不吱声了。餐厅里走过一个壮实的男子，他穿了一条显得稍短的黑色裤子，以怀疑的目光瞅了我们一眼。接着，一位蓄着娃娃头，穿着红色条花上衣的乐队指挥走了过去。餐厅管理员马上把他推到餐厅内的圆柱旁边，他那浓密的胡子完全是由于紧张而撅了起来。此刻，我全明白了——为了迎接贵宾，主要是为了维护餐厅的名声，今天晚上将只演奏波兰舞曲和华尔兹舞曲。

但是，乐队起初仍然演奏了探戈舞曲。正在这时，我爸爸领着两个文质彬彬的、谢顶的男人和一位漂亮的年轻女人走了进来。他当然发现了我，可他坐到桌旁，没有瞅我一眼。两位客人背冲我们，我爸爸和年轻女人却背冲舞池——他那出人意料的殷勤倒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年轻女人很有礼貌地听我父亲说话，这使我骤然明白了——她不过是他那个局里的一名职员。

“那是我爸爸，”我对比斯特拉说，“靠那女人坐着，穿蓝衣服的。”

“是吗？”她满有兴趣地问，马上就开始打破沙锅问到底。“那女人穿一身绿衣服，当然……很得体。是他的朋友吗？”

“不是……一个小职员。”

“这不一样吗？”

“不一样，不一样，”我说，“他是个胆小鬼，从不假公济私。”

隔了五分钟，比斯特拉说：

“他喜欢她。”

“不，是她巴结他。”我回答说。

“你不懂。”比斯特拉自信地说。

大家跳舞去了——比斯特拉做让的舞伴，弗拉多却同被我们叫做“黑兰花”的兹维兹达在一起。鲁门又喝了一百克白兰地，他厚厚的红嘴唇已被烟熏黑。他盯着兹维兹达。我也瞅着兹维兹达。的确很难在舞池里看到比她更灵活、更有生气的腰肢了。

“冷凉凉的，象条鱼！”鲁门轻声说，好象猜透了我的心思。

“全都这样。”我回答说。

“你身体很棒，”鲁门轻慢地说，“需要逮只小野兽！……”

我的脸上象被泼了一瓢脏水。他仍然盯着舞池，要不准会发现我面部表情的变化。他难道真的比我见识多？或者，他仅仅是说说而已。可比斯特拉不足四十公斤，她没有热情和女人的柔情。当她终于从舞池回来后，我贴着她苍白的小耳朵，轻声问她：

“鲁门当过你情夫吗？”

“那你步他的后尘啦？”她直视着我的眼睛。

“你说什么？”

“这需要打听打听，”她说，“何必盘问我。”

“你看，我这就向你打听。”

“他不配。”说着，她又往我爸爸那张桌上瞟了一眼。

这还能忍受。我从来没有想过她这人到底怎么样，而她也从来没有使我产生反感。当今的女孩子，为了不成为人们的笑料，通常是闭口不谈自己的贞洁的。不过，她还满身孩子气，还很克制，这同“黑兰花”有天壤之别。你看，她就有这么一个特点。

“你爸爸是个美男子，你知道吗？”比斯特拉突然问道。

“胡扯！”我疾言厉色地反驳道，“他简直是个侏儒！”

“不，他一点也不矮，”她说，“你不要拿自己的眼光看人。”

“你也不要拿自己的眼光看人。”我生气地回答。

但是，她根本没有理会我，只是笑了笑，说：

“我要嫁给他。”

我真想朝着她那癞蛤蟆般的小嘴巴猛击一掌。但是看来，她简直为自己的想法陶醉了。

“真棒！”说着，她抓住我的手，“论辈数，我要当你的妈妈。咱们就成天坐在家里，拥抱接吻……由他养活咱们。”

“我真要打你啦！”我心里来了火。

“干吗这样？”她奇怪地问道，把稀拉拉的眉毛一扬。

我没有来得及回答她。此时餐厅里骚动起来，门口出现了一位陌生的人物。我瞅着我爸爸，想看他的笑话。我感到，他极想被来人发现。他当然很有礼貌，嘴角挂着微笑，做出欢迎的姿态。要是他那状似瓦罐的脑袋安在弹簧上，他大概会把脖子伸得象餐厅那么长，凑到来人面前。可是，来人没有发现他。于是，我爸爸从椅子上站起来，冲着餐厅里的夹道，等着来人从他旁边走过。

最后，来人发现了他，收住脚步，同他握手。可是，握手时，他心不在焉地瞅着别处。现在，两个谢顶男人端端正正、很有礼貌地站着。就象我预料的那样，他们是两个外国人。我爸爸把他们作了介绍，来人风度翩翩地同他们握手。此时，女秘书后退半步站着，她显然认为自己不够资格参与这一仪式。

“请对他们说，祝他们成交！”来人转向女秘书说。

她把话翻译过去。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能作多大让步。”一位外国人极其机敏地脱口答道。

来人不大自然地笑了笑，在随从们的簇拥下走过去了。经过乐台时，身着红色条花衣服的乐手们抬起驴一般的脑袋，向他致敬。接着，餐厅里又象往常那样喧嚣，刚才还象塑像般呆立在墙边的服务员们，又开始冒着缭绕的烟雾，满头大汗地忙碌起来。

乐队再次奏起探戈舞曲。我们这张桌上没有人起身跳舞。

“我去邀请你爸爸！”比斯特拉突然说。

“你疯啦？”

我刚抓住她的手，她就一理裙子，迈着飞鸟般轻盈的步子，朝我爸爸那张桌子走去。

“埃夫格尼让您先跳！”她撒谎说，脸上现出迷人的笑靥。

我觉着，我爸爸犹豫了片刻，瞅了一眼小餐厅，然后站了起来。他强作笑颜。可是，一旦混入跳舞的人群，他又平静下来，舞步有条不紊，跳得颇有风度。此刻，我对他恨之入骨。我长吁了一口气。要是他有什么不轨之举，归根到底，倒霉的是我。当然，我再也听不清他们在叨咕些什么。可她扬起小脸瞅着他，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似乎在听他倾吐自己的隐私。跳完舞，我爸爸回到自己桌上，脸上红扑扑的，流露出不加掩饰的满意。比斯特拉回到我们这儿，但没坐下。

“你爸爸要咱们到他那张桌上去。”她说。

“咱们自己有人！”我干巴巴地回答。

比斯特拉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可她的眼睛阴沉下来。

“喂，起来！”她压低声音说。

“走吧，走吧！”鲁门说，“正好可以邀请你爸爸的那位女士。”

我站起来，走到我爸爸的桌子跟前。两个外国人比我预料的要客气得多。当然，他们马上就怔住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如此年轻的爸爸会有这么一个大儿子。女秘书做了翻译，然后很有礼貌地对我一笑。

“说实在的，连我也感到奇怪。”她说，“何况你们父子长得一点也不象……”

“这是唯一使我聊以自慰的。”我回答说。

尽管比斯特拉同我爸爸谈得很热闹，但她仍在听我说话，用目光警告我别说漏了嘴。他却什么也不听。这位比两个外国人年事稍高也更殷勤的我的爸爸问道：

“我们的年轻客人想喝点什么呢？”

“来点威士忌。”我回答说。

“呵，你们会英语？”

“如果您认为这也算英语的话。”

“保加利亚人真是谦逊！”

看来，我爸爸听懂了我们的对话，他皱着眉头瞪了我一眼。

“你就偏要威士忌！”他嘟囔道，“你知道，这要花外

汇……”

“当然知道！……可你别提这个词好不好，他们会听出来的……”

他们真的听出来了。

“呵，外汇，这没关系，”年长的外国人说，“只要有威士忌就好……”

“这儿的威士忌数‘皇后’牌的最好喝。”我回答说。

“真妙！”年长的外国人应道。

后来，在喝完第一杯威士忌后，比斯特拉向我凑了过来。

“要是你不规矩点，我再也不陪你出来。”她轻声说。

我熟悉这个声音，虽然我极少把它装进心里。

“好吧。”我说。

“去邀请女秘书。”

“好吧！”我说。

女秘书很会跳舞，可我心绪不佳。我一声不吭，虽然我知道这很不礼貌。她首先开口说：

“您跳得很好。”

“也许我就只会跳舞。”我回答说。

“您太谦逊啦，”她嫣然一笑，“您英语讲得很好……他们对此颇有印象。”

当然，比斯特拉充分利用了我不在场的机会。我看见她坐在那里，嬉皮笑脸地跟我爸爸谈得很投机。老混蛋上了钩，脸上红扑扑的，就象一条出生才几个月的驹猪。为了不致发

火，我把女秘书带到了舞池的另一边。她跳得入了迷，那圆圆的腰身透出真诚和热情。我渐渐忘了比斯特拉，忘了那群魔鬼。我平静下来，她身上的热气传遍我的全身，我感到头晕目眩。我不知道这是由于她的一片诚心呢，还是由于她紧贴着我的柔顺的身子。可我知道，我生活中少得可怜的正是这种东西。

跳过舞，大家又喝威士忌。我们的两张桌子差不多拼在一起了。年长的外国人就象牡蛎一样紧贴在“兰花”号船上，另一位则请女秘书跳舞。但她很客气地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时不时瞟我一眼，会心地一笑，寻求我的同情。我不敢再邀她跳舞，她的脸使我为刚才的举动感到害臊。与此相反，我的爸爸却同比斯特拉跳得自由自在。我看见他搂着她，五个指头好象要在她背上扎下深根。

随后，我们又跳了摇摆舞。一个喝多了酒的德国褐发女人跳得最欢。比斯特拉同让跳，我同“兰花”跳。两个姑娘都跳得很起劲，只有傻瓜才认为这不成体统。乐手们很兴奋，拚命演奏。我瞟了爸爸一眼，看见了他愤怒的脸，可这似乎使我越发忘乎所以。接着，乐曲慢慢减弱，人们又坐了下来。当我们回到餐桌时，我爸爸再也不看我了。

我感到一阵恶心，便去了盥洗间，想醒醒酒。可是，我并没有醒过来。我站了很长时间，东倒西歪。我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苍白的脸。走出盥洗间时，比斯特拉把我扶到我们的餐桌上。乐队已停止演奏，服务员们正在收钱。餐厅里很闷，一盏盏电灯特别晃眼。比斯特拉背朝另一张桌子靠我坐

着，满脸愁容，一言不发。我想拉她的手，可她生气地把手缩了回去。

“喝点苏打水！”她干巴巴地说。

一些苏打水流进了我的衬衫。大概是由于我的样子太难看了，她十分温和地说：

“要是不能喝，就别喝！……看看你爸爸吧……可别以为他喝得比你少！”

我突然觉得有什么事情想不起来了。室外，一名交通警的中尉对鲁门说，要是鲁门想溜走，他就马上没收他的驾驶证。有人建议我们在饭店里过夜。

“我要回去！”比斯特拉坚决表示。

我爸爸突然从黑暗中钻了出来。看来，我们所说的一切都被他听见了，他要我们等他，说他隔一会就回来。他这么干，大概不是为了我或者弗拉多。他一钻进汽车，我就叫喊起来：

“你们干吗不去没收他的驾驶证！……他也喝了酒！”

有人用胳膊捅了捅我。民警皱着眉头瞪了我一眼。不过，他真的把我送到了爸爸那里。他同我爸爸谈了谈，然后行了个举手礼，走了。

“你真无能！”比斯特拉气愤地说，“马上滚开！”

我到了凉台上，但见满天星星。我害怕看见头顶上的这些星星——我浑身发冷，好象掉进了黑洞洞的冰窖。但是，脚下的灯光却使我感到温暖和亲切。它们闪烁着。它们不懂规矩，毫无秩序。我真想让它们排列成行，迈着正步从我面

前走过。然而，它们一动不动，冲着我无动于衷地闪烁着。我发怒了，咒骂它们，对着它们吐唾沫，可它们对我毫不在意。我哭了，它们变得模糊一片，随后就熄灭了。当我睁开眼睛时，一条光的河流从我面前的克尼亚日沃①直泻而下，汇入市中心的光的漩涡。接着，远方的黑暗中出现了一小片红光。这是人间的仙女座。

隔不一会，比斯特拉走过来，默默站在我身边。我已清醒了一点。

“他们呢？”我问。

她沉默了一阵，愁眉苦脸地说：

“鲁门逃掉了。”

“那咱们怎么办？”

“不是得有人等你爸爸吗？”她气呼呼地说。

昏暗中，我瞅了她一眼，知道她穿着单薄的连衣裙，身上冷。我动手脱我的上衣，可她把我止住了。

“别这样！……偎着我就行啦！……”

我向她靠过去，可她瘦小的身子仍然很冷，一动不动。直到我爸爸把车开来，我们一直沉默着。我以为她会坐到前面去，靠着他，可她却靠我坐着。我爸爸也不说话，满不高兴。他开车又稳又快，拐弯时车轮发出尖厉的、持续的“嘶嘶”声。车灯照亮了前面的一切；石块、树木迅速闪到身后。

“这威士忌害得你好苦！”我爸爸终于说了一句。

---

① 克尼亚日沃位于维托沙山山麓。

“都过去了。”比斯特拉说。

我的确醒过来了。我觉得她紧靠在我右边的身子冰凉冰凉的。

“最后的摇摆舞本来是可以不跳的。”

“为什么？”我问。

“首先，这根本不是舞！”他说，“不是大家都会跳。”

“你是想说，你不会吧？”

“是这样。”

“问题就在这里！”我说，“我决不干你想干的事……我只干你不想干的事。”

我爸爸轻轻扭过头来，瞟了我一眼。

“不害臊！”他冷冰冰地说。

比斯特拉用胳膊捅了我一下。

“伊格拉托夫同志，”她轻声说道，“要把事情全搞糟吗？”

“我可没生您的气。”我爸爸说。

“一点也不？”她表示怀疑。

“一点也不。”

“那好！……如果您想彻底和解，就把我们送到夜总会去。”

他沉默了好一阵，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

“任何一个明白人都不去夜总会。”他最后说。

“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怕败坏自己的名声！”我替他说。

“可您是陪自己的儿子去……说不定……是陪自己的媳

妇去。”她突然说道。

他略显惊讶地在反光镜里瞅了瞅我们。

“不，太晚了，”他冷冷地回答说，“我明天还得向部长汇报……必须头脑清醒。”

“我正是对此表示怀疑，”她说，“头脑糊涂总是更有意思。”

“不，不要逼我拒绝你们，”他回答说，声音里含有抱歉之意，“下次一定跟你们去。”

“真的？”

“真的。”他答道。

汽车在拐弯时仍旧发出“嘶嘶”声。灯光划破了夜幕。

第二天，我等他走后才起床。我今天早晨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当大门嘎吱一响时，我懒洋洋地穿好衣服，板着脸进了厨房。查娜也板着脸瞅我一眼，生气地说：

“既不吃午饭，又不吃晚饭……这象个家吗？”

“不象。”我回答说。

我陡然想起要给她一件礼物。过了一会，她拿着一件精致的毛衣，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难看的脸变得很温柔，使人无法辨认。最后，她吸了一口气，把毛衣叠好，说：

“我就知道，你这孩子有出息。”

她见我坐在桌边，又略显严厉地说：

“洗洗脸，先洗洗脸！……别糟踏自己。”

比斯特拉住得离我们很近。我揿揿门铃，等她来开门。门后毫无动静——令人不快、使人压抑的沉静。她家全都有

工作，要是她也去听课，整套房子就真的空了。正当我准备再按门铃时，我听见门后有点响动。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了比斯特拉睡眼惺忪的小脸。

“是你呀?”她冷冰冰地说,“进来!”

她穿着绸料长睡衣，打着赤脚。我进了门。她家的前厅很窄，就象一只方桶。我紧紧搂着她．隔着睡衣摸着她光滑的身子。她一声不响地挣脱出去。她的眼睛一直在奇怪而又冷静地盯着我。

“够啦!”她平静地说，走进了过道。

我跟在她后面。她雪白的、纤细的脚趾在镶花地板上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她的身子紧紧裹在玫瑰色的睡衣里。我们进了她的卧室。蓝色的被子被掀在一边——她显然是刚刚起床。她又坐在热烘烘的床单上。霎那间，我看见了她细细的、匀称的大腿。

“坐这儿!”她说。

我双手颤抖着，把一个蓝色软凳搬到床头柜旁边。这套房子里只有我们两人，要是我想把她掐死，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在她明亮的目光中，觉察不到她有丝毫危险之感。

“唉，瞧你那样子!”她启齿道,“脸还没洗干净。”

我没有回答。

“昨晚真是太过分啦!”她又补充一句．责备似地举起一个纤细的指头。

“我想，是你太过分啦。”

“我吗?”她奇怪地问,“什么过分啦?”

"可怜巴巴地向我爸爸卖弄风情。"

"嗨——可怜巴巴!"她嘲弄地说,"干吗可怜巴巴?"

"因为当着我的面出丑!"我回答说,"还因为他可能当你的爸爸。"

"太恭维啦,可我有自己的爸爸!"她讥讽道,"要是你整天同乳臭未干的孩子泡在一起,差不多每个男人都会给你留下印象……"

我放声大笑——而且笑得那么爽快。

"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男人!"我轻蔑地说,"他没有一点男人的骨气。"

"你就这么说话?"她挖苦道。

"对,我就这么跟你说……不管我的骨气少得多么可怜,它可是实实在在的……而他呢,什么也没有……他早就没有思想,没有骨气,没有人的良心。除了某种社会地位而外,什么也没有……就象一个瞎子……只要你想擦破他一点皮——他就马上把你扔到阴沟里去。"

"我这才知道,你是这么个人!"她惊讶地说。

我听见她气愤地吐出一口闷气。我的声音沙哑了。

"我可以当最后一个傻瓜,"我叫起来,"可我至少不算残忍,懂得自爱……未必你不明白,你昨天晚上也一败涂地!……"

"什么一败涂地?"她把眉毛一扬。

"还问这个?他不是拒绝了你,不拉咱们去夜总会吗?虽然你低声下气地哀求他。"

她的小脸上泛起红晕，嘴唇发紫，象肿了一样。

“你什么都不懂！”她难过地说。

“我只懂得，你要碰得头破血流的！”我回答说，“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而是因为他死要面子……你说，一个胆小鬼也算男人吗？”

她的眼睛象星星一样闪闪发光。

“我现在就向你证明，事情同你所说的恰恰相反！”她很不客气地说，“把电话搬来！”

我胡里胡涂地给她搬来了电话，她马上把电话机的插头塞进了床头柜上的插座。

“他的直拨电话是多少？”

我象每个真正的傻瓜一样，告诉了她电话号码。她随即用她纤细的指头拨了号码。

“伊格纳托夫同志在吗？……您好！……我是比斯特拉！”她的脸上现出异样的表情——明朗、温柔，“我跟您打电话，您不会生气吧？”

她把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轻轻向我挤了一下眼睛。尽管如此，我仍然清楚地听见了话筒里那个于我生疏的、细声细气的声音。

“是呀！”比斯特拉说，“实际上……我可以向您提供一个道歉的机会……最好是今天……是吗？”她笑了起来，“啊，那好，我晚上七点钟等您……就在‘柏林’甜食店……在显眼的地方……好！”她顿了一会，又说，“要是这样，您不必进来……我能通过橱窗玻璃看见您的汽车。”

听筒里沙沙作响。我呆若木鸡。

“怎么样？”她得意洋洋地问道。

我没有吱声。

“瞧你，屁也不懂。”

我勉勉强强听见她在说话。

“你真的要去那儿？”我终于问道。

也许是我的声调使她受到了感染，她审视了我一眼。

“不！”她犹犹豫豫地说，“我还是要去，去道歉……要不就是孩子气……”

我怎么可能知道，她只是去向他道歉呢，还是根本不去？……我躲在停车场的小亭后面，真丢尽了脸。他准时来了，把汽车停在甜食店前面。过了一会，她急匆匆走出甜食店，旋即又钻进汽车，坐在前排座位上。我分明看见她在钻进汽车前环顾了一下四周，似乎觉察到我就躲在附近。

汽车开动后，向右一拐，朝着通往普罗夫迪夫的公路疾驰而去。我屏住气息。我躲在角落里，再次看到汽车穿过了索非亚大学前面的十字路口。然后，汽车的尾灯又在鹰桥那儿闪了几下，混进密密麻麻的红点中。

此刻，我除了感到无限的羞耻外，再无别的感觉。我拚命奔跑，唯恐人们看见我脸上的眼泪。野栗树的树荫下黑糊糊的，周围不见行人。我停下来，用风雨衣的袖口擦去脸上的泪水，竭力使下巴不再颤抖。最后，我空虚的脑袋里产生了某种想法。

幸好鹰桥那儿还有几辆出租汽车。

“去幡恰雷沃[①]！”说着，我冷得把身子缩成一团。

要是在“天鹅”饭馆找不到他们，那就再去“金鱼”饭馆。不过，两个地方都得看看。我觉得出租汽车开得太慢，它那破旧的外壳发出难听的响声。汽车上的里程表不时“格登”一响，鲜红的玻璃后面现出白色数字。

“能给我一支烟吗？”我问司机。

“可以。”司机回答说，仍旧两眼平视前方，把胳膊在肩膀上一弯，递给我一盒烟。

我觉得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最初的愤怒已完全平息，剩下的只有耻辱。到了第一家饭馆，我在出租汽车里看见了端端正正地停在停车场上的我爸爸的汽车。

我不知道我是否觉得轻松。不过，我至少知道我该怎么办。要紧的是保持镇定，顺乎自然地跟他们打招呼，坐到他们的桌上。不管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他们总不会把我撵走。他们的阴谋诡计顷刻就会落空。我站在明亮的玻璃门前，灯光晃眼，但我没有进去。存衣处的服务员睁圆眼睛盯着我，我觉得，他随时都会要我进去。不，我站在门外，没有进去。我命令我的手去抓镀镍的门把，但它不听话。我要它伸出去，可它僵住了。于是，我折转身，掏出那把备用钥匙，发动了汽车。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是最好的一着棋。要是把车开走，他们就什么也干不成。在饭馆里干不成，在街上也干不成。

---

① 幡恰雷沃位于索非亚南郊。

汽车飞驰在回城的路上，我想象着他那张愤怒的脸，想象着他会有什么想法。他将象所有的小人那样，忍气吞声。他还会怨恨她，因为归根到底，这一切都是由于她的任性造成的……

车出蟠恰雷沃，一名交通警示意我停下。一开始，我想到自己有驾驶证，就减慢了速度，可我后来又猛地加大了油门。不言而喻，要是我现在出示证件，我爸爸就会知道是谁开走了汽车。我再无选择的余地。汽车在漆黑的公路上行驶，潮湿的柏油路面在车轮下"嘶嘶"作响。我时不时瞅瞅反光镜，唯恐交通警开他的摩托车来追我。现在，要是我发现后面很远的地方有一盏车灯，那是最危险的！那比什么都危险！……

只是过了戈鲁勃利亚内，我才放慢了速度。我觉得，虽然我两手在微微颤抖，但我的内心十分平静。一辆卡车迎面驶来，开着大灯。我几次闪灯向它发出警告，最后，大灯熄灭了，黑暗中现出了巨型卡车的影子。我打开自己的车灯，发现正好在我的车前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我猛地一转方向盘，想躲开他，可右边的挡泥板撞了上去，把他甩到了路边。

我把车停下，浑身打着哆嗦。我慢慢打开车门，走下车去。周围静极了，一片漆黑。卡车红色的尾灯迅速远去了。我胆战心惊地在黑暗中朝公路右边一看，但什么也没有看见。

就在这时，远处出现了一盏车灯。同时，一个闷声不响的、可怕的人影在黑暗中站了起来。不，我没有勇气看那鲜

血淋淋的人头，没有勇气认罪，没有勇气受苦……我吓得心惊肉跳，赶忙钻进汽车，发动马达，加大油门。大马力的发动机带动汽车，汽车加快速度，在浓重的雾气中风驰电掣般前进。

（佘志和译）

编 后 记

本书选辑了保加利亚当代二十三位作家的二十六篇作品。所选作家大多数是季米特洛夫文学奖金获得者，其中既有解放前就蜚声文坛的老作家，也有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优秀中年作家，还有近年来步入文坛的新秀。他们在本国乃至世界文坛上享有一定声誉。

本书所选的作品，从创作时间上看，包括解放后近四十年。其内容有的反映保加利亚解放初期的社会变革，有的描写新的社会风貌和一代新人的成长，有的表现当前社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保加利亚解放后各个时期的矛盾和冲突，展现出一幅幅颇为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不仅具有一定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代表了不同流派和风格，基本上反映了保加利亚当代文学的发展倾向。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资料有限，选编工作中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竭诚希望读者指正。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
作者＝余志和　　樊石　　金丕良等译
页数＝４２２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４３９
出版日期＝１９８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